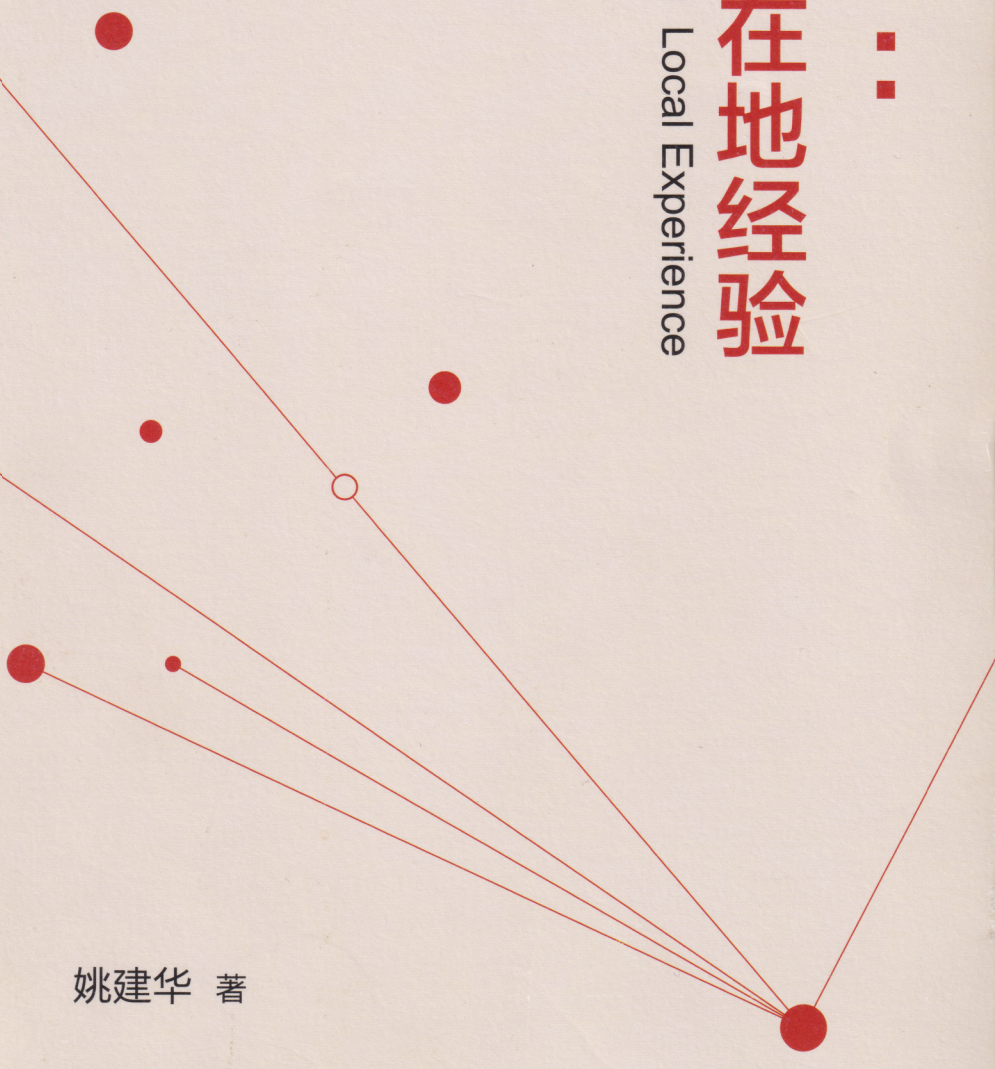
Digital Labour

当代马克思主义
与媒介化社会
研究丛书

SERIES OF CONTEMPORARY
MARXISM AND THE SOCIOLOGY
OF MEDIA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Theoretical Frontiers and Local Experience



姚建华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凤凰传媒
PHOENIX MEDIA

Digital Labour:

Theoretical Frontiers and Local Experience

在传播新科技的突飞猛进将劳动数字化、数字技术使用者“劳工化”的趋势下，数字劳工作为最新的分析范畴，逐渐成为传播劳动研究领域的前沿。本书通过对数字劳动研究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两个维度的系统性分析与探讨，希冀建构经典与实践、理论与现实的对话场域。一方面启发读者深入思考数字劳动问题，充分发挥经典理论的思想潜能，以此来穿透实践与现实，同时为相关研究者打开广阔的想象空间，也使本书具有更强的否思性和前瞻性；另一方面让读者切身感受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二元张力，以实践引导对理论的理解，更为深刻地洞察资本、技术与劳动三者之间多重复杂的勾连关系。

江苏人民出版社
天猫旗舰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

凤凰书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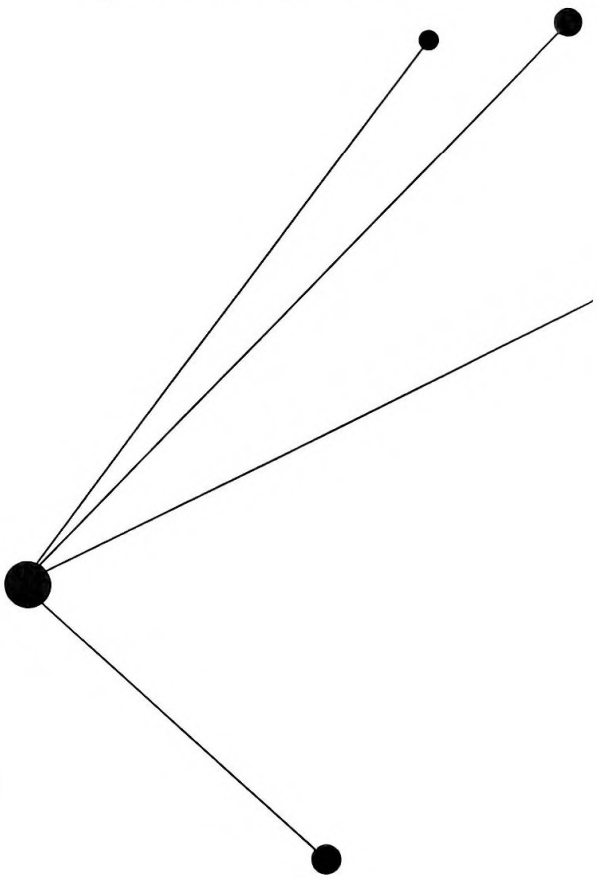
ISBN 978-7-214-26611-8
9 787214 266118 >
定价：58.00元

当代马克思主义
与媒介化社会
研究丛书

SERIES OF CONTEMPORARY
MARXISM AND THE SOCIOLOGY
OF MEDIA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Digital Labour: Theoretical Frontiers and Local Experience



姚建华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 姚建华著. —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12
（当代马克思主义与媒介化社会研究丛书）
ISBN 978-7-214-26611-8

Ⅰ.①数… Ⅱ.①姚… Ⅲ.①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
论—研究 Ⅳ.①A811.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1)第 201992 号

书　　名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著　　者	姚建华
责任编辑	史雪莲
责任监制	王　娟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邮编:210009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扬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15.75　插页 2
字　　数	198 千字
版　　次	202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26611-8
定　　价	58.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序一　“数字劳动”新解(张涛甫)　1

序二　重估米尔德里德的活计(罗小茗)　10

导言　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数字劳动研究　1

一、数字劳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新现象与新理论　2

二、本书结构与主要内容　9

上篇　数字劳动与理论前沿

第一章　数字劳动:劳动与媒介化的交叉视角　17

一、数字劳动与劳动的“媒介化”　21

二、媒介的“劳动化”:你使用媒介,还是媒介使用你?　36

三、可能的未来:非异化劳动之实现　42

第二章　全球数字劳动研究的现状与中国语境　46

一、全球数字劳动研究的现状　47

二、数字劳动与中国语境:本土学者的思考与贡献　62

第三章　零工经济、数字劳动与“不稳定无产者”　66
一、零工经济的全球热潮与零工工作的勃兴　67
二、零工经济、数字劳工的困境与“不稳定无产者”的形成　72
三、零工经济劳动者困境的多元化解决策略　77
第四章　下一代互联网、数字劳动与工作/后工作世界的未来　81
一、替代与创造：众说纷纭的现状　83
二、新“卢德运动”会出现吗？　87
三、后工作世界人类社会的收入分配　95
下篇　数字劳动与在地经验
第五章　全球外包、数字劳动与劳动控制　103
一、全球外包实践与众包平台的兴起　105
二、在线众包平台的运作机制与劳动控制　108
三、网络社区：来自托客的回应　120
四、小结与展望　124
第六章　众包新闻、数字劳动与灵活积累　127
一、众包与众包新闻　128
二、资本积累、劳动力后备军与灵活用工　133
三、众包新闻中的灵活积累研究　139
四、小结与展望　144
第七章　自动化新闻、数字劳动与技能变迁　148
一、自动化新闻、新闻生产与数字劳动　151
二、研究方法与案例介绍　155
三、技能变迁：由去技能化向再技能化的转型　156
四、新闻劳动：作为趋势的多技能化　164
五、小结与展望　165

第八章 平台经济、数字劳动与情感关系 167

一、平台经济、情感劳动与亲密关系 169

二、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176

三、建构亲密关系："虚拟恋人"的情感劳动过程 178

四、网络空间中亲密关系的双重"虚拟性" 181

五、小结与展望 184

结语 数字劳动研究及其未来 189

一、数字劳动者的主体性研究 190

二、数字劳动与社会公共性研究 193

三、数字劳动与交叉性分析方法 194

参考文献 197

后记 我与劳动研究的故事 222



序一

“数字劳动”新解

张涛甫

如今，世界似乎变得愈加复杂了。一因世界本来就复杂，洞穿世相，远非常人所能，“在世之在”非人之目力和脑力所及；二因人把世界弄得复杂。人为之因增厚了人世之果，致使世界堆积了太多人为之物，也招致诸多认知之障。

面对复杂的世界，因能力所限，我们只能分而治之，以学科、知识细分之名，将世界知识分割成星罗棋布的知识“茧房”。于是，知识界的生产积累越多，知识间性的壁垒越多且厚，知识钻井越多，口径越细、越深，被困在知识深井中的知识者头顶上的天空就越小。

当今知识星盘中，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格局和实践视野是阔大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受惠于马克思的开源之功。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乃至人类社会的先见之明和深刻洞察，及其提出的重大命题和解题方法论，至今仍让毛细化的知识界受益。窃以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是一个没有走远、走失的学科。因其离马克思的理论之源近，其视野是阔大的，理论刀锋也是锐利的。

传播政治经济学进入中国，给中国传播学注入了一股异质性的知识激流，也给中国传播学理论工具箱增添了锋锐的斧凿。但是，在中国传

播学理论版图中，传播政治经济学所持的份额不多，与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处境相似，它虽是锋利的存在，但其理论光圈小，在知识界的辐射半径不大，在实证主义理论方法的巨大光晕之下，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批判的武器”，时有英雄迟暮之感。

不过，与那些“抓小放大”的分众化知识“茧房”比起来，传播政治经济学却能坚持“抓大放小”，抓住那些重大理论命题，诸如资本主义、劳动、资本、剥削、交往、权力、意识形态等理论命题，同时关注实践与理论之间的联结，强调理论的现实关切和价值及物性，并在理论和实践的互动中激发理论的活性和想象力。

在当前国内传播学界，活跃着一批学有所成、渐露锋芒的青年学者。他们在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春耕夏种、日积月累，收获了丰硕的成果，可谓“喜看稻菽千重浪”。在这一批青年学者中，建华是颇为杰出的一位。建华在传播政治经济学巨擘文森特·莫斯可教授门下苦读多年，受到系统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训练，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关心的重大问题保持敏感，能够拿捏好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感，既没有内卷在理论的茧房里，也没有沉浸在经验表象里，被表象问题遮蔽其理论洞见与清醒。近些年，他一直致力于“数字劳动”研究，创获颇丰。其专著《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即是一项颇具理论分量和实践价值的研究成果。

数字技术在快进键上不断迭代，传播技术进化论已超出传统理论所界定的“工具论”范畴，其边界已超出“人体延伸”的范域，数字技术已经成为“元技术”意义上的技术体系，它给人类劳动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诚如建华所说，“技术”不再是功能主义传播研究中被置于中立位置的工具，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节点。其影响所及，改写了人类社会的固有社会逻辑和传播逻辑。

“数字劳动”问题是由新传播技术革命引致的簇新命题。随着数字技术和新传播技术所带来的深广影响，这个问题变得愈加突出和尖锐。虽然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技术、劳动等问题有明确且深刻的界定，但

“数字劳动”的内涵与外延远远超出了经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域，也溢出了马克思之后诸多理论者对劳动价值论的阐释。

“数字劳动”作为一种“后劳动”，其所蕴含的复杂性远超出传统劳动，而且，它还在以动态的方式变化着。对此，建华作了如此界定：数字劳动囊括了信息与传播技术（ICTs）和数字技术产业链上的所有劳动，涉及数字媒体生产、流通与使用所需的各种体力和脑力劳动，如 ICTs 和数字硬件设备的原料采掘、加工组装等体力劳动；软件开发、在线平台的设计与维护等脑力劳动；以及互联网平台在线用户的生产性消费行为；等等（第 189 页）。因有数字技术的广域性影响，这种“后劳动”问题迅速升级，弥散在泛劳动空间中，而且，虚拟空间劳动问题的复杂性远超经典劳动理论的解释范畴，亟需新生理论的跟进和补给。既有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数字劳动研究，虽然在理论、对象、方法和对策等方面不断创新和丰富，学术队伍也日益壮大，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灯下黑”的问题（第 190 页）。用数字劳动理论概念激活既有理论记忆和解释力，同时重构数字技术语境下的劳动价值和关系逻辑。“数字劳动”理论概念探讨传播新技术如何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不仅嵌入于既有的社会场域中，而且以自己的逻辑重塑与劳动相关的政治经济环境、劳动过程、劳动控制、生产政体、雇佣模式，甚至劳动者的意识形态（第 27 页）。在这些方面，尚有不少理论空间有待开掘。

关注“数字劳动”，自然需要关乎劳动的媒介化问题。与以往传播技术相比，数字化媒介技术实现了时间和空间的空前突破：一是通达空间得到前所未有的延展；二是“传—达”一体化、去时间化。更为关键的是，这场深广的数字传播技术革命引发了一场颠覆性的社会革命，因为它改变了人类最本质、最基本的社会行为：交往行为和劳动行为，而数字劳动正是二者的深度联结。新传播技术是以数字化为基础、不断扩充、日趋扩容的技术革新体系，体系的不断壮大，最终形成了一个持续迭代更新的新技术星丛，正是这种新技术星丛推动新传播技术革命向前加速迈

进。数字化摆脱了物质性约束，依循人的意志和想象力或数字技术自身的智能逻辑进行场景再造和意义赋能。

然而，丰富多彩的媒介化研究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维度——劳动的媒介化。“如今是所有事物都媒介化了的时代”，那么当我们在探究媒介对于既有建制化权力过程的影响时，没有理由忽视“劳动”这一人类赖以存续与发展的最基本实践，“劳动”可以说是当前媒介化研究的空白和盲点（第 25 页）。“数字劳动”与 19 世纪血汗工厂中“面对面”发生的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压迫看似具有延续性，实际上，它在实现方式上已经发生了某种重要的变化——劳动控制如今也被媒介技术所“中介”化了。最明显的莫过于 ICTs 和数字技术在有偿劳动领域的应用使工作强度在不知不觉中增强，它使得马克思所言的产生剩余价值的工人之间的“协作”效率更高，但最终成果仍然为资本所攫取（第 26 页）。媒介技术亦如此，它打破了旧的时间观和规律的生活节奏，逆转了钟表分割时间的作用，使得时间亦“流动”与再次“混沌”了起来。不管劳动者现在应该处于什么样的私人时间，如假期、睡眠等，只要是电话与网络能够通达之处，雇主便可以吸纳这种时间“为我所用”，致使以往依靠钟表确定的上班/下班时间没有了清晰的边界，这才令非生产时间在资本面前荡然无存，时间继而被消灭了。在这种时空皆为媒介技术所重新规划的情况下，劳动者不断面临弹性的日程，陷入时刻保持待命的工作状态和“劳动权困境”（第 31 页）。以上发现，体现了建华敏锐的问题意识，也展示了他犀利的理论解剖能力。

这场数字技术革命的影响是全球性的，进而催生数字资本主义的崛起和扩张。数字媒介技术的迅速扩张，不仅源自技术逻辑的控制，更受制于资本逻辑的驱遣。数字技术的神奇作用体现在：它不仅提升了生产的效率，还遮蔽了资本逐利的贪婪性。在数字技术的包装之下，资本的罪感和耻感被技术美化、过滤了，资本不再是赤裸裸地剥削劳动者的劳动，资本被技术中介化之后，退隐在技术的幕后。值得关注的是，数字资

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变得更加社会化和个人化，传统组织化、固态化的生产方式和资本变现方式被高度灵活、个人化、零工化的生产方式替代了，非稳定就业、灵活劳动、弹性工作等，被冠以自由的名义，遮蔽了资本的豪夺和剥削。这种用工模式彻底改变了劳动力雇佣关系，重要的是，它重塑了劳动者的身份认同。因此，知识劳动者和产业工人一样，构成了全球劳动力后备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资本提供“取之不竭”的、可供支配的劳动力“蓄水池”，供跨国企业在全球扩张的进程中大量、廉价、灵活地使用（第 106 页）。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不断发展，一种新型的外包形式应运而生：众包——任务发起者将任务通过互联网以自由、自愿的方式外包给非特定的大众网络社区的生产组织过程。众包在本质上是“大众”和“外包”的结合。大众可以是网络志愿者，任务发起者充分利用他们的兴趣爱好与闲暇时间，以灵活用工的方式让他们完成相应的任务，且不提供报酬或仅仅提供微薄的补贴作为回报（第 107 页）。建华以亚马逊土耳其人（MTurk）在线众包平台为典型案例，解析其运作机制和内嵌其中的劳动控制。他研究发现：技术的发展并不必然带来美好的生活。就“托客”（任务参与者）的劳动过程来看，他们的任务高度重复，且报酬普遍较低，在“计件工资”制度的持续作用下，他们不得不选择延长工作时间，因此他们的劳动不仅呈现体力化的特征，而且消泯了生产与闲暇的界限。此外，来自任务发起者和平台的双重控制对“托客”的个人隐私、工作时间、任务成果和工作意愿等方面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并且对“托客”的准入机制、质量控制和强制退出形成了“霸权式”的管理。MTurk 案例并不是孤例。数字技术对劳动的全面入侵，并没有改写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基础逻辑，只不过改变了劳动方式以及资本载体的表现形式。这种不稳定的新型劳动力组织方式在资本全球化下呈现日益普遍化的趋势，这恰恰是数字资本主义和劳动力市场弹性机制相互渗透的必然结果（第 77 页）。

值得关注的是，数字劳动带来一个新的社会问题："不稳定无产者"。一方面，"不稳定无产者"是一个"自在的阶级"，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经历着不安全和不稳定的工作与生活，时刻需要面对不同的社会问题、内心的孤独感，以及对仇恨的恐惧。这些共同的境遇使他们成为一个"新危险阶级"。另一方面，"不稳定无产者"还未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缺乏清晰的阶级意识，且往往互相责难，异常脆弱，内部充满激烈的斗争。但也能看到，"自在的阶级"并非一直处在集体无意识的蒙昧状态。建华认为，劳动者并不只是控制的被动承受者，而是具有能动性和自为意识的主体，他们往往也能对控制做出积极的回应。在 MTurk，这种回应表现为组建网络社区，它作为"托客"生态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网络论坛和职业共同体两种基本形式，在缓解"托客"自我驱使的紧张压力，以及拉近"托客"彼此距离、增进感情、影响行为、加强团结等诸多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为"托客"提供了有效的支持网络（第 120 页）。

劳动的媒介化是数字资本主义的显豁特征，这种新劳动方式在资本主义体制下迅速扩张，并搭乘全球化大潮，顺流而下，在全球范围内扩展。不管是在美国、英国、德国等"全球北方"国家或地区，还是在中国、印度、巴西等"全球南方"国家或地区，无论是在传统产业，抑或是在新兴产业，全球经济中劳动力市场弹性机制的形成，以及由此带来的工资、雇佣关系、工作制度与劳动者技能的弹性化，使越来越多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因缺乏必要的保障而陷入不稳定的状态（第 40 页）。以降低劳动力成本为最终目的，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劳动力市场的弹性机制"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结构性的必然结果（第 75 页）。随着 ICTs 和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全球公正传播的新问题和社会不平等问题进一步复杂化，有些被"遮蔽"的劳动议题的重要性日渐凸显，这些盲点和议题是数字劳动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和理论创新的源泉。

劳动的媒介化也包括媒体的劳动。新传播技术不仅改造了传统媒体的生产方式和传播逻辑，同时催生了新的媒介组织形态和生产方式。

数字媒介技术引发了传媒业的深刻变革，这在人类传媒史上是空前的。媒体劳动的专业壁垒和职业意识形态在这场深刻的数字技术革命的强劲冲击之下，变得千疮百孔，深度解构了传媒业与既有社会结构的深度互嵌。传媒业出现了“去中心化”和“再中心化”的趋势，原先狭义的传媒业边界被彻底打开，传媒业液态化和平台化的特点日渐凸显。在此背景下，传媒劳动也渐渐被数字劳动接管，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生媒体；无论是“再中心化”的新媒体平台，还是“去中心化”的自媒体，其生产方式均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建华也密切关注传媒业生产方式的变化。他以众包新闻这一新生现象入手，探讨“数字劳动”在其中的表现和运行机理。“众包新闻”是指，“依托于新媒体技术，将原本应由专业新闻工作者完成的任务通过平台外包给自愿参与的公众的新闻生产方式”（第 129 页）。在这种方式中，公众通过网络参与线索提供、资料收集、专业剖析，甚至是新闻修改和编辑等工作，与专业记者和编辑协作共同完成新闻的生产。在书中，建华以“财新”传媒旗下的“世界说”这一新媒体产品作为研究对象，基于对其海外新闻专员的深度访谈，揭示他们在新媒体技术的帮助下如何有组织地生产国际新闻。建华的研究发现，新媒体环境下建制化的媒体通过灵活积累策略，将海外新闻专员的在地优势、语言技能和兴趣热情转换为劳动生产力，进而为媒介机构创造核心价值，同时实现资本的积累和增殖。这种新闻众包方式掩盖了在参与、兴趣和自我实现伪装之下的“准灵活用工”问题。对于素有“新闻专业主义”执念的专业媒体标杆“财新”尚且如此，至于那些超大型的新媒体平台，诸如脸书、推特、微信、微博、B 站等以用户生产内容作为主导生产方式的新媒体平台，其灵活用工的方式更是普遍性的存在。海量的数字劳动被大面积收割，为平台型新兴媒体创造了巨量的财富。

传播政治经济学有浓厚的济世情结，这情结源自马克思的精神传统。与那些强调价值中立的理论研究不同的是，传播政治经济学一直保持对现实社会介入的传统。这种精神和理论追求，在建华的研究中表现

得淋漓尽致。建华的研究有强烈的问题代入感，理论与实践之间保持亲密的互动，关键是，他努力尝试用理论的烛火去照亮实践行动的方向，推动问题的解决和治理的向善。他提出重新激发“数字劳动者”的主体性。“数字劳动者”的主体性可理解为数字劳动者所具有的“独立性、个体性、能动性以及占有和改造客体的能力”（第 191 页）。建华关注劳动者个体的赋权（如职业技能的培训），同时关切组织层面的制度性、结构性、系统性的改革，诸如劳动关系的规范与革新、劳动法律法规的健全与升级等。中国数字劳动者与传统体力劳动者面临着相似的，乃至更加恶劣的系统性风险，如劳动力商品化；技术变迁对工作场所的宰制；新自由主义工作伦理（如鼓励主动超常加班、知识技能迅速贬值、自我监督与残酷竞争、计件工资与淘汰制度）；工作的不稳定性（如劳务派遣和弹性雇佣）；社会福利的瓦解（如住房、医疗和教育的商品化所导致的脆弱的抗风险能力）；以及孱弱的应对和抗争。在与网络平台的力量对比之间，数字劳动者处于明显的劣势。此外，大量产生实际价值的“观看”与“玩乐”劳动尚未被视为劳动。作为互联网大国，中国的互联网巨头是否应为全球最大的网民群体支付红利？国家是否应该介入监管，改革数字生产资料（如数据、平台）的所有制，使其在一些方面体现出社会主义公有和“传播公地”的特色（第 65 页）？这些问题关切，彰显了作者宽广、热切的济世情怀、坚韧可贵的探索勇气，同时也显示了他敏锐的问题意识以及不凡的理论见地。建华认为，在未来的数字劳动研究中，亟需关注以下两个问题：其一，数字劳动者如何摆脱拜物性、制度性、文化性的异化与桎梏，发挥其能动性，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其二，数字劳动者在将自我命运与他人命运乃至社会命运紧密关联之时，如何通过个体性、群体性或社会性的行动，迸发出自己的力量（第 191 页）？

值得欣慰的是，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具体实践中，“数字劳动”表现出不同于数字资本主义语境的特征，中国在充分利用“数字劳动”之利的前提下，并未放任资本的资本主义化，而是利用制度优势，遏制资本对劳动

的反噬。近年来一系列的规制行动，遏制了被资本绑架的流量经济的非理性繁荣，拆解了数字技术与资本的合谋，从而将数字劳动纳入到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框架之内。

理论研究的理想境界是：能建设性地推动问题的优化解决。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仅志在解释问题，更在于解决问题。正在向纵深处推进的新传播技术革命，带来的广域影响，全面改写了人类的劳动生态和劳动机制，劳动作为人的本质性活动，因数字技术的“元技术”介入，引致的问题既非单一知识领域所能解释，也非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所能解决，而是需要更多力量的正向介入和建设性推动。对于社会主义中国而言，更需要中国社会的最大常量去解决中国社会的最大变量。

建华新著临盆，我先睹为快，深感荣幸，从中获得诸多启迪。以上心得，显然配不上序言的资格，才疏学浅，力有不逮，也许会有创造性误读，但属非主观故意。其实，建华书中论及的问题以及对问题的学理解析，远在我的视力之外。更何况，建华的研究还在上行路上，谨以小文，祝贺他已获的成果，也祝愿他未来更大的收成。

2021 年 10 月 6 日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序二

重估米尔德里德的活计

罗小茗

在《华氏451度》中，科幻小说家雷·布拉德伯里为一对夫妻安排了两种不同的工作/劳动模式。

第一份工作是消防员，这是主人公蒙塔格的职业。不过，在这个虚构的世界里，消防员的职责是放火。只要接到举报说哪里藏有书籍，消防员们便迅疾赶往那里，搜出所有的书籍，堆放到一处，浇上煤油，启动点火器，将它们在大庭广众之下毫不留情地销毁。这一份工作，让蒙塔格总是受到火焰的炙烤，搞得浑身黑乎乎，也让他试图去回忆“消防员”这个工作最初设立的时候，好像是为了救火而不是放火。可是，管它呢，“迅速放火，烧毁一切”，这就是消防员手册上白纸黑字规定了的他的工作呀！

第二份工由他的妻子米尔德里德完成。名义上，她是一名家庭主妇；但每天最重要的事项，是坐在家中由三面电视墙所构成的房间里，照着寄来的剧本，与电视墙上出现的那些人对眼神、答问题，沉浸其中。这大概可以称之为宽泛意义上的“数字劳动”。而米尔德里德的最大愿望，是丈夫可以靠着当放火的消防员，赚到更多的钱，为家里添置第四面电视墙——进一步改善工作条件。

倘若按照大卫·格雷伯对“狗屁工作”的定义来看的话——“完全无谓、不必要或有所危害，连受雇者都没办法讲出这份职务凭什么存在，但基于雇佣关系的条件，却又觉得有必要假装其实不然，这种有支薪的雇佣类型就叫狗屁工作”①，那么，蒙塔格的工作就是铁定的狗屁工作。因为除了攒钱买电视墙，让他和他妻子之间更加无话可说之外，蒙塔格根本搞不清这份工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好在蒙塔格的工作性质，和今天的普通人颇有些距离——但愿如此！反倒是米尔德里德的活计，经由移动客户端，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日益熟稔的一部分。即便不是全职的家庭主妇，也没有巨大的屏幕，也一点不耽误我们中的大多数，热烈地投入到这一份“工”之中。

不过，格雷伯对“狗屁工作”的定义，显然没有包括米尔德里德，也不包括我们今天随时随地正在展开的这一类活计——无论是利用等待的时间刷抖音发评论，还是随时更新朋友圈，展开点赞式的网络社交，上传实时的各类数据。这倒不是因为米尔德里德的活计有多少的正当性，对社会价值有什么正经贡献，而是因为，它没有得到酬劳，不是一份有薪水的真正的工作。但这似乎并不意味着，不能从社会价值的角度去评价它、要求它，既然它已经如此声势浩大。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评价米尔德里德的这份工呢？如何理解这一份在今天被笼统地概括为“数字劳动”的活计，对于社会生活的渗透和劳动观念的改造？对于社会价值，它有自己的意义和贡献吗？这样的渗透、改造与贡献，又将如何影响社会的未来进程？是带来人类解放的可能，还是套上更加沉重的社会枷锁？

所有这些，正是建华老师在本书中关注的问题。一直以来，针对米尔德里德的这份工，“玩工”也好，“产消者”也罢，又或是越来越被大家熟悉的“情感劳动”，学术界尝试用各种方式，定位和命名这一在日常生活

① 大卫·格雷伯：《40%的工作没意义，为什么还抢着做？论狗屁工作的出现与劳动价值的再思》，李屹译，台北：商周出版社，2019年，第48页。

中占据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的人类的身心状态。米尔德里德们从事的活计,应该得到什么样的评判?人们需要依据什么样的标准,对其展开判断?这样的标准与判断,将和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经验发生何种关联与抵牾?从系统梳理围绕"数字劳动"展开的既有理论与相关争议,到提出劳动"媒介化"的当代议题,再到"众包新闻""虚拟恋人"这一系列中国社会的现实案例分析,建华老师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试图描摹和思考的,正是越来越多或主动或被动地滞留在屏幕之前,参与米尔德里德式的活计中去的我们,在支配自己的时间、精力和预判未来时,究竟在做着什么样的事项?当整个世界正被越来越多的狗屁工作所包围、驱使和扭曲的时候,更是如此!这也就意味着,如何给予数字劳动更加准确的定位和清晰的命名,思考它的发展走向与可能遭遇的未来,不仅关系到那些流水线上被赤裸剥削的数据劳工,也关系到每一个在日常生活中时刻变身为米尔德里德的我们。

显然,一旦普通人意识到自己在互联网上的点击量和注意力,可以转换为银两,被标记为一种经济之时,从被剥夺者的角度来理解这一活计的政治经济学的面向,伸张自身的权益,这样的主张不仅理所当然,而且十分正当。毕竟,当这个世界的当权者总是拿出数字指标,扣算小数点,主张"一切都按经济理性来!"的时候,这应该也必须是每一个普通人都拥有的一项权利。不过,这样的主张往往也在不经意中冒险,将经济理性得以实施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渗透到那些原本就不是因为经济而出现的社会生活领域之中。在这里,正如法国左翼思想家安德列·高兹曾经担心的那样,如何为经济理性划定限度,这个西方社会面临的难题,现如今已经成为全球社会普遍面对的问题。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这一难题总是更为棘手。因为它的奋起直追,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将所有的领域都交付给经济理性,以便签订一项事关突飞猛进的契约。然而,无论怎样迅猛的发展,到头来大概都无法回避高兹的议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冲突的本质是经济理性的范围和广度,而非经济理性本

身”①。而在讨论中国社会中的“数字劳动”之时，我们正在迎来这一重新理解经济理性，通过为其划定范围，实现对人和社会理解上更新的契机。就此而言，既要伸张和维护自身的权利，又不在这一伸张和维护的过程中被经济理性吞噬与异化，臣服于它的逻辑而不自知，是讨论“数字劳动”时的第一步。如何结合当代社会经验，稳当坚定地迈出这一步，则构成了从事学术劳动/创造者的自我期待和挑战。而这正是本书的学术野心所在。

最后，让我们把话题拉回到蒙塔格身上，毕竟他才是《华氏 451 度》的主角。小说的最后，蒙塔格彻底放弃了放火消防员这份工作，把自己变成了一部行走的图书，以此来抵抗那一个不允许书籍存在的城市。读完建华老师的书，我忍不住想，蒙塔格的选择，实际上也是今天所有学术工作者可以做的一个选择。当整个学术管理和生产制度越来越被所谓的理性侵蚀，变成纯粹的数字计算之时，与其参与那些白纸黑字所定义的工作，不如将自己变成一部行走的图书，来得有趣且自在。当然，如此选择的自由，属于每一个人。但若想要实现面对当代社会展开真正有深度的思考的野心，则既非二三学人，也非单一学科，凭借一己之力，便可达成之事，而是需要无数个蒙塔格和米尔德里德们的共同努力。这或许便是建华老师要我这样一个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彻底外行来替他做序的原因。那就是，不同研究领域之间的相互督促与帮助，彼此勉励与呼应，在这个看起来已经由不同学科分而治之、相互钳制的死循环中，努力寻找为整个社会解套的可能。

2021 年 7 月 17 日于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

① 安德列·高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迷失与方向》，彭姝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年，第 48 页。

导言　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数字劳动研究

在20世纪6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左翼思潮影响下，重新发掘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对传播学科的意义成为当时理论转向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通过20世纪70年代著名的“盲点”论争，劳动、剥削、商品、拜物教、阶级分析等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重回学术分析视野。[①] 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滋养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自产生之初，就致力于将其研究对象置于具体的社会历史进程与变迁之中，并以此探讨整体的社会结构性力量如何影响传播实践，强调历史性、整体性、结构性在传播理论与实践中的重要意义。[②] 换言之，有别于以行政和市场导向为策略，以媒介分析、受众研究和传播效果为重心的美式行政主义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聚焦市场结构、传播技术、公共政策、劳动关系如何形塑媒介产业和具体的传播实践，探究媒体和传播系统如何与社会的政

① Smythe, Dallas. 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1977(1): 1-27. 中译文参见达拉斯·斯麦兹、刘晓红译：《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姚建华主编《传播政治经济学经典文献选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17—40页。

② 曹晋、赵月枝：《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脉络与人文关怀》，《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治、经济结构勾连,并与宏观权力秩序发生互动和彼此影响的过程。①

当前,数字技术正在以不可思议的发展速度将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工作场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深远地影响着当前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尤其是大众传播与社会互动模式。在此背景下,传播政治经济学关注数字技术在全球社会引发的种种新现象,持续聚焦包括阶级、社会性别和数字劳动在内的诸多经典的政经议题和范畴。② 一方面,通过对数字技术快速发展语境下的经典政治经济理论的再发现、回应与展望,传播政治经济学不断拓展其理论视野与实践空间,展现了其对正在转型的全球社会及新媒体技术蓬勃发展快速迭代极具阐释力的分析与重构;③另一方面,相关研究旨在重新发现马克思经典理论的独特价值,揭示出阶级、社会性别和数字劳动等议题和范畴对当下传播研究的重要意义,致力于剥去后资本主义时代全球社会表面的同一性,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新的学术生长点和理论创新之可能的源泉。④

一、数字劳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新现象与新理论

全球发达经济体中资本主义的基础正在从工业制造转向服务业和信息业,对基于数字技术的新媒体的征用成了这个转型过程的根本驱动力。数字技术既为新的网络经济提供必要的技术设施支持,如构建数字中心全球网络,又产生了一系列围绕着信息与通信技术

① 罗伯特·麦克切斯尼:《传播革命:紧要关头与媒体的未来》,高金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

② 姚建华、徐婧:《数字时代传播政治经济的新现象与新理论》,《全球传媒学刊》2017年第3期。

③ 姚建华:《传承与发展:数字时代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新闻与写作》2019年第5期。

④ 徐婧、秦朝森:《新媒体语境下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前沿研究综述》,《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CTs)的融合、新的数字产品和应用程序的生产而组织起来的新兴经济部门。数字技术的支持部门和新兴经济部门都存在对新型劳动力的需求,传统劳工不断被新兴数字劳工取代的趋势日益明显。

在丹·席勒(Dan Schiller)看来,数字技术和ICTs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积累方式,重新配置了各种生产要素与资源,在扩张性市场逻辑的影响下,带动政治经济向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转型。① 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随着越来越多从事信息生产、传播、监控的劳动者以数字技术和ICTs为生产、加工工具,且人类的知识本身不断以数字的形态存在,数字劳工日益成为传播学者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研究议题涉及他们的劳动过程、劳动价值、劳动力再生产、劳动力商品化和控制方式,以及自身特征与主体意识,等等。②

根据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的界定,数字劳工包括将数字技术和ICTs作为生产资料的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③ 也就是说,数字劳工研究不仅聚焦于对工程师、设计师或是媒体从业者工作和日常生活的研究,而且强调对工厂中生产科技产品的产业工人进行研究的必要性。今天的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都需要面对新的数字技术和ICTs、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不稳定的工作环境,甚至是随时可能被取代的命运。因此,扩大数字劳工的内涵和外延,而非使用来自意大利自治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① Schiller, Dan. *Digital Capitalis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9.

② 姚建华、徐偲骕:《全球数字劳工研究与中国语境:批判性的述评》,《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第5期。

③ Fuchs, Christian. Dallas Smythe Today—The Audience Commodity, the Digital Labour Debate, Marxist Political and Critical Theory. *TripleC*, 2012(2): 692-740. 中译文参见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汪金汉、潘璟玲译:《受众商品、数字劳动之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批判理论》,《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1年第4期。

labour)概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不同劳动形式之间的联系。①

洪宇、邱林川等学者长期关注信息产业的发展及产业内数字劳工,尤其是他们的工作环境,他们的相关研究对全球资本主义结构性的不平等与剥削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洪宇的研究指出,在中国成为全球 ICTs 生产强国的过程中,信息产业内不断重构的阶级关系持续受跨国资本和国内社会及经济转型的双重影响。② 中国信息产业内数字劳工的规模不断壮大,同时他们作为"雇佣劳动力"的身份不断得以确立和强化。邱林川更多将他的研究视角聚焦于富士康(Foxconn)企业的工人,将其置于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世界工厂的研究框架下,审视数字资本主义与过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间的差异与关联。③ 一方面,他从反技术决定论的视角出发,分别对富士康企业的工厂、宿舍和防跳网进行了实地调查与分析,揭示出资本主义对数字劳工的剥削和异化;另一方面,他强调:富士康企业工人超负荷工作的根本原因在于苹果公司(Apple)在定价和产品交付时间上具有决定权的制度性安排,这种制度性安排背后的权力不平等使苹果公司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对消费电子产品的生产进行"离境外包"(outsourcing)而获得超额利润。④

---

① 今天的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都需要面对新的数字技术和 ICTs 的飞速发展,同样面临着围绕新型信息技术和网络平台的更加隐蔽的剥削形式、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和"步履维艰"的境况。虽然"非物质劳动"这一概念在构建新型政治主体方面颇有建树,但它却过于偏重产品的最终形式,而忽略了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环节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强化了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参见王洪喆:《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当代数字资本主义问题的启示》,《天府新论》2016 年第 3 期;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4。

② Hong, Yu. *Labor, Class Formation and China's Informationized Polic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1.

③ 邱林川:《新型网络社会的劳工问题》,《开放时代》2009 年第 12 期。

④ "离境外包"(又称"外部资源利用")这个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管理学家普拉哈拉德(C. K. Prahalad)教授和加里·哈梅尔(Gary Hamel)教授于 1990 年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的《企业的核心竞争力》(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一文中提出的。它是企业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企业外部资源进行产业转移的一种形式,主要表现为跨国公司利用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优势将生产和服务(生产链上的一些非核心环节)外包到发展中国家。这种方式有利于降低企业的营运成本、提升 (转下页)

媒介产业中的数字劳工研究是传播政治学者关注的重要议题。数字技术和 ICTs 对媒介产业的影响不可谓不大：2016 年 8 月，当苹果、谷歌(Google)、微软(Microsoft)、亚马逊(Amazon)和脸书(Facebook)成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五大公司的时候，新闻、广播和广告等诸多媒介产业内控制权不断集中于少数大型技术公司的趋势众目昭彰。在当下数字技术和 ICTs 的发展呈几何增长的背景下，市场化的无孔不入为巨型传媒集团的垄断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处于全球价值链中的媒介数字劳工亦无法摆脱资本的影响，相关学者对其研究也呈现多样性的景观。

例如，尼科尔·科恩(Nicole Cohen)以媒介产业中的自由作家为研究对象，强调对自由作家数量的增加以及获得教育和培训项目机会增多的考察，不能仅从狭仄的个人经验研究的视角出发，而应强调他们是媒体从业者的重要组成部分。① 对自由作家无偿劳动时间和版权侵占的分析，折射出数字时代媒体从业者群体的行动和经历受更为宏观的社会整体影响的事实；与此同时，自由作家劳动过程的变化体现了数字技术和 ICTs 对资本主义劳动环境的影响，这些影响既加速了劳动力商品化的进程，同时又强化了剥削作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本质性的存在。②

需要强调的是，不少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将对信息产业和媒介产业中

(接上页)产品品质、集中人力资源、提高顾客满意度，进而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离境外包兴起于制造业，如苹果公司全球最大的合同制造商富士康。但是 21 世纪以来，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人力资源等要素水平不断提高，而且保持了低成本优势，除制造业以外，大量服务业也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如呼叫中心大规模地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出现就是其中很好的一例。参见姚建华：《制造和服务业中的数字劳工》，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年；Brophy, Enda. The Subterranean Stream: Communicative Capitalism and Call Centre Labour. *Ephemera*, 2010 (3/4): 470 - 483; Qiu, Jack Linchuan. *Goodbye iSlave: A Manifesto for Digital Abolition*.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7。

① Cohen, Nicole. Cultural Work as a Site of Struggle: Freelancers and Exploitation. *TripleC*, 2012(2): 141 - 155.

② 在科恩看来，不管是对媒介数字劳工进行授权，还是通过在办公室内创造“愉快”的环境来激发员工的创造力和潜能，其目的都是为提高生产效率，进而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这与延长工作时间等陈旧的方法在本质上并无二致。参见 Cohen, Nicole. Negotiating Writers' Rights: Freelance Cultural Labour and the Challenge of Organizing. *Just Labour*, 2014(17/18): 119 - 138。

数字劳动问题的思考与社会性别分析紧密交织在一起,通过批判社会性别权力等级结构和反思全球媒体组织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深刻地揭示出女性数字劳工所遭受的多重宰制。[①] 这可以在莱斯利·谢德(Leslie Shade)和尼基·波特(Nikki Porter)对孟加拉国女工的研究[②]以及曹晋和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对中国出版产业中女性编辑人员的研究中得到佐证。[③] 前者洞察到当前社会性别议题的跨国语境,并强调西方发达国家时尚产业的繁荣是建立在对第三世界国家女性劳动的残酷剥削的基础之上的,而后者揭示出发展中国家内部的转型与体制改革,也会导致劳动过程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在中国的出版产业中,女性编辑人员在市场经济转型大潮中所遭遇的工作强化、劳动力贬值、弹性雇佣制度的普遍化、性别歧视等问题往往被遮蔽了起来,缺乏对当前社会转型中劳动力编制与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深刻反思。

不管是信息产业的体力劳动者,还是媒介产业的脑力劳动者,他们都是数字时代新的劳动形式的具体表现。数字技术和 ICTs 带来的巨大变化还在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边界不再清晰。[④] 在数字世界中,消费者越来越多地通过使用不同的媒介来创造价值,比如说在以脸书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上发布自己的照片、视频和文字,他们被称为“产消合一者”

---

① Steeves, Leslie and Janet Wasko. Feminist Theory and Political Economy: Toward a Friendly Alliance. In *Sex and Money: Feminism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Media*, edited by Eileen Meehan and Ellen Riordan, 2002,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p. 16 - 29.

② Shade, Leslie and Nikki Porter. Empire and Sweatshop Girlhoods: The Two Faces of the Global Culture Industry. In *Feminist Intervention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Minding the Gap*, edited by Katharine Sarikakis and Leslie Shade, 2008,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p. 241 - 257.

③ Cao, Jin and Graham Murdock. Holding Down Half the Sky: Female Knowledge Workers and Flexible Employment in China's Publishing Conglomerates. *Work Organisation, Labour & Globalisation*, 2015(2): 14 - 35.

④ Manzerolle, Vincent. Mobilizing the Audience Commodity: Digital Labour in a Wireless World. *Ephemera*, 2010(3/4): 455 - 469. 中译文参见文森特·曼泽罗尔,姚建华、徐偲骕译:《移动的受众商品:无线世界的数字劳动》,《开放时代》2017 年第 3 期。

(prosumers)——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并不因为自己的努力和工作而被支付明确的薪酬。爱德华·科莫尔(Edward Comor)进一步指出:越来越多的在线产消合一活动并未终结对人的异化,产消合一者生产的"用户生成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 UGC)已然成为数字资本主义新的剩余价值来源的增长点;与此同时,他们不断沦为资本的工具。①

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使用"玩工"(playbour)的概念来界定通过玩耍的形式,在其闲暇时间内创造价值的用户。尤利安·库克里奇(Julian Kücklich)是较早关注玩工问题的学者。通过对游戏修改版本者(modder)②的研究与分析,他深刻地揭示出:游戏修改版本者除了每日花费大量的时间在游戏中,还通过使用游戏开发者提供的或自己开发的各种编辑工具来打造专属自己的游戏。他们创造的价值成了游戏产业利润来源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与此同时,游戏修改作为一种"无酬劳动"形式的事实,往往被视游戏修改为休闲活动或娱乐延伸的认知掩盖。与自由作家一样,游戏修改版本者并不对自己的最终作品享有版权,且承担他们的活动可能引发的经济和法律风险。③ 虽然玩工形式的工作在几十年前传播政治经济学家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Smythe)的研究中早已被预见,但是今天的学者对这种工作形式愈发重视——因为这种工作形式在全球劳工中不断扩张和蔓延。某种意义上来说,当前每个人都是"数字劳工"。④

---

① Comer, Edward. Digital Prosumption and Alienation. *Ephemera*, 2010(3/4): 439 - 454.

② 游戏修改版本者来自"游戏模组"这一概念,即创作游戏修改版本(Modifications,简称Mods)。

③ Kücklich, Julian. Precarious Playbour: Modders and the Digital Games. *The Fibreculture Journal*, 2005(5). 中译文参见尤利安·库克里奇,姚建华、倪安妮译:《不稳定的玩工:游戏模组爱好者和数字游戏产业》,《开放时代》2018年第6期。

④ Murdock, Graham. Political Economies as Moral Economies Commodities, Gifts, and Public Goods. In *The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edited by Janet Wasko, Graham Murdock and Helena Sousa, 2011, West Sussex, UK: Wiley-Blackwell, 13 - 40. 中译文参见格雷厄姆·默多克,姚建华、徐偲骕译:《作为道德经济的政治经济:商品、礼物与公共物品》,姚建华主编《传播政治经济学经典文献选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80—107页。

数字劳动问题的思考与社会性别分析紧密交织在一起,通过批判社会性别权力等级结构和反思全球媒体组织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深刻地揭示出女性数字劳工所遭受的多重宰制。[①] 这可以在莱斯利·谢德(Leslie Shade)和尼基·波特(Nikki Porter)对孟加拉国女工的研究[②]以及曹晋和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对中国出版产业中女性编辑人员的研究中得到佐证。[③] 前者洞察到当前社会性别议题的跨国语境,并强调西方发达国家时尚产业的繁荣是建立在对第三世界国家女性劳动的残酷剥削的基础之上的,而后者揭示出发展中国家内部的转型与体制改革,也会导致劳动过程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在中国的出版产业中,女性编辑人员在市场经济转型大潮中所遭遇的工作强化、劳动力贬值、弹性雇佣制度的普遍化、性别歧视等问题往往被遮蔽了起来,缺乏对当前社会转型中劳动力编制与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深刻反思。

不管是信息产业的体力劳动者,还是媒介产业的脑力劳动者,他们都是数字时代新的劳动形式的具体表现。数字技术和 ICTs 带来的巨大变化还在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边界不再清晰。[④] 在数字世界中,消费者越来越多地通过使用不同的媒介来创造价值,比如说在以脸书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上发布自己的照片、视频和文字,他们被称为“产消合一者”

---

① Steeves, Leslie and Janet Wasko. Feminist Theory and Political Economy: Toward a Friendly Alliance. In *Sex and Money: Feminism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Media*, edited by Eileen Meehan and Ellen Riordan, 2002,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p. 16 - 29.

② Shade, Leslie and Nikki Porter. Empire and Sweatshop Girlhoods: The Two Faces of the Global Culture Industry. In *Feminist Intervention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Minding the Gap*, edited by Katharine Sarikakis and Leslie Shade, 2008,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p. 241 - 257.

③ Cao, Jin and Graham Murdock. Holding Down Half the Sky: Female Knowledge Workers and Flexible Employment in China's Publishing Conglomerates. *Work Organisation, Labour & Globalisation*, 2015(2): 14 - 35.

④ Manzerolle, Vincent. Mobilizing the Audience Commodity: Digital Labour in a Wireless World. *Ephemera*, 2010(3/4): 455 - 469. 中译文参见文森特·曼泽罗尔,姚建华、徐偲骕译:《移动的受众商品:无线世界的数字劳动》,《开放时代》2017 年第 3 期。

(prosumers)——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并不因为自己的努力和工作而被支付明确的薪酬。爱德华·科莫尔(Edward Comor)进一步指出:越来越多的在线产消合一活动并未终结对人的异化,产消合一者生产的"用户生成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 UGC)已然成为数字资本主义新的剩余价值来源的增长点;与此同时,他们不断沦为资本的工具。①

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使用"玩工"(playbour)的概念来界定通过玩耍的形式,在其闲暇时间内创造价值的用户。尤利安·库克里奇(Julian Kücklich)是较早关注玩工问题的学者。通过对游戏修改版本者(modder)②的研究与分析,他深刻地揭示出:游戏修改版本者除了每日花费大量的时间在游戏中,还通过使用游戏开发者提供的或自己开发的各种编辑工具来打造专属自己的游戏。他们创造的价值成了游戏产业利润来源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与此同时,游戏修改作为一种"无酬劳动"形式的事实,往往被视游戏修改为休闲活动或娱乐延伸的认知掩盖。与自由作家一样,游戏修改版本者并不对自己的最终作品享有版权,且承担他们的活动可能引发的经济和法律风险。③ 虽然玩工形式的工作在几十年前传播政治经济学家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Smythe)的研究中早已被预见,但是今天的学者对这种工作形式愈发重视——因为这种工作形式在全球劳工中不断扩张和蔓延。某种意义上来说,当前每个人都是"数字劳工"。④

---

① Comer, Edward. Digital Prosumption and Alienation. *Ephemera*, 2010(3/4): 439 - 454.

② 游戏修改版本者来自"游戏模组"这一概念,即创作游戏修改版本(Modifications,简称Mods)。

③ Kücklich, Julian. Precarious Playbour: Modders and the Digital Games. *The Fibreculture Journal*, 2005(5). 中译文参见尤利安·库克里奇,姚建华、倪安妮译:《不稳定的玩工:游戏模组爱好者和数字游戏产业》,《开放时代》2018年第6期。

④ Murdock, Graham. Political Economies as Moral Economies Commodities, Gifts, and Public Goods. In *The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edited by Janet Wasko, Graham Murdock and Helena Sousa, 2011, West Sussex, UK: Wiley-Blackwell, 13 - 40. 中译文参见格雷厄姆·默多克,姚建华、徐偲骕译:《作为道德经济的政治经济:商品、礼物与公共物品》,姚建华主编《传播政治经济学经典文献选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80—107页。

概言之,特雷伯尔·肖尔茨(Trebor Scholz)强调,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对劳动的剥削以一种更为隐蔽的形式围绕新型的数字技术和ICTs以及网络平台而展开。[①] 在他看来,数字资本主义同样是资本主义,是后者在新技术环境中的延伸,这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判断,且业已被大量实证研究结果证实——资本主义并没有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而改变其通过剥削劳动力实现自我增殖的基本逻辑。资本家通过将数字技术和ICTs作为一种控制的工具,加强了全球范围内有关生产活动的传播与协作,并以离境外包等方式实现了资本主义的空间修复,[②]进而将后福特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致。在此背景下,工作被数字技术和ICTs进一步切割、细分,知识与技能持续并加速贬值,资本完成了对数字劳工的去技能化(de-skilling)与弹性雇佣,并通过各种通信工具实现对劳动力在劳动场所内外的无差别监视与控制,[③]这些都构成了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新型劳工议题。

除此之外,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十分关注数字劳工如何应对因资本和劳动之间本质上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而产生的剥削过程。从历史上看,工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断保障工人的基本权力;但大部分数字公司一直拒绝承认工会,且因为缺乏公开的报道导致公众较少关注与工人和工会相关的议题。[④] 也有不少学者强调协会组织在联合数字劳工方面的积极作用,这些组织通过社会运动组织来不断满足劳工的需求与推动政治议事日程。[⑤]

---

① Scholz, Trebor. *Digital Labor: The 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② 陈世华:《信息政治经济学批判》,《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③ 姚建华:《作为数据流的劳动者:智能监控的溯源、现状与反思》,《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年第5期。

④ Sussman, Gerald and Carey Higgins-Dobney. The Planned Obsolescence of TV Journalism. I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Labor and Media*, edited by Richard Maxwell, 2015, New York: Routledge, pp. 230 - 241.

⑤ Stevens, Andrew and Vincent Mosco. Prospects for Trade Unions and Labour Organizations in India's IT and ITES Industries. *Work Organisation, Labour & Globalisation*, 2010(2): 39 - 59.

诚然，在数字时代，将数字技术和 ICTs 作为生产资料的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生产者与消费者组成了规模庞大的群体，且发展迅速。虽然他们中并非所有的人都拥有稳定的工作，但毋庸置疑，他们都从事“生产性劳动”，都在创造剩余价值。但是不同地区、不同职业和不同社会身份的数字劳工可能认为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反而存在着竞争性的利益冲突，如何将他们联合起来，形成共同的阶级意识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①

二、本书结构与主要内容

本书由上下两篇组成。上篇聚焦数字劳动的理论前沿，旨在对数字劳动展开全面且深刻的学理分析，在系统地阐述数字劳动内涵和研究现状基础上，为读者细致梳理和全景展现数字劳动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同时结合零工经济、不稳定无产者、下一代互联网、工作/后工作世界等重要理论或概念，帮助读者打开一扇通往繁茂学术“森林”的理论大门。下篇从数字劳动与在地经验切入，把数字劳动置于更为宏大的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全球平台经济勃兴的时代背景下，关注数字劳动的实践逻辑，一方面致力于揭示数字劳动与全球外包、灵活积累、技能变迁、情感关系等重要问题之间复杂的勾连关系，另一方面致力于回应相关的现实问题，进一步推动本土化理论研究的发展。

第一章至第四章为本书的上篇部分（数字劳动与理论前沿）。**第一章（数字劳动：劳动与媒介化的交叉视角）**首先梳理与展示了数字劳动领域的前沿成果。当前，数字劳动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对象已经不仅局限于最初的新媒体平台的产消合一者与玩工，学者们开始关注网络零工、受技术宰制的传统雇佣关系之内的脑力劳动者，甚至将开

① Huws, Ursula. The Underpinnings of Class in the Digital Age: Living, Labour and Value. *Socialist Register*, 2014(50): 80 - 107.

采原料和生产电子产品的体力劳动者亦纳入其中。其次，本章旨在剖析作为分析范畴本身的“数字劳动”区别于知识劳动、脑力劳动、非物质劳动等纷杂概念的核心关键；其哲学基础之于其他概念在范式意义上的创新；以及数字劳动研究与传播研究其他最新成果展开对话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本章提出：数字劳动实际上是以劳动的“媒介化”与媒介的“劳动化”两条并行不悖的路径渗透到当下人类社会中的，并对争取非异化劳动之可能的路径展开了充分的讨论。

第二章（全球数字劳动研究的现状与中国语境）从四个方面梳理了全球数字劳动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进路和最新成果，即制造和服务业中的数字劳工、媒介产业中的数字劳工、产消合一者和玩工，以及数字经济中的劳工组织，并从中国语境出发，呈现本土学者对该议题的思考与贡献。在当前复杂的全球化过程持续深入，本土社会急剧转型、新媒体技术冲击日益猛烈的全球语境中，上述研究大多根植于中国独有的、丰富的且充满活力的日常实践土壤之中，帮助劳动者发声，增加他们的曝光率，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学术品格。

第三章（零工经济、数字劳动与“不稳定无产者”）聚焦全球零工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数量日益增多的零工经济劳动者及其所面临的困境与多元化的解决策略。在全球范围内，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承担零工工作的自由职业者在数量、规模和影响力上日益壮大，零工经济应运而生。不管是包括网络直播、付费阅读内容的创作和编辑，以及视频制作和分享在内的基于网络平台而产生的新型工作方式，还是集中于快递、家政、交通、维修等服务行业因移动终端应用程序对传统就业方式的颠覆而产生的新型工作方式，都使零工经济中经历着“即插即用型”U 盘生活的数字劳工面临诸多困境，不断沦为新型的“不稳定无产者”。解决这些困境的对策需要从零工经济劳动者、政策制定者、关注零工工作公平性的利益相关者等多维度出发。

第四章（下一代互联网、数字劳动与工作/后工作世界的未来）尝试

结合下一代互联网技术的高速迭代对数字劳动与工作/后工作世界的未来进行展望。下一代互联网技术替代还是创造就业？新“卢德运动”会出现吗？这些问题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诸种观点都有各自的立论基础和证据。结合现有研究，本章提出：这两种相反的现象实际上是以不同的速率沿着各自的轨道同时进行的，“旧去新来”的时间差才是问题的关键。而且，技术并非唯一作用因素，还应结合人机关系、劳动力结构、全球价值链与劳资关系来综合考察人工智能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工作种类劳动者的影响，进而在此基础上寻求解决之道，最大限度避免社会转型带来的阵痛。此外，当“奇点”临近，“机器控制机器”的“强人工智能”阶段到来之时，为防止大规模失业和“弃民”的出现，维系人类以劳动为主要特征的生活世界，批判传播学或可从“数据收入”的角度提供一种后工作的方案。

第五章至第八章为本书的下篇部分（数字劳动与在地经验）。**第五章（全球外包、数字劳动与劳动控制）**从全球外包实践与众包平台的兴起切入，以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为案例分析对象，探究平台劳动的运作机制和内嵌其中的劳动控制问题。一方面，平台劳动者的劳动过程受到普遍且隐蔽的控制，这是众包平台中不对等权力关系展演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平台劳动者通过积极组建网络社区进行各种形式的反控制实践。这些实践既展现了平台劳动者的能动性，又为他们提供了有效的支持网络，但却仍受到强大的结构性制约，难以和平台中既存的控制相抗衡。为了改变这一状况，结合当下众包平台的全球治理经验，本章强调：建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管理、监督和保障机制将成为众包平台的未来发展方向和目标。

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传统的新闻生产模式造成了冲击。近年来，不少媒体机构不再雇用专职记者，取而代之的是组建覆盖全球的新闻专员网络社群，通过与他们建立弹性雇佣关系，进而低成本、高效率地生产新闻内容，并在这个过程中，展现出海外新闻专员的在地优势、语言

技能和兴趣热情以及海外新闻专员为媒体机构创造核心价值的过程。**第六章（众包新闻、数字劳动与灵活积累）**以财新传媒旗下的“世界说”这一新媒体产品作为研究对象，基于对其海外新闻专员的深度访谈，探究他们在新媒体技术的帮助下如何有组织地生产国际新闻，揭示出新媒体环境下，建制化媒体通过灵活积累策略，将海外新闻专员转化为劳动生产力，加速媒体机构的资本积累和增殖过程，而实际上，这是一种被掩盖在参与、兴趣和自我实现伪装之下的“准灵活用工”实践。

自动化新闻是人工智能技术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具体应用，它重构了包括新闻劳动在内的传媒生态的核心要素。随着自动化新闻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快速崛起，新闻记者正经历着由去技能化向再技能化的技能变迁，且多技能化的趋势日渐明朗，这也是**第七章（自动化新闻、数字劳动与技能变迁）**的主要发现。同时，本章强调，新闻生产过程和劳动者技能成长的有效结合反映出自动化新闻背景下的人机关系是一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共存关系，而非“有你没我”的竞争关系。在未来，自动化新闻能否成为一种更为进步和解放的力量，赋予新闻劳动以独立的、建设性的意义，这一问题既事关新闻从业者美好的职业愿景，也为相关研究者打开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在乔纳森·特纳（Jonathan Turner）和简·斯黛兹（Jan Stets）看来，人类的独特性在于形成社会纽带和建构复杂社会结构时对情感的依赖，因此情感对建构社会关系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①]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以来，不少学者开始将身体、情感和欲望等因素置于社会学和人类学分析的中心位置，“情感转向”（affective turn）发展为人文社科领域一条新的研究进路，情感劳动成了这一转向主要的理论落脚点。**第八章（平台经济、数字劳动与情感关系）**以“虚拟恋人”情感劳动过程为研究内容，指出：这一情感劳动的核心内容是在网络空间中建构与消费者的亲密关

① 乔纳森·特纳、简·斯黛兹：《情感社会学》，孙俊才、文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

系。“虚拟恋人”在“进场”“在场”和“离场”的不同服务阶段，根据消费者喜欢的恋人类型，主动整饬外显情感来努力营造甜蜜的恋爱氛围，满足消费者对恋爱关系的想象和情感需求。这种亲密关系具有双重“虚拟性”：一方面，它存在于网络的虚拟空间，而非现实生活中；另一方面，它受市场原则支配，是一种能够即时和短暂满足消费者情感需求的商品，而非建立在两者长久和稳定的情感基础之上，因此具有情感虚拟化的特征。当前，缓解当代青年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情感压力既必要又紧迫。“虚拟恋人”服务建构的网络空间中的亲密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个体现实生活中的情感缺失，但终究无法替代人们在现实社会交往中形成的亲密关系。

综上，随着传播研究的理论、对象、方法和价值取向的日趋多元化，一些曾被遮蔽的重要议题开始进入传播学者的视野，其中有的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传播劳动研究。在传播新科技的突飞猛进将劳动数字化、数字技术使用者“劳工化”的趋势下，数字劳工作为最新的分析范畴，逐渐成为传播劳动研究领域的前沿。本书通过对数字劳动研究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两个维度的系统性分析与探讨，希冀建构经典与实践、理论与现实的对话场城。一方面启发读者深入思考数字劳动问题，充分发挥经典理论的思想潜能，以此来穿透实践与现实，同时为相关研究者打开广阔的想象空间，也使本书具有更强的否思性和前瞻性；另一方面让读者切身感受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二元张力，以实践引导对理论的理解，更为深刻地洞察资本、技术与劳动三者之间多重复杂的勾连关系。

上篇

数字劳动与理论前沿

第十章

第一章　数字劳动：劳动与媒介化的交叉视角

以后福特主义的弹性积累(flexible accumulation)策略为背景，[①]一部分劳动由企业被转移至整个社会进行，并由此显著地改变了工作与休闲、职业与业余人士之间的关系。[②] 随着日常生活被媒介技术整合进数字资本主义或信息资本主义(informational capitalism)中去，用户亦被卷入到新媒体价值链中，服务于生产、消费和市场等多个环节，正如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所述，新数字技术和 ICTs 正以全球的工具性网络整合世界。[③]

在传播与劳动研究领域，提兹安娜·特拉诺瓦(Tiziana Terranova)较早地开展了数字劳动的理论化工作。她指出：网络用户组成了一类被资本

---

① 根据熊易寒的归纳，“弹性积累”是指“企业用即时生产和外包制取代以大规模生产与机械化管理为特征的福特主义，生产单位规模缩小，奉行小批量生产、减少库存；企业一方面竭力减少核心工人(即全时员工)岗位，另一方面增加雇佣弹性工时、部分工时、临时性派遣的劳工，甚至随传随到者，以及在家工作、接受订单的家庭劳动力。”弹性积累包括弹性雇佣、弹性生产和弹性消费三个层面，资本通过生产的灵活性和生产过程的标准化来应对全球竞争的不确定前景，实际上将灵活性的成本和风险都转嫁给了劳动者。弹性积累导致的非正规就业与新穷人的大规模出现有密切的联系。参见熊易寒：《集权化市场、弹性积累与劳工政治的转型》，《复旦政治学评论》2016 年第 1 期。

② Manovich, Lev. *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1.

③ 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

剥削的无偿劳工——“网奴”，用户在将网络视为娱乐和社交的游乐场时，还扮演着另一种角色，其数字劳动（浏览网页、聊天、评论、网站设计、软件设计等行为）实际上属于“无酬劳动”（free labour），这种无酬劳动是一种被当成生产性活动的知识性消费行为，助力资本积累和增殖的过程，但同时又被无偿占有。① 在她看来，数字劳动实际上是“资本尝试从知识、文化和情感（affect）中创造货币价值之经济试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投入情感和收获满足为特征的网上无酬劳动正是“数字经济创造价值的基础”。②

沿着这一思路，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发现，在Web 2.0时代，用户成为“产消者商品”，不仅消费内容，更生产内容。他们每日无偿贡献着自己的创意活动、传播信息、建构社区。在网络时代，“对受众参与的商品化比在其他大众传媒上更容易实现”。③ 产消合一者取代单纯观看的受众成为新的商品，这同时意味着除注意力之外的人类创造力也彻底被商品化——网络既是机器，又是媒介，是生产与消费信息的工具。

在此，我们不难发现：“数字劳动”这一论述最初被批判学者用以突显信息传播产业对网络用户的劳动剥削。换句话说，数字劳动指的是网络空间中的“虚拟工作”。然而此后，这一概念便超越了这个范围，开始涉及网络零工④、受技术宰制的传统雇佣关系之内的脑力劳动者，如新闻记者⑤、呼叫中心的劳工⑥，甚至将开采电子产品元件原料和生产这些产

① Terranova, Tiziana. Free Labour: Producing Culture for the Digital Economy. *Social Text*, 2000(2): 33-58.

② 同上，第33—38页。

③ Fuchs, Christia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Society: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Internet.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9(1): 69-87.

④ 姚建华：《零工经济中数字劳工的困境与对策》，《当代传播》2018年第3期。

⑤ Liu, Chang-de. De-Skilling Effects on Journalists: ICTs and the Labor Process of Taiwanese Newspaper Reports.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6(31): 695-714.

⑥ Brophy, Enda. The Subterranean Stream: Communicative Capitalism and Call Centre Labour. *Ephemera*, 2010(3/4): 470-483.

品的体力劳动者亦纳入其中。[①] 福克斯对此概念进行了拓展，他认为：数字劳动涵盖了工业、服务业、信息业等诸多领域，包括非洲矿工奴隶般的劳动、中国制造业中的劳动、印度软件业中的劳动、美国硅谷硬件流水线上的劳动、谷歌工程师的贵族式劳动、呼叫中心的泰罗制工作、主妇式的服务性劳动以及社交媒体产消合一者的劳动，不一而足。[②]

恰恰是上述拓展，带来了不少问题。比如，数字劳动作为学术概念与分析范畴，其边界的扩展不但触及依然具有阐释力的“知识劳动”[③]，而且还触及更为宽泛和大众化的“脑力劳动”，抽象层次更高的“非物质劳

① 邱林川：《告别i奴：富士康、数字资本主义与网络劳工抵抗》，《社会》2014年第4期。

② Fuchs, Christian. *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③ 知识劳工概念的提出源于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对知识阶层日益成为社会领导阶层的判断。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1997)一书中，他指出：随着知识技术型社会的崛起，尤其是当社会开始依赖于理论信息(theoretical information)的形成与传播的时候，一个新的领导阶层，即有良好教育背景的科技工人所形成的知识阶层正日益凸显其重要性。正是由于对以教育和技能中信息生产与传播为基础的精英制度的重视，知识劳工已经成功转变为当前全球新政治与经济体系中的核心角色。许多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认同并对这一观点进行了不断的补充与完善，如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曼纽尔·卡斯特、文森特·莫斯可等。与产业工人相比，具备专业技能、大多数以中产阶级自居的知识劳工在全球市场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凯瑟琳·麦克切尔(Catherine McKercher)和莫斯可在《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Knowledge Worker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013)一书的序言中，对“知识劳工”概念的多个层面有详尽的梳理与厘清。同时，他们指出：知识劳工在总工作岗位中所占的比重不仅在发达国家中稳步上升，在发展中国家更是迅猛增长，同时将在全球劳工运动中变得更加活跃。于是，资本主义主要的积累空间从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工厂车间”转变为以大都市写字楼为主的“社会工厂”。麦克切尔和莫斯可进一步强调，由于技术融合(technological convergence)和企业兼并(corporate convergence)共同导致了劳工力量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下降，包括知识劳工在内的劳动者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即使在传统的专业领域、终身制的雇佣模式也已大为萎缩，弹性雇佣关系变得更为普遍。质言之，无论是“低端行业”中的产业工人还是高薪岗位的知识劳工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他们都不得不为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做准备。知识劳工普遍面临的压力来自长时间的工作、不断提前的最后期限、由劳动分工而导致的自主性降低等，同时，他们还深陷对自身未来强烈的不确定性、临时的劳动合同、甚至无法从任何保障性的社会保险中得到援助的困境。参见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铦、王宏周、魏章玲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凯瑟琳·麦克切尔、文森特·莫斯可主编：《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曹晋、罗真、林曦、吴冬妮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

动”，等等。[①] 所以数字劳动可以完全取代或包含这些概念吗？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还是截然分立的呢？如果“数字劳动”作为一种学术分析工具，不能对其解释对象拥有排他性和独占的阐释优势，同时传统的概念对新现象并未丧失其解释力，那么其存在的合理性就不那么充分了。

与福克斯相反，一些学者认为，“知识劳工宽泛的定义可以是参与生产、加工和传播信息的所有劳动力”，可以是直接操纵符号来生产原创知识产品的个体，也可以是图书馆员、包裹服务公司的员工，甚至是装配电脑线路和元件的劳工都是知识劳工。[②] 依循这一逻辑，数字劳动又从属于知识劳动，用知识劳动去统摄前者似乎也毫无问题，何况，连特拉诺瓦也认为，因为是无偿提供的劳动，数字劳动其实是更为贬值的知识劳动。那么，究竟谁是正确的呢？

本章作为数字劳动领域的理论探讨与反思，首要任务是梳理与展示数字劳动领域的前沿成果。其次，更兼具一定的问题意识，作为分析范畴本身的“数字劳动”区别于“知识劳动”“脑力劳动”“非物质劳动”等纷杂概念的核心关键究竟在哪里？其哲学基础之于其他概念是否具有范式意义上的创新？“数字劳动”研究如何与传播研究的其他最新成果（如媒介化理论）展开对话？根据邱林川提出的“网络化劳工”与“网络即劳工”两条脉络，本章提出，数字劳动实际上是以劳动的“媒介化”与媒介的“劳动化”两条并行不悖的路径渗透到当下的人类社会之中。[③] 最后，本章讨论了争取非异化劳动之可能的路径。

---

① Lazzarato, Maurizio. Immaterial Labour. In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 edited by Paolo Virno and Michael Hardt, 1996,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p. 133 - 147. 中译文参见莫里齐奥·拉扎拉托，孙萍、蔡珂译：《非物质劳动》，姚建华主编《传播政治经济学经典文献选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年，第 225—237 页。

② 麦克切尔·凯瑟琳、文森特·莫斯可主编：《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曹晋、罗真、林曦、吴冬妮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年。

③ 邱林川：《新型网络社会的劳工问题》，《开放时代》2009 年第 12 期。

一、数字劳动与劳动的“媒介化”

（一）概念之林

当前传播研究中关于劳动问题的概念混乱，在前文中已有体现，实际情况则远非如此简单，许多研究所使用之概念皆有交叉关系，并且针对同一现象，研究者往往各自持有不同且不具备排他性的分析工具。篇幅所限，此处无法将所有概念都追根溯源，仅以知识劳工与数字劳工的关系为例展开讨论。

首先，理论层面的混乱。如福克斯认为，数字劳工包括将数字技术和 ICTs 作为生产资料的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①] 数字劳工研究不仅应聚焦对工程师、设计师或是媒体从业人员的工作和日常生活，而且也不能忽视工厂中生产科技产品的产业工人。因此，在他看来，数字劳工研究应扩大其研究外延，而非使用强化脑体之分的“非物质劳动”概念。但梁萌则反过来认为，当前的情况是由于网络技术的发展，导致知识劳工概念本身的模糊与外延庞大，知识劳工既包含了传统行业的白领精英，又囊括了信息产业中的新型知识劳动者。[②] 这一论述的着力点与福克斯完全相反，在理论上形成了“数字劳工”与“知识劳工”到底是谁包含谁的僵局。

其次，经验研究中的混乱。大量实证研究关注了不同行业中受数字技术深远影响的劳动者，但在概念选择上却未经讨论地使用某一种既定理论。比如，胡绮珍将字幕组的劳动理解为“非物质劳动”与“无酬劳

① Fuchs, Christian. Dallas Smythe Today—The Audience Commodity, the Digital Labour Debate, Marxist Political and Critical Theory. *TripleC*, 2012(2): 692-740. 中译文参见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汪金汉、潘璟玲译：《受众商品、数字劳动之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批判理论》，《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1 年第 4 期。

② 梁萌：《网络领域中的知识工人》，《学术探索》2014 年第 3 期。

动”，显然是在特拉诺瓦的“数字劳动”的脉络之中。[①] 然而，曹晋与张楠华的研究则将从事字幕组这种弹性兴趣劳动的人称为“知识劳工”，显然坚持的仍然是信息社会理论中“知识劳动”的认识论。[②] 那么，翻译字幕究竟是“数字劳动”还是“知识劳动”呢？再如，因为自觉自愿地以廉价甚至免费的劳动成果参与“众包”(crowdsourcing)新闻生产，“公民记者”在吴鼎铭的研究中被称为“数字劳工”[③]，而在建制化媒体中遭遇新贫问题的网络编辑则依然是“知识劳工”。[④] 很明显，网络编辑这一职业本身是“数字化”的，而公民记者的劳动也不可能离开大脑中储备的知识，那么网络编辑也应当是“数字劳工”，而公民记者同样不能被排除出“知识劳工”的范围。又如，为网络平台供稿和为传统报纸供稿的自由撰稿人并不能被截然地分为“数字劳工”和“知识劳工”，后者如今也使用电脑进行写作。

最后，概念混乱还表现在行文之中“数字劳工”和“知识劳工”这两个词同时出现。贾南在分析“网红经济”时，以“社交媒体的赋权与数字劳工”为分析切入点，然而接下来使用的却是莫斯可的“知识劳工”论述，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生产网络文化信息的知识劳工能动性的提高是一种赋权的体现”。[⑤] 他在阐述的过程中，虽有提及尼克·戴尔-维特福德(Nick Dyer-Witheford)的“数字劳工”理论，[⑥]但并未辨析与比较“数字劳工”和“知识劳工”两者之间的差异，浑然不觉地将它们直接混用在一起。

---

① 胡绮珍：《中国字幕组与新自由主义的工作伦理》，《新闻学研究》(中国台湾)2009 年总第101 期。

② 曹晋、张楠华：《新媒体、知识劳工与弹性的兴趣劳动——以字幕工作组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 年第 5 期。

③ 吴鼎铭：《“公民记者”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反思——以“数字劳工”理论为研究视角》，《新闻界》2015 年第 23 期。

④ 曹晋、许秀云：《传播新科技与都市知识劳工的新贫问题研究》，《新闻大学》2014 年第 2 期。

⑤ 贾南：《“网红经济”的繁华与迷思——基于消费主义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批判视角》，安徽省第七届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论坛，2015 年。

⑥ Dyer-Witheford, Nick. *Cyber-Proletariat : Global Labour in the Digital Vortex*. London: Pluto Press, 2015.

如前所述，如果一个学术概念没有清晰的“问题域”和边界，无法很好地将其研究对象囊括在内，也无法对其他竞争性概念形成排他性的优势，那么其作为一种理论工具是否成立就值得推敲了。何况，除了前文提及的“脑力劳动”与“非物质劳动”，在传播劳动的研究领域内，还有诸多纷杂的具体概念同时存在，如乌苏拉·胡斯（Ursula Huws）的“高科技无产者”和“创意劳工”①、卡斯特的“自我程式控制劳工”（self-programmable labour）②、邱林川的“网络劳工”与“灰领”等。③ 杨杰、凌文辁和方俐洛调查发现：在中国人的判断中，知识劳动者、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白领工人等这些看似无甚差别的概念尚且不是一回事，彼此之间存在细微差异，若要确定某一概念与其他概念之间清晰的界限究竟在哪里，难度极大。④ 因此，继续陷在概念之林中，纠缠于“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文字游戏，是很难为数字劳工确立概念之主体位置的，以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传播劳动研究需要与传播学中的其他脉络和路径展开对话，并在此过程中彰显其独特的理论价值与适用性。

（二）劳动的“媒介化”

1. 媒介化研究简述

近年来，吸取了卡斯特所定义的“信息化社会”（informational society）与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的形式社会学（formal sociology）两大理论资源，欧洲传播研究经历了一轮“媒介化转向”，并形

---

① Huws, Ursula. *The Making of a Cybertariat: Virtual Work in a Real World*.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3.

② 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③ 邱林川：《新型网络社会的劳工问题》，《开放时代》2009年第12期。

④ 杨杰、凌文辁、方俐洛：《关于知识工作者与知识性工作的实证解析》，《科学学研究》2004年第2期。

成了颇具规模的“媒介化研究学派”。[①] 其核心问题意识在于，媒介作为一种制度化要素开始独立作用于社会文化变革，信息传递的中介物不再是完全“中空”的管道，开始逐渐地“影响”乃至“控制”社会形态的形构过程。在此过程中，“技术”不再是功能主义传播研究中被置于中立位置的工具，而是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节点。进而，当媒介逐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也开始依据当前媒介与传播手段来重新组织其关联方式。按照尼克·库尔德里（Nick Couldry）等人的理解，现在是媒介在引发其他社会场域中特定制度化实践的重塑。[②] 媒介化作为一种元过程（meta-process），与个人化、全球化、商业化等过程一起成为推动当代政治、社会、文化以及其他生活领域变革的根本驱动力。[③]

眼下，媒介化研究方兴未艾，如媒介化政治。黄旦对 1903 年的《苏报》实践进行了研究，提出“‘媒介化政治’包括媒介在政治沟通中的中介作用，又着意媒介自身逻辑是如何改变并形塑政治的”[④]。而唐士哲直指当代媒介化政治研究多数的重点在于关切媒介对于政治过程的扭曲效应，比如政治的运作过程必须仰赖更多商业营销的手段，试图截取选民愈来愈涣散的议题关注力以及政治认同。[⑤] 周翔和李镓也认为，在媒介化政治中，政治力量通过设计渲染事件，以戏剧化的故事进行呈现，运用现代化的传媒手段，将社会情绪与政治议题“打包”糅合到信息传递中

---

① 戴宇辰：《走向媒介中心的社会本体论？——对欧洲“媒介化学派”的一个批判性考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 年第 5 期。

② Couldry, Nick. Mediatization or Mediation? Alternative Understandings of the Emergent Space of Digital Storytelling. *New Media & Society*, 2008(3): 373 - 391.

③ Krotz, Friedrich. Media Connectivity: Concepts, Conditions, and Consequences. In *Network, Connectivity and Flow: Key Concepts for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edited by Andreas Hepp, Friedrich Krotz, Shaun Moores and Carsten Winter, 2008, New York: Hampton Press, pp. 13 - 31.

④ 黄旦：《报纸革命：1903 年的〈苏报〉——媒介化政治的视角》，《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 年第 6 期，第 22 页。

⑤ 唐士哲：《重构媒介？“中介”与“媒介化”概念爬梳》，《新闻学研究》（中国台湾）2014 年总第 121 期。

去。[①] 除此之外，学者们还聚焦了音乐的媒介化、[②]游戏的媒介化、[③]文学的媒介化、[④]社会运动的媒介化，[⑤]甚至战争的媒介化，如军队安排随营记者等。[⑥]

2. 理论相遇：数字劳动与媒介化

遗憾的是，丰富多彩的媒介化研究似乎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维度——劳动的媒介化。媒介化理论家施蒂格·夏瓦（Stig Hjarvard）强调："媒介化是这样一种发展进程，社会或文化活动（诸如工作、休闲、游戏等）中的核心要素采取了媒介的形式。"[⑦]在这里，他提及了"工作"，但其后的诸多研究却绕开了这一重要议题，似乎劳动与媒介是两条"平行线"。如果我们认同索尼娅·利文斯通（Sonia Livingstone）的观点，"如今是所有事物都媒介化了的时代"[⑧]，那么当我们在探究媒介对于既有建制化权力过程的影响时，没有理由忽视"劳动"这一人类赖以存续与发展的最基本实践，"劳动"可以说是当前媒介化研究的空白和盲点。

与此同时，媒介化理论也恰能构成数字劳动研究得以成立的自洽性基础，改变当前数字劳动研究的"媒介学无意识"。[⑨] 以批判的政治经济

---

① 周翔、李镓：《网络社会中的"媒介化"问题：理论、实践与展望》，《国际新闻界》2017 年第 4 期。

② Auslander, Philip. *Liveness: Performance in a Mediatized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9.

③ Schulz, Winfried. Reconstructing Mediatization as an Analytical Concept.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4(1): 87 - 101.

④ 蒙冬英：《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文学的媒介化生存》，华侨大学文学院硕士论文，2017 年。

⑤ Gamson, William and Gadi Wolfsfeld. Movements and Media as Interacting System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993(1): 114 - 125.

⑥ Cottle, Simon. *Mediatized Conflict: Developments in Media and Conflict Studies*. Berkshire,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⑦ Hjarvard, Stig. From Bricks to Bytes: The Mediatization of a Global Toy Industry. In *European Culture and the Media*, edited by Ib Bondebjerg and Peter Golding, 2004, Bristol, UK: Intellect Books, pp. 43 - 63.

⑧ Livingstone, Sonia. On the Mediation of Everything.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9(1): 1 - 18.

⑨ 陈卫星、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观念与命题——关于媒介学的学术对谈》，《南京社会科学》2015 年第 4 期。

学为主要理论武器的数字劳动研究,揭示了数字劳工“不幸”的境遇:他们收入微薄、工作不稳定、缺乏训练与专业技能;①他们是高压和监视下的生产线工人,被剥夺了休息时间与私人空间,并遭受体力与精神的双重压力;他们上至自喻为白领的精英阶层,下至尚未走出校园的媒体公司免费实习生;②他们的弹性兴趣劳动被无偿占有与商品化。③ 诚然,这些成果十分重要,然而学者们在进行归因的过程中,却将造成这些问题的“元凶”抽象化为轮廓模糊的“资本”。现在的问题是:难道“资本”是“赤手空拳”地造成了数字劳工目前的困窘吗?恐怕不是,这一切与19世纪血汗工厂中“面对面”发生的资本家对劳工的压迫(当然,肉身在场的劳动压迫如今依然没有绝迹)看似具有延续性,实际上其在实现方式上已经发生了某种重要的变化——劳动控制如今也被媒介技术所“中介”化了。最明显的莫过于数字技术和ICTs在有偿劳动领域的应用使工作强度在不知不觉中增大,④它使得马克思所言的产生剩余价值的工人之间的“协作”效率更高,但最终成果仍然为资本所攫取。⑤ 库尔德里的提醒极为重要,“我们需要探索是否有特定的‘行动的场域’(fields of action),因为媒介而展开或关闭”⑥。当然,并不是说当前的数字劳动研究不关注技术,只是众多研究将网络及数字技术的普及当成一种背景,

---

① Dyer-Witheford, Nick. *Cyber-Marx: Cycles and Circuits of Struggle in High-Technology Capitalism*.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9.

② Mayer, Vicki and Jocelyn Horner. Student Media Labour in the Digital Age: MediaNOLA in the Classroom and the University. I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Labor and Media*, edited by Richard Maxwell, 2015, London: Routledge, pp. 242 - 251.

③ 曹晋、张楠华:《新媒体、知识劳工与弹性的兴趣劳动——以字幕工作组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5期。

④ Manzerolle, Vincent. Mobilizing the Audience Commodity: Digital Labour in a Wireless World. *Ephemera*, 2010(3/4): 455 - 469. 中译文参见文森特·曼泽罗尔,姚建华、徐偲骕译:《移动的受众商品:无线世界的数字劳动》,《开放时代》2017年第3期。

⑤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⑥ Couldry, Nick. *Listening Beyond Echoes: Media, Ethics, Agency in an Uncertain World*. Boulder, CO: Paradigm, 2006, p. 47.

以此作为不需要加以讨论的先验性前提展开后续的论述，得出的结论无外乎资本直接造成了所有的后果，然而媒介技术对劳动过程的重构需要更深层次的理解与考察，亟待打破“思维主体在上，物质客体在下”的二元论，强调思维主体和物质客体的平等关系。[①] 毕竟，资本单靠主观的剥削意愿，是无法造成当下的全部后果的。

因此，媒介化理论与数字劳动研究之间可以产生非常有价值的理论对话：前者的研究仍存在重要缺憾——没有关注媒介化过程对当代劳动的重塑意义，以及它是如何与政治经济权力勾连的；而后者完全可以将媒介化理论作为自身区别于知识劳动、非物质劳动、脑力劳动等概念的立身之本。即“数字劳动”作为学术概念与分析范畴的主体性，在于探讨传播新技术如何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不仅嵌入于既有的社会场域中，而且以自己的逻辑重塑与劳动相关的政治经济环境、劳动过程、劳动控制、生产政体、雇佣模式，甚至劳动者的意识形态。

3. *劳动如何媒介化？*

陈卫星论述道：“从重新塑造社会生态和产业结构开始，当今时代的新媒体正在对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进行全面介入。”[②]围绕数字媒介所依托的中介物和载体所产生的新的组织性和结构性实践，已经按照媒介逻辑重新结构化或正在结构化生产关系。[③] 邱林川提出“网络化劳工”，也就是指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动过程随着数字技术和 ICTs 的普及与全球化程度的提高，被日益网络化，这里的“网络”是指新的生产工具。[④]

以媒介产业为例，大量的经验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一点。杰拉尔德·瑟斯曼（Gerald Sussman）和凯里·希金斯-多布尼（Carey Higgins-Dobney）以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电视新闻业的新闻工作者为研究对

---

① 陈卫星、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观念与命题——关于媒介学的学术对谈》，《南京社会科学》2015 年第 4 期。

② 陈卫星：《新媒体的媒介学问题》，《南京社会科学》2016 年第 2 期，第 114 页。

③ Altheide, David and Robert Snow. *Media Logic*.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79.

④ 邱林川：《新型网络社会的劳工问题》，《开放时代》2009 年第 12 期。

象，揭示出在资本主义的商业模式下，因为生产新闻比购买其他形式的节目成本来得低，所以本地工作日的新闻从 2003 年的每天 3.7 个小时增加到 2011 年的 5.6 个小时。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他们为了满足资本对生产率持续增长的渴求，不得不在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的新闻生产环境中工作，工作强度可见一斑，同时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新闻的质量。① 瑟斯曼和希金斯-多布尼进一步发现，自动新闻生产技术的推广（以及机器人的使用）使计算机可以替代大量摄像师、音频技术人员、图像生成师等媒介产业中不同职业技术人员的工作。这种变化不仅存在于电视台的控制室中，而且还表现在新闻的日常生产过程中，记者、编辑、摄像、直播车操作员工作数量的减少和工作职责不断的趋同化。在此，对于媒介产业的数字劳工而言，他们一方面面临着工作强度加剧的威胁，另一方面陷入工作可替代性增强的困境，即专业主义精神与技术角色的界限被模糊，工作与闲暇、办公室与家庭之间的界限也被消泯。曹晋和许秀云则调查了网站编辑群体，在其考察的网站，89％的编辑表示曾将工作带回家进行。两位学者认为，工作时间的弹性反映在工作时间的免费延伸以及工作对于家庭生活的侵占。在传播新技术的助力下，市场逻辑如虎添翼，延伸到生活的各个空间中，并且俘获了家庭，“而唯一的获益方仍是雇主，因为他们不需要为编辑在家中的工作时间支付工资”②。周鹏发现，新技术全面渗透到新闻劳动之中的结果是使新闻记者沦为技术的奴隶。③ 这表现在：一方面，新闻劳动被行动网络“异化”成无时间、无空间限制的生产活动，无限增加了新闻记者的劳动强度；另一方

① Sussman, Gerald and Carey Higgins-Dobney. The Planned Obsolescence of TV Journalism. I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Labor and Media*, edited by Richard Maxwell, 2015, London: Routledge, pp. 230 - 241.

② 曹晋、许秀云：《传播新科技与都市知识劳工的新贫问题研究》，《新闻大学》2014 年第 2 期，第 98 页。

③ 周鹏：《是劳动，还是社交？——从“东八区”记者微信群看社交媒体对新闻劳动的影响》，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硕士论文，2017 年。

面，雇主高举“数字融合”的大旗，最终的负担实际上落到新闻记者身上，数字融合不仅是媒介融合，更是记者本身的各种新媒介技能的融合。以往是多部门和多人协作的任务，现在一个人就能完成，文字记者需要承担写稿、摄影、出镜、运营新媒体平台等诸多不同的工作，成为“气喘吁吁的全媒体记者”。① 陈甜甜通过研究游戏产业的美术工作者发现，“新技术的不断发展重新界定着劳动过程，并因此界定着劳动者的职业结构，适应性和多技能成为对劳动者的内在要求”②。具体而言，游戏产业的美术工作者在学习新的绘图软件的同时，又在重复着大量程式化、生产线化的工作，工作的艺术性和创意性被不断牺牲，时刻处于过度的身体劳累与去技能化的危险之中。除此之外，维奇·梅耶尔（Vicki Mayer）通过在美国、巴西等国家或地区大量的民族志研究，揭示出新电视经济中内容的主要生产者并非人们想象中的专业导演或团队，而是大量非专业，但颇具创造性的个体，如 DIY 摄影师、真人秀节目制作人等。③ 一方面，他们从事着大量“隐形的劳动”（invisible work），即他们的劳动不是被低估，就是被视而不见，因此他们缺乏必要的劳动保障且工作日趋弹性化；另一方面，他们的劳动成果和专业人员的劳动成果一样都进入商品流通体系，为资本积累和增殖做出同样的贡献，同时加速资本在全球电视行业内的扩张。

凯文·凯利（Kevin Kelly）断言：“新经济是关于通信的……所有改革都起源于我们正在进行的通信革命……它在文化、技术和观念上震撼着我们生活的根基。”④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也颇具启

① 陈国权：《气喘吁吁的全媒体记者》，《中国报业》2011 年第 23 期，第 52 页。

② 陈甜甜：《新媒体语境下游戏从业者的非物质劳动研究》，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艺术设计学院硕士论文，2018 年，第 40 页。

③ Mayer, Vicki. *Below the Line: Producers and Production Studies in the New Television Econom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④ 凯文·凯利：《网络经济的十种策略》，萧华敬、任平译，广州：广州出版社，2000 年，第 7 页。

发性地告诉我们，“电子媒介跨越了以物质场所为基础的场景界限和定义”①。也即，家中的房屋再也不是将个体与社会完全隔离开来的有效屏障，网络重新组合了人们的社交环境，融合了以往不同的公共场景，模糊了私下与公开行为的分界线，削弱了有形地点与曾经在该地点上演的行为之间密切的联系，并由此改变了人们对于什么是“恰当行为”观念的[illegible]变。在数字劳动中，“办公室”这一地点借助媒介技术，彻底成为“流[illegible]空间”。

另一方面，媒介技术无远弗届的神奇力量不仅消灭了空间，也消灭了时间。路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修道院与钟表》一节中认为，钟表而不是蒸汽机才是现代工业时代最关键、最核心的机器。② 因为它不仅能够计时，更是协调人类活动、整合人类行为的工具。有了时钟和抽象的时间(小时、分钟、秒)，修道院的那种井井有条，有节奏和有规律的祈祷、劳动、学习、休息才成为可能，守时才成为人们的“第二天性”(second nature)。但技术进步有时并不一定沿着同一方向来改变社会秩序，史蒂文·约翰逊(Steven Johnson)就发现：人工照明的进步产生了一个意外后果——自然睡眠被挤压。③ 媒介技术亦如此，它打破了旧的时间观和规律的生活节奏，逆转了钟表分割时间的作用，使得时间亦“流动”与再次“混沌”了起来。不管劳动者现在应该处于什么样的私人时间，如假期、睡眠等，只要是电话与网络能够通达之处，雇主便可以吸纳这种时间“为我所用”，致使以往依靠钟表确定的上班/下班时间没有了清晰的边界，这才令非生产时间在资本面前荡然无存，时间继而也被消灭了。此外，“效率第一”“企业优先”这些话语和工作伦理还作为媒介逻

① 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4页。

② 路易斯·芒福德：《路易斯·芒福德著作精萃》，宋俊岭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年。

③ Johnson, Steven. *How We Got to Now: Six Innovations that Made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2014.

辑的产物，被内化为人们的内在价值观。在这种时空皆为媒介技术所重新规划的情况下，劳动者不断面临弹性的日程，陷入时刻保持待命的工作状态和“劳动权困境”①，人人都有享受休息和休假的权利（包括劳动者合理地限制工作时间，雇主定期为劳动者提供带薪休假）这一人类通过斗争获取的成果已然岌岌可危。正如马克思曾发问：“一切已有的机械发明，是否减轻了任何人每天的辛劳？”②实际情况是，“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非但没有缩短劳动时间和减小劳动强度，反而最终把工人的劳动强度增加到无以复加的地步”③。因此，朱蒂·威吉曼（Judy Wajcman）提出了“时间紧迫悖论”（time pressure paradox）④，人们即使处于闲暇中，也会时刻担心工作任务的袭来，因为闲暇已经因为时空的分离而被媒介技术消灭。现代经济学最具影响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所预测的技术进步将使工作时间越来越短，人们有望从生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日渐渺茫。因此，媒介不仅是技术和文化体系，还是一种历史结构，它提示我们关注新媒体与社会生产力升级换代的关系。⑤

媒介技术只是重塑了脑力劳动的劳动过程吗？似乎没有那么简单。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提出了“媒介域”（Médiasphères）的概念，旨在说明传递技术及其制度支配如何作用于社会秩序的确立与改变。⑥ 在凯利那里，网络技术的行为模式更像“生物”而不是“机器”，随着技术稳定发展到通信网络和交通网络时期，技术已经完全淹没了

① 夏倩芳、李婧：《媒体从业者的劳动权困境及其形塑机制》，《学术研究》2017年第4期。

②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27页。

③ 王行坤：《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时间政治——评瓦克曼〈时间紧迫〉》，《中国图书评论》2018年第8期，第97页。

④ Wajcman, Judy. *Pressed for Time: The Acceleration of Life in Digital Capitalism*.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

⑤ 陈卫星：《新媒体的媒介学问题》，《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⑥ 陈卫星：《传播与媒介域：另一种历史阐释》，《全球传媒学刊》2015年第1期。

社会领域，其逻辑已经接管了物质世界，所有物体和交易都将受到网络逻辑的支配。[①] 卡斯特就注意到网络带来的“最为广泛的组织演变趋势”是从“批量生产”到“弹性生产”、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的转型，基于机械化和流水线的大规模生产与基于垂直整合和制度化分工的大企业，已经受到“弹性生产系统”和“弹性积累”的挑战。[②] 以风头正劲的共享经济为例，根据《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21)》显示，2020年，中国在网络平台上提供服务的人数约为 8 400 万人，同比增长约 7.7%，共享经济领域直接融资规模约为 1 185 亿元人民币。[③] 可以说，媒介技术直接催生了新的劳动领域、生产方式和劳工组织形态。[④] 然而，共享经济真的意味着自由和解放吗？纪雯雯与赖德胜指出，网络平台就业以更加灵活和多元的方式重塑了劳动关系，企业以提供“信息服务”为名，吸纳劳动者碎片化的时间与资源，诱使其参与不签订劳动合同的、难以认定为劳动关系的兼职活动，挑战了劳资关系的相关性认定，动摇了劳动力市场的稳定性。[⑤] 以网络为技术依托的共享经济冲击了以终身雇佣制为特征的稳定雇佣关系形态，将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得以有效联结，实际上是一种“企业＋平台＋个人”的更富轻便化的新型灵活雇佣关系，在袁文全与徐新鹏看来：

> 这种雇佣关系形式上有别于当前劳动法律意义上的劳动关系，实质上具有以民事关系掩盖雇佣关系、以非标准劳动关系掩盖标准劳动关系的隐蔽性……巧妙地绕过为员工提供安全卫生的工作环

① 凯文·凯利：《网络经济的十种策略》，萧华敬、任平译，广州：广州出版社，2000 年。

② 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

③ 国家信息中心：《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1)》，网经社，2021 年 2 月 20 日，http://www.ec100.cn/detal-6585190.html。

④ 詹婧、王艺、孟续铎：《网络平台使灵活就业者产生了分化吗？——传统与新兴灵活就业者的异质性》，《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8 年第 1 期。

⑤ 纪雯雯、赖德胜：《从创业到就业：新业态对劳动关系的重塑与挑战——以网络预约出租车为例》，《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6 年第 2 期。

境、缴纳社会保险、提供劳动工具及保障劳动条件等法律规定动作，对员工实现“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理想管理状态。①

如今，企业成为一种“液态”的存在，通过极精瘦的管理模式和彻底的“众包”，将核心数据加工以外的劳动持续推向外部劳动力市场，实际上造成劳动者议价能力与劳动保障水准的大幅度下降。非但如此，网约车司机还要自己承担汽车的燃料、维护与保险之类的费用，爱彼迎（Airbnb）房主需要自己来进行清洁打扫。以“弹性生产”为特征的平台则顺利地实现成本转嫁，规避了倚靠“批量生产”的传统出租车业、酒店业需要雇用管理人员、接线人员、清扫人员、安保人员，依法支付其报酬，缴纳社会保险，保障其劳动权益的成本，无偿征纳司机和房主的这一部分额外劳动，并从收入中抽取服务费。

此外，共享经济实际上加强了劳动者对于媒介技术及其拥有者的依赖性与从属性，劳动者并不能控制自己的工作，“集中体现在他们不具有自行联系客户和定价的权利；一经注册成为平台用户，则必须全盘接受平台所制定的规则”②。平台亦介入或控制劳动者的劳动过程，把控其工作品质，评估绩效并执行优胜劣汰机制。③ 还是以网约车平台为例，“每一次运营的发生都被隔绝在信息技术的帷幕之外，演算法越精密、越复杂，司机就越难以理解这个过程，而只能被动接受抢单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不确定的路程、用时、客户等）”④。梁萌通过研究网络技术影响下的家政女工，发现了“弱契约＋强控制”的用工模式——平台弱化对劳动

① 袁文全、徐新鹏：《共享经济视阈下隐蔽雇佣关系的法律规制》，《政法论坛》2018 年第 1 期，第 121 页。

② 杨伟国、王琦：《数字平台工作参与群体：劳动供给及影响因素——基于 U 平台网约车司机的证据》，《人口研究》2018 年第 4 期，第 79 页。

③ Acevedo, Deepa Das. Regulating Employment Relationships in the Sharing Economy. *Employee Rights and Employment Policy Journal*, 2016(20): 1-36.

④ 杜鹃、张锋、刘上、裴逸礼：《从有产者游戏到网络劳工——一项关于共享经济与劳动形式变迁的定性研究》，《社会学评论》2018 年第 3 期，第 47 页。

者的保护，而与消费者联手增强劳动控制。[①] 平台一方面以“轻资产战略”（本身不雇佣任何人员，不需要租用任何职业介绍场所）延续了家政女工“弱契约”的劳动关系，以临时的、非正式的劳动关系（包括兼职、劳务派遣、平台合作）来雇用家政女工；另一方面则利用 GPS 定位技术来监控她们的服务地点，进一步加强对她们劳动纪律的管理，用户回馈和评价机制也从过去保姆介绍所中的口耳相传转变为即时和平台保持回馈与互动，劳动者处于企业和用户共同构筑的“强控制”管理网络之中。来自澳洲的研究也显示，在数字平台实施的结构性宰制中，搜集和传播评价员工的信息往往是单边的。[②] 就家政服务平台而言，它们中的大多数只提供雇主对于家政工的评价，不会给家政工机会去反驳差评或详细讲述自己遭遇的虐待、歧视、不安全的工作条件、不合理的要求或赖账等情况。在网络平台上，家政工的可替代性大幅提高，快速更替和流转的零工家政人员缺乏长期的职业发展轨道。

实际上，上述劳动者通过网络平台从事的依然还是非常传统的服务，但媒介技术这只“新瓶”却使他们处于“全天候工作模式”之下，加大了从业者的职业疲劳感，降低了他们的劳动自主性。媒介技术从人类手中的工具最终异化为反噬劳动者的“生物”。[③] 更重要的是，它与弹性积累策略无缝对接在一起，为形成新的市场组织形态与组织分工提供了崭新的技术手段，实现了生产组织方式的重大变革，瓦解了工业时代稳定雇佣关系和劳工保护政策的制度性基础，使现有法律规范落后于现实，而这些由劳动的媒介化所带来的重大挑战，反映了“用来解决社会问题

① 梁萌：《强控制与弱契约：网络技术影响下的家政业用工模式研究》，《妇女研究论丛》2017 年第 5 期。参见梁萌：《强控制与弱契约：互联网技术影响下的家政业用工模式研究》，姚建华、苏熠慧主编《回归劳动：全球经济中不稳定的劳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年，第 301—325 页。

② Flanagan, Frances. Theorising the Gig Economy and Home-Based Service Work.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2019(1): 57 - 78.

③ 詹婧、王艺、孟续铎：《网络平台使灵活就业者产生了分化吗？——传统与新兴灵活就业者的异质性》，《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8 年第 1 期。

的技术本身制造了更多问题”这一意外的后果。①

（三）如何理解初级产业与制造业的劳动？

完成上述分析后，依然还存在一个问题，即如何安放初级产业与制造业的劳动？开采电子产品元件原料和生产这些产品的体力劳动者本身可能既没有被媒介化（依然使用原始工具或进行手工操作），劳资双方也没有为数字平台所中介，如果仅仅根据最终产品形式（如苹果手机），就将初级产业与制造业的劳动者纳入数字劳工的范畴，似乎站不住脚。他们与生产服装、玩具等日用品的劳工可能并无本质不同，我们并不会将后者称作“服装劳工”或“玩具劳工”，并对两者进行专门区分。

虽然媒介化在中程（冲击现有法律制度，形成新型雇佣关系）和微观层面（将劳动延伸至家庭空间与 24 小时）的体现较为容易把握，上文对此进行了全面的阐释，但它作为一种“元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宏大层面的概念。② 在数字化生存成为一种宏观语境的背景下，学者们往往忽略了一点，即数字化的生活环境和交往不等于“非物质化”，它是建立在物质性的基础设施和设备之上的，如同“云”并不是真的无根，它所依赖的数据中心是建立在温度合适、水源丰富的自然环境之中的，涉及真真切切的土地和资源问题。③ 既然数字生存环境本身是“物质化”的，那么就离不开建造这些物质基础设施的初级产业与制造业的劳动，不管是挖掘矿产、铺设光纤还是组装手机，均是“将人连为一体”的“宏观媒介化”过程的组成部分。

更何况，这种“宏观媒介化”的过程实际上与当代资本主义积累难

---

① 刘丹凌、赵娟娟：《对媒介化社会的批判与反思——基于媒介环境学的视角》，《学术论坛》2014 年第 4 期，第 102 页。

② 周翔、李镓：《网络社会中的“媒介化”问题：理论、实践与展望》，《国际新闻界》2017 年第 4 期。

③ Mosco, Vincent. *To the Cloud : Big Data in a Turbulent World*. Boulder, CO: Paradigm, 2014.

分彼此。丹·席勒(Dan Schiller)就指出,日新月异的数字科技与快速崛起的中国是"数字资本主义"两个增长极。[①] 邱林川以此为引,认为应该"把富士康置于全球体系进入以数字媒体为基础的积累阶段这一更大空间范围内进行考量"[②]。在人类的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劳动生产过程都全面数字化的条件之下,电脑和手机等电子产品才成为"个人化的基础设施"和"刚性需求"。资本难以遏制增殖的冲动,通过缩短产品周期,增加易耗性,不断推陈出新,并借助广告和新品发布会等手段来营造"更换而非维修"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消费者(不知情或知情但不作为)与资本合谋,实际上也从客观上造成了"i奴"的悲惨境况。因此,数字劳工这一概念的确能够将初级产业与制造业的劳动者纳入分析的视野。

二、媒介的"劳动化":你使用媒介,还是媒介使用你?

在考察了劳动的媒介化过程之后,我们将回归数字劳工理论的本源,来探讨网络用户所贡献的免费的生产性消费活动。网络用户作为数字劳工研究最初的分析对象,在理论上不会遇到上述概念界定的困境,顺理成章地完全包裹于清晰的问题域之中,近年来也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较早提出了"产消合一"(prosumption)的概念,预言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界限日趋模糊。[③] 福克斯认为,受众经由互动技术被引入信息生产过程,贡献免费的劳动,其休闲时间被转化为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时间,成为媒介资本增殖和价值生

① Schiller, Dan. Poles of Market Growth? Open Questions about China, Information and the World Economy. *Global Media & Communication*, 2005(1): 79 - 103.

② 邱林川:《告别i奴:富士康、数字资本主义与网络劳工抵抗》,《社会》2014年第4期,第120页。

③ Toffler, Alvin. *The Third Wave*.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0.

产的源泉。[①] 邱林川用“网络即劳工”来概括这一现象，其核心是媒介“把非物质劳动集腋成裘，再转化为资本积累的生产活动”[②]。媒介由此呈现“劳动化”的特征，资本将网络用户的技术使用、信息接收、社交关系、休闲娱乐等传播行为进行劳动化与商品化，从而吸纳其成为“数字劳工”。福克斯将“产消合一者”的劳动价值实现方式分为两种：海量的 UGC 与用户数据，后者涵盖人口数据、人际网络、个人嗜好、浏览的网页记录，等等。[③] 这一判断时至今日依然基本成立，下文的阐述与理论钩沉将借用这一框架，引入当前研究的新进展与新发现，许多成果实际上证实、补充和丰富了这一理论。

（一）多面向的内容

乔治·雷瑟（George Ritzer）和纳森·尤根森（Nathan Jurgenson）认为，作为生产者的用户虽然被赋予使用生产性资源的权力，但他们所创造的利润和价值，或潜在的利润和价值都归属公司。[④] 如吴鼎铭对公民记者进行了研究，认为现有分析局限于“权力—话语”的理论框架与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视角，总是乐观地认为公民新闻赋予了草根以发声的管道，大众民意得以获取媒介权力，实现自我表达，从而动摇了统治精英的合法性与稳定性。[⑤] 但其实质却是网络用户在网络商业意识形态的询唤之下，自觉自愿地加入新闻众包的劳动，成为廉价乃至免费“贡献”自身

---

① Fuchs, Christia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Society: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Internet.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9(1): 69 - 87.

② 邱林川：《新型网络社会的劳工问题》，《开放时代》2009 年第 12 期，第 135 页。

③ Fuchs, Christian. Web 2.0, Prosumption, and Surveillance. *Surveillance & Society*, 2011 (3): 288 - 309.

④ Ritzer, George and Nathan Jurgenson. Production, Consumption, Prosumption: The Nature of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the Digital “Prosumer”. *Journal of Consumer Culture*, 2010(1): 13 - 36.

⑤ 吴鼎铭：《“公民记者”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反思——以“数字劳工”理论为研究视角》，《新闻界》2015 年第 23 期。

劳动成果的数字劳工，免去了雇佣成本与赚得盆满钵满的恰恰是这些新闻网站。传统商业媒体需要生产和制作免费内容作为诱饵吸引受众，在此基础上才能开展广告销售的任务，其内容生产劳动尚未被转嫁给受众，受众所做的仅仅是观看。在社交媒体时代，受众商品的建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平台媒体连内容都不需要自己来生产，免费的“饵”是由“鱼”自己制作的，它充分利用源源不断的 UGC，将自己的角色从生产者转化为连接者，将一部分用户生产的内容作为吸引另一部分用户的筹码。① 可以说，用户承担了原本传统媒体中编辑、记者等专业从业者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②，再加上自身的观看剩余劳动，这三种劳动的价值如今都被平台无偿占有了。占有剩余劳动是资本的天性，但无偿占有必要劳动，亦可谓“返祖”回了前资本主义时代。这也是传统媒体溃不成军的原因之一——它们依然在为内容生产的成本买单。

除了生产原创性的“饵”，受众实际上还通过向自己和他人营销产品及服务来为媒介资本工作。③ 在这其中，一对一“参与式营销”的兴盛便是较为典型的例子，其依赖于社交媒体将 UGC 直接纳入营销的过程之中，黄炎宁称其为“粉丝劳动”。④ 他通过研究新浪微博上的杜蕾斯官方帐号发现，近几年迅速兴起的基于社交媒体的企业营销，同样不乏广大网络用户积极参与的身影。从转寄产品信息给好友到通过社交媒体晒“美食”，不少用户乐此不疲，投入情感，收获满足，贡献自己的“文本生产

① Gallant, Linda and Gloria Boone. Communicative Informatics: An Active and Creative Audience Framework of Social Media. *Triple C*, 2011(2): 231 - 246.

② 在马克思看来，工人的劳动时间分为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前者为工人自身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须，而超出这一部分的时间即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时间，剩余劳动产生剩余价值，为资本所占有。参见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

③ Smythe, Dallas. *Dependency Road: Communications, Capitalism, Consciousness, and Canada*, Norwood, NJ: Ablex, 1981.

④ 黄炎宁：《中国社交媒体企业营销中的用户劳动和消费主义主体建构：以新浪微博上的杜蕾斯官方帐号为例》，《传播与社会学刊》(中国香港)2016 年总第 37 期。

力”(textual productivity)作为“数字经济创造价值的基础”，同时也主动配合传播新技术对于日常生活的殖民化，促成了“免费的时间日渐从属于消费的‘劳动’”这一转化过程。① 蔡润芳发现，用户被卷入的实际上是社交媒体价值链的三个环节，即消费、生产和市场。② 因此，在 Web2.0 中还有另外两种隐秘的用户价值生产过程，其一是用户自己成了“你媒介”(you media，也就是“你自己成了媒介”)，其二是建构和维护自己的社交网络所耗费的劳动，客观上为社交媒体省去了市场分析与调查的成本，促成了平台对“营销劳动”的集约型剥削过程——以几乎为零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回报，在这个过程中，用户不仅生成了内容，还生成了传播管道。③

此外，库克里奇笔下的“玩工”也有了新的变化。④ 他的开创性研究指出，玩工的实质是在闲暇时间贡献具有创造性的玩耍活动，他们自发修改和创作的游戏内容成为游戏产业价值与创新的重要源泉，极大地降低了公司在研发和营销上的人力成本与其他费用。玩工为资本积累和增殖贡献了大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已经远远超越兴趣爱好的范畴。然而，吴鼎铭对中国“金币农夫”和电竞玩家的研究发现，这种所谓的玩乐劳动既不休闲，也并不一定具有创造性，“金币农夫”依靠重复和枯燥的鼠标点击换取游戏升级所需的虚拟钱币，并将这些钱币上交给他们的老板进行统一出售，从而获得收入。⑤ 在中国，大约有 200 万青少年

---

① Robins, Kevin and Frank Webster. *Times of the Technoculture: From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to the Virtual Life*.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② 蔡润芳：《“积极受众”的价值生产——论传播政治经济学“受众观”与 Web2.0“受众劳动论”之争》，《国际新闻界》2018 年第 3 期。

③ Fisher, Eran. “You Media”: Audiencing as Marketing in Social Media.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015(1): 50-67.

④ Kücklich, Julian. Precarious Playbour: Modders and the Digital Games. *The Fibreculture Journal*, 2005(5). 中译文参见尤利安·库克里奇、姚建华、倪安妮译：《不稳定的玩工：游戏模组爱好者和数字游戏产业》，《开放时代》2018 年第 6 期。

⑤ 吴鼎铭：《互联网时代的“数字劳工”研究——网络“受众”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视角》，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论文，2015 年。

被吸纳进这一高度市场化的领域之中，用自己的“点击劳动”驱动网络游戏产业冉冉上升。

在此背景下，玩工成为游戏产业的劳动力后备军，且具有明显的不稳定性。① 值得关注的是，这种不稳定性并不是玩工所独有的，它日益成为全球经济中劳动方式或雇佣关系的新常态。不管是在美国、英国、德国等“全球北方”国家或地区，还是在中国、印度、巴西等“全球南方”国家或地区，无论是在传统产业，抑或是在新兴产业，全球经济中劳动力市场弹性机制的形成，以及由此带来的工资、雇佣关系、工作制度与劳动者技能的弹性化，使越来越多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因缺乏必要的保障而陷入不稳定的状态。

（二）数据“钻井”与一般劳动

福克斯强调，用户花费在脸书上的时间越多，其所生产的最终被售卖给广告客户的数据就越多。② 用户的线上时间如今都成为被监视的对象，并最终成为流量数据被售卖给广告商，即当下无论一种媒介如何声称自己是新媒介，如何改变了人类的联结方式，如何颠覆了既有的传播生态，它依然还是在依靠广告作为其经济基础，这一点与大众媒介大体无异，脸书、推特（Twitter）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都通过广告获取收益。用免费的“饵”将用户持续捆绑在平台上只是第一步，获取并基于用户数据售卖广告才是社交媒体的真正目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数据实际上已经成为平台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正如尼克·斯尼克（Nick Srnicek）

---

① “劳动力后备军”（reserve army of labour）这一概念首先是由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十三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中提出的。在马克思看来，“过剩的工人人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这些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了一支劳动力后备军，他们是资本主义积累的重要基础，具有流动性、潜在性、停滞性和赤贫性四个基本特征。参见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93页。

② Fuchs, Christian. With or Without Marx? With or Without Capitalism? A Rejoinder to Adam Arvidsson and Eleanor Colleoni. *Triple C*, 2012(2): 633 - 645.

所言，平台作为两个或更多群体互动的空间，事实上将成为数据的“钻井”。[①] 每一次私人线上互动都成为一个被平台捕获的信息点，并且被输入某种演算法。不仅如此，可穿戴设备还将人们的身体数据源源不断地提供给数据收集者。理查德·艾斯可（Richard Eskow）发现，大数据公司甚至追踪厌食症、药物滥用、暴食症、抑郁症、无家可归、不孕不育等用户信息，收集的范围延伸到心理健康、投票倾向和许多其他行为，乃至个人滚动鼠标速度与登入帐号频率的数据。[②]

借用约翰·霍特希尔（John Thornhill）的话来形象地表达，网络用户就像是“数字电池母鸡”，在行动电话上“啄食”，为机器学习程式生成大量的数据集，以解决如何向自己营销广告商品的问题，而媒体竞争日益变成一场尽可能长时间地吸引用户注意力的战斗。[③] 其背后的事实是，社交媒体的日常实践，构成了一个潜在的剩余劳动领域，随时可能被转化为剩余价值。李光锡也认为，因为企业现在要吸取青年休闲与玩耍的时间，他们在业余和尚未就业的时间等所做的“剩余活动”，就变成制造另一种形态的市场价值的根据，青年们的网上游戏和自我表达为数据演算机器提供原料与能量，最后被它吞噬，成为数据工厂的“燃料”。[④] 因此使用社交媒体成为一种“线上剩余劳动”。这种“制造成瘾”的新媒体技术使人们不再受雇佣关系和上下班时间的限制，全天 24 小时都是生产价值的劳动时间。劳动不再受年龄、社会性别、学历、健康状况、岗位

---

① Srnicek, Nick. We Need to Nationalise Google, Facebook and Amazon. Here's Why. *The Guardian*, August 30, 2017.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7/aug/30/nationalise-google-facebook-amazon-data-monopoly-platform-public-interest.

② Eskow, Richard. Let's Nationalize Amazon and Google: Publicly Funded Technology Built Big Tech. *Salon*, July 8, 2014. https://www.salon.com/2014/07/08/lets_nationalize_amazon_and_google_publicly_funded_technology_built_big_tech/.

③ Thornhill, John. Social Media Users of the World Unite!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5, 2018. https://www.ft.com/content/ea6c3a0c-0843-11e8-9650-9c0ad2d7c5b5.

④ 李光锡：《东亚青年与高科技文化——青年难民的劳动地牢摆脱记》，《热风学术网刊》2017 年第 1 期。

和技术工种的限制,只要拥有数字设备并保持“永远在线”,即可成为为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主体,而新媒介平台并不支付使用者任何必要劳动的价值。① 蓝江的说法或许更为透彻,上网已经呈现马克思所说的“劳动一般”的特征,也即后来在其《资本论》中演化为抽象劳动的概念,② 浏览网页、打游戏、网购、发布内容之间已经没有区别,因为它生产的是集体性的“一般数据”,它代表所有数据的抽象层面,每个人的数据已变得难分彼此,造成的“数据异化”(datafied alienation)甚至要比传统的劳动异化更为骇人,用户作为生产数据的劳动者,已经全然与自己的劳动成果相分离,甚至浑然不觉自己的数据已经被反过来诱导自己按照广告商和政客的意愿来消费与投票。

三、可能的未来:非异化劳动之实现

如前所述,资本并不是“赤手空拳”地造成了当下的全部后果,而媒介技术本身也不可能“单枪匹马”地引发一切变革,灵活用工关系的秘密不过是资本主义积累体制演变的结果,以及资本、国家、劳动力之间力量失衡条件下劳动力不断商品化的集中表现,而当前一切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提高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和资本进行加速积累与增殖的方法。③ 因此王行坤指出,传播新技术并非人们感到“时间紧迫”和被全面宰制的唯一元凶,症结在于数字技术如何被资本主义企业利用,从而对劳动者进行更为“精细刻薄”的剥削。④ 我们从中获得的启发则是,在媒介与劳动的关系中,从来都不只有两类变量,如媒介—政治、媒介—文

① 孔令全、黄再胜:《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之数字经济时代拓展——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数字劳动价值创造研究》,《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8 年第 2 期。

② 蓝江:《数字资本、一般数据与数字异化——数字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引》,《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4 期。

③ 王金秋:《资本积累体制、劳动力商品化与灵活雇佣》,《当代经济研究》2017 年第 1 期。

④ 王行坤:《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时间政治——评瓦克曼〈时间紧迫〉》,《中国图书评论》2018 年第 8 期。

学，而是资本—技术—劳动者的三角结构。

莫斯可洞察到："当代传播政治经济学对抵制的强调日益普遍化，这就使以资本、支配企业和精英为中心的立场转向了女性主义和劳动研究。"[①]此处使用的"未来"一词实际上具有双重意义，既指数字劳动者的未来，亦是数字劳动研究的未来。在积极对问题进行理论化并揭示其真相之后，学者们已经开始将研究聚焦于当前丰富多彩的"反向运动"(counter movement)，这种反向运动包括夺回时间主权、削减工作时间、建设更民主的工作场所、争取更合理的工作日程和更人道的工作形式，以及获得更公正的劳动分配等。王行坤将其称为"当下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微观政治"[②]。

一方面是对媒介化劳动的抗争。如德国大众公司规定，在工作时间之外不能向员工发送电子邮件，[③]法国在2017年元旦通过法律，工人享有"断网权"(right to disconnect)等。人们借助制度化权力反抗"垄断资本主义无休闲"的命运，努力阻止资本试图通过传播新技术进一步延长工作时间、剥削绝对剩余价值的企图。[④] 针对媒体组织弹性雇佣蔓延的趋势，曹晋和曹茂则呼吁，国家应该扮演落实劳动法规的主角，通过宏观干预降低劳动力被商品化的程度，建立社会安全制度和保障体系，支持媒体集团为劳动者配备基本公正的工资制度、福利体系与考核指标。[⑤]针对共享经济中的劳动，袁文全和徐新鹏提出：立法的基本宗旨要以现

① 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胡春阳、黄红宇、姚建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145页。

② 王行坤：《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时间政治——评瓦克曼〈时间紧迫〉》，《中国图书评论》2018年第8期，第103页。

③ Wajcman, Judy. *Pressed for Time: The Acceleration of Life in Digital Capitalism*.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

④ 绝对剩余价值是指在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条件下，通过绝对延长工作日(绝对剩余劳动时间)的方法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⑤ 曹晋、曹茂：《"新闻民工"修辞的政治经济语境分析》，《当代传播》2017年第6期。

有劳动法律制度为基础,借鉴荷兰等国的经验,遵循“灵活安全性”(flexicurity)为原则的制度框架,探寻适应新型用工形态的劳工关系认定标准,建立科学、系统的劳动法律体系,其核心是“灵活就业正规化”和减缓工作的不稳定性,并提高其社会保障水准。① 近年来,平台合作主义作为一种知识框架和运动已经在全球兴起,它的载体为合作拥有、民主管理的平台合作社,依赖于平台的所有者、用户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拥有与管理。与现有的“公司性”平台不同,合作社的剥削程度较低,它通过确保平台的财务和社会价值在参与者之间传播,发展更为公平、公正的数字媒介经济。平台合作主义借鉴了同侪生产的理念,坚持“新的民主和经济参与”,目标是在公平的工作条件下实现更加多样化的数字劳动格局和完全分散式的非市场机制。②

另一方面是对媒介劳动化的抵抗。面对媒介资本将人类的社交和传播能力置入资本积累陷阱的实质吸纳(real subsumption)过程,吴鼎铭分析了几种抵抗形式:其一是另类媒体与数字公有地的建设,其二是“盗用”与“游击”式的抵抗,其三是“被遗忘权”的伸张,并上升至对“生命政治”剥削的抗争。③ 针对人类上网活动已成为具有抽象劳动特征的一般数据生产过程,阿列塔·伊瓦拉(Arrieta Ibarra)等学者提出要从作为资本的数据(Data as Capital)向作为劳动的数据(Data as Labour)的理论转型,数据是用户的财产,应使其所有者受益,公司有必要为人们的数据付费,并以此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培养具有“数字尊严”的文化。④ 同样,合作化运动也波及了数据领域,2012 年,意大利合作社联合会

---

① 袁文全、徐新鹏:《共享经济视阈下隐蔽雇佣关系的法律规制》,《政法论坛》2018 年第 1 期。

② Scholz, Trebor. *Uberworked and Underpaid: How Workers Are Disrupting the Digital Economy*. New York: Polity, 2016.

③ 吴鼎铭:《互联网时代的“数字劳工”研究——网络“受众”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视角》,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论文,2015 年。

④ Arrieta Ibarra, Imanol, Goff, Leonard, Jiménez Hernández, Diego, Lanier, Jaron and E. Glen Weyl. Should We Treat Data as Labour? Moving Beyond “Fre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Papers & Proceedings*, 2017(1).

(Legacoop)发布了《合作公地》(*Cooperative Commons*)宣言，呼吁将合作社运动的经验教训用于控制线上数据。叶夫根尼·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则建议人们直接创建数据所有权合作社。[①] 2016 年，瑞士苏黎世出现了一家非营利性的线上合作社 Midata，其宗旨是成为会员医疗数据的交换平台。

统而观之，自 20 世纪 40 年代传播政治经济学发轫以来，一代又一代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将学术生活视为社会变革的一种形式，社会干预视为知识的一种形式，围绕主要传播议题展开了积极的行动主义研究和实践，展现了他们兼备批判旨趣和人文关怀的学术品格。他们坚持以社会公平与正义为终极关怀，不断跨越研究和政策的壁垒，不懈追寻媒介变革的动力，履践葛兰西所示范的有机知识分子的角色，为个人和社会的解放提供了不竭的动能。对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来说，未来的数字劳工研究应更多地关注替代性选择与非异化劳动的实现路径，更为重要的是，将上述路径照进现实。

① Morozov, Evgeny. Data Populists Must Seize Our Information for the Benefit of Us All. *The Guardian*, December 4, 2016.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6/dec/04/data-populists-must-seize-information-for-benefit-of-all-evgeny-morozov.

第二章　全球数字劳动研究的现状与中国语境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传播领域的应用和延伸，始终秉持着其母体学科的基本理论出发点之一，即将劳动视为价值的源头，并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解建立在资本对劳动力剩余价值的剥削之上，这种理解脱胎于传统生产劳动，延伸到知识劳动，继而扩展至数字劳动。在莫斯可看来，“数字领域的大部分工人都在昔日产业工人似曾相识的条件下辛苦工作”①。同样，默多克尖锐地指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直指该制度中的核心矛盾——劳资关系的矛盾”②。他强调，任何回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忽视劳动价值论的新媒体和数字技术研究将无法触及真正的问题。

鉴于此，本章首先从四个方面梳理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下全球数字劳工的研究现状及其最新成果，它们分别是：制造和服务业中的数字劳工、媒介产业中的数字劳工、产消合一者与玩工，以及数字经济中的劳工组织，并在此基础上，阐述来自国内外的许多批判学者将数字劳动问题

① 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胡春阳、黄红宇、姚建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179页。

② 格雷厄姆·默多克：《导言》，姚建华主编《制造和服务业中的数字劳工》，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9页。

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语境紧密联系起来，对其进行系统性的思考与探索，为中国的数字劳工研究做出的开拓性的贡献。这些成果不仅提供了全球最新的、有力的批判研究视野，而且对分析与反思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相关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全球数字劳动研究的现状

（一）制造和服务业中的数字劳工

传播政治经济学指向的劳动研究并不天然带有脑体之分，即“劳心”与“劳力”之间并不截然对立，这同样适用于对数字劳动的分析过程。在此背景下，如上一章节所阐述的，将包括制造苹果设备的富士康流水线工人在内的制造业中的产业工人纳入数字劳工的研究视野，正是将人类劳动作为一种整体来思考的有益实践，因为数字产品并不是脱离“生产后端”而单独存在的“技术前端”。同样，新兴经济体在数字价值链的每一个环节都产生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从智能手机部件的日常装配到开发新的操作软件与应用系统。

在此，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格外关注全球劳动者中因信息技术应用的不平衡而导致的新型的“数字鸿沟”。米歇尔·罗迪诺-克劳希罗（Michelle Rodino-Colocino）认为，它主要表现在：特权精英启动并控制数字创新过程；中间阶层负责在现有协议的基础上设计出新的应用程序；大量的数字劳工被安排从事日常的装配与服务工作——数字鸿沟的存在更加固化而非挑战了现有的阶级结构。[①] 这种将概念与执行、创意与生产分开的做法恰好是19世纪数学家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思想的延伸，他主张把工作的执行分解为不同的过程，这些过

① Rodino-Colocino, Michelle. Laboring under the Digital Divide. *New Media & Society*, 2006 (3): 487 - 511.

程要求不同程度的技能。企业主可以更精确地根据特定的流程来匹配工资率，绝不支付超过必要的部分，而将劳动过程分解为最基础的重复性操作，又恰恰是“工作降格”或“劳动降格”（work degradation）和资本将工人去技能化的最佳体现。①

与此同时，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致力于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对数字劳工进行考量，即将数字劳工的分析置于全球体系进入以数字技术与ICTs为基础的积累阶段的背景之下，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只是全球数字生产与劳动分工的一个环节。也就是说，从全球资本积累和价值链的角度切入，制造业中的数字劳工研究能够折射出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结构性的不平等——安妮贝儿·费鲁斯-科米罗（Anbiel Ferus-Comelo）在她的研究中发现，苹果、三星等全球顶级手机制造商与印度本国独立制造商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在各邦政府的默许下，这些手机制造商将这个国家训练有素的工人迅速纳入资本化的轨道。在印度的电子产业中，大约有2 780万年轻人被锻造成“唾手可得”的廉价劳动力，为“如饥似渴”的消费者市场生产廉价的手机，而这些手机给跨国公司带来了高额的利润。但同时，他们深陷工作无保障、弹性雇佣、收入极低、缺乏安全保护、没有发展与晋升机会、女工与童工泛滥等诸多困境。不过，年轻的产业工人并非全无能动性，在印度工会组织的领导下，他们开始跨越既有的边界，尝试团结其他贫民、草根与社区组织，并将国内外的手机生产者与消费者团结起来，从而为公民政治教育打开了更为广阔的空间。②

而在服务业中，知识性的生产因其不需要长距离的物质性迁徙，加

① Braverman, Harry.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② Ferus-Comelo, Anbiel. Free Bird: The New Precariat in India's Mobile Manufacturing. I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Labor and Media*, edited by Richard Maxwell, 2015, London: Routledge, pp. 119 - 129. 中译文参见安妮贝儿·费鲁斯-科米罗，仝晓霞译：《自由鸟：印度手机制造业中的新“不稳定无产者”》，姚建华、苏熠慧主编《回归劳动：全球经济中不稳定的劳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50—176页。

速了离境外包的普遍化，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大规模出现的呼叫中心就是其中的一例。这个过程与全球通信系统的使用密切相关，其运作成本也随着技术的发展不断降低。在贝弗里·西尔弗(Beverly Silver)等学者看来，这就是资本在面对强大工人运动时做出的普遍反应之一，“将生产转移到具有更为廉价和驯服劳动力的地点”，即资本的“空间调整”。① 这种调整对于产品原生产地国家或地区的劳动者而言，意味着工作岗位的骤减；同时，对于接受离境外包的国家或地区的劳动者而言，也并非一个好消息。恩达·布罗菲(Enda Brophy)发现，接受离境外包的呼叫中心的劳动者饱受低薪、高强度工作压力、不稳定的雇佣关系、僵化的管理体制、冷漠的工作环境以及无处不在的电子监控等问题的“折磨”。呼叫中心的劳动者是信息社会中关于工作的、更广阔的社会转型的缩影，这些转型包括大型企业的重组、外包的普遍化、工作中传播形式的强化，以及弹性雇佣实践的深化。他进一步强调，呼叫中心作为传播生产的隐蔽场所，完美地体现了20世纪最后十年间资本在追逐利润时所做的策略调整和风险转嫁。离开了这种传播劳动，传播资本主义(communicative capitalism)也就不复存在了。② 虽然这些信息“灰领”的劳动工具是电脑与电话，其直接工作对象是内容、符号和信息，但他们在低工资、低福利状态下从事重复性劳动这一点上与制造业中的“蓝领”别无二致。

对于离境外包的审视让我们更为清晰地认识到世界政治图景的复杂性和流变性，而在这个过程中起主导性作用的仍是资本的扩张和劳动力的商品化。③ 存在于离境外包这一制度性安排背后的权力不平等，使苹果公

① 贝弗里·西尔弗：《劳工的力量：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张璐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4页。

② Brophy, Enda. The Subterranean Stream: Communicative Capitalism and Call Centre Labour. *Ephemera*, 2010(3/4): 470－483.

③ Mosco, Vincent. Here Today, Outsourced Tomorrow: Knowledge Workers in the Global Economy. *Javnost/The Public*, 2005(2): 39－55. 中译文参见文森特·莫斯可，徐偲骕、姚建华译：《全球经济中的知识劳动者：今天在本地，翌日就外包》，《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1年第1期。

司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外包消费性电子产品的生产来获得超额利润。① 这也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笔下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构性症候,体现着核心国家对半边陲与边陲国家经济的宰制与剥夺,而是否为已开发的经济地区提供原料与廉价劳动力则是判断该地区是否为边陲经济的重要依据。② 但核心与边陲之间的关系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互联网与科技进步的势头此消彼长,如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家既可以成为一时的核心国家,也可能在下一波科技浪潮中沦为边陲国家;此外,中国和印度正在从边陲国家转变为核心国家。基于这一视角,当前各国间频繁发生的尖端科技领域的纷争与摩擦就不难理解了。

(二) 媒介产业中的数字劳工

随着传播技术的突飞猛进与媒介生态的变迁,大量媒体从业者积极或被动地卷入数字化进程,数字技术渗透到他们劳动过程、日常生活甚至抗争运动等方方面面;媒介产业的数字劳工问题也开始进入传播学者的研究视野。③ 不同于行政主义取向的传播学者,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反

---

① Chan, Jenny, Pun, Ngai and Mark Selden. The Politics of Global Production: Apple, Foxconn and China's New Working Class. *New Technology, Work & Employment*, 2013 (2): 100-115.

②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郭方、刘新成、张文刚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③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行政主义取向的传播研究一般以行政和市场导向为策略,以媒介分析、受众和传播效果研究为重心,因此"劳动"和"劳动者"一直是比较稀缺且长期处于边缘位置的视角。如早期诞生于大众传播时代的线性传播模式将传播视为新闻信息传递行为,将传播者视为大众媒介组织,因此其主要关注传播的有效性及其短期或长期的社会影响等问题。即使是后来的媒介社会学对新闻生产的研究,也主要侧重于分析新闻记者与编辑人员如何应对各种社会力量,构建社会网络,并通过惯例化的新闻生产维护现存社会秩序的过程,如盖伊·塔奇曼(Gaye Tuchman)的《做新闻》(*Making News*)。虽然媒介社会学视域下的新闻生产研究也会关注记者的阶层、种族、社会性别等变量对新闻最终产品的影响,但其缺乏对媒介产业生产者劳动过程和劳动关系的考察。与之不同的是,媒介产业的劳动与劳工问题作为传播过程中诸多社会关系的重要一环,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此高度关注。他们从媒介用工实践的现实出发,使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工具,对包括媒介产业在内的各个行业和领域的数字劳工做了大量开拓性和实证性的研究。参见 Katz, Elihu and Paul Lazarsfeld. (转下页)

对使用“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等科学话语遮蔽和“迷思化”劳工问题，在他们看来，强调“媒介产业以最低的人力成本来最大限度追求利润”的行政主义取向的传播研究不可避免地陷入“只重微观个体，不重结构性不平等”的窠臼。① 与之不同的是，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坚持对资本逻辑渗透传播领域的根本性否思，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出发来考察媒介产业的数字劳工问题，即将劳动视为价值源头，将剥削劳动力的剩余价值视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②

总体而言，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进路存在着微观、中观与宏观三个研究维度和框架。首先，从微观的维度和框架来看，传播政治经济学并不仅仅局限于从媒介产业数字劳工个体经验的视角出发，而是强调他们是媒介产业生产者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致力于分析媒介产业数字劳工所面临的相同困境以及享有的共同利益与前景，并观照不同媒介产业数字劳工之间（如新、旧媒体）及其与其他产业工人（如工农业）之间紧密的联系。其次，从中观的维度和框架来看，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媒介产业数字劳工劳动过程、福利待遇与社会保障的变迁，以及劳动力再生产等议题的分析，旨在揭示出数字时代媒介产业从业者的行动和经历受社会整体的影响，这些影响因素包括市场的经济属性、规范性制度、国家政策、产业的组织形式等，它们也是社会权力结构和社会语境复杂性的集中体现。③ 最后，从宏观的维度和框架来看，传播政治经济学将对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的研究放置在更为广阔的全球社会转型的语境中，这种转型早在全球发达经济体中

（接上页）*Personal Influence: The Part Played by People in the Flow of Mass Communications*. New Jersey, N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66；盖伊·塔奇曼：《做新闻》，麻争旗、刘笑盈、徐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

① 邱林川：《新型网络社会的劳工问题》，《开放时代》2009年第12期。

② 曹晋、赵月枝：《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脉络与人文关怀》，《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③ 姚建华、徐婧：《数字时代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新现象与新理论》，《全球传媒学刊》2017年第3期。

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从工业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和信息业之初就已经开始,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正是这种转型的根本驱动力。与此同时,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将劳动力的加速商品化与资本在全球的扩张过程紧密相连,并探讨这个过程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盛行、各国政府的"去管制化"(de-regulation)政策,以及国际劳动分工与全球价值链形成之间的关联。①

正是在上述微观、中观与宏观的研究维度和框架下,传播政治经济学者通过以新闻工作者、动漫创作者、自由作家、出版社编辑人员、新媒体企业实习生、视觉特效师等不同面向的媒介产业数字劳工为研究对象,揭示出他们在追求利润与效率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性理念、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替代了国家宏观调控的背景下,不断被去技能化、无酬化和分散化的过程,而这些过程与资本对他们劳动过程的控制和劳动力的剥削密切关联,这些议题共同构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下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的理论聚焦。②

首先,数字技术和 ICTs 的发展加速了媒介产业中数字劳工的商品化进程,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③ 这一过程是通过劳动过程的去技能化和再技能化实现的。何塞·阿尔贝托·加西亚-阿维莱斯(José Alberto García-Avilés)等学者在对英国和西班牙六家数字化

---

① Mosco, Vincent, McKercher, Cathrine and Ursula Huws. *Getting the Message: Communications Workers and Global Value Chains*. London: Analytica Publications, 2010.

② 姚建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18 年第 12 期。

③ 在马克思看来,所谓劳动力的商品化,是指在社会经济中,直接生产者的劳动力使用权普遍地成为交易的对象;而且,直接生产者的生存资料,也主要依靠其出卖劳动力的方式而获得。因此,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成为资本为纽带的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基本前提。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强调,劳动力的商品化是劳动价值理论的起点,同时,劳动力是根据购买者的需要和欲求进行组织与使用的——这些劳动力的购买者往往是以资本的积累和增殖为第一要义的雇主,因此他们对降低劳动力商品的价格存在着特殊且持久的兴趣,并导致劳动力的持续贬值。参见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

新闻编辑室进行观察和访谈研究的基础上，强调随着数字化新闻运作方式的普及，新闻工作者需要不断生产大量新闻节目以满足 24 小时播报新闻节目的要求，新闻工作真正成为 24 小时不间断的劳动，固定的截稿时间不复存在，记者疲于奔命，随时接到任务，随时采、写、编、发，致使包括调查能力在内的诸多“创造性”能力被“操作性”能力取代。这一取代在导致新闻产品质量持续下降的同时，使新闻工作者彻底沦为高度依附于计算机的“鼠标猴”(mouse monkey)。① 在这种去技能化和再技能化同时发生的过程中，不只是职业技能与技术角色的界限被模糊了，工作与闲暇、办公室与家庭之间的界限也被消解了。刘昌德通过对中国台湾地区报社记者的深度访谈，发现数字技术和 ICTs 导致了新闻报道工作的琐碎化，记者的经验和知识被迅速贬值，其职业角色和技术角色之间的差异性不断被消除。② 迈克尔·布洛维(Michael Burawoy)强调的工作“概念”(conception)和“执行”(execution)的分离在媒介产业数字化的生产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③ 琐碎化的简单劳动不断将媒介产业的数字劳工转变为“非技术型”或“半技术型”工人，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所指涉的“工作降格”在数字化时代的传媒生产活动中日趋严重，即当媒介产业数字劳工因其专业知识和能力被去技能化而不得不进行简单劳动时，资本通过降低生产成本而将劳动力剩余价值最大化的内驱力加速了上述劳动者的具体劳动(依赖于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劳动)向一般劳动的转变。④ 这种转变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媒介数字劳工技能

---

① García Avilés, José Alberto, León, Bienvenido, Sanders, Karen and Jackie Harrison. Journalists at Digital Television Newsrooms in Britain and Spain: Workflow and Multi-Skilling in a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Journalism Studies*, 2004(1): 87 - 100.

② Liu, Chang-de. De-Skilling Effects on Journalists: ICTs and the Labor Process of Taiwanese Newspaper Reports.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6(31): 695 - 714.

③ Burawoy, Michael.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u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④ Braverman, Harry.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和专业知识的加速贬值,并将后福特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致。随着自动化新闻的兴起,这种去技能化的工作甚至面临着被写稿机器人取代的危险,到那个时候,新闻记者的劳动所具有的交换价值将进一步被削弱。①

其次,媒介数字劳工成为"无酬劳工"的趋势日益明显,他们被排除在有保障的、稳定的劳动关系之外。大量民族志研究发现,"无酬劳动"是目前资本主义数字经济中创造价值的关键,但在卡琳·法斯特(Karin Fast)看来,它却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并不脱胎于网络化的数字时代,而是受到包括奴隶、学徒、兴趣爱好者和志愿者等在内的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七种不同"无酬劳工"类型的影响。② 一方面,"无酬劳动"剩余价值的积累过程是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相互建构与交织的复杂的历史的产物;另一方面,在媒介产业中,较高的生产成本和不可预期的消费者偏好使媒介生产成为高风险行业,而"无酬劳工"的应运而生正是迎合了该产业中降低生产成本,同时将企业风险分散到不同主体之中的诉求——在市场和消费者的关系中,资本通过降低劳动力成本将剩余价值最大化的内在驱动力使媒介数字劳工沦为一种新形式的"无酬劳工"。

最后,媒介产业中的数字劳工愈发呈现分散化的特征。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时间和空间的重要性日趋减弱,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媒介产业数字劳工不可逆转地被裹挟进全球价值链的生产体系之中,劳动力呈现分散化的特征。也就是说,ICTs 的发展克服了人们之间联

---

① Carlson, Matt. Automating Judgment? Algorithmic Judgment, News Knowledge, and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New Media & Society*, 2018(5): 1755 - 1772. 中译文参见马特·卡尔森,张建中译:《自动化判断?算法判断、新闻知识与新闻专业主义》,《新闻记者》2018 年第 3 期。关于自动化新闻与新闻工作者去技能化、再技能化、多技能化过程的深入讨论详见本书第七章(自动化新闻、数字劳动与技能变迁)的内容。

② Fast, Karin, Örnebring, Henrik and Michael Karlsoon. Metaphors of Free Labor: A Typology of Unpaid Work in the Media Sector.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016(7): 963 - 978.

系与交往的空间距离与时间障碍，同时使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成为可能。[①] 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这种扩张的实质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资本主义国家为追求高额利润向市场发育水平较低的周边地区进行的一种经济辐射和政治、文化渗透。这种辐射和渗透的过程往往通过离境外包的方式实现，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力纷纷卷入到基于全球劳动分工（global division of labour）的全球价值链网络之中。

约翰·兰特（John Lent）通过对美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中国等国家媒介产业动漫创作者经年累月的民族志研究，深刻地揭示出：跨国公司推进的全球漫画产业的集中化和商业化一味追逐利润，并不强调漫画的艺术价值。为追求劳动力成本的最小化，这些巨头采取了外包的策略，引发全球劳动分工的变化，不仅使得美国很多漫画创作者失去了工作机会，而且使接受外包的漫画创作者面临诸多困境，导致劳动者“双输”的局面。[②] 一方面，美国大量动漫创作者的工作机会不断减少，甚至失业；另一方面，接受离境外包工作的动漫创作者（他们往往来自市场发育水平和劳动力成本都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面对微薄的酬劳、高强度的工作。同时他们对于自己创作的作品不享有所有权，而且因为政府的管制而不得不时刻进行自我审查，这使他们长期处于不安全和孤立的工作环境之中。更不用说，劳动岗位在全球范围内的分散化趋

① Zhao, Yuezhi and Robert Hackett. Media Globalization, Media Democratization: Challenges, Issues, and Paradoxes. In *Democratizing Global Media: One World, Many Struggles*, edited by Robert Hackett and Yuezhi Zhao, 2005,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p. 1 - 33.

② 约翰·兰特在《全球动画产业的劳动力、问题及其应对机制：被边缘化的漫画创作者的苦痛》一文中，以迪斯尼和华纳兄弟（Warner Bros）公司为例，详细阐述与分析了两家公司从2006年开始，将其动画专题节目制作和卡通形象设计的任务外包给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动画制作者，以及精通电脑绘图、特技效果和其他用于捕捉动作软件和设备技术人员的案例。参见 Lent, John. The Global Cartooning Labour Force, Its Problems and Coping Mechanisms: The Travails of the Marginalised Cartoonist. *Work Organisation, Labour & Globalisation*, 2010(2): 160 - 172.

势所导致的劳动力严重同质化的倾向，使资本流动和扩张的逻辑与人类经验价值之间的张力愈发明显，尤其表现在上述涉及离境外包的生产过程之中。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笔者在自己的英文专著《当代中国的知识劳工：来自出版产业的改革和抵制》（*Knowledge Work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 : Reform and Resistance in the Publishing Industry*）中，对新媒体技术对中国出版产业中编辑人员劳动过程和工作环境影响的分析既是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将新媒体技术、政策与结构变迁相结合，洞察并揭示出中国出版产业与制度再生产的社会问题的一种尝试，也是本土经验研究对西方数字劳工研究有益的补充。① 在中国的出版产业中，数字技术的发展不断消除了编辑人员职业技能角色和技术角色之间的差异性，这与发生在新闻日常生产过程中，记者和摄像、直播车操作员、网络编辑和社交媒体推广者之间不断模糊的界限别无二致。编辑人员专业知识的迅速贬值、工作机会的骤减、弹性雇佣制度的兴起，以及工作与休闲、办公室与家庭边界的打破都使他们陷入“处境堪忧”的状态，而对他们劳动过程和工作环境中无处不在的“电子监控”（electronic panopticon）更使他们的这种状态急剧恶化。②

（三）产消合一者与玩工

冯建三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由“计算机、互联网与手机等新技术条件所复苏、扩大或催生的参与、合作与分享的生产模式，固然蓬勃进行，唯这种有偿、无偿、志愿与非志愿的劳动，究竟是一种偏向让人产生赋权经验的‘参与’之旅，还是滑向资本增值的航道，从而遭到资本剥削的成

① Yao, Jianhua. *Knowledge Work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 : Reform and Resistance in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4.

② Adams, Tracy and Sandy Welsh. *The Organization and Experience of Work*. Toronto: Thomson and Nelson, 2008.

分会浓厚些?”[①]20 世纪 70 年代末,传播政治经济学奠基人斯麦兹从唯物主义观点的视角出发,提出了具有学术史意义的“受众商品理论”。[②]该理论通过探讨资本主义商业传播体制下,受众、媒介和广告商之间隐藏的三角关系——传媒公司生产受众,然后将他们移交给广告商的过程,深刻揭示出资本主义制度下媒介生产的主要商品是受众。然而,随着当前数字信息技术和互联网传播的普及与发展,媒介不仅是内容的提供者,而且还是生产内容的平台,大量的用户有意识地上传图片、视频、博客和网络搜索关键词资料,义务为网站进行宣传和翻译,甚至参加有偿或无偿的众包任务。

也就是说,当前新媒体平台的 UGC 已经成为数字资本主义新的剩余价值的增长点,包括用户有意识地上传图片和视频,义务为网站进行宣传、翻译,甚至参加有偿或无偿的众包任务,这些都被用于生产新的可以被商品化的内容,或成为商品化内容(如广告)的载体。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边界因数字技术而变得不再清晰。资本将个人的生活方式、欲望和知识等全部裹挟进工作之中;另一方面,工作与闲暇之间的边界不断消融。ICTs 对于日常生活的殖民化导致了“无处不在的媒介时代”的来临,同时加速了“免费时间日渐从属于消费的‘劳动’”的转化过程,因此“有偿的”劳动时间(工作)和“无酬的”劳动时间(闲暇)发生了直接的融合——这也恰恰对应了马克思笔下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formal subsumption)转化为“实质吸纳”的过程。[③]

---

① 冯建三:《从〈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看文化与劳动的关系》,《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4 期,第 61 页。

② Smythe, Dallas. 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1977(1): 1-27. 中译文参见达拉斯·斯麦兹,刘晓红译:《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姚建华主编《传播政治经济学经典文献选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年,第 17—40 页。

③ Read, Jason. *The Micro-Politics of Capital: Marx and the Prehistory of the Present*.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3.

资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资本对于文化和媒体的控制，即对传播生产资料所有权和产品的控制，（使得）受众劳动的‘个体性’被不断整合到资本流通和积累的过程之中”①。从本质上来说，这个过程是对受众劳动剩余价值的剥夺，诚如乔治·瑞泽尔（George Ritzer）和纳森·尤根森（Nathan Jurgenson）所言，作为生产者的用户虽然被赋予使用生产性资源的权利，但他们所产生的利润和价值，或潜在的利润和价值都归属公司。② 瑞泽尔对亚马逊的研究则更清晰地证明了消费者在消费的过程中还承担了生产者的角色，因为他们自己在网上完成了从选购商品到取货的所有工作，但原本这些工作应该是由亚马逊员工来完成的，用户的能动性并未换来任何报酬，而他们留下的购买信息却成为大数据，继续进入生产循环。③

可见，除了用户主动生成的内容，其“数字痕迹”同样也被“吸纳”到商品化过程之中，作为大数据挖掘的对象与算法推送的依据，包括网民的浏览和购买习惯、社交圈子、消费品位，以及其他人口学信息——它们作为大数据挖掘的对象与算法推送的依据，帮助企业能够在掌握个人“信息地图”的基础上，更精准地进行研发、更有效地预测与引导市场消费，进而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齐齐·帕帕科瑞希（Zizi Papacharissi）认为，隐私已经成为奢侈品。④ 以脸书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极力推广信息“公开”与“分享”的理念，用户以牺牲自己隐私为代价换取基于社交媒体的社会交往与资源，他们为数字资本主义注入源源不

① Nixon, Brice. Toward a Political Economy of “Audience Labour” in the Digital Era. *Triple C*, 2014(2): 713-734.

② Ritzer, George and Nathan Jurgenson. Production, Consumption, Prosumption: The Nature of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the Digital Prosumer. *Journal of Consumer Culture*, 2010(1): 13-36.

③ 乔治·瑞泽尔：《赋魅于一个祛魅的世界：消费圣殿的传承与变迁》，罗建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④ Papacharissi, Zizi. Privacy as a Luxury Commodity. *First Monday*, 2010(8).

断的发展动力。①

在玩工领域，库克里奇发现：首先，“玩工”（即游戏模组爱好者）是游戏公司重要的创造力来源。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为游戏平台吸引了更多的用户，创造了更多的内容，甚至修改游戏中的漏洞以优化用户的体验。他们自发修改与创作的游戏内容成为游戏产业价值和创新的重要源泉，他们的创造性极大降低了公司在研发和营销上的人力成本及其他费用。其次，“玩工”是无酬劳动力。一来游戏公司的现有制度并没有将模组爱好者纳入有保障的、稳定的劳动关系之中，其本质是对他们劳动的免费占有；二来游戏模组作为一种“无酬劳动”形式的事实往往被休闲娱乐的意识形态和修辞遮蔽；三来模组游戏的知识产权牢牢控制在游戏公司而非玩家的手中，同时游戏模组爱好者承担着其活动可能引发的一切经济和法律风险。在现实生活中，游戏公司悄无声息地成为最大的赢家。最后，将休闲活动“劳动化”的普遍实践标志着一种新的资本积累模式的形成，即弹性积累模式，“玩工”的普遍化与之高度匹配。游戏模组爱好者为资本积累贡献了大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已经远远超越了兴趣爱好的范畴，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是游戏产业的生命线。这一模式正在全球不断扩张和蔓延。②

产消合一者与玩工的原子化状态使其很难形成集体身份认同（collective identity），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劳动”，并为资本创造价值，更遑论组织起来成为自为状态下的劳动阶级。③新形式的用工关系往往基于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而富有活力，但这也导

---

① 姚建华、徐偲骕：《全球数字劳工研究与中国语境：批判性的述评》，《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第5期。

② Taylor, Nicholas, Bergstrom, Kelly, Jenson, Jennifer and Suzanne de Castell. Alienated Playbour: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in EVE Online. *Games & Culture*, 2015(4): 365 - 388.

③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The Future of Work We Want: A Global Dialogue, April 6 - 7, 2017. http://www.ilo.org/global/topics/future-of-work/dialogue/lang-en/index.htm.

致了劳动者就业身份的模糊化,让他们通常被排除在与雇佣关系相连的保护范围之外。① 因此,传统劳工组织与工会组织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如何在新的条件下形成团结(unionization)成为它们亟待解决的难题。数字经济的产生一方面促使传统雇佣关系开始松动,另一方面建立在以往社会化大生产与标准雇佣关系之上的一整套劳工保护制度,因为灵活而富有弹性的用工条件与劳动过程而变得支离破碎,与劳动相关的各类法律在面对数字技术发展而产生的这些新现象时已显得滞后和力不从心。

(四) 数字经济中的劳工组织

邱林川认为:"互联网是资本的场域、剥削劳工的场域,也是社会的场域、阶级形成和抵抗的场域。"② 那么,数字劳工如何才能更有效地以集体组织的方式改变其不稳定的工作和生活现状呢?在这个过程中,工会组织和政府可以发挥哪些积极的作用?例如,加拿大的新闻记者不断面临着大量不稳定的因素,包括因为全职岗位减少导致的自雇从业者规模的急速扩张、薪酬水平的停滞不前甚至持续下降,以及逐渐失去对新闻生产过程的控制,等等。为改变上述状况,科恩呼吁加拿大职业作家协会(Professional Writers Association of Canada,PWAC)和加拿大自由工作者工会(Canadian Freelance Union,CFU)在改善新闻记者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为他们提供交流平台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③ 与此同时,科恩本人也积极投身于加拿大作家组织(Canadian Writers Group,CWG)。该组织是加拿大历史上第一家建立在代理机构——工会组织合作关系之上、代表自由雇佣的新闻记者权益的代理机构,致力于在加拿大出版商和作者之间建立连接和对话的机制,尤其是在合同与薪酬的

① 袁文全、徐新鹏:《共享经济视阈下隐蔽雇佣关系的法律规制》,《政法论坛》2018 年第 1 期。
② 邱林川:《告别 i 奴:富士康、数字资本主义与网络劳工抵抗》,《社会》2014 年第 4 期。
③ Cohen, Nicole. Negotiating Writers' Rights: Freelance Cultural Labour and the Challenge of Organizing. *Just Labour*, 2014(17/18): 119 - 138.

协商等问题上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科米罗以电子制造行业为例，通过对劳动者集体行动机遇与困境的讨论来探究劳工工会化的可能性。她发现，在全球电子制造行业中，工会化的程度非常低，且工会组织的运作缺乏制度性保障。因此，如果工人运动的组织者希望有效地组织和代表工人，他们就必须与其他行动组织或社会运动建立广泛的联系，后者可能是非营利性、基于社区的实体组织（如高科技企业中的工会组织致力于联合学校、医院和政府机构中的每一位高科技电子产品消费者），也可能是应对某项具体议题的社会运动，如女权运动、环保运动等。此外，马奎拉团结网络（Maquila Solidarity Network）和 IMB 公司劳工抗争的经验表明，工人之间的个体联系和信息交换有益于冲破资方的信息封锁与掩盖真相的行为，同时更好地向劳动者展示行业内的一般工作条件，以便加速劳工联合的形成。[①] 在迎接国际劳工组织 100 周年纪念日的全球对话论坛上，来自工会组织的代表充分肯定了工会是适应 20 世纪传统雇佣关系的、有效组织劳动者的工具，但在数字经济不断发展的 21 世纪，因为工作和劳动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以往工会组织保护工人的方式已经略显过时，因此他们主张组织新的团体来保障不同行业中劳动者的权益，包括全球产业链上的工人、个体经营者，以及在数字经济（如媒介产业）中的从业者，等等。

概言之，以上四个领域的研究基本囊括了全球数字劳工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进路和最新成果。这些研究致力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厘清媒体组织与更为广泛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权力之间的勾连关系，深刻地揭示出数字资本积累和增殖的实质，考察劳动是如何在信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被剥夺与异化，以及国家保护、社会福利和工作稳

① Ferus-Comelo, Anibel. Paving the Path Toward the Unionization of High-Tech Sweatshops. In *Trade Union Responses to Globalization: A Review by the Global Union Research Network*, edited by Verena Schmidt, 2007,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pp. 51 - 62.

定性被瓦解的过程。在方法论上,这些研究大多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如民族志等,依托大量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通过对研究对象进行微观的、切实可感的体察,探讨数字劳动领域的劳动关系、劳动过程、劳动力再生产、阶级意识等一系列经典"老问题"究竟发生了何种"新变化"。将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消费过程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不仅开拓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野和方法,使它不囿于宏观层面的批判与宏大理论的生产,而且极大地照亮了行政主义取向的传播学研究的盲点。

二、数字劳动与中国语境:本土学者的思考与贡献

在经济全球化和网络社会的协同作用下,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同样面临数字劳工大量涌现的现状。如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等所言,中国经历的是"压缩的现代化",面临着第一现代性和第二现代性"双重强制"的共时性困境。① 也就是说,与西方社会所谓第三产业在吸纳就业方面已经超越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不同,中国仍有大量劳动力处于传统的农业和工业部门,从事体力劳动和物质生产。但与此同时,我们不难发现,受过中、高等教育,集中在城市就业的青年人开始全面转向从事非物质的办公室知识劳动,而如前文所述,当代大部分知识劳动已经必须经由数字技术和 ICTs 中介才能实现,因此,即使不能说数字劳动已经成为当前中国主要的劳动形式,劳动的"数字化"所带来的影响仍然是结构性的。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随着数字技术和 ICTs 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增长点,中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这直接导致在信息产业部门或其他部门中从事信息处理与传播工作人员数量的上升,劳动的数字化与数字劳工规模的扩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追赶甚至超越了大部分发达国家;另一方面,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推进,中国的数字

① 乌尔里希·贝克、邓正来、沈国麟:《风险社会与中国——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对话》,《社会学研究》2010 年第 5 期。

产业已经与全球其他国家紧密地缠绕在一起，如德温·温赛克(Dwayne Winseck)等学者发现，三大中国互联网公司(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在资本结构、所有权和控制权方面已经完全融入世界经济。三家总部位于美国的风投基金持有百度公司初始资本的近30%，其中最多的为德丰杰全球创业投资基金(Draper Fisher Jurvetson ePlanet)的15.6%，腾讯40%的股权由外国机构投资者持有，这个数字在阿里巴巴则高达47.4%。①

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从数字劳工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语境出发，思考和探索中国的数字劳工问题是极其必要的。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传播劳动相关研究落后于数字劳动领域的现状与实践，使中国数字劳工与传统体力劳动者面临着同样的，甚至更为恶劣的系统性风险，如劳动力商品化；技术变迁对工作场所的宰制；新自由主义工作伦理(如鼓励主动超常加班、知识技能迅速贬值、自我监督与残酷竞争、计件工资与淘汰制度)；工作的不稳定性(如劳务派遣和弹性雇佣)；社会福利的瓦解(如住房、医疗和教育的商品化所导致的脆弱的抗风险能力)；以及孱弱的应对和抗争(与传统工人和农民颇为不同的是，知识劳工遇到劳动纠纷时往往采取辞职、换工作等个体化策略而非集体行动来解决问题，当然也有极少的例外)。在与网络平台的力量对比之间，数字劳工处于明显的劣势。此外，大量产生实际价值的“观看”与“玩乐”劳动尚未被视为劳动。

一部分本土学者就上述问题进行了回应，为中国的数字劳工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们运用政治经济分析这一工具，将数字劳动问题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紧密联系起来，旨在更为准确地理解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国数量庞大的劳工群体在全球化、信息化和数字化浪潮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发挥的关键作用，以及他们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在此基础上，厘清上述困境与数字时代劳动者所处的权力关系网络和制度背景之

① Jia, Lianrui and Dwayne Winseck.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Internet Companies: Financialization, Concentration, and Capitalizati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2018(1): 30-59.

间的勾连关系。[①] 如邱林川、洪宇、潘毅等学者对 ICTs 制造业中数字劳工的研究；孙萍、佟新、梁萌等学者对中国小型互联网公司 IT 程序员身份认同与传播实践的研究；曹晋、韩绍伟和笔者等对中国出版产业中编辑人员的研究；刘昌德和笔者等对包括中国台湾地区报业记者和中国大陆地区自动新闻背景下新闻记者去技能化的研究；胡绮珍、曹晋、张楠华等学者对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网络字幕组成员的研究；吴鼎铭、杨逐原等学者对于本土网络视频众包生产的研究；张志华、胡鹏辉、余富强、张志安、董晨宇等学者对网络直播平台主播的研究；梁萌、苏熠慧等学者对平台经济中家政人员的研究；陈玉洁、叶韦明、张玉璞、庄曦等学者对滴滴司机的劳动与行动主义的研究；胡慧、张铮等学者对网络文学平台上网络作家群体的研究；贾文娟、牛静等学者对中国娱乐资本盘剥实习生的研究；孙萍、陈龙等学者对网络平台上外卖骑手劳动过程中控制和剥削机制的研究；郑广怀、庄家炽、帅满等学者对快递员劳动控制模式与劳动同意制造过程的研究；夏冰青、吴桐雨和笔者等对数据标注员劳动困境和劳动众包的民族志研究；郭建斌、胡冯彬、邓剑、林仲轩、赵瑜佩、宋嘉伟、袁潇等学者对游戏玩家劳动过程、角色转变与日常生活的研究；何威、曹书乐、翟秀凤等学者对短视频平台上的创意劳动和网络内容生产者的研究；庄曦、朱丽丽、杨馨、童祁等学者对粉丝劳动及其与偶像建构亲密关系的研究，以及赵月枝团队对缙云淘宝村的研究。[②] 上述研究极大地丰富了当前学界在数字时代劳动转型议题中的研究对象、内容、方

① 姚建华：《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数字时代的劳动转型（编者按）》，《全球传媒学刊》2018 年第 4 期。

②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赵月枝与罗伯·达菲（Rob Duffy）共同发表的《短路？中国劳动斗争的传播》（Short-Circuited? The Communication of Labor Struggles in China）一文的重要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该文开创性地将对中国知识劳工的研究置于本土化的语境之中，揭示出：不同于西方的有机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劳工在国家层面表达自身利益和开展协调活动困难重重，但其社会主义国家“主人”的观念仍为他们追求社会正义提供了强大的意识形态资源。参见 Zhao, Yuezhi and Rob Duffy. Shorted-Circuited? The Communication of Labor Struggles in China. In *Knowledge Worker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edited by Catherine McKercher and Vincent Mosco, 2007,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pp. 229 - 266.

法及核心议题，尤其是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拓宽了对相关问题感兴趣的研究者、从业者与公共政策制定者关于数字时代劳动者的一般认知，并对数字劳动的意涵进行更为多元化的解读与阐释。

质言之，在当前复杂的全球化过程持续深入，本土社会急剧转型、新媒体技术冲击日益猛烈的全球语境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将他们的本土劳工研究根植于中国独有的、丰富的且充满活力的日常实践土壤之中，帮助劳动者发声，增加他们的曝光率，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学术品格。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思考：作为互联网大国，中国的互联网巨头是否应该为全球最大的网民群体支付红利？国家是否应该介入监管，改革数字生产资料（如数据、平台）的所有制，使其在一些方面体现出社会主义公有和“传播公地”的特色？这些问题亟待本土学者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第三章　零工经济、数字劳动与“不稳定无产者”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在世界经济论坛上首次提出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概念。他认为：

> 历史上的三次工业革命，先用水和蒸汽让生产机械化，再用电力让生产规模化，接着用电子元件和信息技术让生产自动化。第三次工业革命(也就是数字革命)于20世纪中期拉开帷幕，现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在其基础上应运而生。技术融合是其一大特点，物理、数字和生物领域之间的界限逐渐趋于模糊。数十亿人通过移动设备彼此相连，这些设备的处理能力、存储容量、知识获取途径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为我们带来了无限的可能。在未来，人工智能、机器人、物联网、无人驾驶汽车、3D打印、纳米技术、生物技术、材料科学、能量贮存和量子计算等领域新兴技术的突破，将使人类的可能性成倍增加。①

新科技可能会改变工作和工作场所，加速劳动力的重置(labour

① Schwab, Klaus.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What It Means and How to Respond. *Foreign Affairs*, December 12, 2015.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6/01/the-fourth-industrial-revolution-what-it-means-and-how-to-respond/.

displacement)，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在此背景下，零工经济(gig economy)迅速发展，大量零工工作孕育而生。在乐观派看来，零工工作可以增加个人储蓄、提高生产力和工作灵活性；而在悲观派看来，零工工作的流行让许多人丢掉饭碗，造成了就业不稳定情况的恶化、部分工作的技能要求下降、各类不平等的加剧，等等。本章从零工经济的全球热潮与零工工作的勃兴切入，阐述零工经济中数字劳工在数字资本主义与劳动力市场弹性机制的共同作用下面临的困境，并在此基础上，从零工经济劳动者、政策制定者和关注零工工作公平性的利益相关者等不同维度出发，探究帮助他们摆脱上述困境的多元化策略，以防止他们沦为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笔下的“不稳定无产者”。

一、零工经济的全球热潮与零工工作的勃兴

当前，零工工作作为一种新型用工方式在全世界流行起来，零工经济也随之孕育而生，这种新的经济形态依托于互联网和承担零工工作的自由职业者，后者在数量、规模和影响力方面日益壮大。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5年的研究报告指出，在全球范围内，零工经济劳动者与劳动人口总量占比从2005年的10%增长到2015年的16%。到2025年，各种零工工作的产值有望贡献约2%的世界生产总值，零工经济市场规模将达到3万亿美元，并创造出7 200万个就业岗位。[①] 在中国，零工经济与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相生相伴，为医疗、旅游、时尚、金融、环保等万亿级支柱产业的发展提供服务支持，并催生了大量零工护理人员、零工导游、零工设计师、零工金融分析师、零工专家等零工经济劳动者。

① 赵松：《人民日报经济透视：“零工经济”挑战了谁?》，人民网，2015年8月21日，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5/0821/c1003-27496922.html。

(一) 零工经济的全球热潮及其分类

零工经济在全球的发展壮大首先离不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数字技术的革命,尤其是网络平台的搭建和包括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在内的移动终端的普及。其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增长疲软,导致了劳动人口失业率的居高不下,零工经济因其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失业率,得到了不少国家政府的大力推广与扶持,如美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在这些国家中,零工工作日益成为劳动者重要的收入来源。[①] 再次,不管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服务业的比重均呈稳步上升的态势,而零工经济劳动者主要是各种服务的提供者,如快递、家政、交通、维修服务等,他们往往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当然,零工经济劳动者也包括提供知识的服务者,如兼职讲师、短期教学合同工、兼职律师、独立执业顾问人员等。最后,对于企业而言,按需使用大量灵活且高度熟练的零工经济劳动者不仅可以降低劳动力的雇佣成本,有助于企业有效地开发人力资源,以满足各种发展的需求,同时企业可以增强其可扩展性,以便快速而准确地应对新进入市场的竞争对手带来的冲击。

零工经济有两大主要类型:其一,基于网络平台而产生的新型工作方式,如网络直播、付费阅读内容的创作和编辑,以及视频制作和分享等。以网络直播为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 47 次《中国互联网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0 年 12 月,中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 6.17 亿,占网民整体的 62.4%。这类新型的工作方式具有群体性的特征——相关群体由接入网络平台的个体组成,且他们可能来自不同的国家或地区。

其二:因网络平台(尤其是移动终端的应用程序)对传统就业方式的颠覆而产生的新型工作方式,主要集中于快递(人人快递)、家政

① Huws, Ursula, Spencer, Neil, Syrdal, Dag and Kaire Holts. Work in the European Gig Economy. Foundation for European Progressive Studies (FEPS), 2017, http://www.feps-europe.eu/en/publications/details/579.

(Thumbtack[美国]、58到家、云家政)、交通(Uber[美国]、Lyft[美国]、滴滴出行)、维修(解决任何房屋问题平台TaskRabbit[美国];专业的上门手机维修平台“极客修”;办公设备及电脑网络产品安装与维修平台“叫我修吧”;家居配送、安装、维修、返货平台“万师傅”)等服务行业。如Uber,通过大数据智能分析技术,快速而有效地解决了“即时交易+定向派单+同路匹配”的问题,通过实现供需双方直接的对接,极大地提高了劳动供求的匹配效率。①

① 零工经济的热潮离不开近几年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网络平台(尤其是移动终端的应用程序)对传统就业方式具有颠覆性的效应,劳动组织方式也从传统的基于雇佣劳动的工厂制向基于隐性劳动的平台经济模式不断过渡,孕育出大量新型的工作方式。根据劳动力供给的地域性和劳动技能专业化程度的不同,平台劳动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别。

第一类,无地域性劳动力供给—低劳动技能类平台劳动。以美国的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Amazon Mechanical Turk,MTurk)为例。在MTurk,劳动力需求方(“任务发起者”)在平台上发布各种任务,符合资质要求的平台劳动者(“托客”)自主选择接单并按要求完成任务,任务发起者根据任务完成情况支付托客相应的报酬。一方面,任务发起者能够通过MTurk轻易获取无地域限制的劳动力供给,即平台面对的是一个开放的、全球在线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这些任务通常是相对简单、重复度高、专业性技能要求较低的人类智能任务,即目前计算机难以完成,但人类却擅长的任务,主要包括图像排序、音频转录、信息分类,等等。每天有超过50万项这样的任务在MTurk上发布。这部分内容将在本书第五章(全球外包、数字劳动与劳动控制)中详细地进行介绍。

第二类,无地域性劳动力供给—高劳动技能类平台劳动。以猪八戒网为例,它的劳动力供给不受地域限制,但主要针对拥有特殊技能的目标人群,如文化创意人才。猪八戒网最先从做企业商标设计切入,发展至今已经成为提供海量创意服务和企业外包服务的平台,如助力企业营销策划、技术开发等。截至2015年,猪八戒网汇聚了约1300万名各类文化创意人才,其服务对象已经覆盖美国、英国和马来西亚等25个国家。猪八戒网因此成为国内最大的服务众包平台,同时也是国内最大的知识人才共享平台。

第三类,有地域性劳动力供给—低劳动技能类平台劳动。这类劳动主要以优步、滴滴出行和跑腿兔平台的网约零工为代表,他们通常在给定地域内提供日常服务,因为专业性技能要求低而几乎没有注册门槛。如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司机通过滴滴出行,而不是受雇于出租车公司的方式与客户建立联系,并提供劳动服务。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滴滴发布的《数字经济新就业形态发展研究报告(2020)》中的统计数据,当前滴滴平台吸引了超过1000万名从业者,带动产业链上下游600多万人就业。

第四类,有地域性劳动力供给—高劳动技能类平台劳动。这类劳动供给受到地域限制,且一定的劳动技能要求使得它针对特定的目标人群。以好大夫在线为例。好大夫在线是中国最大的医患交流平台之一,已收录全国881多家正规医院、60多万名正规医院医生,活跃度高,可以随时为患者提供预约挂号、网上问诊、转诊开药等服务。在中国,好大夫在线、春雨掌上医生、丁香园等平台共同构筑了在线医疗社区,它的存在使病人即使不去医 (转下页)

(二) 零工工作的勃兴

零工工作是一种自我雇佣形式,严格来说,它是一种极其符合当今时代特点的现代劳动力市场现象。早在20世纪80年代,非标准的临时工作(包括零工工作)在工业经济体中的占比就开始上升,这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如劳动力的女性化(特别是从事兼职和服务业工作的女性人数的急剧增长)以及劳动力和产品市场监管的发展(以强调市场主导、贸易壁垒消除、国有资产私有化为其特点)。①

许多企业通过网络平台提供个人服务,零工工作者则活跃在相关行业中。平台所有者负责协调服务提供商和服务代理,是生产者与消费者、零工工作者与生产者、零工工作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中介,让各方主体汇聚一处。② 零工工作的新颖之处在于,劳动力的供求匹配是通过网络平台进行的,并且每个工作岗位的劳动者都与平台签订各自独立的合

(接上页)院,也能得到专业的指导和帮助。此外,好大夫在线与不少实体医院签约,后者成为其线下基地医院,在帮助患者进行后续治疗、减小医疗风险方面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概言之,平台劳动并不等同于线上劳动,对于有劳动力供给地域限制的平台来说,其提供的往往是线下面对面的服务。这些服务既涉及提供交通、外卖配送、日常杂务跑腿、家政服务等低专业性技能的平台劳动者,又涉及从事与健康、教育、法律、咨询相关工作的高专业性技能平台劳动者。这些平台劳动暂时都很难被机器和算法有效替代。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U. S. Bureau of Labour Statistics)的调查,目前美国约98.8%的平台交通服务和72.5%的平台健康和教育服务,都是线下面对面进行的。参见马骋宇:《在线医疗社区医患互动行为的实证研究——以好大夫在线为例》,《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16年第11期;谢富胜、吴越:《零工经济是一种劳资双赢的新型用工关系吗》,《经济学家》2019年第6期;朱鸣:《"网约工权益保障研讨会"综述》,《工会理论研究》2017年第3期;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Electronically Mediated Employment. U. S. Bureau of Labour Statistics, September 28, 2018. https://www. bls. gov/cps/electronically-mediated-employment. htm; Irani, Lilly. Difference and Dependence among Digital Workers: The Case of Amazon Mechanical Turk.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2015(1): 225-234; Schmidt, Florian. Digital Labour Markets in the Platform Economy: Mapping the Political Challenges of Crowd Work and Gig Work. Friedrich-Ebert-Stiftung Project, 2017. http://library. fes. de/pdf-files/wiso/13164. pdf.

① Bosch, Gerhard. Towards a New Standard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in Western Europe.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2004(4): 617-636.

② Minter, Kate. Negotiating Labour Standards in the Gig Economy: Airtasker and Unions New South Wales. *Economic and Labour Relations Review*, 2017(3): 438-454.

同。在瓦莱里奥·德·斯特凡诺(Valerio de Stefano)看来,零工工作在本质上是一种“按需工作”(on-demand work),即单一用户公司通过网络平台实现劳动者与服务需求的匹配。①

零工工作有多普遍呢?总的来说,对零工经济展开统计是十分困难,主要是因为很难用传统劳动力调查中使用的名词对应零工工作的各个环节,且相关调查往往缺乏可靠的数据来源。例如,美国的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ur Statistics,BLS)临时劳动者补充计划于2005年被中止,2017年才得以恢复,这让能体现零工工作正面特征的可靠数据变得更加难以获取。② 安德鲁·斯图尔特(Andrew Stewart)和吉姆·斯坦福(Jim Stanford)强调,以网络平台为媒介的工作其实不多,在成熟的工业经济体中,其劳动力占比在1%以下,③如BLS在恢复临时工作和非传统就业补充计划后,发布了2018年9月30日统计的“电子媒介就业”相关数据。该统计表明,截至2017年5月,此类劳动者仅占美国劳动力的1%。④

然而,劳伦斯·卡茨(Lawrence Katz)和阿兰·克鲁格(Alan Krueger)的调查研究发现,1995年至2015年,在美国,非传统就业劳动者(包括临时工、随时待命的劳动者、合同工和自由职业者等)的比例上升了10%—15%。⑤ 根据他们的统计数据,大型平台提供商雇用的劳动

---

① de Stefano, Valerio. The Rise of the “Just-in-Time Workforce”: On-Demand Work, Crowd-Work and Labour Protection in the “Gig-Economy.” Conditions of Work and Employment Series Report,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Geneva, 2016.

② Contingent and Alternative Employment Arrangements Summary.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2018. https://www.bls.gov/news.release/conemp.nr0.htm.

③ Stewart, Andrew and Jim Stanford. Regulating Work in the Gig Economy: What Are the Options? *The Economic and Labour Relations Review*, 2017(3): 420-437.

④ Electronically Mediated Employment.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2018, https://www.bls.gov/cps/electronicallymediated-employment.htm.

⑤ Katz, Lawrence and Alan Krueger. The Rise and Nature of Alternative Work Arrange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95-2015. Working Paper, Princeton University Industrial Relations Sec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inceton, 2016.

（三）“不稳定无产者”的形成

斯坦丁认为，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自由市场催生了一个全球性的阶级结构。新的群体在这个结构中孕育而生，其中就包括数百万身处弹性而无保障的劳动关系中的“不稳定无产者”（precariat）。①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数字技术的革命所引发的一系列经济组织形式的变革，以及随之而来的零工经济的勃兴正是“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新自由主义逻辑的延续。新自由主义逻辑的核心在于强调资本市场的自由化，即哪里生产成本最低、利润最高，资本就会流向哪里。② 因此，以降低劳动力成本为最终目的，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劳动力市场的弹性机制”（labour market flexibility）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结构性的必然结果。③

---

① “不稳定无产者”这个概念是由“不稳定的”（precarious）和“无产阶级”（proletariat）两个词构成的，意指处于不稳定雇佣关系中的无产者。参见 Standing, Guy. The Precariat: From Denizens to Citizens? *Polity*, 2012(4): 588 - 608。

② 换言之，盖伊·斯坦丁提出的“不稳定无产者”概念是以新自由主义资本全球化为背景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加速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同时也重组了第一世界国家内部的劳资关系，具体表现为：政府减少对资本的管制、修改了为工人提供稳定工作保障的法律、将社会福利逐渐变成商品，以及削弱了工会的力量。与此同时，资本的全球化依托信息化的平台，在传统部门及新兴部门（包括信息产业、创意产业及各种服务行业）内实行劳动力市场弹性机制，导致临时工、兼职工和实习工等各种灵活用工形式开始替代长期固定的用工方式；工作任务快速调整，内部劳动分工更加灵活；工资系统更加弹性，货币工资占劳动者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而非工资性质福利的比重则持续下降。此外，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也通过资本的空间转移，将生产“外包”给第三世界国家。亚洲、非洲、南美洲的许多国家纷纷纳入全球产业链的生产过程，为全球资本提供大量廉价而灵活的劳动力。一方面，大量年轻的劳动力背井离乡，脱离家庭和社区的庇护，在缺乏安全保护的劳动环境中工作，同时缺乏国家提供的福利。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弹性机制也出现在这些国家的传统工业领域和新兴产业部门，使得传统和新兴产业中的用工方式与内部劳动分工都变得更加灵活。参见苏熠慧、姚建华：《“不稳定无产者”是“新危险阶级”吗？》，《中国图书评论》2020年第8期；Guy Standing. *The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1。

③ 根据斯坦丁的观点，在信息产业、创意创业及各种服务业中，弹性雇佣制度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实践——这些行业中的工作要求（如灵活变化的工作任务与弹性机制）不仅改变着劳动者的劳动形式及其身份认同，也改变着他们在工作场所之外的生活方式。参见苏熠慧、姚建华：《“不稳定无产者”研究谱系及其当代意义》，《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Guy Standing. *The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1。

1. “不稳定无产者”的内涵。斯坦丁从生产关系、分配关系和与国家的关系三个维度出发,对“不稳定无产者”概念的内涵展开论述,从而透析新自由主义资本全球化背景下,劳动者生存状况的变迁过程。首先,在生产关系方面,不稳定无产者中的大多数人以临时的或短期的工作为生,经济收入相对较低或不稳定,雇佣关系短暂,缺乏长期的职业目标与职业前景,无法在工作场所中建立长期的人际关系,这使得他们缺乏安全感和认同感,缺乏与工作相关的社会记忆。其次,在分配关系方面,不稳定无产者无法享有那些福利国家时代工人和白领领薪阶级(或阶层)所享有的各种形式的劳动保障,缺乏社会福利。最后,在与国家的关系方面,不稳定无产者只是“失权者”,而非“公民”——他们要么没有政治权利,无法参与所属社区的政治生活、没有资格投票或参与政治竞选;要么没有文化权利,无法开展特定的文化活动;要么没有社会权利,无法享受当地的社会福利。① 在斯坦丁看来,一方面,“不稳定无产者”是一个“自在的阶级”,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经历着不安全和不稳定的工作和生活,时刻需要面对不同的社会问题、内心的孤独感,以及对仇恨的恐惧。这些共同的境遇使他们成为一个“新危险阶级”。另一方面,“不稳定无产者”还未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缺乏清晰的阶级意识,且往往互相责难,异常脆弱,内部也充满着激烈的斗争。

2. 零工经济劳动者与新型的“不稳定无产者”。近几年,当数字技术和 ICTs 的深度融合不断加速着平台经济的发展时,不少学者将斯坦丁对“不稳定无产者”的系统性阐释作为主要理论资源,以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直播主等零工经济劳动者为对象,从劳动过程、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障等不同面向切入,展开了大量理实兼备、不乏探索性

① 总结起来,在斯坦丁看来,“不稳定无产者”面临的核心问题不在于工资收入的高低,而在于缺乏社区支持和国家保护——他们往往因脱离来自私人、企业和国家的保障,而身陷社会收入低下的囹圄。那些不能通过教育获得回报的年轻人、女性劳动者、老年人、残障人士,以及缺乏公民权的境内外移民极易成为“不稳定无产者”。参见 Guy Standing. *The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1。

和前沿性的研究。他们发现，一方面，以弹性工作时间、不固定工作场所、不稳定薪酬为基本特征的零工工作逐渐替代了基于稳定的工作时间、场所和薪酬的传统工作；另一方面，零工经济中的数字劳工，不管是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都很难享受到失业保险、工伤补偿、退休金、产假等各种形式的劳动保障；当劳动争议发生时，更是难以维权。此外，他们还时刻面临着越发激烈的竞争、不可预知的职业前景，以及狭窄的阶层流动通道等诸多挑战。他们因此逐渐沦为新型的“不稳定无产者”，这更加剧了全球市场中长期的、系统性的社会和经济的不稳定性。一些批判学者更是洞察到隐匿于这些困境背后的社会权力结构关系的不平等，认为：这种不稳定的新型劳动力组织方式在资本全球化下呈现日益普遍化的趋势，而这恰恰是数字资本主义和劳动力市场弹性机制相互渗透的必然结果。①

三、零工经济劳动者困境的多元化解决策略

（一）零工经济劳动者的维度

首先，零工经济劳动者在面对互联网的发展和数字技术的革命时，需要在掌握最新数字技术的基础上，加强与科技互补技能的培养和训

①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当前，资本通过金融化、信息化以及建立劳动力市场弹性机制使劳动者深陷不稳定性的漩涡，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在美国，雇员对雇主忠诚度降低、长期失业人数总量骤增、不稳定性普遍化，以及非正式用工和临时工需求量急剧增长，等等。在欧洲，欧洲货币联盟的建立加速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签订临时合同和从事兼职工作的劳动者数量逐年上升。即使在新兴产业，信息产业、创意产业、服务行业处于弹性用工制度中的“非物质劳动者”，因为被要求快速回应工作任务的灵活变化和市场对大规模定制产品的需求，不得不长期从事临时的、长时间的劳动，过着随时可能被替代的不稳定生活。参见 Brophy, Enda. Labour Precarity and Collective Organizing at Microsoft.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6 (3): 619 - 638; Kalleberg, Arne. Precarious Work, Insecure Workers: Employment Relations in Transi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9(1): 1 - 22; Prosser, Thomas. Dualization or Liberalization? Investigating Precarious Work in Eight European Countries. *Work, Employment & Society*, 2016(6): 949 - 965。

练，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技能水平和更新知识结构，更好地适应零工经济就业市场和工作方式的变化。其次，零工经济劳动者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一方面需要强化自我保护意识，另一方面需要加强职业道德建设，不能以降低服务质量的方式来压低服务价格，形成劳动力之间的恶性竞争。最后，零工经济劳动者需要充分利用网络和社会资源表达意见，为改善自己的工作条件和环境与平台或雇主进行集体协商。零工经济劳动者是否可以团结起来，采取积极的集体行动以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这是数字劳工问题研究者所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

（二）政策制定者的维度

首先，政策制定者需要通过与利益相关者的沟通和协调，积极完善涉及零工经济雇主、劳动者和网络平台的相关法律及法规，尤其是在解决零工经济劳动争议方面，不断完善相关的制度建设，维护供需双方的合法权益。在涉及跨国零工经济劳动争议或纠纷的过程中（一般情况下，跨国零工经济中的雇主往往来自发达国家，劳动者通常来自发展中国家），最低劳动标准的依据是以雇主还是以劳动者所在国家的标准为依据？这是一个亟须厘清的问题。其次，政策制定者需要进一步规范零工经济市场的准入机制，利用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及时了解行业动态，更好地加强对网络平台的监管，同时限制零工经济中垄断的形成，积极探索建设非商业化网络平台的可能性，如平台合作社，该平台的所有权归属全体劳动者。[①] 最后，政策制定者应该积极建立适应零工经济劳动者需求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通过设计新型的用工合同，明确规定劳动者的最低时薪、加班费、赔偿金等各种形式的劳动保障。

---

① Scholz, Trebor. *Platform Cooperativism: Challenging the Corporate Sharing Economy*. New York: Rosa Luxemburg Stiftung, 2016.

（三）关注零工工作公平性利益相关者的维度

首先，对于雇主而言，如何平衡企业员工与零工经济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关系？是否需要与零工经济劳动者签署正式的雇佣合同？如何通过有效的渠道让他们发出声音，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其次，对于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而言，它们不仅应该在管理零工经济劳动者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更应该关心他们的心理健康、定期组织各类交流活动，并为他们提供各种法律和政策的援助。此外，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应该致力于对网络服务平台进行积极、有效的评估，进而为零工经济劳动者在选择网络平台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信息与建议。最后，对所有关注零工工作公平性的利益相关者而言，他们需要考量是否有必要在国家或地方层面建立“公平工作委员会”（Fairwork Foundation）？该委员会可以监督和敦促零工经济平台为劳动者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具有一定保障性的社会福利。①

对解决数字劳工困境的多元化策略不仅是理论层面的，而且体现在各国不同的实践之中。在英国，议会正在准备通过立法规定零工经济劳动者的最低时薪。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劳动委员会裁定 Uber 司机属于 Uber 公司员工而非独立承包人，因此 Uber 公司需要对这些司机提供相关的培训和福利，使个人的发展与企业稳定、持续的业务增长紧密地结合起来。一些激进的社会活动家积极倡导美国联邦政府向每位公民提供每月 1 000 美元的“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为公民追求自身利益提供一个安全网。② 在中国，不少网络平台已经与第三方商业保险公司展开合作，根据零工工作的岗位需求，引入雇主责任险、账

① Graham, Mark, Lehdonvirta, Vili, Wood, Alex, Barnard, Helena, Hjorth, Isis and David Simon. *The Risks and Rewards of Online Gig Work at The Global Margins*. Oxford, UK: 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 2017.

② 张致铭：《“全民红包”与“直升机撒钱”》，《博鳌观察》2016 年第 7 期。

户安全险等个性定制、按时供需、零活方便的保险产品，用来解决劳动者在用工过程中的工伤意外、账户安全等风险问题。[①] 此外，第三方的征信机构正在为网络平台的每一位雇主和劳动者建立诚信档案，这些信息对于地方乃至国家征信大数据平台和系统的建设与完善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上述实践将在多大程度上有益于零工经济中的数字劳工摆脱困境，有待进一步的考察和研究。

① 赵腾达、霍艳敏：《零工经济引领就业市场变革》，《上海信息化》2017 年第 4 期。更多关于“全民基本收入”的详细介绍与系统分析，详见下一章。

第四章　下一代互联网、数字劳动与工作/后工作世界的未来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技术、硬件设备和算法的快速迭代，作为新一代技术革命的核心驱动力，人工智能从基础研究、技术转化到产业应用都已经进入高速发展期，成为世界主要国家经济增长的新引擎。[①] 根据中国电子学会的统计，2018 年，全球人工智能市场规模超过 555.7 亿美元，相较于 2017 年同比增长 50.2%。[②] 德勤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白皮书》中预测，2025 年全球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将突破 6 万亿美元，持续推动传统经济向新兴经济和数字经济的转型。[③] 在中国，人工智能市场规模目前已逾 1 000 亿元人民币，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 1 万亿元人民币，拉动 GDP 增长 0.8%—1.4%。[④]

毋庸置疑，人工智能在加速企业数字化、改善产业链结构、提高信息利用率等各个方面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并在多个领域实现技术落地，涉

① 亚历克斯·德·鲁伊特、马廷·布朗、约翰·伯吉斯，姚建华、房小琪编译：《零工工作与第四次工业革命：概念和监管挑战》，《工会理论研究》2019 年第 3 期。

② 李颐、凌霞：《从 2018 年全球人工智能数据看未来发展趋势》，《光明日报》，2019 年 1 月 17 日，http://www.xinhuanet.com/tech/2019-01/17/c_1124000825.htm。

③ 德勤：《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白皮书》，2019 年 9 月 24 日，http://kl.caict.ac.cn/yjts/qqzkgz/zksl/201909/t20190923_212772.html。

④ 裴长洪、倪江飞、李越：《数字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财贸经济》2018 年第 9 期。

及数据挖掘、生物识别、机器视觉、远程诊断、基因测序、自然语言处理等十多个领域，[①]应用场景也愈发丰富：智能分拣包裹、无人驾驶、机器人客服、自动化新闻写作等。这不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价值，而且为人类生活带来了无限的可能。与此同时，它正在全面“入侵”人类的工作领域，包括工业机器人和服务机器人在内的智能机器的生产能力以“排山倒海”之势威胁着人类的工作，抢夺人类的“饭碗”。[②] 中西方不少学者指出，与前几次技术革命相比，人工智能不再局限于简单替代人类的身体或四肢，它具备了深度学习和模拟人类大脑的能力，所以能以指数级的速度和规模取代人类劳动——这将构成对工作和就业市场的极大冲击。[③] 而另一方面，亦有大量研究逐渐发现，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正在以各种形式降低商品价格、增加需求和“创造”新的工作，如以美国的制造业为例，其未来十年存在 240 万工人的缺口。[④] 那么，到底哪一种说法更为接近现实呢？19 世纪初，在处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浪潮中的英国，当资本家运用机器大量取代人力劳作时，大批手工业者破产，工人失业，他们将机器视为贫困的根源，用捣毁机器作为对抗资本家和争取改善劳动的方法。许多失业的英国产业工人以“卢德”的名义破坏工厂织袜机，将此次运动推至高潮，史称“卢德运动”。[⑤] 那么，随着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新“卢德运动”会出现吗？即劳动者会大规模地捣毁智能机器，抵制新一代技术革命吗？本章将结合现有研究及其证据，通过检视技术/非技术因

① 黄欣荣：《人工智能与人类未来》，《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1 期。

② 张学英：《人工智能视阈下基于劳动就业迭代的技能形成问题研究》，《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8 年第 30 期。

③ 潘天君、欧阳忠明：《人工智能时代的工作与职业培训：发展趋势与应对思考》，《远程教育杂志》2018 年第 1 期；Brynjolfsson, Erik and Andrew McAfee. *The Second Machines Age: Work, Progress, and Prosperity in a Time of Brilliant Technologie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14.

④ Deloitte Insights. Deloitte and the Manufacturing Institute Skills Gap and Future of Work Study, 2018, http://www.themanufacturinginstitute.org/~/media/E323C4D8F75A470E8C96D7A07F0-A14FB/DI_2018_Deloitte_MFI_skills_gap_FoW_study.pdf.

⑤ 邱元阳：《人机关系：从卢德运动到机器换人》，《中国信息技术教育》2019 年第 19 期。

素对工作与劳动转型的作用和影响，尝试对这个问题进行回答，并在此基础上，一窥工作/后工作世界的未来。

一、替代与创造：众说纷纭的现状

2016 年，欧洲工会研究院（European Trade Union Institute）对欧盟国家就业市场受人工智能的冲击进行了评估，估算结果显示欧盟国家平均 54%的劳动者将被这一技术替代。[①] 这个比例在美国是 47%，在日本是 55%。[②] 同时，有专家预测，在未来的 5 年内，全球 15 个主要国家的工作岗位总量将减少 710 万个。[③] 借用凯恩斯的话来说，随着技术的迭代和演进，我们发现：节约劳动力方法的速度远远超过发现劳动新用途的速度，由此产生的“技术性失业”现象迫使大量劳动者不得不经受这种新型“疾病”的折磨。那么，这些劳动者是谁？他们又具体从事哪些工作呢？

首先，规则性体力工作不断消失。这些工作具有低技能、高重复性和程序化的特点，其劳动者往往处于人力资本最底端，主要集中在农业、建筑业和制造业。如在制造业，“机器换人”已经成为全球普遍的实践，即越来越多的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现代工厂，使用智能机器（主要是工业机器人）对生产过程进行深度整合，推动“技术红利”替代“人口红利”，以实现产业升级和生产效率的最大化。近些年来，中国成为工业机器人密度增速最快的国家。这主要是因为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包括家电、新能源汽车、钢铁、电子科技等众多行业在内的龙

① European Trade Union Institute. Digitalisation of the Economy and Its Impact on Labour Markets. European Trade Union Institute Research Paper, 2016.

② Frey, Carl Benedikt and Michael Osborne. The Future of Employment: How Susceptible Are Jobs to Computerisation?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17(114): 254-280.

③ 李连德：《一本书读懂人工智能》，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 年，第 140 页。

头企业已经基本实现智能化，“机器换人”开始向行业内的中小型企业渗透。[①] 在欧美国家，顶级汽车制造商，如特斯拉、宝马已经基本实现冲压、焊装、涂装等多个主要工序的高度智能化，不断向“无人生产”转型，产业工人数量急剧下降。

其次，传统意义上事务性工作也面临着被替代的威胁。这些工作的工作内容专业性强，但却遵循一定的规则或规律，因此其劳动过程主要基于理性计算，不涉及太多情感的交流；其劳动结果大多可预测，不需要依据智慧和灵感做出综合判断。[②] 相关从业者通常是具备一定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脑力劳动者，他们处于人力资本中端，分布在金融、医疗、新闻等诸多技术密集型领域。在这些领域中，算法取代交易员、智能机器取代外科手术医生、自动化新闻取代记者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如在金融领域，全球最大的投资基金公司 BlackRock 从 2017 年开始，陆续砍去了一部分交易员的工作，因为现在大部分的投资决策都是由算法做出的。2019 年末，德意志银行部署了一支人工智能“服务机器人大军”，旨在实现“银行后台工作的智能化”，目前已经削减了 4 000 名业务员，预计到 2022 年削减人数将达到 1.8 万人。[③] 在医疗领域，当前美国半数的医疗记录人员将在 9 年内被人工智能完全替代；在不到 25 年的时间内，智能机器将完成一半以上的外科手术。[④] 在新闻领域，2006 年 3 月，跨国商业数据供应商汤姆森金融公司（Thomson Financial）使用计算机程序加工和处理相关的财经数据，完成新闻报道；此后，自动化新闻被广泛应用于财经报道、体育赛事和突发事件等新闻生产的过程中，未来相关领域内 90％的记

① 许怡、许辉：《“机器换人”的两种模式及其社会影响》，《文化纵横》2019 年第 3 期。

② 迈克斯·泰格马克：《生命 3.0：人工智能时代人类的进化与重生》，汪婕舒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8 年，第 162 页。

③ 杨于泽：《谁将被机器人取代，现在难下定论》，《长江日报》，2019 年 11 月 28 日，http://news.cjn.cn/cjsp/fb/201911/t3497890.htm。

④ 文森特·莫斯可，徐偲骕、张岩松译：《数字劳工与下一代互联网》，《全球传媒学刊》2018 年第 4 期。

者都将直面转型或失业的残酷现实。① 图 4-1 罗列了部分职业的自动化潜力，数值越高表示这一职业越有可能被人工智能替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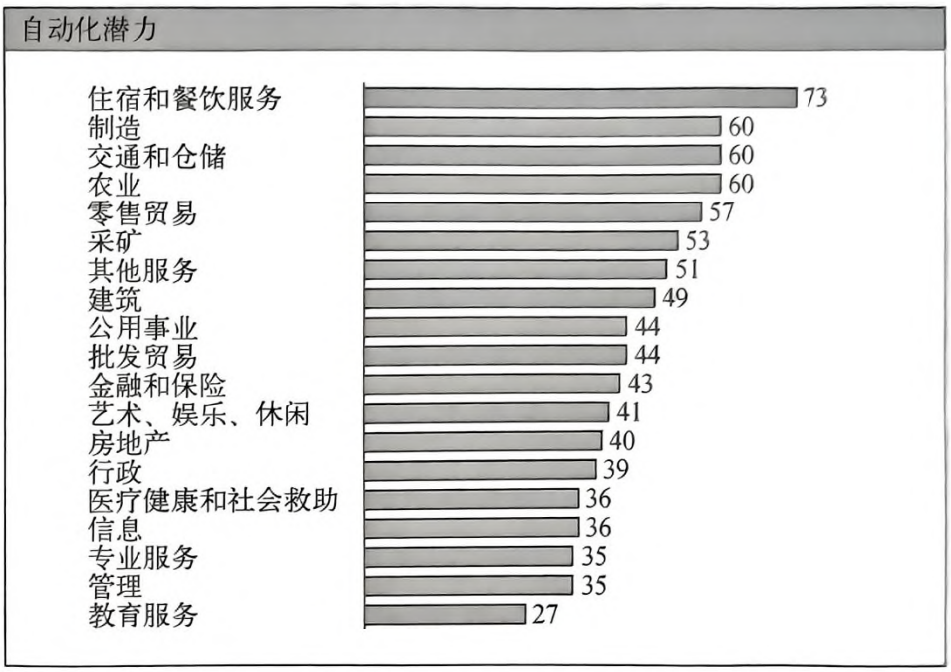


图 4-1　部分职业的自动化潜力②

在这种情况下，关于“人工智能又名大失业”的预警格外能够引发各

① 近几年，人工智能应用日益广泛，新兴技术与传统行业的融合发展已呈现燎原之势，新闻业不可能独善其身，在此背景下，笔者特别关注自动化新闻作为人工技术在新闻业的重要应用，并专门撰文对自动化新闻生产中的人机关系展开了系统探讨与反思，自动化新闻、数字劳动与技能变迁三者之间的勾连关系也是本书第七章的聚焦。笔者认为，自美国福特公司在全球建立第一条流水生产线以来，一方面，自动化技术逐渐替代规则性体力劳动的趋势十分明显，这些被替代的劳动呈现低技能、高重复性和程序化的特点，相应的劳动者也大多处于人力资本的最底端，主要集中在农业、建筑业和制造业；但另一方面，与之前的蒸汽机革命、电力革命和信息互联网革命相比，以智能化为根本特征的第四次技术革命不再局限于简单替代人类的身体或四肢、替代规则性体力劳动，它拥有了越来越强大的深度学习和模拟人类大脑的能力，并以指数级的速度和规模取代人类几乎所有劳动，新闻记者所从事的非规则性、掌握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的脑力劳动也不例外。在国内外的众多新闻机构中，一场用写稿机器人替代新闻记者的技术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上演，难怪一些国际知名咨询公司甚至将新闻记者列为全球即将完全被智能化技术取代的“最为高危”的职业人群之一，他们相信新闻记者被写稿机器人替代只不过是时间问题。参见姚建华：《自动化新闻生产中的人机联姻及其实现路径》，《当代传播》2021 年第 1 期；《未来即将消失的 10 种职业，谁也逃不掉》，优米网，2017 年 5 月 2 日，http://www.youmi.cn/2017/0502/74750.shtml。

②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投资人力资本，拥抱人工智能：中国未来就业的挑战与应对》，2018 年 8 月 24 日，http://www.doc88.com/p-5911700964142.html。

界的担忧,劳动者将因为人工智能而被抹平出身、学历和技能的差异,一同陷入失业的泥淖。[①] 甚至连李开复这样最不用担心失业的人士都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真正威胁》的文章,声称这些趋势将导致严重的失业问题和贫富差距问题。同样,比尔·盖茨(Bill Gates)于2014年在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的一次讲演中直截了当地指出:在未来的20年,新技术对劳动需求实质性的减少已昭然若揭,但是绝大部分人并未在认知层面意识到这一点。

相比悲观人士,"乐观派"研究者也有话要说。美国经济学家达隆·阿齐默鲁(Daron Acemoglu)和帕斯夸尔·雷斯特雷波(Pascual Restrepo)以科技史为考察对象,发现在市场作用的力量下,技术进步在替代一些工作时,从长期来看,会创造出新的工作,因此在就业市场中,新工作产生的"补偿效应"会不断抵消其"替代效应"。[②] 如在历史上,汽车的出现导致马车车夫失业,但却创造了诸如客车和卡车驾驶、汽车研发、制造、修理等职位,汽车行业的从业者要远远多于以前马车行业。当前,随着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一方面,大量专业数字技能类工作应运而生,它们存在于人工智能上下游的产业链中,与研发、生产、销售、运用、推广等环节密切相关。[③] 这些工作往往是非常规性的,工作内容较为复杂和抽象,需要相关从业者丰富的知识积累以及较强的问题解决能力和创造力。[④] 这类劳动者包括芯片设计师、技术研发师、数据分析师、逻辑架构师、机器维修师等——他们处于人力资本顶端,且目前存在超过900

① 冯象:《我是阿尔法——论人机伦理》,《文化纵横》2017年第6期。

② Acemoglu, Daron and Pascual Restrep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utomation and W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18.

③ Wilson, James and Paul Daugherty. Collaborative Intelligence: Humans and AI Are Joining Force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18(4): 114-123.

④ 张新春、董长瑞:《人工智能条件下"人的全面发展"向何处去——兼论新技术下劳动的一般特征》,《经济学家》2019年第1期。

万人的缺口。[①] 另一方面，当数字信息作为一种新的虚拟生产要素时，它以更低的成本加速新企业的涌现，开辟全新的经济增长空间，进而激发一般性工作岗位和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最终在就业市场中，释放出更为广泛的“补偿效应”。[②] 此外，更有学者指出，现有研究只是简单地从岗位数量的角度来阐述人工智能对工作的影响，但如果从工作类型的角度来看，被人工智能替代的工作类型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21个国家中所占比例仅为9%，远未达到引发恐慌的程度。[③]

总而言之，观点相左和数据“打架”的情形时有发生，但这或许更接近于事实的全貌。人工智能对工作和就业市场的影响绝非替代或创造这样的单一进程和逻辑可以描述和概括，这两种相反的现象实际上是以不同的速率沿着各自的轨道同时进行的，它并不均匀，因此新工作产生的“替代效应”和“补偿效应”是错位的，存在一定的时间差，而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况且，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因素也绝不只是技术一环。

二、新“卢德运动”会出现吗？

除技术因素外，影响整个就业市场变动和劳动转型的还有非技术因素，如人机关系、劳动力结构、全球价值链与劳资关系。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们认为：人工智能条件下新“卢德运动”出现的可能较低。

(一) 人机关系

一方面，在人工智能时代，作为一种“整体”的技术过于复杂，绝非

①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Jobs Lost, Jobs Gained: Workforce Transitions in a Time of Automation. McKinsey & Company Report, 2017.

② 曹静、周亚林：《人工智能对经济的影响研究进展》，《经济学动态》2018年第1期。

③ Morikawa, Masayuki. Who Are Afraid of Losing Their Jobs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Robots? Evidence from a Survey.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2017.

“卢德运动”中被捣毁的织袜机可以比拟。它涉及互联网硬件设施、应用软件、物联网、大数据存储和分析，以及各式各样的生产和消费终端，劳动者几乎没有可能了解和掌握整个生产流程的全部信息。如果今天的劳动者与“卢德运动”中的产业工人一样，砸毁机器，那么这种劳动抵制与抗争不会给他们带来实质性的劳动改善，因为他们破坏的任何一台机器只是当下复杂生产流程中极其微小的一部分。失业者不但无法从机器手中夺回工作，甚至可能需要依法赔偿企业的经济损失。且如前文所言，下一步将被替代工作的很可能是知识劳工，他们与生产工具的关系已经与“卢德运动”中织袜工人和织袜机的关系截然不同：计算机或其他信息技术设备对他们来说，已经融入日常生活，不太可能再简单地被视为丢失饭碗的“元凶”，而遭到物理毁坏。新的劳动抵制与抗争很可能会以“技术化”的方式发生，如近年来，程序员们通过在 GitHub 平台上创建开源项目来表达他们对“996”工作制度普遍的不满。

另一方面，当前人类和机器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弹性空间，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涉及与智能机器的共同协作。因此更准确地说，人机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替换关系”，即马克思强调的“竞争关系”，而是“互补关系”，即“人机共融”。① 智能协作机器人（collaborative robots）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如美国 Rethink Robotics 公司早在 2012 年推出了 Baxter，可以执行生产上下料、机器控制、包装和材料处理等多种重复性的任务。这些工作可以由 Baxter 独立负责，也可由它与工人同步协作完成。研发团队反复强调，设计和使用智能协作机器人的最终目的并不在于替代人类劳动，而是提高它们的加工速度和精度，增加其灵活性和自我学习的能力；与此同时，工人通过学习人机交互的独特技能，可与智能机器建立合理、和谐的工作关系，进而加速生产力的发展，降低工作场所伤害的风

①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资料一作为机器出现，就立刻成了工人本身的竞争者”。参见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495 页。

业发展提供辅助性服务，例如风险投资师、专利律师、设计师等；以及人工智能产业所在地有限的传统服务业劳动者，如餐饮、娱乐和健身等行业的从业者。然而，技术进步的“败者”往往是受教育水平较低且居住于产业单一地区的中年人。①

也就是说，我们很难断言那些从事“技能退化”工作的劳动者是技术进步的“胜者”，尽管他们的工作和就业机会是人工智能所创造出来的。这些劳动者既包括本来就处于社会底层的产业工人，也不乏从中产阶层坠落下来，尚来不及再技能化的知识劳工。研究者应该将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新产生工作的质量上来，即便普华永道预测人工智能在中国的“创造效应”大于“破坏效应”，未来 20 年将新增 9 000 万个工作岗位。②如果这些工作岗位只是重复性体力劳动，只能满足劳动者的基本温饱，不能实现他们其他层次的需求，无法降低他们生活的不确定性，更无力帮助他们实现职业发展与向上的社会流动，那么长此以往，技术进步的“败者”将会意识到自己与“胜者”之间的尖锐对立，滋生绝望与怨恨的情绪。况且，两头一样大的“沙漏”只是理想状态下的形状，速率问题如影随形，两极分化的新工作总量能够恰好完美填补被替代的中间岗位数量吗？如果失业者和不甘于低技能工作的劳动者联合起来，新“卢德运动”会不会发生，以何种形式上演，就很难预测了。

（三）全球价值链与劳资关系

纵观历次技术革命，尤其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信息技术和自动化技术的突飞猛进，许多学者注意到：“技能偏向”和“技能退化”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与全球价值链和全球劳动分工高度同构。“技能偏

① Trajtenberg, Manuel. AI as the Next GPT: A Political-Economy Perspectiv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18.

② 陈自富：《学习时报：人工智能会导致大规模失业吗》，新浪财经，2019 年 8 月 28 日，https://finance.sina.com.cn/chanjing/cyxw/2019-08-28/doc-ihytcitn2438697.shtml。

向”型工作集中在“全球北方”的核心国家或地区，而“技能退化”的劳动密集型工作则成为“全球南方”的边陲国家或地区吸纳就业人口的主要去向。光鲜亮丽的科技企业雄踞北美，而富士康的工厂则星罗棋布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这些地区的产业工人从事着电子零部件的生产和通信设备的装配等简单且重复性极高的工作。① 还有大量位于“全球北方”的服务型企业，为降低劳动力成本和规避监管，将其业务通过互联网外包到“全球南方”，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与企业的“轻资产运营模式”。早年的印度呼叫中心客服人员如此，近年来的数据标注员、脸书内容审查员等零工经济劳动者皆同此类。相比制造业中生产线上的装配工人，他们的工作更加隐匿化和弹性化。②

由此可以看出，工作的替代与创造问题不仅仅是各国的国内经济问题，它还深深内嵌在全球政治经济结构之中，与一个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及其所处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息息相关。即便一国在短期内可能创造出众多的工作岗位，但如果都是承接高科技企业外包的低端处理任务，这些工作岗位得以稳定存续的可能性极小，因为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它们很可能会迅速流向劳动力资源更为充沛、薪酬更低、劳动法保护力度更弱的国家或地区，工作的繁荣不过是昙花一现。况且，大部分后发国家或地区在人工智能方面不可能在短期内赶超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无法立即创造出大量高技术人才的工作岗位需求，这样失业危机就近在眼前了。

除了外部环境，一个国家国内的劳资关系与国家角色也极大地影响到工作替代与创造的相对速率。就劳资关系而言，它涉及企业裁员、劳动者权益、工会工作、社会稳定等不同方面。就当前情况来看，政府政策制定者、企业管理者和公共知识分子需要更深入地探究如何将劳动者从

① 苏熠慧、姚建华：《“不稳定无产者”研究谱系及其当代意义》，《社会科学》2019 年第 6 期。
② 姚建华：《零工经济中数字劳工的困境与对策》，《当代传播》2018 年第 3 期。

在场的“局外人”转变为“局内人”，即鼓励和确保劳动者更广泛地参与到关于“机器换人”的劳资集体协商中来，同时，在智能机器面前保持他们高超、娴熟技能的“独特性”，进而更好地实现企业的转型和升级。① 就国家角色而言，它是劳资关系的主要参与者与调节者。

当下，劳动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涉及公正、自由的价值问题，在中国甚至是直接关系到能否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关键性问题。② 一方面，国务院已经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将人工智能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力争在 2030 年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另一方面，政府也日渐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数以亿计产业工人及其家庭的生计熔接在一起，任由智能机器单方面在各行各业突飞猛进，迅速替代掉大量工作岗位，短时间内将造成严重的社会冲击。显然，中国政府没有这么草率，及时吸取了各方意见，并在政策部署中做了一定前瞻性的努力。2017 年 2 月 6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其中，“构建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运用互联网促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强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支撑保障”等表述颇为引人注目。③ 国家的态度很明确，产业要转型升级，劳动力也要转型升级，两者并不矛盾。近年来，广东、河南、重庆等地的地方政府和工会组织已经陆续出台各种政策措施，完善劳动者教育与技能培养体系，以适应智能化生产的知识和技能要求。

机器不会自动“换人”，是资本和企业经营者在执行这一策略；同样，人机不会自动“共融”，新的工作不会自动产生，后发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力结构也不会自动实现最优化。要让替代与创造的速率在各国家或地区、各行业、各工作种类间维持基本的平衡，最大限度地缩短“旧去新来”

① 杨涛：《机器换人②|在场的“局外人”：企业升级过程中的工人》，澎湃新闻，2019 年 5 月 4 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387703。

② 李梅：《聚焦中国“劳动”之变——劳动观念的时代跃迁与劳动形态的价值转换》，《探索与争鸣》2015 年第 8 期。

③ 中共中央、国务院：《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2017 年 2 月 6 日。

之间的时间差，避免社会转型带来的阵痛，需要全球范围内的国家和政府、科技企业、技术开发者、工会组织、教育机构、劳动者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共同智慧和努力。

三、后工作世界人类社会的收入分配

上述所有探讨，都是建立在当前“弱人工智能”阶段之上的。随着大数据和深度学习技术的高速发展，人工智能可以利用庞大的数据集，在自我学习、自我适应、自我归纳、自我创新的基础上，与意识、感性、知识和自觉等人类特征互相联结，实现“机器控制机器”的新型生产方式，也就是“强人工智能”阶段。① 到那个时候，“奇点”便到来了，即机器智能将会完全超越且脱离它的主人——人类智能。于是，第一台超级智能机器就是人类“最后的发明”，之后无论是设计还是生产，都不再需要人类劳动。这将导致十分可怕的后果：大多数人将沦为尤尔·赫拉利（Yuval Harari）笔下的“无用阶级”或“无用的物种”。② 一旦成为现实，前文所有应对方案都将变成权宜之计，不过只是在拖延时间而已。

在戴锦华看来，到“强人工智能”阶段，贫富差距的问题之上，又叠加了一个更残酷的问题，即“弃民”问题。人类几乎丧失了所有不可被机器替代的特征，以往因生产规模缩小而产生的大规模劳动力后备军，在未

① 沈文玮：《论当代人工智能的技术特点及其对劳动者的影响》，《当代经济研究》2018 年第 4 期。

② 在尤尔·赫拉利（Yuval Harari）看来，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导致一种新的无产阶级状态的形成，即“无用阶级”。换言之，“无用阶级”是人工智能时代无产阶级的新形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中，作为人的思维智能和感受性的正常功能被剥夺了，人们只能按照人工智能框架来实现自己的功能，即“感受性的无产阶级化”；其二，政治上的盲动，人们手中的选票不再是经过理智思考的产物，而是被人工智能控制的票仓，不断沦为右翼民粹主义利用的工具。参见何怀宏：《奇点临近：福音还是噩耗——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最大挑战》，《探索与争鸣》2018 年第 11 期。

来会因为新的生产方式而成为永远过剩且多余的劳动力。[①] 这将给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冲击，原因在于：虽然企业节省了工资支出，降低了生产成本，但一个经济体如果使用越来越少的劳动力，分配越来越少的工资给劳动者，那么家庭的购买力必将江河日下。一旦人们没有足够的金钱去购买商品，而生产的商品数量还在持续增加，支撑市场的相应的需求增长将从何处而来呢？对此，全球著名的未来学家马丁·福特（Martin Ford）阐述道：一方面，全球资本主义体制似乎走到了吸收劳动力的“最后阶段”；另一方面，机器不断代替人力生产出更多更好的商品。当这两种情况同时出现，我们亟须思考和关注过剩和多余劳动力将如何生活的问题。[②] 可能的办法或许是建立一种国家规定的税收制度，税源是通过“回收”新技术创造出来的生产力增长成果，再把这些税收当作“购买力”，分配给大众。虽然目前来看，这种“激励性再分配方案”设计起来较为困难，尤其是要在“养懒汉”和“托底”之间寻找到动态平衡点，但不少国家开始试验的“全民基本收入”或“无条件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就是这种思路的现实产物。

作为一项极具建设性的倡议，全民基本收入这个全新的概念呈现在公众面前，用来确保数字时代每一位劳动者和出于各种原因（如伤残、失业等），暂时或终身无法参加劳动的社会成员的基本收入，对许多无法找到一份维持生计工作的个体而言，这既是一项公民权利，又是弥合社会不平等的一剂良方。令人感到欣喜的是，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已经得到了全球科技界领袖人物广泛的支持，他们在芬兰、加拿大、荷兰和意大利等国开始了一系列国家和地方层面的试验，这对于从根本上帮助数字时代劳动者消除因劳动关系、劳动过程和劳动保障方面的变化而带来的无

① 《访谈戴锦华|人类/后人类：数码转型之后的未来图景》，海螺社区，2019 年 8 月 13 日，https://www.sohu.com/a/333472792_790641。

② Ford, Martin. *The Rise of the Robots: Technology and the Threat of a Jobless Future*.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5.

措感，以及克服由数字技术和 ICTs 的发展导致的对工作消亡和人力淘汰的恐惧感极具价值和意义。

现有新闻报道和学术文献不乏对基本收入的讨论，主要涉及制度设计、实施范围、政策结果等各个面向。不过，稍显遗憾的是，大部分文章尚未交代清楚一个根本问题：资金从哪里来？如果只是从现有税收中抽取，势必引发纳税人的愤懑和抵触，是否另有更具正当性的资金来源呢？

在此，2020 年美国总统选举民主党初选候选人杨安泽（Andrew Yang）的思路颇具启发性。他主张“自由分红”（freedom dividend），即政府无条件给全国所有人每人每月发放 1000 美元，理由便是“未来很多重复性的劳动力工作将会被机器、数据和自动化等新科技取代”——有了这份收入，就等于有了基本的财务支持，受惠者就能腾出充分的时间来做有意义的事情，比如抚养孩子、照顾病弱、参加社区服务，等等。根据他的计算，刨去已经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受保者（社保和“自由分红”二选一），实际上只需要 1.8 万亿美元的资金投入就可以将此主张付诸实践。然而，这个主张最大的亮点在于他对资金来源的设想：通过对高科技企业征收增值税的方式来获取这 1.8 万亿美元——亚马逊每出售一本图书、谷歌服务器每进行一次搜索，都需要向政府缴纳增值税。这样即便这些高科技企业全部实现智能化生产，也能保证政府从它们身上获取税收。目前，他设想的税率是欧洲的一半，所以也无须担心本土企业的外迁。[①] 这个设计实际上与福特的想法不谋而合，即新的税源来自新技术创造出来的生产力增长成果，而后用于补贴大众。但是，杨安泽还是没有阐释清楚，为什么要向高科技企业征税来补贴大众？因为他没能点出人工智能的生产资料问题——数据，以及数据生产者尚未被支付报酬这一事实。那么，传播学，特别是批判传播学研究可以提供怎样的洞

① 《一战成名，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华裔总统终于来了》，家天下，2019 年 9 月 2 日，https://mp.weixin.qq.com/s/JWOXeb9BBY2S0vOIfH7QqQ。

见和方案呢?

默多克在讨论机器的道德经济时,曾鼓励传播学人走出公认的"舒适区",与不熟悉领域的研究人员合作,有效介入围绕新兴通信设备和网络展开的辩论,如由技术引发的结构性失业问题。① 批判传播研究吸收了来自经济学、政治学、网络法学领域的最新成果,已经逐渐认识到数据不只是隐私和信息传播的副产品,而是数字经济乃至后续所有发展模式必不可少的生产性资源,应该从生产关系和用户劳动的视角来审视数据问题。② 更何况,人工智能和算法要想改进,新的自动生产模式想要趋于完善,就必须浸润在充足的高质量数据中学习与训练——其中就包括个体(作为用户/劳动者)在无意识间生产出来的海量数据。他们很少意识到这些数据的生产价值或在启动机器语言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③ 数据来自用户/劳动者的生产、生活、传播和电子媒介的使用行为,后者却没有任何收入所得和讨价还价的能力,因为在他们反应过来之前,大量宝贵的数据已经被平台或高科技企业打着"清洗过"和"去身份识别化"的幌子私有化了,这与互联网巨头崛起之初无偿"圈占"传统媒体和用户生成内容来壮大自己何等相似!

因此,有学者开始主张个人对数据享有收益权,这种收益权绝对不只是建立在侵权保护规则之上的、基于企业过错而偶尔为之的"赔偿",毕竟,对于企业而言,被处以罚款和经济索赔不过是"九牛一毛",很难构成实质性的成本压力,也不能惠及初级生产资料提供者——广大使用者。④ 特别是从"数据圈地"(data enclosure)运动的原始积累中发展起来

① 格雷厄姆·默多克,刘宣伯、芮钰雅、曹书乐译:《媒介物质性——机器的道德经济》,《全球传媒学刊》2019年第2期。

② 徐偲骕、张岩松:《国有化还是用户所有?——从"数据所有制"破解社交媒体治理之争》,《新闻界》2019年第6期。

③ 戴昕:《数据隐私问题的维度扩展与议题转换:法律经济学视角》,《交大法学》2019年第1期。

④ 刘新宇:《大数据时代数据权属分析及其体系构建》,《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的人工智能，应该给予每一位数据生产者以经济补偿。部分学者认为，当前的“免费数据”换取“免费服务”的模式难以持续产生高质量的数据，自然也会限制人工智能的加速迭代。与此相反，企业应该将数据看作用户/劳动者的劳动成果，为使用这些数据付费，即向数据生产者提供“最低数据工资”——这有益于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为人工智能的井喷式发展提供不竭的动能。当然，这种分配是采取企业和用户/劳动者间单独定价和支付，还是由国家汲取税收后进行集体再分配的方式，仍然存在争议。不过，“数据劳动”很有可能成为大规模智能化未来仅剩的“有用”工作，一种为人们提供收入和意义的全新生产方式。①

古往今来，人类社会的运行、维系与进步，皆仰赖于劳动及其果实。不仅如此，人类本身也在劳动中创造自己，李大钊曾言，“一切乐境，都可由劳动得来，一切苦境，都可由劳动解脱”②。正因如此，当机器可能危及人类劳动时，紧张情绪才会徘徊不去，萦绕在人们的心间。

本章借“卢德运动”是否会重演来发问，意在探讨目前人工智能与工作之间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研究认为，替代与创造实际上是“共时的”，即都在发生，但速率不同，恰恰因为速率不同，它们又是“历时的”，因为前者可能快，先发生，后者可能慢，甚至迟到。替代之后，创造之前，存在着时间差。我们相信，这是符合基本事实的——毕竟，在成千上万名司机可能因为无人驾驶技术失去工作时，要他们习得新的技能、实现“人机共融”并顺利再就业，需要不少时日。如果不能尽快缩短这个时间差，新“卢德运动”也许就在不远处。

况且，在技术因素以外，我们还能看到，替代与创造还存在工作性质和任务方面的差异，劳动力结构和社会阶层可能随之发生两极分化，加

① Ibarra, Imanol Arrieta, Goff, Leonard, Hernández, Diego Jiménez, Lanier, Jaron and Glen Weyl. Should We Treat Data as Labor? Moving Beyond “Fre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Papers and Proceedings*, 2018(108): 38-42.

② 刘诚：《劳动观、劳动关系与劳动政策——基于创造性劳动、人本主义和劳资合作的思考》，《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8期。

之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不平等现状，各国劳资关系和国家角色的多样性，人工智能对于不同国家或地区、不同行业，甚至不同工作种类的劳动者的影响都将迥然相异。要确保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冲击维持在一个总体可控的水平上，实现替代与创造的均速和平衡，还需要国家和政府、科技企业、技术开发者、工会组织、教育机构、劳动者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取得共识，多管齐下，才能最大限度避免这场转型中的多数人成为技术进步的“败者”。当然，这只是工作世界的未来，那么后工作世界的未来呢？一旦“强人工智能”时代到来，人类社会不得不为“无工作可为”早做准备。所幸，我们每分每秒都在生产的海量数据，或可成为未来安身立命，获取收入的基本分配依据，这也不失为一种合理的社会想象。

下篇

数字劳动与在地经验

第五章　全球外包、数字劳动与劳动控制

2005年，全球最大的网络电子商务公司亚马逊推出了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Amazon Mechanical Turk，MTurk），旨在搭建一个新型的、标准化的在线众包平台，向全球劳动力众包计算机难以完成，但人类却擅长的工作，比如数据标注，即对大量文本、图像、语音、视频等数据进行归类、整理、纠错和批注，这有益地拓展了下一代互联网公司能够存储、分类和提供的在线数据领域，进而推动了人工智能的发展。

早在18世纪，匈牙利商人沃尔夫冈·冯·肯佩伦（Wolfgang von Kempelen）在游历欧洲时随身携带了一台会“自动”下棋的机器人——土耳其机器人（Turk）。当时，它击败了众多优秀的棋手，一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但后来人们发现，这仅仅是一个骗局，Turk并不具有任何智能化的成分；现实真相是，一名顶尖棋手躲藏在机器的内部对它进行操作。MTurk命名的灵感正源于此，不过躲藏在MTurk内部的不再是一名顶尖棋手，而是全球数以万计的、廉价的、基于需求的线上劳动力，他们根据自身所具备的技能从MTurk发布的线上任务（每日超过50万种）中快速选择并高效完成适合自己的任务，获得相应的报酬。他们同时也是在线众包平台“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劳动力。也就是说，平台

经济的发展颠覆了传统劳动力市场以终身雇佣制为特征的稳定雇佣关系模式,形塑出一种新型的灵活用工形态,作为个体从业者(如独立承包商、自营业主或自由职业者),他们逐渐成为在互联网端快速回应在线众包平台任务需求最为重要的弹性劳动力资源。①

基于此,本章从全球外包实践和在线众包平台的兴起入手,以MTurk为案例分析的对象,通过探究其运作机制,旨在揭示出内嵌于上述机制中对平台劳动者劳动过程普遍且隐蔽的控制,以及这些劳动者进

① 这里首先需要厘清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确定平台和劳动者的关系?两者是否存在雇佣关系?国内外研究者、政府官员和相关行业从业者对此问题看法不一。美国俄亥俄州第49任州财长罗伯特·科尔斯普拉格(Robert Sprague)认为,平台和劳动者不存在雇佣关系,只是合作关系。平台经济催生的临时性的灵活用工制度替代了传统劳动力市场的长期稳定的雇佣模式。在这种新型的用工制度下,劳动者在是否工作、工作时间、工作形式的选择上,均有很大的自主性,平台往往只负责应用软件的开发运营、服务信息的整合推送,并不直接经营实体业务,因此不需要承担劳动关系中规定的雇主义务。但是美国哈佛大学劳动法教授本杰明·萨赫斯(Benjamin Sachs)、英国牛津大学法学教授杰里米亚斯·普拉斯(Jeremias Prassl)和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常凯教授认为,在平台经济中,平台对劳动者劳动过程的每一个环节进行组织、控制和监督,并占有其剩余劳动,因此平台和劳动者实属雇佣关系,雇佣关系依然是互联网经济的基本用工形式。在他们看来,平台经济所带来的信息革命,令剩余劳动时间的创造者真正从传统产业的雇佣工人扩展到文化产业、服务业中的雇佣劳动者,这是资本主义的后福特主义弹性积累体制的必然要求。以平台经济中的Uber为例,Uber掌控司机从雇佣到离职的全过程;决定车费标准和司机的薪酬;为司机安排工作任务并为其发放报酬;接受司机的劳动成果,并从中提取一定比例的佣金;为司机提供劳动工具(应用软件);司机提供的服务是它的核心业务。在此,Uber控制所有司机的行动,司机是典型的劳动者,Uber和司机的雇佣关系十分明确。从全球实践的维度出发,在美国,2015年6月,加利福尼亚州劳动委员会裁定Uber和司机是雇佣关系,司机应该享受失业待遇,且能够成立工会,并通过工会进行集体谈判,争取更多的利益。在英国,伦敦劳工法庭在2016年10月的一场劳动争议案中,确认Uber司机的身份为Uber所雇佣的劳动者,而非个体从业者。2019年4月,欧洲议会(The European Commission)正式通过法案,将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等职业与实习生、学徒一起纳入劳动法的保障范围,规定了他们的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数,平台以"独立承包商"(independent contractor)等为由的风险规避不再奏效。笔者更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即平台和劳动者存在雇佣关系。在平台经济中,平台和劳动者之间的雇佣关系具有隐蔽性,它以降低用工成本和用工风险为根本出发点,置劳动者的工作和社保福利等于不稳定的状态之中,这也是本章讨论在线众包平台MTurk与托客关系的基本立场与出发点。参见常凯:《雇佣还是合作,共享经济依赖何种用工关系》,《人力资源》2016年第11期;陆胤、李盛楠:《分享经济模式对传统劳动关系的挑战——美国Uber案和解的一些借鉴》,《中国劳动》2016年第16期;潘天君、欧阳忠明:《人工智能时代的工作与职业培训:发展趋势与应对思考》,《远程教育杂志》2018年第1期。

行的各种形式的反控制表达，成为重塑在线众包平台权力关系的能动力量，在此基础上，尝试绘制出在线众包平台的未来发展图景。

一、全球外包实践与众包平台的兴起

“外包”并不是一个崭新的概念或一种全新的实践。[①] 20 世纪 90 年代以降，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盛行加速了资本、商品和服务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如在传统的制造业，基于全球劳动分工而形成的离境外包成为一种普遍且有效的组织生产的方式。当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通过资本的空间转移，处于全球价值链体系核心的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大型科技硬件公司和大型零售商将生产以“合同制造”的方式“外包”给位于亚洲、非洲、南美洲的众多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时（主要是指位于全球世界体系边陲或半边陲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独立制造商），它们纷纷被纳入到全球产业链之中。[②] 在此背景下，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位于全球价值链体系（半）边陲的中国，在 2010 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服装和纺织产品、电子产品、玩具以及家庭用品的生产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③]

与此同时，基于呼叫中心的客户服务、数据录入和转录等服务活动越来越多地从欧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地区转移到南亚、拉丁美洲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资本通过外包的生产组织方式进一步实现了空间转移。[④]

---

① Prahalad, C. K. and Gary Hamel. 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0(May-June): 79 - 93.

② Gereffi, Gary. The Organization of Buyer-Driven Global Commodity Chains. In *Commodity Chains and Global Capitalism*, edited by Gary Gereffi and Miguel Korzeniewics, 1994. Westport, CO: Greenwood Press, pp. 95 - 122.

③ Hamlin, Kevin. China Overtakes Japan as World's Second-Biggest Economy. *BBC News*, August 16, 2010. https://www.bbc.com/news/business-12427321.

④ Huws, Ursula. *The Making of a Cybertariat: Virtual Work in a Real World*.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3.

在菲律宾，呼叫中心的客户服务是该国服务外包中增长最快的部分——2001 年至 2005 年，菲律宾呼叫中心的客户服务一直保持 100%的增长，同时它在整个服务外包总收益中占比最重，2005 年为 49.4%，高出占比第二的医疗转录服务（29.3%）近 20 个百分点。2005 年，菲律宾共有 108 个呼叫中心，拥有座席 7.5 万个，雇佣员工总人数达到 11.2 万。①

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认为，不仅是传统制造业流水线上的产业工人和低技术能力的服务人员持续受到外包的威胁，那些高技术能力的知识劳动者也日益受到世界生产和贸易中这种新的组织方式的直接冲击，即包括作家、教师、工程师、动画制作者、技术人员等传统专业领域内拥有较高教育水平且具备多种技能的知识劳动者同样面临其工作被外包的挑战。② 随之而来的是，在传统的专业领域内，终身制的雇佣模式也已不复存在，知识劳工在其工作安排中也亟须面对日益普遍的灵活用工，这种用工模式不仅彻底改变了劳动力雇佣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它重塑了劳动者的身份认同。因此，知识劳动者和产业工人一样，也构成了全球劳动力后备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资本提供了一个贮存着“取之不竭”的可供支配的劳动力“蓄水池”，供跨国企业在全球扩张的进程中大量、廉价、灵活地使用。③ 王金秋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在他看来，当今

① 这里之所以使用 2001 年至 2005 年的数据，主要是因为 2005 年以后，随着数字技术和 ICTs 的发展与普及，基于呼叫中心的客户服务逐渐被基于互联网的客户服务取代。参见 Holman, David, Batt, Rosemary and Ursula Holtgrewe. *The Global Call Center Report: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Management and Employment*. Ithaca, NY: Authors, 2007 中的相关内容。

② Ross, Andrew. *Nice Work If You Can Get It: Life and Labor in Precarious Time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③ 全球劳动力后备军数量的不断增长且越来越不受空间限制，这为劳动力市场价格的下降打开了阀门。在哈里·布雷弗曼、约翰·福斯特（John Foster）等学者看来，将马克思劳动力后备军理论运用到全世界范围内，灵活用工实践的普遍化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在全球进行劳工套利，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劳工进行剥削，获取巨额利润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以及由此带来的庞大的全球劳动力后备军使得全世界劳动者（既包括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劳动者，又包括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劳动者）都处于不利的地位。参见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方生、朱基俊、吴忆萱、陈卫和、（转下页）

灵活用工不仅出现在二元劳动力市场中的次级劳动力市场，而且已经蔓延到整个经济的各个行业中。当物质资本的扩张不能满足资本的利润率水平时，资本就开始大规模地从生产和贸易领域转移出来，转而投向金融业和服务业领域。① 因此，灵活用工被广泛运用于知识劳动、非物质劳动、创意劳动、情感劳动等各种新型劳动之中。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不断发展，一种新型的外包形式应运而生：众包，即任务发起者（requesters，包括个人或组织）将任务通过互联网以自由、自愿的方式外包给非特定的大众网络社区的生产组织过程。② 因此，众包在本质上是“大众”和“外包”的结合。大众可以是网络志愿者，任务发起者充分利用他们的兴趣爱好与闲暇时间，以灵活用工的方式让他们完成相应的任务，且不提供或提供微薄的补贴作为报酬。③ 如曹晋、张楠华④、张斌⑤、胡绮珍⑥等学者基于对中国大陆和台湾字幕组成员的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化访谈发现，字幕组成员往往基于自己的兴趣和对影视作品的喜爱，免费为国外影视作品制作中文字幕，这些任务一般是通过互联网发布与众包的。

2005 年后，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在线众包平台更是深化了上述众包模式。任务发起者利用数字网络的连接性，将具有特定时限的“有偿”任

（接上页）张其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年；Jonna，Jamil and John Foster. Marx's Theory of Working-Class Precariousness：It's Relevance Today. *Monthly Review*，2016 (11)：21－44. 中译文参见贾米尔·乔纳、约翰·福斯特，苏熠慧译：《工人阶级不稳定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与当今的关联》，姚建华、苏熠慧主编《回归劳动：全球经济中不稳定的劳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年，第 73—94 页。

① 王金秋：《资本积累体制、劳动力商品化与灵活雇佣》，《当代经济研究》2017 年第 1 期。

② Howe，Jeff. The Rise of Crowdsourcing. *Wired*，2006(6)：1－5.

③ Hammon，Larissa and Hajo Hippner. Crowdsourcing. *Business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Engineering*，2012(3)：163－166.

④ 曹晋、张楠华：《新媒体、知识劳工与弹性的兴趣劳动——以字幕工作组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 年第 5 期。

⑤ 张斌：《中国字幕组、数字知识劳（工）动与另类青年文化》，《中国青年研究》2017 年第 3 期。

⑥ 胡绮珍：《中国字幕组与新自由主义的工作伦理》，《新闻学研究》（中国台湾）2009 年总第101 期。

务(超越了仅仅基于兴趣爱好的“无酬”任务)通过在线众包平台发布和众包给全球网络上数以万计的劳动者,旨在以最少的劳动力成本实现自身利润和效益的最大化。比较有代表性的在线众包平台有德国的 Clickworker、美国的 MTurk 和 Upwork。众包的任务既涉及非常基础性的操作,如只要通过点击鼠标就能完成并获得报酬的“微任务”(micro-work),又包括专业性工作,如编码、软件开发和数字内容的开发或处理等(如图形设计、复制与编辑、翻译或为网页制作文本)。而在本章的研究对象——MTurk 这一众包平台,任务发起者发布和众包各种“微任务”,如图像排序、转换非结构化数据、信息分类等,并通过平台获得一个开放的、全球在线劳动力市场。此外,从这些在线众包平台衍生出来的线下工作也辐射着相关职业内数量众多、范围广泛的劳动者,因此它的作用不容小觑。

二、在线众包平台的运作机制与劳动控制

(一) 在线众包平台的运作机制

在线众包平台的运作机制是指:用一定的结构方式,把在线众包平台的运作主体与工作流程组织和联系起来,使它们协调运行进而达到最优效果的组织方式,同时它构成了调节和约束平台运作主体及其众包活动的基本准则与核心制度。① 在 MTurk,平台的运作主体包括:平台、任务发起者和任务参与者(又称“托客”,turkers);平台的基本工作流程由任务发起者在平台发布和众包任务、托客选择要完成的任务,以及任务发起者审查(批准或拒绝)任务三部分组成。

1. MTurk 的运作主体:平台、任务发起者和托客。在 MTurk,任务发起者以一种简单、高效和可复制的方式招募全球线上劳动力来完成各种被发布和众包的人类智能任务(以下简称任务)。

① 曾维和、贺连辉:《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主体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理论探索》2015 年第 5 期。

首先，平台。平台架接任务发起者与托客，扮演着他们之间经纪人的角色。如上所述，MTurk 发布和众包的任务具有“微任务”的特征，它们是复杂任务最基础的组成部分，分为图像和视频处理、数据验证和清除、信息收集、数据处理四大类。具体来说，其中既有较为简单的任务，如图像贴标签、删除重复数据、人工翻译等，又有涉及参与者主观判断且较为复杂的任务，如图像和视频内容审核、问卷调查和实验参与、网站内容撰写，等等（见表 5－1）。① 一般来说，MTurk 从任务发起者支付的报酬总额中抽取 20%—45%作为提成，这是平台日常运营费用和利润的来源。②

表 5－1　不同种类的任务及其难易度

分类	任务	难易度
图像和视频处理	图像贴标签	简单
	图像排序	简单
	选择最好的图像来表示产品	复杂
	审核图像和视频内容	复杂
数据验证和清除	删除重复数据	简单
	识别不完整或重复的产品列表	简单
	转换非结构化数据	复杂
信息收集	回答任何主题的问题	复杂
	填写市场调查或调查数据	复杂
	参与问卷调查和实验	复杂
	撰写网站内容	复杂
	查找特定字段或数据元素	简单

① 表格内容来自笔者对相关文献中 MTurk 任务分类论述的归纳和整理，并参阅了 MTurk 官方网站（https://www.mturk.com）上的相关信息。

② Buhrmester, Michael, Kwang, Tracy and Samuel Gosling. Amazon's Mechanical Turk: A New Souce of Inexpensive, Yet High-Quality, Data.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1(1): 3－5.

续表

分类	任务	难易度
数据处理	编辑和转录音频内容	简单
	人工翻译	简单
	评估搜索结果的准确性	复杂
	信息分类	简单

其次，任务发起者。任务发起者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任务发起者是学界的研究者，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类学者，他们把 MTurk 作为获取社会调查数据的平台。与传统的问卷调查方法相比，MTurk 具有被调查者更多样化、数据获取的速度更快、成本更低等特点。① 第二类任务发起者是大数据初创企业，这些企业往往在有限资金投入的情况下，利用 MTurk 提供的大量全球廉价劳动力的智慧和技能，简化业务流程，实现创新，博得资本的青睐和投资。② 第三类任务发起者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如谷歌），它们的目标是降低劳动力成本，有效控制企业规模，进而规避因正式员工数量骤增而带来的企业风险。同时，MTurk 有利于这些企业增强其数据收集与分析能力，加快机器学习的开发速度。在 MTurk，学术研究任务的占比远小于商业性质任务的占比，因此第二类和第三类任务发起者构成了平台发布和众包任务的主体。此外，高度活跃的任务发起者数量大致占总数的 10%，但他们众包了平台约 98%的任务总量。③

① 周立君、汪涛：《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科学研究的众包网络平台研究综述》，《科技进步与对策》2014 年第 8 期。

② 这与大数据初创企业选择的轻资产战略（即近乎“零劳动力成本”的企业运营战略）密切相关。对于这些企业而言，以相对低廉的价格获取全球劳动力的智慧和技能，加速推进企业劳动力的整体外包和实现更优化的劳动力管理有助于其业务能力的快速拓展与市场估值的持续提升。参见姚建华：《人工智能中的“人工”：众包平台的实践与反思》，《新闻战线》2020 年第 7 期。

③ Schwartz, Oscar. Untold History of AI: How Amazon's Mechanical Turkers Got Squeezed Inside the Machine. *IEEE Spectrum*, April 22, 2019, https://spectrum.ieee.org/tech-talk/tech-history/dawn-of-electronics/untold-history-of-ai-mechanical-turk-revisited-tktkt.

最后，托客。2011 年，根据亚马逊的统计数据，MTurk 注册的托客数量超过 50 万，他们来自 190 多个国家或地区（主要来自美国和印度，见图 5－1）。[①] 但研究人员测算，MTurk 活跃的托客人数约为 5 万，其中高度活跃的托客约为 1 万名，他们大多选择全职，每周工作 15 小时以上，完成了平台 80％的任务量。[②] 在其他人口统计学特征方面，男性托客的比例持续上升，近年来几乎与女性持平。40％托客的年龄小于 30 岁，平均年龄约为 31.6 岁。70％托客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③] 从职业构成来看，他们中有退休教师、退伍军人、自由撰稿人、大学生、全职母亲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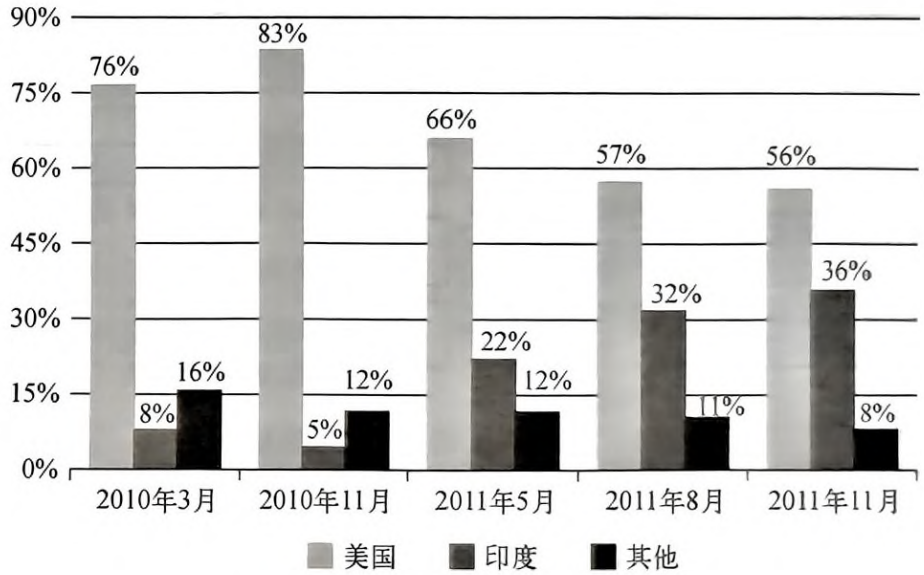


图 5－1　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托客人数的占比

① Fort, Karen, Adda, Gilles and Bretonnel Cohen. Amazon Mechanical Turk: Gold Mine or Coal Mine.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2011(2): 413－420.

② Adda, Gilles and Joseph Mariani. Language Resources and Amazon Mechanical Turk: Legal, Ethical and Other Issues. Legal Issues for Sharing Language Resources Workshop, October 21, 2010, La Valletta, Malta.

③ Ross, Joel, Irani, Lilly, Silberman, M. Six, Zaldivar, Andrew and Bill Tomlinson. Who Are the Crowdworkers? Shifting Demographics in Mechanical Turk. Proceedings of the 28th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Extended Abstracts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 April 10－15, 2010, New York.

2. MTurk 的基本工作流程。MTurk 的基本工作流程由三部分组成:任务发起者在平台发布和众包任务;托客选择要完成的任务;任务发起者审查(批准或拒绝)任务(见图 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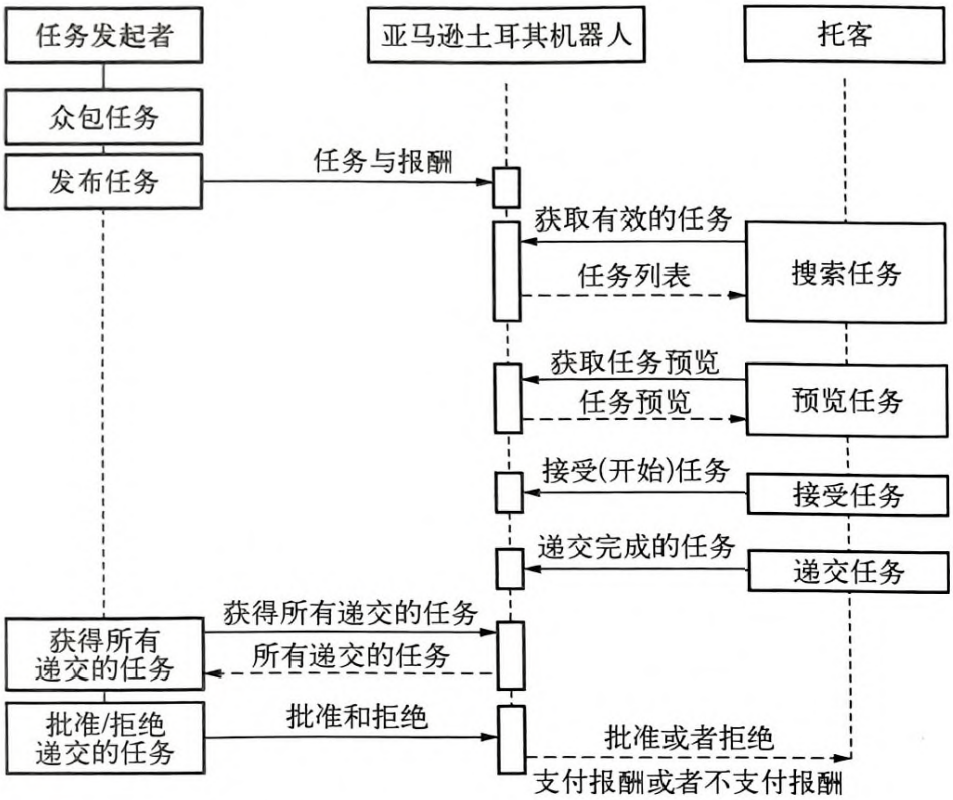


图 5-2 MTurk 的基本工作流程

首先,任务发起者在平台发布和众包任务。任务发起者发布与任务相关的具体信息,这些信息主要包括任务描述、任务持续时间、任务时效、任务所需资历要求、任务类型、任务报酬等。为了帮助托客更好地了解和完成任务,任务发起者通常会在任务发布时提供 1—2 个任务成品范例供托客参考。任务发起者借助 Web 服务应用程序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API)自动发布数量不等的(少至几个,多至上千个)相似的任务,并将其结果通过算法直接集成到任务发起者的工作流程和计算机系统中。①

① Irani, Lilly. Difference and Dependence among Digital Workers: The Case of Amazon Mechanical Turk.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2015(1): 225-234.

其次，托客选择要完成的任务。托客完成的任务一般都具有重复性，且报酬普遍较低——25%任务报酬低至0.01美元，70%任务报酬低于0.05美元，只有不到10%的任务报酬超过0.10美元。表5-2罗列了不同任务的可获得数量和相应报酬。① 有些任务（如人工翻译）的报酬不及同类线下工作报酬的十分之一。② 根据乔尔·罗斯（Joel Ross）等学者的统计，托客的时薪约为8美元，这远远低于美国在职人员的平均时薪标准。20%和50%托客分别将报酬作为自己第一和第二大经济来源。③

表5-2　不同任务的可获得数量和相应报酬④

任务	可获得数量	相应报酬（美元）
图像贴标签	240987	0.01
选择最好的图像来表示产品	12748	0.04
删除重复数据	136725	0.02
参与问卷调查和实验	3809	0.08
撰写网站内容	8976	0.10
查找特定字段或数据元素	5294	0.02
人工翻译	9498	0.03
评估搜索结果的准确性	6780	0.02

① Irani, Lilly and M. Six Silberman. Turkopticon: Interrupting Work Invisibility in Amazon Mechanical Turk. Proceedings of the SIG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April 27 - May 2, 2013, Paris, France.

② Callison-Burch, Chris and Mark Dredze. Creating Speech and Language Data with Amazon's Mechanical Turk. Proceedings of the NAACL HLT 2010 Workshop on Creating Speech and Language Data with Amazon's Mechanical Turk, June 6, 2010, Morristown, NJ.

③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托客大多很难进入传统劳动力市场，来自MTurk的报酬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经济来源。参见Ross, Joel, Irani, Lilly, Silberman, M. Six, Zaldivar, Andrew and Bill Tomlinson. Who Are the Crowdworkers? Shifting Demographics in Mechanical Turk. Proceedings of the 28th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Extended Abstracts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 April 10 - 15, 2010, New York.

④ 表格内容来自笔者登录MTurk官方网站后对相关信息的整理，并参阅了Silberman, M. Six and Lilly Irani. Operating an Employer Reputation System: Lessons from Turkopticon, 2008 - 2015. *Comparative Labour Law and Policy Journal*, 2016(3): 505 - 542的相关内容。

最后，任务发起者审核（批准或拒绝）任务。即使托客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要求完成某项工作，也不一定能够保证获得相应的报酬，因为任务发起者对是否发放报酬具有最终的决定权，双方签署的“参与协议”（The Participation Agreement）对此予以明确的说明。虽然该协议规定，当任务发起者拒绝托客的任务时，需要提供相应的理由，但在实际操作中，他们的理由往往是随意填写的，如“1”“X”或“.”。① 面对上述不合理的理由时，托客可以向 MTurk 提出申诉，但大部分任务发起者并不会回应这些申诉，因为在双方互通电子邮件的过程中，任务发起者花费在阅读邮件上的时间成本远远大于他们支付给托客的报酬。此外，“参与协议”十分明确地规定，TMurk 无须承担在任务发起者和托客之间进行协调的责任，由此平台巧妙地抽身于任务发起者和托客的“劳动”关系之外，将自身和托客的关系模糊化。

（二）在线众包平台中的劳动控制

马克思认为，资本要充分发挥劳动力的潜力，就必须拥有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因此控制成为劳动过程中的基本问题。② 在 MTurk，对托客劳动过程普遍且隐蔽的控制内嵌于其运作机制之中。它以托客劳动力的商品化为前提，既来自任务发起者，又来自平台，因此具有双重属性。劳动控制是在线众包平台中不对等权力关系布展的必然结果，而托客和任务发起者在信息获取方面的不对称更加剧了这种权力关系的不对等性。

1. 托客劳动力的商品化。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力的商品化意味着本质并非商品的人类劳动被纳入市场，通过交换原则进行买卖，在此，生产

---

① Bergvall-Kåreborn, Birgitta and Debra Howcroft. Amazon Mechanical Turk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Labour. *New Technology, Work & Employment*, 2014(3): 213 - 223.

② 卡尔·马克思：《马克思资本论节选本》，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

者的劳动力使用权普遍地成为交易的对象。[①] 这也意味着对于劳动力的使用不再根据劳动力本身而是根据劳动力购买者的需求组织起来，旨在最大限度地攫取他们的剩余价值，加速资本的积累和增殖。这在 MTurk 表现得尤为明显。首先，世界各地的线上劳动力构成了 MTurk 的劳动力后备军，在平台售卖他们的劳动力及其专业技能，[②]劳动力的商品化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③] 其次，在传统劳动力市场稳定雇佣关系的模式下，企业依据劳动法为劳动者提供工资和各项社会福利（如养老、失业、医疗保险等），形成了劳动者的“安全网”。但在 MTurk，托客需要个人承担劳动风险，这进一步降低了 MTurk 的劳动力成本与用工风险。[④] 最后，为了适应不断变化和多样化的任务需求，托客需要持续培养和提升自己的技能，这些技能包括：如何找到合适的任务，如何做出最佳的任务选择，如何进行多任务管理，等等。托客承担着技能培养和提升的时间成本与相关费用。

更为复杂的是，在 MTurk，托客劳动力的商品化与劳动力的符号化和原子化相互交织。托客一旦在 MTurk 注册成功，就会被分配到一个由字母和数字组成的 ID，这个 ID 是他们在平台的符号化存在形式。劳

---

①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195—197 页。

② 在 MTurk，托客既来自处于全球价值链体系核心、劳动力成本较高的发达国家或地区（如美国），又来自处于体系边陲或半边陲、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如印度）。参见王金秋：《资本积累体制、劳动力商品化与灵活雇佣》，《当代经济研究》2017 年第 1 期。

③ 世界各地的线上劳动力构成 MTurk 劳动力后备军的现实再次印证了崔学东、曹樱凡、邱林川等学者的论述：企业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通过标准化和机械化过程（即“再泰罗化”过程）以众包这一新型组织方式在全球范围招募最为廉价的劳动力，进而加速资本的积累和增殖。因此，随着在线众包平台的兴起，社会化的生产存在于工厂、电信服务部门和小商铺外，占领书房和任何可以手机上网的地方，侵占劳动者的闲暇时间，在全球范围储备着一支弹性的、不稳定的劳动力后备军。参见崔学东、曹樱凡：《“共享经济”还是“零工经济”？——后工业与金融资本主义下的积累与雇佣劳动关系》，《政治经济学评论》2019 年第 1 期；Qiu, Jack Linchuan. *Working-Class Network Society: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Information Have-Less in Urban China*.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9。

④ 王俊：《互联网资本主义下劳动力商品化的发展趋势与就业效应》，《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 年第 4 期。

动力的符号化不但削减了托客的主体性与自主性，他们的社会关系也因此被匿名化，而且他们和任务发起者的交流机制愈发呈现数字化和符号化的特征。基于此，两者的关系更像是一种电子化的简单交换关系，托客的劳动变得越来越抽象和隐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难以通过相同的工作而彼此联结，每个人都被区隔开来为自己打工，原子化趋势日趋明显，这极大阻碍了他们行使组建工会和集体协商的权利。①

2. 任务发起者和平台对托客的双重劳动控制。MTurk 通过对“灵活、自主”工作模式的宣传，吸引了大批托客，但事实上，他们的劳动过程受到了来自发布者和平台的双重控制，这种普遍且隐蔽的控制不仅包括任务发起者对托客个人隐私、工作时间、任务成果和工作意愿等方面的强有力影响，而且还涉及平台对托客准入机制、质量控制、强制退出的“霸权式”管理。

一方面，任务发起者对托客的控制。其一，任务发起者可以获得托客的数据库，关于他们已完成任务表现的详细信息，通过他们网络的 IP 地址获悉其地理位置，以及其他相关信息，托客的个人隐私受到了极大的威胁。② 其二，任务发起者对于托客递交任务的时间有着严格的规定和控制。为了按时完成任务并获得报酬，托客往往夜以继日，不断压缩休闲时间。虽然他们在选择工作时间（包括工作时长）上有着自主权，但这种看似自由的安排，实质上并不受自己意志的支配，而由任务发起者所发布任务的具体要求和属性决定，更受制于数字资本主义的技术结构与规则设计，③因此托客的工作自主权既是一种调动托客积极性的有效手段，又具有劳动控制的意义。其三，任务发起者对发布和众包的任务

① Engels, Steven and Monika Sherwood. What If We All Worked Gigs in the Cloud? The Economic Relevance of Digital Labour Platforms. European Commission, Discussion Paper, 2019.

② Irani, Lilly. The Cultural Work of Microwork. *New Media & Society*, 2013(5): 720 - 739.

③ 吴鼎铭：《作为劳动的传播：网络视频众包生产与传播的实证研究——以“PPS 爱频道”为例》，《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 年第 3 期。

具有完全的定价权，托客缺乏议价的空间。[①] 此外，如上所述，任务发起者对是否发放托客报酬具有最终的决定权，并对他们的任务成果（即使是没有支付报酬的任务成果）享有完全的所有权。其四，托客的报酬取决于完成任务的数量和质量，即 MTurk 实行严格的“计件工资”制度，这培养了托客“多劳多得”的劳动意识和鼓励他们追逐实现自己的“财富梦想”，且促使他们自愿参与内嵌于平台生产制度的“赶工游戏”，不断制造和强化“劳动同意”。[②]

另一方面，平台对托客的控制。其一，从理论上来说，只要托客能够掌握简单的互联网和英语技能就可以在世界的任何地方接受 MTurk 的众包任务，但在实践中，截至 2015 年，75%的托客来自美国。[③] 这主要是因为从 2011 年开始，MTurk 采取了“仅限邀请”的注册机制，也就是说，平台在邀请个人加入之前会对其注册信息进行详细的审查。[④] 其二，MTurk 引进了质量控制系统，将托客分为“普通托客”和“托客大师”，后者是托客中的“精英”（2012 年数量约为 2 万名），他们在亚马逊的统计监控下的表现远远优于其设定的标准，具有较高的历史任务合格率（通常在 90%以上）。[⑤] 任务一般会被优先分配给“托客大师”而非“普通托客”。即使在“普通托客”群体内部，他们也会因为不同的历史任务合格率而得到不同的任务列表，这些列表是经过 MTurk 自动过滤和筛选的，

---

① 托客不享有对任务报酬的议价权，因此如果对任务报酬不满意，他们只能退出 MTurk，或投入更多成本寻找其他报酬相对较高的工作。

② 姚建华、徐偲骕：《全球数字劳工研究与中国语境：批判性的述评》，《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 年第 5 期。

③ Ipeirotis, Panos. Demographics of Mechanical Turk: Now Live! *Computer Scientist in a Business School*, April 6, 2015. http://www.behind-the-enemy-lines.com/2015/04/demographics-of-mechanical-turk.html.

④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2010 年，高度活跃的托客来自 60 多个国家或地区。参见 Ipeirotis, Panos. Analyzing the Mechanical Turk Marketplace. *XRDS*, 2010(2): 16 - 21 中的相关内容。

⑤ Ipeirotis, Panos. Mechanical Turk Changing the Defaults: The Game Has Changed. *Computer Scientist in a Business School*, December 5, 2012. https://www.behind-the-enemy-lines.com/2012/12/mechanical-turk-changing-defaults-game.html.

这无疑加剧了托客内部的竞争关系。其三，一旦发现有托客违反了“参与协议”，平台有权在任何时候强制注销他们的账号，并没收其账号中尚未提取的收入。安东尼奥·阿洛伊西（Antonio Aloisi）将这种行为的实质界定为平台在行使雇主的解雇权。①

换言之，当托客的主要经济来源为 MTurk 的任务报酬时，他们高度依赖平台，且受到来自发布者与平台的劳动控制，这导致他们工作自主性的不断降低，②遑论对平台的治理权。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对托客劳动过程的控制和对他们劳动过程的监督是同构的，即来自任务发起者和平台的双重控制使它们得以对托客的劳动过程实施福柯式的“全景敞视监控”③。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平台通过赋予任务发起者最终决定是否发放托客报酬的权力，将托客与平台的矛盾（这种矛盾因平台对托客的

① Aloisi, Antonio. Commoditized Workers, Case Study Research on Labour Law Issues Arising from a Set of “On-Demand/Gig Economy” Platform. *Comparative Labour Law and Policy Journal*, 2016(3): 653 - 690.

② Mosco, Vincent and Catherine McKercher. *The Laboring of Communication: Will Knowledge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8.

③ 20 世纪 70 年代，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圆形监狱”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全景监狱”（panopticon）的概念。它由位于中心的瞭望塔（监督室）和周边的环形建筑（被分割为许多独立的小囚室）组成，身处瞭望塔中的监视者对囚室中的囚犯进行监视。在福柯看来，“圆形监狱”不再囿于监狱、教养所、贫民收容所、医院、学校等封闭空间，而是弥漫、扩散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也标志着现代监控社会的形成。如果说边沁“圆形监狱”的内核是通过建筑物和光线等各种物理手段的结合，将人的身体活动和轮廓展现在监视者的面前，那么福柯则认为：“全景监狱”远远超越了对人的身体的监控，而对人的心理和行为进行监控，被监视者持续产生了一种挥之不去、每时每刻受他人监控的肉体和精神压力。这也正暗合了边沁对“圆形监狱”精妙的设计：监视者隐于幽暗的内环而不为囚犯所观察到，囚犯身处明亮的小间而无所遁形，所以在监视者不存在的情况下，监控机制仍能得以有效的运作。福柯进一步强调，这种持续为被监视者所感知的监控机制与惩戒措施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了规训社会的基础。由此，“全景监狱”延展为一种社会关系的组成方式：在社会的各种场景中，存在着“监视”和“被监视”的二元张力——一方实现权力运作和社会治理，一方在监控权力的规训下，成为服从管制的、孤立的和自我监督的主体。参见菲利普·斯塔布、奥利弗·纳赫特韦，鲁云林译：《数字资本主义对市场和劳动的控制》，《国外理论动态》2019 年第 3 期；李翔：《互联网背景下监视社会理论的新发展》，《法制与经济》2008 年第 10 期；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年；王俊秀：《数据监控、隐私终结与隐私通货》，《探索与争鸣》2018 年第 5 期。

控制和监视而产生，如“普通托客”时常抱怨自己只能在 MTurk 选择到报酬很低的任务，有时候为了和其他托客争抢报酬相对较高的任务，他们必须时刻关注新任务发布的消息）悄无声息地转移到了托客与任务发起者之间（如任务的报酬过低，不能真实地反映托客的实际劳动价值）。

3. 信息获取的不对称和不对等权力关系的加剧。在 MTurk，托客生产过程受到的普遍且隐蔽的控制与在线众包平台中不对等的权力关系紧密勾连，而托客和任务发起者在信息获取方面的不对称更加剧了这种不对等性。具体来说，在托客的日常实践中，他们需要广泛收集必要的信息来做出更为合适的判断，而这些必要的信息（主要与任务发起者相关的信息）一般无法在 MTurk 获得，更不用谈对这些信息进行过滤和筛选了。信息的不对称使得新托客更倾向于接受声誉良好的任务发起者低报酬、简单的任务来增加他们的任务完成数量，而不愿意选择来自不熟悉的（通常声誉度较低）任务发起者相对较高报酬的任务，因为他们不愿意（大多数情况下，也没有能力）承担任务提交后，得不到任务发起者任何报酬的风险。①

在此背景下，托客倾向于选择长期“打交道”的任务发起者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不但熟悉这些任务发起者的任务要求，而且了解他们提供的工作量和发布任务的规律。但是随着这些任务发起者规模的壮大、流程的简化，以及降低成本的压力，托客面临着与日俱增的工作压力和不稳定的工作环境。即便如此，出于“搜索成本”和“转换成本”的考量，他们往往会放弃选择提供更好报酬的任务发起者。由此，托客的任务发起者越来越固化，且托客对他们的日益依赖使两者的权力关系变得愈加不对等。

---

① 在 MTurk，托客完成任务后不仅可以获得相应的报酬，而且还可以提升自己的历史任务合格率与信誉度。任务发起者一般称历史任务合格率在 90%以上的托客为“托客大师”，他们更容易获得报酬相对较高的任务。信誉度是任务发起者在托客完成任务后对其做出的评分，信誉度越高的托客将获得更多的任务。不管是托客的历史任务合格率还是信誉度，它们都是算法对托客劳动过程和结果控制的具体表现。

总结而言,不同于阿尔文·罗斯(Alvin Roth)的论断,即在线众包平台通过劳动需求供给双方点对点的即时匹配和扁平化的权力结构,实现对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① 本章通过对 MTurk 的分析发现,任务发起者和平台居于支配地位,具有绝对主导权,托客居于从属地位,在相对固定的时间里以任务发起者和平台共同规定的方式从事特定的工作,并遵守相应的规章制度和工作规范。也就是说,在 MTurk,劳动需求供给双方存在着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和等级化的权力结构,这与工业社会中传统雇佣关系的根本特性并不存在本质性的差异。②

三、网络社区:来自托客的回应

理查德·爱德华兹(Richard Edwards)指出:劳动者并不只是控制的被动承受者,而是具有能动性和自为意识的主体,他们往往对控制做出积极的回应。③ 在 MTurk,这种回应表现为组建网络社区,它作为托客生态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网络论坛和职业共同体两种基本形式,在缓解托客自我驱使的紧张压力,以及拉近托客彼此距离、增进感情、影响行为、加强团结等诸多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为托客提供了有效的支持网络。

(一) 网络论坛

大量托客聚集在 Mturker Forum、Turker Nation、MTurk Grind 等由托客自主发起与运营的网络论坛上。在此,经验丰富的前辈会与新加

---

① 阿尔文·罗斯:《共享经济——市场设计及其应用》,傅帅雄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年。

② 笔者认为,平台经济并不导致劳动的终结,因此劳动控制和对人类劳动的剥削不会消失,但是平台经济中劳动控制和对劳动剥削的方式并不与工业社会的完全相同,而是一种新的模式。

③ Edwards, Richard. *Contested Terra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kpla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9.

人 MTurk 的托客分享最快速的赚钱方法，而且托客内部会分享与任务（及其流程）、任务发起者相关的特定信息，展开多元和开放的讨论，如新托客如何快速入门，如何与他人建立非正式的关系和信任，如何结成共同体，等等。以 Mturker Forum 为例，它是一个为托客提供各类与 MTurk 相关信息的网络论坛（如图 5－3 所示）。托客可以在此张贴他们的任务目标、讨论特定的任务发起者；任务发起者可以在此为他们发布的任务做广告。论坛还提供 MTurk 插件下载服务，有了这些由第三方开发的插件，托客可以快速而有效地进行任务搜索、第一时间得到新任务发布的消息、获得托客对任务发起者评价的信息，以便对他们之前与其他托客之间存在的问题有一个全面且清晰的了解。有些插件还会及时告知托客哪些任务已被领取（或已经过期），并将这些任务自动从托客所能看到的任务列表中删除。① 目前托客使用比较频繁的一款插件来自 2008 年，由美国计算机科学活动家开发的 Turkopticon。托客通过这一款插件描述和评价任务发起者的众包行为，并与广大托客分享这些信息，尤其是与任务发起者支付行为相关的信息，如他们的支付速度、报酬标准、评估公平性，以及违反双方签署的“参与协议”的行为等。截至 2016 年 1 月，5.6 万名用户在 Turkopticon 上注册，对 4.2 万名任务发起者进行了近 30 万次的评价，这成功引起了人们对于在线众包平台运作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的关注。② 此外，网络论坛提供聊天室服务，供托客实时交流，分享彼此的工作经历，为他们摆脱焦虑和沮丧提供支持。

---

① Schmidt, Gordon. Fifty Days an MTurk Worker: The Social and Motivational Context for Amazon Mechanical Turk Workers. *Industri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2015(2): 165－237.

② Boes, Andreas, Kämpf, Tobias, Lühr, Thomas and Alexander Ziegler. Cloud & Crowd: New Challenges for Labour in the Digital Society. *Triple C*, 2017(1): 132－1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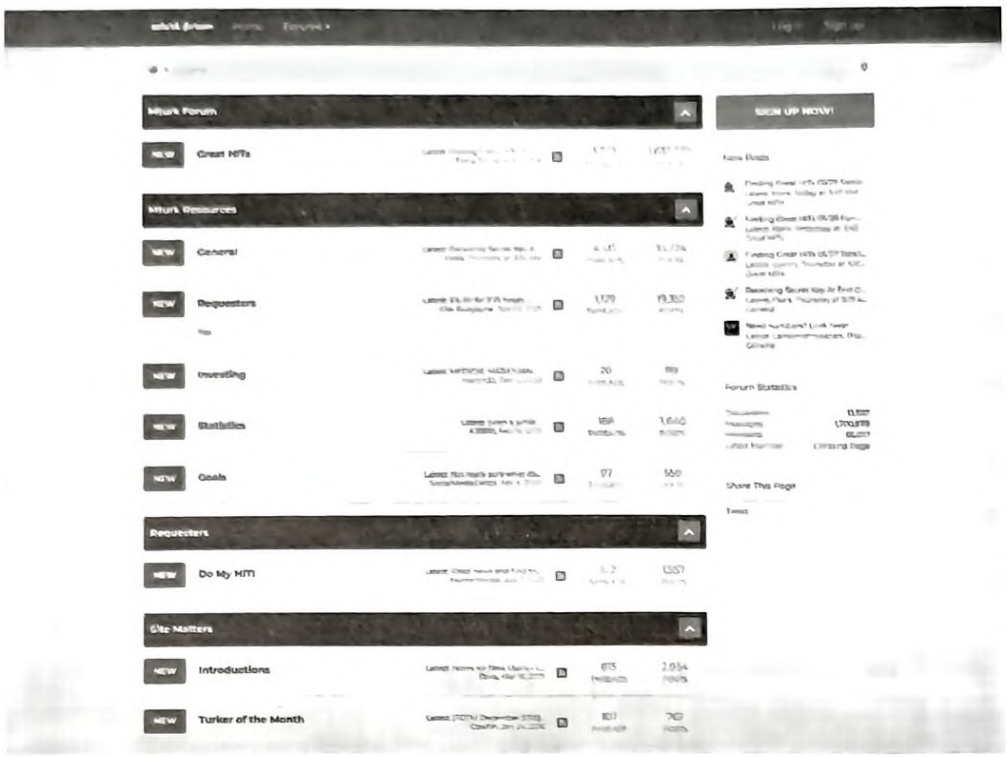


图 5-3　Mturker Forum 网络论坛的界面

（二）职业共同体

2014 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迈克尔·伯恩斯坦（Michael Bernstein）教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尼洛法·萨利希（Niloufar Salehi）教授、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丽莉·埃拉尼（Lilly Irani）教授、Turker Nation 论坛社区经理克莉丝提·米兰德（Kristy Milland）共同发起并成立了“我们是发电机”（We Are Dynamo）这一众包行业内的职业共同体。在他们看来，将托客个体组织起来十分不易，但托客对市场的干预能力取决于他们内部的团结程度，尤其是他们与任务发起者（或平台）集体协商的有效性，而“我们是发电机”正是托客团结的孕育器，并致力于通过集体协商的方式帮助他们提高任务报酬，增加 MTurk 沟通渠道的开放性。[①] 作为一个由托客组成

① Katz, Miranda. Amazon's Turker Crowd Has Had Enough. *Wired*, August 23, 2017. https://www.wired.com/story/amazons-turker-crowd-has-had-enough/?mbid=social_tw_backchannel.

的非正式组织，“我们是发电机”强调任务发起者在众包任务时，必须满足每小时 10 美元的最低报酬标准。同时，它鼓励托客在相关论坛上讨论任务话题，表达他们的困惑，并对任务机制提出修改建议。如果有大量托客对某项任务表达不满时，它会坚持让 MTurk 移除该项任务，因此它有益于对任务发起者进行集体施压，杜绝他们的不恰当行为。

除此之外，“我们是发电机”还积极尝试建立与完善托客的声誉系统。马修·玛吉(Matthew Marge)等学者指出：因为缺乏完善的托客声誉系统，任务发起者很难对托客进行过滤和筛选，导致“垃圾托客”(如作弊者，他们通过机器人而不是本人完成任务)从“普通托客”手中抢夺了一定数量的报酬任务。[①] 这与 200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讨论的“柠檬市场”非常相似：信息的不对称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我们是发电机”长期致力于托客声誉系统的建立与完善，降低“垃圾托客”出现的可能性，进而避免任务发起者对托客劳动价值的认知出现偏差。同时，为了帮助托客提高自己的信誉度，“我们是发电机”鼓励托客相互给出建设性的意见、经常讨论工作规范来更好地完成任务。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托客获得的同侪支持和建立的情感网络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概言之，托客对 MTurk 中劳动控制的回应具有复杂性：一方面，网络社区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在线众包平台中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展现了托客的能动力量，为他们提供了有效的支持网络(尤其是在为托客提供有关任务发起者相关信息方面)，因此网络社区的组建具有反控制的意涵；另一方面，上述反控制策略的根本目的在于帮助托客更好地完成平台的众包任务，提高任务报酬的同时，排解他们的焦虑、沮丧等负面情绪，拉近彼此的距离。也就是说，托客对劳动控制的回应是以个人利益

① Marge, Matthew, Banerjee, Satanjeev and Alexander I. Rudnicky. Using the Amazon Mechanical Turk for Transcription of Spoken Language.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coustics Speech and Signal Processing, March 14 - 19, 2010, Dallas, TX.

而非群体利益为先,他们具有反控制意涵的表达形式并不指向反抗资本主义,不以激烈的劳资对抗为根本目的,而是指向资本主义的再生产。[①] 所以,这样的回应受到强大的结构性制约,无法形成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指称的真正意义上的"反向保护运动",难以与任务发起者和平台所建构的强有力的劳动控制相抗衡。[②]

四、小结与展望

美国当今最有影响力的社会思想学家之一托夫勒基于对技术乌托邦的想象,对未来的人类社会这样描述道:家家户户成为田园般的"电子小屋",科技的发展使远程工作成为可能,人们摆脱了上下班的烦恼,在工作中享有更大的自主权和灵活度,不断提升工作满意度与工作效率,获得更为丰厚报酬的同时,也降低了企业的管理成本和提高了企业的利润。[③] 然而,本章通过对 MTurk 运作机制和内嵌其中的劳动控制的分析发现:技术的发展并不必然带来美好的生活。就托客的劳动过程来说,他们的任务高度重复且报酬普遍较低,在"计件工资"制度的持续作用下,他们不得不选择延长工作时间,因此他们的劳动不仅呈现体力化的特征,而且消泯了生产与闲暇的界限。此外,来自任务发起者和平台的双重控制对托客的个人隐私、工作时间、任务成果和工作意愿等方面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并且对托客的准入机制、质量控制和强制退出形成了"霸权式"的管理。

在此,我们需要思考:当数字技术和 ICTs 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行业,如数据输入、音频转换、技术支持和软件开发愈发依赖在线众包平台

---

① 迈克尔·布洛维:《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李荣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年。

②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刚、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年。

③ Toffler, Alvin. *The Third Wave*.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0.

时，应该如何对它进行管理和监督，如何为在线劳动力建立基础性的保障机制？笔者认为，结合当下在线众包平台的全球治理经验，建构多元化主体共同参与的管理、监督和保障机制将成为在线众包平台未来发展的方向和目标。这里涉及一系列相关的具体问题。首先，在管理方面，如何实现托客的可持续发展，创建新型劳动力平台？如何建构涵盖平台、任务发起者、托客及其职业共同体，以及政府相关部门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管理机制？其次，在监督方面，在线众包平台在其具体实践中规避企业责任义务的情况屡有发生，政府和职业共同体作为第三方对此是否享有监督权？它们对众包行业和市场是否有权进行监督？如何界定平台和托客的关系？两者劳动关系的确立以及由谁来确立和如何确立都将直接改变平台的劳动状况和重塑平台劳动的价值体系。最后，在保障方面，托客如何才能享受到社会保障体系、集体劳动协议与劳动协定所保障的社会福利，[①]以抵御市场的风险？托客的上述权利如何在法律和政策层面得到支持与保障？如何通过有效的渠道让托客在更大的范围内发出声音，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这些问题兼具重要性和紧迫性，它们与探索智能时代劳动力市场的新变化及其对宏观经济影响等更为宏大的时代议题紧密扣连在一起。[②]

最后，本章提出一个有趣且关键的问题，供后续研究者进一步思考：如前文所述，在 MTurk，任务发起者和托客并不存在马克思预言的激烈的劳资对抗，现实反而是：托客通过组建网络社区，改变在线众包平台信息获取不对称的现状，排解他们工作中的消极情绪，进而快速选择并高效完成适合自己的任务，并将报酬最大化——这一现实逻辑吸引着无数托客前仆后继，成为平台中数以万计的、廉价的、基于需求的线上劳动力

① Staab, Philipp and Oliver Nachtwey. Market and Labour Control in Digital Capitalism. *Triple C*, 2016(2): 457 - 474.

② Felstiner, Alek. Working the Crowd: Employment and Labour Law in the Crowdsourcing Industry. *Berkeley Journal of Employment and Labour Law*, 2011(32): 143 - 203.

的一员,为资本的快速积累和增殖贡献自己的剩余价值。换言之,在平台经济中,托客对在线众包平台及其规则的主观认识和体验变得十分复杂,他们如何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形成对在线众包平台的认同(主动认可),并逐渐接受平台建构的规则和控制(被动接受),自我强化,形成劳动共识,这一过程已经远非布洛维"制造同意"的概念所能描述与阐释的。解答这个问题不仅将助力我们更好地把握平台经济未来发展的方向,更将有益于我们洞察资本、技术和劳动三者的互动关系,及其对劳动者个体生命经验和群体利益诉求的深远影响。当然,对于众包平台的反思离不开对人类和机器之间边界及关系的探讨与厘清,而这已经成为当下计算机科学、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研究者共同关注的焦点。

第六章　众包新闻、数字劳动与灵活积累

移动互联网时代，新媒体技术产品的普及为普通网络用户提供了便捷的信息发布工具与平台——网民自主发布的内容不仅对传统新闻采编的时效性造成巨大的冲击，而且因其更容易营造出新闻事件的“在场感”而得到用户的青睐。为了应对自媒体内容带来的冲击，新闻业界出现了多种形式的对众包新闻的探索，旨在吸纳这种形式，并将其制度化和常规化，从而化解冲击，“为我所用”。

在全球的信源网络中，海外新闻专员与后台专业编辑团队协作进行新闻生产，被认为是一种可行的、低成本、高效率的获取新闻源的方式。一方面，专业编辑团队的把关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消息来源的真实性与可靠性、传播渠道的稳定性，并提升了报道的专业性；另一方面，基于兴趣与社群资源共享而加入新闻生产过程的公众在降低劳动力成本、增强组织管理运营的灵活性、提高受众对该地区的文化认知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①] 本章以财新传媒旗下的“世界说”这一新媒体产品作为研究对象，基于对其海外新闻专员的深度访谈，探究他们在新媒体技术的帮助

① 解雯超：《自媒体时代我国公民新闻的发展》，《视听》2017 年第 3 期。

下如何有组织地生产国际新闻,揭示出新媒体环境下,建制化媒体通过灵活积累策略,将海外新闻专员的在地优势、语言技能和兴趣热情转换为劳动生产力,进而为媒体机构创造核心价值,同时实现资本积累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被掩盖在参与、兴趣和自我实现伪装之下的"准灵活用工"实践。

一、众包与众包新闻

(一) 众包

美国《连线》(*Wired*)杂志记者杰夫·豪(Jeff Howe)于2006年首次提出了"众包"的概念,即一个公司或机构把过去由员工执行的工作任务,以自由自愿的形式外包给非特定的(通常是大型的)大众网络的做法。因此"众包"在本质上是"大众"(crowd)和"外包"(outsourcing)的结合。①

在林素芬和林峰看来,众包具有如下特征。第一,众包与开放式创新、开放源、大众生产、用户创造等商业模式相关,并具有参与者范围广泛的特征。第二,众包发包者和参与者既可以是营利性或非营利性的个人(包括专业人员和业余爱好者),也可以是机构。第三,众包平台有商用类和社会网络、论坛等社交平台类两种,前者包括MTurk、猪八戒等,它们根据发包者的需求提供相应的服务,并向发包者收取一定的管理费用;后者包括脸书、推特等,发包者通过在社交平台上嵌入自己的应用程序来发布任务。② 第四,众包的结果具有互惠互利性,即发包者通常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多样化的解决问题的答案,参与者因完成众包任务而获得物质或精神收益,众包平台(尤其是商用类众包平台)提供服务并收取费

① Howe, Jeff. The Rise of Crowdsourcing. *Wired Magazine*, 2006(6): 1-5.
② 冯剑红、李国良、冯建华:《众包技术研究综述》,《计算机学报》2015年第9期。

用。第五，众包活动的对象具有不确定性，因此众包任务是否能够完成、任务完成质量等相关问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①

（二）众包新闻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各行业开始探索众包这种新型商业模式在行业内的具体应用，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生产领域内的众包实践应运而生。② 所谓众包新闻，是指“依托于新媒体技术，将原本应由专业新闻工作者完成的任务通过平台外包给自愿参与的公众的新闻生产方式”③。在这种方式中，公众通过网络参与线索提供、资料收集、专业剖析，甚至是新闻修改和编辑等工作，与专业记者和编辑协作共同完成新闻的生产。因此，众包新闻是一种协作化的实践，具有以下四方面的积极作用。其一，通过组织和资源的合理分配及优化，众包新闻拓宽了公众的表达平台，有利于发挥他们的个体优势，进而有效降低新闻生产的成本、充分挖掘新闻资源，以及从根本上解决传统新闻生产模式中新闻同质化的现象。④ 其二，众包新闻能够不断提高公众参与的质量和加深他们参与的程度，参与者往往承担信息源、文字记者、摄影师、评论员等多种角色，因此它在提高全民媒介素养方面的作用不容小觑。其三，众包新闻可以让新闻事件获得更为广泛的关注和影响。当公众成为新闻信息的主要来源时，众包新闻所涉及的问题一般都与公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因此它更容易在公众中产生共鸣，公众在整个新闻生产的过程中更容易获得成就感，继而促使他们更为积极地参与生产众包新闻。其四，在众包新闻中，专业记者和编辑有更多的时间来制作更加专业的选

① 林素芬、林峰：《众包定义、模式研究发展及展望》，《科技管理研究》2015 年第 4 期。

② 王志宏、傅长涛、李阳阳：《众包的行业应用研究述评》，《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5 期。

③ 夏恩君、赵轩维、李森：《国外众包研究现状和趋势》，《技术经济》2015 年第 1 期，第 28 页。

④ 徐旭伟：《众包模式——未来新闻业发展的新渠道》，《新闻研究导刊》2015 年第 6 期。

题、冷静思考、不断创新，最终达到人力资源最优配置的目的。①

刘居星对实现新闻众包的四个基本前提进行了高度的概括。② 首先，随着公众参与意识的提高，他们积极讨论重大公共事件，从“沉默的大多数”转变为“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自媒体人。与此同时，一些专业人士在自己的领域就相关事件引导舆论，鼓励公众参与信息共享，因此，众包新闻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其次，互联网技术使得传统媒体较为封闭的新闻生产过程走向开放，微博等自媒体经常由于信源的接近性发布第一手信息，这些都冲击了专业媒体的话语权，模糊了行业边界。③ 有些学者甚至提出“新闻众包的不断发展使新闻机构已经无法保持其对公共信息‘排他性的管辖’，新闻业因此迈入‘去专业化’进程”的主张。④ 再次，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使新闻生产所需的专业技能平民化，尤其是智能手机的出现，赋予每一位用户生产新闻的能力。最后，自媒体平台兼具社交功能，可以将关注相同问题（或事件）的人群组织成一个社区，人们在这个网络中共享信息。社交用户、搜索引擎和数据库的不断融合是新闻众包未来的发展趋势，且将猛烈和持续冲击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⑤

众包新闻有着不同于传统新闻的生产机制。刘佳提出，众包新闻的生产机制由确定众包事件、搭建众包平台、分配众包任务、鼓励用户参与、完善筛选等不同环节组成。⑥ 第一，众包事件既可以由媒体，又可以由公众决定，它往往是在一个地区或全球具有相当关注度、主题明确，且能够引起公众参与热情的事件，包括突发性事件、调查性报道和国际新闻等。尤其是在国际新闻的报道中，新闻众包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一般

① 尤岩：《在互联网下众包新闻模式的探索》，《商》2016 年第 22 期。
② 刘居星：《“众包”模式下的参与式新闻》，《传播与版权》2015 年第 6 期。
③ 尹连根、王海燕：《失守的边界——对我国记者诠释社群话语变迁的分析》，《国际新闻界》2018 年第 8 期。
④ 张伟伟：《众包新闻：一个亟待关注与研究的领域》，《今传媒》2014 年第 4 期。
⑤ 刘居星：《“众包”模式下的参与式新闻》，《传播与版权》2015 年第 6 期。
⑥ 刘佳：《浅析新闻生产中的众包模式——以新华社“我在现场”为例》，《新闻世界》2018 年第 5 期。

情况下，媒体在海外常驻的记者人员数量十分有限，特别是一些地方性媒体，因此它们很难在国外获取更多的新闻线索。新闻众包恰恰能够有效利用海外留学生的资源，使他们参与到国际新闻的报道中来，这大大节约了媒体机构生产新闻的成本，使真相不再“迟到”。[①] 第二，众包平台是公众和媒体之间的桥梁，网络的便捷性、即时性和交互性等特征，使信息发布和制作更为高效。其中，手机移动网络平台所具有的操作简单、功能多样的特性使它成为公众参与众包新闻的重要渠道。第三，媒体根据具体的众包事件和众包平台设置不同的众包任务，主要包括分享式任务（既包括公众自发在媒体创建的平台上分享新闻信息，又包括公众分享与众包主题相关的故事、视频等）、分析式任务（公众根据媒体提供的信息，凭借自己的专业技能，对问题进行分析，寻找有效的信息）、回答式任务（公众按照媒体根据众包事件设计出的问题，填写信息和简要地进行回答），以及建言式任务（公众对众包主题提供建议或进行投票选择）四种基本类型。第四，公众参与众包新闻主要由内部和外部两类动因组成，前者包括兴趣爱好、自我肯定、技能习得等，后者包括金钱、物质奖励等。第五，专业记者和编辑需要一边整合公众生产的大量“信息碎片”，一边根据一定的操作规范和筛选标准对公众生产的新闻进行筛选，避免出现虚假信息、理性缺失等问题。[②] 综上所述，从新闻采集、制作到传播的全过程中，公众成为内容的生产者，媒体为公众搭建了新闻生产的平台，成为任务发布者和信息整理者，因此众包新闻是新闻生产模式由传者向受众转变的具体表现。[③] 在上述转变过程中，众包新闻充分展现了其时效性、全面性和创新性的特点。

① 王云晓：《浅析众包新闻的生产运作机制》，《新闻研究导刊》2016 年第 17 期。
② 周欣姝：《众筹与众包新闻中职业记者角色的转变》，《传播力研究》2018 年第 19 期。
③ 滕翰：《众包新闻：未来新闻报道模式中的一匹黑马》，《传媒观察》2014 年第 8 期。

(三) 众包新闻与用户生成内容

众包新闻作为以用户为新闻制作主体的新闻生产模式,与 UGC 密切相关——包括用户在 Web2.0 环境下,修改、集成、原创或发布的图像、文字、视频、动画、音频、游戏、虚拟物品等一切可被创造的客体。①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信息经济工作组在 2007 年发布的《参与式网络:用户生成内容,信息经济的工作党》(*Participative Web: User-created Content, Working Party on the Information Economy*)报告,作为一种新型的网络信息资源创作与组织模式,UGC 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首先,UGC 必须是在网络(包括互联网和局域网)上公开发表的。其次,用户必须在公开的内容里包含自己一定程度的创造性努力,无论是对新的内容,还是修改原有的内容。最后,用户创作的内容不应该含有商业因素或受机构的利益驱使,而是他们依据自身的兴趣或类似动机进行生产的产物,是个人价值观的反映。②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在新闻内容的生产环节,相较于传统的内容生产方式,用户生成内容为专业新闻内容的生产注入了新的活力。③ 许闽枝、廖景芝等学者以"澎湃新闻"为例,描绘了用户生成内容引入新闻生产的现实图景。"澎湃新闻"是上海报业集团的改革成果,于 2014 年正式上线。在 Web2.0 时代,"澎湃新闻"作为传统媒体转型的典范,意识到传统的"你看我写"的信息生产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用户的需求,针对现状,"澎湃新闻"通过添加"报料"功能、"追问"功能,开通"问

---

① 曾新星:《基于用户生成内容模式的传统媒体新闻生产创新研究》,湖南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硕士论文,2013 年。

②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Participative Web: User-Created Content, Working Party on the Information Economy, April 12, 2007. https://www.oecd.org/sti/38393115.pdf.

③ 曾祥敏、曹楚:《专业媒体新闻内容生产创新实践——用户生产与专业生产深度融合的路径研究》,《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 年第 11 期。

吧”频道，以及鼓励用户在“澎湃新闻”官方微博平台上发表自己的原创内容等多种途径，为用户生产新闻信息提供了便利。[①] “澎湃新闻”努力在新闻专业主义和用户参与的生产模式之间找到平衡点，致力于汇聚来自专业的新闻编辑团队和网民的强大力量对新闻进行完整的报道。

曾祥敏和曹楚的研究发现，用户生成内容受到主流媒体的青睐，主要是因为它能够提升报道的时效性、填补素材空缺、拓展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增强与用户关联的亲近感和真实感，以及提供多元声音的表达以确保新闻的客观性与公正性。[②] 但是，徐晚雪和艾则孜则指出，用户生成内容存在着质量低下、无效信息较多、信息茧房等诸多问题，她们以“今日头条”为案例研究，提出建立质量控制机制来解决上述问题。她们主张：一方面，通过用户之间的相互监督、相互评价和相互审核的机制来强化对用户生成内容质量的管理，并形成良好的用户生成内容的环境；另一方面，媒体机构运用关键字屏蔽技术，在网络上屏蔽用户生成内容中不符合规定的低质量内容。[③] 此外，钟瑛、李苏和方晨分别从新媒体环境下，专业媒体角色的转换、功能的重新定位，以及从业者核心技能的迭代等维度出发，分析了用户生成内容对专业媒体的重要影响和作用。[④]

二、资本积累、劳动力后备军与灵活用工

（一）资本积累与劳动力后备军

在《劳工的力量：1870 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Forces of*

---

① 许闽枝、廖景芝：《UGC（用户生产内容）引入新闻生产中的现实图景——以澎拜新闻为例》，《新闻研究导刊》2017 年第 10 期。

② 曾祥敏、曹楚：《专业媒体新闻内容生产创新实践——用户生产与专业生产深度融合的路径研究》，《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 年第 11 期。

③ 徐晚雪、艾则孜：《UGC 对新闻生产的影响——以“今日头条”为例》，《视听》2018 年第 5 期。

④ 钟瑛、李苏、方晨：《新媒体环境中用户生产内容的价值及实现路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1 期。

Labor : Workers' 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70）一书中，西尔弗敏锐地洞察到资本主义内部存在着合法性危机和利润危机之间的张力。[①] 他论述道：当资本主义将工人剥削到极致，就会出现“合法性危机”，即工人罢工，要求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而迫使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各种福利制度。而当资本主义国家为工人提供各种工作保障和福利制度之后，资本主义体系又会遭遇“利润危机”，即资本的积累变得有限，从而使资本通过各种修复性的手段来重新获得积累，例如将生产方式变得更为灵活、在全球范围内“猎身”更为廉价的劳动力等。因此，资本主义总是在上述二元张力中循环演进。波兰尼从劳动力的商品化视角切入，通过阐释历史的钟摆式“双向运动”，进一步补充了西尔弗对资本主义演进过程的分析。在波兰尼看来，资本主义的“钟摆”一会儿摆向推行经济自由主义的政策和建立灵活的市场（即强调劳动力的“商品化”），一会儿则摆向构建有利于保护劳动者的社会福利制度（即强调劳动力的“去商品化”），因此“市场的自由发展与社会保护的反向运动决定了劳动力商品最终会被约束在一个界限范围内”。[②] 而灵活用工的兴起正是劳动力持续商品化的产物，即资本尝试创造更多灵活的劳动安排，减少工人获得社会权利的同时，使资本通过剥削他们创造的剩余价值实现积累和增殖。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加速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同时，持续引发全球劳资关系结构性的变迁：以往为工人提供稳定工作保障的法律被频繁修改、政府去管制化与社会福利商业化的进程不断被加速，以及工会（作为保护工人权益的传统的制度资源）的作用和影响受到持续的挑战与削弱——这些变化直接导致了个体主义式的“工作福利制度”完全取代了工人曾经享受的集体性“社

① 贝弗里·西尔弗：《劳工的力量：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张璐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②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刚、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

会福利制度”。①

布雷弗曼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入手，以劳动力的去技能化及其主体性的建构和解构为研究对象，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学术传统，提出灵活用工并非当代社会出现的新问题，而早在资本主义的诞生初期，就存在一支不稳定的劳动力大军，它与马克思阐述的劳动力后备军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②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时指出：“相对过剩人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他们形成了一支劳动力后备军，具有流动性、潜在性、停滞性和赤贫性的特征，具体包括有劳动力的赤贫人群、孤儿、需要救济的贫民子女等。③ 在布雷弗曼看来，劳动力后备军为资本提供了一个贮存着“取之不尽”的可供支配的

① Kalleberg, Arne. Precarious Work, Insecure Workers: Employment Relations in Transi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9(1): 1-22. 中译文参见阿恩·考利博格，那宇琦译：《不稳定的工作、无保障的工人：转型中的雇佣关系》，姚建华、苏熠慧主编《回归劳动：全球经济中不稳定的劳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97—132页。

② 王金秋：《资本积累体制、劳动力商品化与灵活雇佣》，《当代经济研究》2017年第1期。

③ 在马克思看来，首先，产业后备军最混乱的一层是流动人口(floating population)，他们作为机器的广泛运用和劳动过程高强度细化的另一面而存在。在现代工业的中心，工人阶级是永恒流动的——不仅因为劳动力需求的强制减少，也因为劳动力的快速消耗。人类只能抵抗短期内工作对于身体的折磨。因此，工厂、车间和矿山往往寻找新鲜的，最容易被剥削的产业后备军——尤其是儿童、年轻女性和“零散的”农民工。其次，产业后备军的第二类构成是潜在人口(latent population)。他们大部分指的是农业(或农村)人口中自给自足的那部分。这部分人口为资本主义工业提供了广大潜在的劳动力资源。再次，停滞人口(stagnant population)是马克思对整个劳动力的不稳定性特征做出的最犀利的描述。从现代工业和农业中被驱逐出去的工人是停滞人口的重要构成，且成为可肆意使用的劳动力取之不竭的蓄水池，以“最少的工作时间和最低工资”为基本特征。在这里，雇佣是“极度不规律的”。当成员全部被雇佣的时候，他们被剥削的程度往往极高。最后，贫困人口(pauperized population)是产业后备军又一重要组成。停滞人口逊色于完全的贫困人口。马克思将赤贫的工人视为相对剩余人口的“最底层”。这些赤贫的工人包括相对剩余人口的最底层和那些过去被完全雇佣的工人。赤贫的工人撑起了产业后备军和整个工人阶级。这个阶级的大部分工人被囚居在“官方所统计的贫困的领域”——余下的人由“流浪汉、罪犯、妓女，简而言之为真正的流氓无产阶级”所构成。参见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Jonna, Jamil and John Foster. Marx's Theory of Working-Class Precariousness and Its Relevance Today. *Monthly Review*, 2016(11): 21-38. 中译文参见贾米尔·乔纳、约翰·福斯特，苏熠慧译：《工人阶级不稳定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与当今的关联》，姚建华、苏熠慧主编《回归劳动：全球经济中不稳定的劳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73—94页。

劳动力“蓄水池”，他们是工人不稳定性概念的结构性基础，是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的杠杆，其主要特征表现为：从事长时间的工作和赚取微薄的工资；接受不规律的雇佣安排；即使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就业的话，被剥削的程度也极高。①

贾米尔·乔纳（Jamil Jonna）、约翰·福特斯等学者将马克思的劳动力后备军理论运用到全世界范围内，指出灵活用工数量的增加是国际垄断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劳工套利，对第三世界国家劳工进行超级剥削，获取巨额利润的必然结果。②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以及由此带来的庞大的全球劳动力后备军使得全世界劳工（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劳工）都处于不利的地位。根据国际劳动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ILO）2015 年发布的《1991—2013 年劳动力市场的主要指标》（*Key Indicators of the Labour Market, 1991 - 2013*）报告，2013 年全球劳动力后备军构成了世界 60% 的可用劳动人口，数量达到 23 亿。③ 我们不难发现，劳动者以劳动力后备军的方式加强了资本而非自身的经济能力，他们在成为资本主义积累重要基础的同时，自身的不稳定性却在不断加剧。

（二）灵活用工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由于福特主义大规模、标准化的生产模式

---

① 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方生、朱基俊、吴忆萱、陈卫和、张其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年。

② Jonna, Jamil and John Foster. Marx's Theory of Working-Class Precariousness and Its Relevance Today. *Monthly Review*, 2016(11): 21 - 38. 中译文参见贾米尔·乔纳、约翰·福斯特，苏熠慧译：《工人阶级不稳定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与当今的关联》，姚建华、苏熠慧主编《回归劳动：全球经济中不稳定的劳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年，第 73—94 页。

③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ILO). Key Indicators of the Labour Market, 1991 - 2013. Geneva, 2015.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stat/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498929.pdf.

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多样化、差异化消费模式的追求，一种新型的、以灵活性为根本特征的生产模式应运而生，这一生产模式强调依靠弹性灵活的劳动过程和劳动力市场进行小批量生产，以满足瞬息万变的市场需要，进而克服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的刚性和僵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劳动力市场的灵活用工数量急剧增加，并成为资本全球化背景下劳资关系的显著特征。①

所谓灵活用工，又称非正规用工，是指在正规或非正规企业中进行的所有非正规工作，具体包括：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如政府组织和大中型企业（或事业单位）雇佣的临时工、非全时/兼职工和劳务工等；非正规部门的就业，如城市社区服务业、城市公益性岗位、家庭服务工作、为加工制造业配套服务的小型和微型企业、商业服务业中的小型企业，以及个体经营等；社会中介机构的就业和高科技、文化和咨询领域中的自由职业等。② 学者在界定非正规用工的某些具体工作类型时，往往会使用非全时/兼职工作（part-time work）、临时性工作（temporary work）、合同制工作（contracted work）、劳务派遣工作（dispatched work）、实习工作（intern work）等概念，这些概念也被统称为“非典型就业”。此外，他们使用网络工作者（net-worker）、弹性上班员工（flex-timer）、长期临时工（permatemp）、独立/非独立合同工（dependent/independent contractor）、不稳定无产者等新修辞来描述上述不稳定的劳动力。这些新修辞既是劳工不断适应具有临时性且不稳定性的工作条件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是劳动与资本重构的产物。③

灵活用工导致了劳动力工资、雇佣关系、工作制度和技能的弹性化。具体来说，首先，数量上的弹性。越来越多劳动者的职业身份变得不稳

① 王金秋：《资本积累体制、劳动力商品化与灵活雇佣》，《当代经济研究》2017年第1期。

② 唐卓华：《新形势下企业灵活用工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硕士论文，2011年。

③ 文森特·莫斯可，曹晋、杨保达译：《信息社会的社会理论与知识劳工》，《新闻大学》2009年第3期。

定,各种灵活用工模式开始替代长期固定的劳动力雇佣模式,劳动者不与雇佣者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的现象在各行业中普遍盛行。同时,劳动者的职业身份也变得不再单一,为了应对自身未来强烈的不确定性,他们选择同时从事几份不同工作的情况屡见不鲜。① 其次,功能上的弹性。一方面,因为工作任务的快速调整与频繁变动,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不再集中,需要随时随地远程办公,工作强度也因工作时间的延长和最晚完成工作任务时间的提前而急剧增加,但他们的工作自主性却在不断降低。② 最后,工资系统的弹性。一方面,先前具有规律性的、可预测的工资因绩效考核制度的引入而变得充满弹性和不可预测性;另一方面,货币工资占劳动者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而非工资性质福利的比重则持续下降。这意味着,劳动者需要同时面对有保障的收入逐渐消失和无法从任何保障性的社会保险中得到援助的困境。③

需要强调的是,以灵活用工为根本特征的"后福特主义"构成了新的社会形态的结构基础。在弗兰克·韦伯斯特(Frank Webster)看来,20世纪70年代以降,信息作为一种无形的物质,在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④ 信息的生产、处理与传递成为生产力与权力的主要来源。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变革了传统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方式,而且还孕育出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卡斯特用"网络社会"这一概念来描述这种新型的社会形态,他指出:"一个以网络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是高度动态的、开放的社会系统。在网络社会中,社会生产关系不再是一种实际的存

① 恩达·布罗菲、德·波伊特:《非物质性劳动、不稳定性和重构》,凯瑟琳·麦克切尔、文森特·莫斯可主编:《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曹晋、罗真、林曦、吴冬妮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220—237页。

② Mosco, Vincent and Catherine McKercher. *The Laboring of Communication: Will Knowledge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8.

③ Standing, Guy. The Precariat: From Denizens to Citizens? *Polity*, 2009(4): 588-608.

④ 弗兰克·韦伯斯特:《信息社会理论》,曹晋、梁静、李哲、曹茂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在，劳动力也由一个集中的实体变为差别极大的个体存在。”[①]也就是说，网络社会催生了一种以知识为生产力，以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为基础的新经济，而社会劳动的差异化、劳动空间和生产工序的分散化，以及企业生产组织方式和工人生产工作方式的灵活化构成了这种新经济的根本特征。

三、众包新闻中的灵活积累研究

（一）研究方法

本章对众包新闻中灵活用工的考察以“世界说”为研究对象，它是财新传媒旗下的一款新媒体产品。该产品最初是财新网和今日头条共同发起的全球资讯分享平台，旨在搭建一个全球化的国际新闻网络，帮助中国用户更熟悉世界，深入了解每个国家。成立至今，该产品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主要面向青年的新媒体产品，运用文字、语音、视频、直播等多样化的报道方式，在手机 APP、微信公众号、微博和知乎等新媒体平台上发布国际资讯。值得关注的是，该产品从创建开始就没有专职记者的参与，而是依靠招募海外新闻专员，组建起覆盖全球，超过 60 个国家 200 个城市的新闻专员网络，通过海外新闻专员与北京总部编辑的协作来共同完成全球资讯和突发新闻的报道。

这项研究基于对在巴西当地参与 2016 年里约奥运会报道的 4 位海外新闻专员的深度访谈（3 位以微信语音的方式、1 位以电子邮件的方式）而完成。每位访谈者就其参与的最有代表性的报道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涉及选题、采访、制作和发布等各个具体的操作环节。与此同时，由于访谈对象数量的有限性，笔者同时以“世界说”在 2016 年 8 月发布的

① Castells, Manuel.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West Sussex, UK: Wiley-Blackwell, 1996.

与里约奥运会主题相关的报道为样本,对 14 篇报道进行了文本分析,这些报道涉及文字、语音、视频、直播等多种类型,并与其他相关网络资料的收集整理相结合。这些方法旨在探究海外新闻专员在新媒体技术的帮助下进行国际新闻生产的实践,并揭示出媒体机构如何通过采用灵活用工策略为其创造核心价值,同时实现资本积累和增殖的过程。

(二) 国际新闻的传统生产方式

在中国,国际新闻的主要来源有国外媒体(外国通讯社和其他外国媒体)、新华社和国内其他媒体。因此,国际新闻的传统生产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途径。首先,国家级主流媒体和部分地方的大报、大台在部分国家设有记者站(聘用驻外记者),国际新闻的生产以自采和编译稿件为主。① 如 2008 年,中央电视台正式组建完成了欧洲、美洲中心记者站。通过对当地重大、突发事件更多的现场报道,不仅增加了中国电视节目对全球受众的吸引力,而且通过建立全天候专用演播室和传输通道,将中央电视台的电视节目辐射到邻近地区,更好地传播中国声音。② 其次,除了国家级主流媒体和部分地方的大报、大台,其他媒体需要使用新华社通稿刊发国际新闻。新华社驻外总分社和分社记者采写的稿件在对内播发时,需要由总社国际部、联合国分社欧美编辑部中文编辑室处理;国外采写的体育新闻由体育部处理,少部分稿件由具有发稿权的驻外总分社、编辑部直接编发;国外采集的图片新闻由摄影部处理。③ 最后,一部分媒体通过派出空降记者的方式进行跨国报道,以生产差异化的国际新闻来应对行业内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与驻外记者不同,空降记者是指:在国际重要新闻事件采访中,媒体临时抽调国内记者“空降”事发地

① 唐佳梅:《中国空降记者的国际新闻生产问题及其解决路径》,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论文,2015 年。

② 张欣:《国际电视媒体海外中心记者站运行模式初探》,《中国电视》2008 年第 11 期。

③ 新华通讯社:《新华社通稿的采编发流程》,《中国记者》2002 年第 9 期。

从事新闻记录或报道的人员。如2014年3月，马来西亚MH370航班失联成为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中国记者纷纷赶赴事件所涉的越南、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国进行报道。①

毋庸置疑，“世界说”在国际新闻生产方式方面与上述三种国际新闻的传统生产方式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它建立在招募海外新闻专员基础之上，带有明显的灵活积累特征，不采用全职雇佣的驻外记者或空降记者，而是将采访任务分包给不确定的、临时的，与用工单位不具有劳动关系（甚至是劳务关系）的个体，但他们承担的却是相同的工作。因此，本章对海外新闻专员的研究聚焦于他们的招募渠道与人员构成、选题策划内容及其过程、工作强度与劳动时间，以及物质与非物质回报等不同面向。

（三）海外新闻专员的招募渠道与人员构成

研究分析财新传媒发布的全球资讯，可以将其报道来源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占绝大多数的海外新闻专员供稿，第二类是由位于北京财新总部的专业编辑团队制作的总结、分析和评论类稿件，第三类是较为少见的读者供稿。无论从稿件的数量、质量还是阅读数来看，海外新闻专员的供稿无疑是财新传媒新媒体产品的核心，而如何组建并维护一个覆盖全球的、庞大的海外新闻专员网络是本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

就招募渠道而言，海外新闻专员主要来自以下三种途径。首先，来自海外华人网络社区和自媒体。在“世界说”的筹备阶段，其创始团队成员在众多海外华人网络社区投放了财新海外新闻专员的招募帖，如豆瓣网的海外小组、华人和留学生论坛等海外中国人聚集的网络社区。除此之外，创始团队成员还会主动接触以发布当地资讯为主要任务的海外自媒体人员。其次，来自现实社会中的熟人网络。“世界说”的主编在一次网络访谈中提到，一开始团队招募海外新闻专员，多半是通过朋友介绍。

① 唐佳梅：《在异国他乡的新闻现场》，《新闻记者》2016年第3期。

而参与本研究的所有受访者均表示，当初他们加入的契机，也都是经朋友介绍后直接与编辑团队取得联系，在此之前并没有特别关注过“世界说”这一新媒体产品。最后，来自读者应征投稿。“世界说”也会定期通过自己的新媒体平台，如微信公众号、知乎账号等发布海外新闻专员的招募消息。其网站和微信平台也长期开放投稿入口，随时吸纳新的海外新闻专员以壮大团队。

就人员构成而言，“世界说”将海外新闻专员的目标群体锁定为当地留学生和在当地居住的、有表达欲望的华人群体，而非专业记者。直接参与里约奥运会报道的海外新闻专员，有在巴西的留学生、有在当地工作的中文教师，还有奥运会期间前往里约的志愿者。虽然没有明确的标准，但“世界说”的海外新闻专员均具备以下特征：在海外生活，对所在国的语言和文化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关注国际时事政治；对写作、拍摄有浓厚的兴趣；拥有分享自己观点和想法的强烈欲望。这些特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海外新闻专员在第一时间内发回“最新鲜、最真实”的独家消息、完成报道任务，同时降低新闻众包活动中常见的高失败率。

（四）海外新闻专员的选题策划内容及其过程

据统计，“世界说”共发表 14 篇与里约奥运会主题相关的报道。除去编辑撰稿和读者供稿外，身处巴西的海外新闻专员共完成其中的 9 篇稿件。具体包括 1 篇探访里约贫民窟的直播报道，1 篇采访巴西人民对奥运会看法的视频报道，1 篇奥运会志愿者的语音播报，1 篇采访巴西籍中国女乒运动员视频与文字相结合的深度报道，其他文字稿件主要涉及在里约生活、巴西健身行业等相关话题。

由于海外新闻专员大多既缺乏新闻从业经验，又无法保证时间上的投入，北京的专业编辑团队控制着报道的选题策划过程。一位受访者表示，自己上报的选题内容、采访提纲都与编辑的视角有很大的不同，讨论后最终的结果绝大多数都以编辑的想法为准。此外，因海外新闻专员加

入时间与个人背景的不同，他们报道的选题策划过程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在受访者中，有一位海外新闻专员在奥运会之前就长期为“世界说”供稿，奥运会期间主要负责女乒运动员的选题。据她介绍，奥运会选题的策划大约是提前半年开始的。海外新闻专员和编辑分别列出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再通过微信讨论执行的可能性。其他海外新闻专员均是在奥运会开始前不久加入报道团队，由编辑提前 2—3 周在微信上与他们进行个人沟通、探讨选题。在确定报道主题和形式后，再根据需要将他们拉入不同的项目微信群，如直播群、运动员专题群进行后续沟通。如果是单人负责的文字稿件，则由海外新闻专员和编辑直接联系。

（五）海外新闻专员的工作强度与劳动时间

在工作强度与劳动时间的投入方面，海外新闻专员也因个人条件、任务分配不同而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一般来说，深度的新闻类稿件会花费海外新闻专员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内容偏向见闻、体验、感受类的稿件，操作起来较为便易。有受访者表示，在完成里约贫民窟主题的报道过程中，他们前期会投入很多精力查阅相关资料和反复修改采访提纲。对有些受访者来说，在奥运会期间，他们白天的志愿者工作的强度比预期的要大，晚上还要兼职写稿，因此这份工作并不轻松。另一位负责采访女乒运动员的新闻专员表示，选题从确定到完成前后共持续两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她曾花费大量时间在巴西当地寻找可供租赁的拍摄器材，同时接受线上简单的摄影培训，独自一人完成了拍摄、采访和写稿的所有工作。而对参与语音和直播报道的海外新闻专员来说，他们投入的时间和精力相对少很多。

（六）海外新闻专员的物质与非物质回报

在物质回报方面，根据最终发表稿件的数量和形式，海外新闻专员能够得到一定数额的薪酬，但这并没有十分明确的标准。海外新闻专员

也不会事先签订劳动合同性质（或劳务合同性质）的文件，而只是和编辑在微信上进行口头协商。有受访者表示，编辑全程没有谈论过薪酬的问题，最终也因为自己较少参与而没有计较薪酬。还有受访者表示，自己最终得到的薪酬比心理预期的要低，但他们认为参与奥运会报道的经历与体验比薪酬重要得多。

在非物质回报方面，奥运会前新加入的海外新闻专员均表示这是一段有意义的体验，为自己的奥运会经历增添了有趣的回忆，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而署名稿件的发表也给自己带来了一定的满足感和成就感。之前长期参与“世界说”国际新闻生产的受访者则把参与奥运会报道定位在兴趣与工作之间，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接受业内人士的专业指导、学习专业的媒体知识和新闻操作流程，并有机会参与财新智库等其他项目的筹划工作都非常有意义。更重要的是，这份兼职工作为海外新闻专员的异乡生活带来一种团队的归属感，有益于他们排遣海外生活的孤独。此外，“世界说”的海外新闻专员系统主要是通过大大小小的微信群的形式组织起来的，因此，加入到这样一个虚拟的网络社区，海外新闻专员不仅可以第一时间获取全球新闻资讯，而且还可以作为全球华人社区的一分子和其他优秀、有趣的青年一同成长。

四、小结与展望

后福特主义时期的灵活积累策略为企业节省运营成本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在此策略下，许多企业开始裁员，只留下一组核心的长期雇佣的员工，用外围的临时劳工增加企业的弹性，降低企业的人力资源成本。[①] 以财新传媒旗下的“世界说”为例，这种策略表现为一种“准灵活用工”实践，它将原本由雇佣劳动完成的任务转移给劳动关系之外的非特定人群

① 弗兰克·韦伯斯特：《信息社会理论》，曹晋、梁静、李哲、曹茂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或用户来完成，不但重构了传统新闻生产过程中媒介的组织结构，而且重新定义了专业记者和编辑的核心能力与角色。具体来说，位于北京的专业编辑团队是被全职雇佣的、稳定的核心员工，而兼职的海外新闻专员取代了专业记者，成为外围的“临时劳工”。在这样的组织结构中，媒体机构规避了培育驻外记者、建立和维护记者站等高昂的成本；另外，确定选题、联系采访等新闻记者专业工作的一部分被转嫁到了专业编辑团队的身上。编辑也因此从一个纯文字工作者转变为产品运营者，在面对海外新闻专员的不稳定性和非专业性时，他们的协调和管理能力就显得格外重要，这种实践反过来加重了编辑劳动的繁重性。但由于双方之间并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也没有固定的、制度化的报酬支付机制，加之目前这种模式尚未获得国家、机构层面的认可和法律保护，因此能否称为一种“制度”尚且存疑，故在此将新闻的众包生产视为一种“准灵活用工”实践。

在本研究中，灵活用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世界说”新闻报道的种类和质量。首先，海外新闻专员在专业编辑团队的全程操控和指导下，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新闻内容的真实性，不会像用户自主发布的消息那样难以进行核实，但是非专业的兼职记者很难完成有深度的新闻报道，因此其新闻报道的种类存在局限性。以“世界说”里约奥运会报道的样本来说，涉及大量采访工作并最终完成的深度的“新闻类”稿件只有 2 篇，其余均是侧重新奇感和特色文化的“体验类”稿件。报道的浅尝辄止，一方面是青年受众口味导向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灵活用工策略下海外新闻专员新闻素质和专业技能欠缺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其次，与专业记者不同，海外新闻专员不稳定的工作模式无法保证高质量作品的产出，他们在实际工作中会遇到很多问题。例如，一位受访者表示，为了在里约机场进行一次直播报道，他在前期投入很多时间筹备，并进行了两次直播测试，但最终因场地信号不佳而无法完成报道，不得不改为一条志愿者自述的语音播报，最终的效果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大

打折扣。而一些新闻类稿件，如采访奥运会难民代表队、里约的特色音乐表演等，都因缺乏足够的线索和得不到采访条件的保障而不得不被放弃。除此之外，海外新闻专员更多地将新闻报道的生产视为一次以兴趣为主的体验活动。面对完全依赖灵活用工策略组建的海外新闻专员群体，专业的编辑团队很难保证他们进行长期的、稳定的、高质量的新闻生产。由此，新闻业中灵活用工所带来的内容质量问题日益凸显。

国际新闻作为一个选题范围特别丰富，采编操作却很困难的领域，媒体机构纷纷通过新媒体技术和灵活用工策略将世界各地的华人组织起来，将他们转变为有价值的信源和新闻劳动生产力，这已成为一种普遍的实践。海外新闻专员不仅熟悉当地的语言文化和有着丰富的背景知识，而且还能第一时间到达新闻现场，因此他们有能力提供更新鲜、更有趣的新闻视角。对于大部分海外新闻专员来说，新闻劳动被刻画成一种满足好奇心和表达欲的新奇体验，从而被神秘化为一种创造力的表达，这种劳动抛弃了 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期工厂或办公室工作中异化的、公私分离的特征。[①] 但是，这些被灵活用工束缚和吸纳的知识劳工看似是摆脱传统大规模生产的“自由劳动者”，但我们不能忽略这样的一个事实，即平台的提供者实际上控制了市场和接触市场的渠道，劳动者的成果最终被资本攫取用来创造和积累价值。这种新型的灵活用工实质是一种外包体系，只不过资本不再以大工厂的生产方式持续增殖，而是将个人视为免费的自由劳动力。这种剥削改变了劳资关系，令其更加隐蔽。在本研究中，海外新闻专员自愿将自己的语言技能、兴趣热情投入到新闻生产的劳动中。虽然劳动对被雇佣者而言不再是谋生的手段，但却为雇佣机构创造了核心价值和实现了资本的积累，成为这些机构进行内容生产、商业品牌延续和广告利益交换的筹码。

---

① 惠·卡普尔：《“新”经济/传统劳工：创造力、扁平性及其他新自由主义的迷思》，凯瑟琳·麦克切尔、文森特·莫斯可主编：《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曹晋、罗真、林曦、吴冬妮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年，第 204—219 页。

从本质上来说，新闻众包是一种将集体智慧与新媒体信息技术有效结合，用于新闻生产的日常实践，是众智新闻（crowdwisdom journalism）的一种表现形式。[①] 那么，它与公民新闻（civic journalism）、建设性新闻（constructive journalism）存在着怎样的联系与区别呢？它又将对专业的新闻记者在新闻知识生产过程中的职业判断与身份认同提出哪些挑战？一个更为激进的问题是：在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完善，自动化新闻的出现将会对国际新闻的生产方式，乃至更为宏观层面的新闻生产方式带来哪些根本性的变化？这些问题值得相关研究者进一步探索与思考。

① 唐佳梅：《从众包新闻到众智新闻：国际报道的新闻创新及其发展》，《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 年第 2 期。

第七章　自动化新闻、数字劳动与技能变迁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以一种无处不在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自动化新闻就是这一技术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具体应用。与新闻记者相比，自动化新闻在数据采集和处理、新闻生产速度和总量、降低新闻生产成本、预测新闻事件的发展趋势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受到越来越多新闻机构的青睐，被广泛应用于新闻生产的实践活动中，进而引发了新闻业深层次的变革。①

所谓自动化新闻，是指一种建立在算法、人工智能程序平台以及自然语言衍生技术基础上的新型新闻生产模式。② 它通过采集各种类型和题材的海量化数据，从中寻找关联性，生成符合不同素材的新闻模式与规则，以此来进行新闻稿件的创作。③ 因此，在自动化新闻的生产过程中，很少甚至不需要进行人工干预。这种基于自动化技术的新闻生产方

① 孟晖：《人工智能技术重塑新闻生产的进路与问题》，《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0 年第 7 期。

② 匡文波：《记者会被机器人取代吗》，《新闻与写作》2017 年第 9 期。

③ 据此，史安斌和龙亦丹将自动化新闻定义为：利用特定的语言程序，对所搜集的数据进行模式化的加工，将目标数据文本“嵌入”已有的模版，进而生成一套精密完整的计算机程序，用于新闻报道的“文本再生产”。参见史安斌、龙亦丹：《新闻机器人溯源、现状与前景》，《青年记者》2016 年第 22 期。

式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精确新闻学。精确新闻学强调信息处理技术是新闻客观性、科学方法和科学理想的重要保障，而自动化新闻则是这一理念在当前新闻生产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和最新发展。①

2006年3月，跨国商业数据供应商汤姆森金融公司（Thomson Financial）使用计算机程序对大量财经数据进行快速加工、处理与整合，生成完整的经济和金融类新闻报道，这成了全球最早的自动化新闻实践。2010年5月，美国科技创新公司叙事科学（Narrative Science）研发出了一款名为“鹅毛笔”（Quill）的自动化新闻撰写工具（又称“写稿机器人”）。之后，《洛杉矶时报》最早将这一技术引入实际的新闻生产中，成为自动化新闻发展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随着自动化新闻实践的日常化与普遍化，涌现出了一大批与自动化新闻生产密切相关且实用性很强的应用系统，如美国《纽约时报》的Blossomblot新闻筛选与推送系统、《洛杉矶时报》的Quakebot地震新闻生成系统、《华盛顿邮报》的Heliograf实时体育赛事新闻生成系统、英国路透社的Lynx Insights数据挖掘与分析系统、英国新闻联合社（Press Association）的Radar社区新闻生成系统、俄罗斯Yandex公司研发的Meteum气象预测系统，等等。截至2018年初，欧美几乎所有主流新闻机构都已经搭建起一定程度的自动化新闻生产平台，自动化新闻报道的数量呈现遍地开花式增长的态势。②

中国自动化新闻的研发与使用起步较晚，但从2015年9月中国首

---

① 这里需要厘清精确新闻、数据（驱动）新闻与自动化新闻三个概念之间的异同。沈浩和元方认为，这三种新闻类型都是以数据为导向的新闻生产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精确新闻强调科学的方法与客观性；数据（驱动）新闻强调用数字的结构化或非结构化的原始资料来调查与解释事实，因此处理数据成为新闻生产中最核心的部分；自动化新闻则是算法、大数据与知识的结合，强调通过使用计算方法来创造新闻价值，并体现在信息收集与组织、新闻传播与展现，以及公众反馈等各个环节。参见沈浩、元方：《“大数据时代”的自动化新闻写作的历史、实践与未来》，《新闻爱好者》2017年第4期。

② Ghuman, Ramandeep and Ripmi Kumari. Narrative Science: A Re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2013(9): 205－207.

篇由写稿机器人创作的新闻稿件《8月CPI同比上涨2.0%创12个月新高》发布以来,自动化新闻发展迅猛,尤其是在财经、体育、自然灾害、健康、气象等领域。其中颇具代表性的写稿机器人有:腾讯的"梦幻写手"(2015年9月上线)、新华社的"快笔小新"(2015年11月上线)、光明网的"光明机器人"(2016年4月上线)、阿里巴巴集团与第一财经合作研发的"DT稿王"(2016年5月上线)、今日头条的"张小明"(2016年8月上线)、百度的"写作机器人"(2016年12月上线)、《南方都市报》的"小南"(2017年1月上线)、封面新闻的"小封"(2017年11月上线),等等。① 不少学者认为,与欧美国家大型新闻机构中使用较为成熟的写稿机器人相比,自动化新闻在中国的发展还处在相对初级阶段,但同时,技术的快速更迭与应用场景的多元化为本土自动化新闻的发展提供了十分广阔的成长空间,使其接近世界前沿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②

在全球范围内,经过十多年的探索与完善,自动化新闻在整个新闻报道中的比重持续增大,稿件质量稳步提升,报道领域愈发丰富,报道内容日益个性化,不断满足人们对于新闻报道多元化的需求。这引发了国内外一大批学者对自动化新闻发展的关切与思考,相关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研究从自动化新闻工作模式与特征、新闻生产流程的优化、传统新闻传播思维的变革、新闻业未来的技术融合等多样化的视角切入,展现了自动化新闻作为加速传媒产业发展愈发重要的推动力量,极大提升了新闻生产与传播各环节的效率,全面推动了传统新闻业的创新。此外,自动化新闻更是作为一股不可小觑的变革力量,在改造新闻生产和传播的全流程、颠覆已有新闻业的组织架构、重塑新闻业的面貌等不同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③ 如喻国明所言,自动化新闻带给

① 郑春风:《自动化新闻的实践、影响与困境》,《青年记者》2018年第28期。

② 彭增军:《巧夺人工?人工智能与新闻自动化》,《新闻记者》2020年第1期。

③ Lewis, Seth and Nikki Usher. Open Source and Journalism: Toward New Frameworks for Imagining News Innovation.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013(5): 602-619.

传媒产业的是“全方位、全环节”的变革，是对行业格局和业务操作流程、新闻理念乃至传媒生态的系统性再造。①

一、自动化新闻、新闻生产与数字劳动

在审视自动化新闻对传媒生态的系统性再造方面，既有文献主要集中于传媒生态四大要素的再造，即新闻编辑室、新闻记者、用户和媒介产品。② 在这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以自动化新闻为代表的媒介技术如何重构新闻劳动(journalistic labour)的过程，特别是在自动化新闻背景下，新闻记者所面临的困境及其有效的应对之道。③ 与聚焦工作

① 喻国明：《“机器新闻写作”带动传媒新变局》，《新闻采编》2015 年第 6 期。

② Örnebring, Henrik, Karlsson, Michael and Karin Fast. The Labor of Journalism: Challenges of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Restructuring. Digital Disruptions to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Conference, Missouri University Brussels Office, Brussels, Belgium, October 2 - 3, 2014.

③ 不少学者长期关注自动化新闻生产中的人机关系问题，提出了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写稿机器人是新闻生产的主体，强调自动化新闻的技术逻辑。在相关学者看来，自动化新闻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写稿机器人代替新闻记者进行新闻生产的实践，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新闻生产的全自动化，因此写稿机器人在自动化新闻生产中具有主体地位。这种观点随着 2017 年 10 月沙特赋予人工智能机器人“索菲亚”以公民身份，以及同年 11 月日本赋予人工智能“涩谷”以未来城市居住权，而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接纳。许多学者强调，写稿机器人在数据采集和处理、新闻生产速度和总量、新闻报道范围和质量、降低新闻生产成本、预测新闻事件的发展趋势等诸多方面具有新闻记者所不可比拟的优势，因此能够帮助新闻机构有效突破其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瓶颈，这进一步巩固了写稿机器人在自动化新闻生产中的主体地位。

希瑟·福特(Heather Ford)和乔纳森·哈钦森(Jonathon Hutchinson)是第二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他们认为，写稿机器人只是新闻记者和用户之间发生联系的中介，它的出现实际上是解放而不是支配新闻记者，而新闻记者才是新闻生产活动的主体。原因有二：其一，新闻记者是写稿机器人的适用者与使用者，具有很强的能动性；其二，写稿机器人抓取的任何信息都是人为创造的产物。有学者更是将“写稿机器人的主体化”视为浪漫主义的“迷思”，并认为写稿机器人只是新闻记者身体的延伸，是一种帮助新闻记者获得更强的信息获取能力与判断能力的工具，所以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替代新闻记者成为新闻生产的主体。进一步来说，一方面从写稿机器人的视角出发，它受制于现阶段自身的某些不足与缺陷，无法在自动化新闻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例如，当前写稿机器人的思辨能力与情感表达能力远不及新闻记者，因此它生成的新闻产品在内容上更多的是客观描述或叙述，局限于新闻消息、资讯和快讯等少量体裁，鲜有新闻评论、社论、新闻特写，且语言也相对枯燥；另一方(转下页)

实践和常规的新闻工作(journalistic work)不同,新闻劳动更多涉及新闻从业者的工资水平、职业安全、管理控制、工作场所中的冲突等问

(接上页)面从新闻记者的视角出发,他们一般都具备丰富、扎实的专业知识,较强的问题解决能力、新闻敏感度和社会责任感,这些独特的能力和品质是自动化新闻的选题愈加丰富、语言更具特色、内容愈发个性化和多元化的必要条件与重要保障。故而,新闻记者在自动化新闻生产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是新闻机构的核心战略资源。受此认识论的影响,不少学者主张,在自动化新闻生产中,关注新闻记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极具现实意义与价值。相关研究的议题也颇为丰富,包括新闻记者的职业身份认同、劳动过程和劳动同意的制造、工作态度与满意度,以及他们在自动化新闻生产中的主观感受等。

虽然上述两种观点强调写稿机器人和新闻记者在自动化新闻生产中不同的主体地位,但两者都将机器与人置于不可调和的张力之中。部分学者尝试打破这种以技术或人为中心的二元对立假设,反对将人机关系简单地界定为"有你没我"的竞争关系或替代关系,致力于探索不同的研究立场与路径,对人机关系展开新的想象。在他们看来,技术对劳动者的操纵与控制以及劳动者对技术的认知、习得和互动是一体两面的,且两者同时发生,因此自动化新闻生产的主体由写稿机器人和新闻记者共同构成,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机是共存的。

从人机共存这一研究立场与路径出发,马修·韦伯(Matthew Weber)和艾莉·考斯特里奇(Allie Kosterich)发现,写稿机器人和新闻记者的共存关系呈现"互补型"的特征。两位学者强调,随着写稿机器人在新闻生产中的普及,新闻记者可以从枯燥且耗时巨大的常规工作中解放出来,尤其是在数据采集与处理方面,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个性化特色的内容创作上,以及调查性报道与解释性新闻等"硬核"新闻信息的生产上,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性与想象力,这将有益于他们更好地完成报道任务,同时提升报道的质量。新闻记者的工作也随之趋向智力密集型和科技密集型。这种"人机互补"的实践在全球范围内已十分普遍。

根据阿尔扬·范·达伦(Arjen van Dalen)等学者的观点,写稿机器人和新闻记者的共存关系更偏向为一种"融合型"的关系,而不是"互补型"的关系。随着人工智能与新闻生产和传播全流程的耦合,写稿机器人和新闻记者在组织和业务上深度融合,形成一种新型的协同机制,"人机联姻"概念应运而生。与人机互补不同的是,人机融合或人机联姻更强调写稿机器人和新闻记者在自动化新闻生产中"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工作场景。人机联姻强调的是写稿机器人和新闻记者通过分工与协作,共同完成数据采集和处理、新闻价值判断、事件描述与分析、语言润色等一系列新闻生产工作,甚至人机联姻生成的新闻产品也是一种高质量的"复合型新闻产品"。因此,与人机互补相比,在人机联姻中,媒体从业者和科技基因之间的相互渗透、死劳动与活劳动之间的彼此交融,以及机器和人之间的协同共生更为全面和彻底。参见姚建华:《自动化新闻生产中的人机联姻及其实现路径》,《当代传播》2021 年第 1 期;喻国明:《"机器新闻写作"时代传媒发展的新变局》,《中国报业》2015 年第 23 期;Ford, Heather and Jonathon Hutchinson. Newsbots that Mediate Journalistic and Audience Relationships. *Digital Journalism*, 2019(8): 1013 - 1031; van Dalen, Arjen. The Algorithms Behind the Headlines: How Machine-Written News Redefines the Core Skills of Human Journalism. *Journalism Practice*, 2012(5 - 6): 648 - 658; Weber, Matthew and Allie Kosterich. Coding the News: The Role of Computer Code in Filtering and Distributing News. *Digital Journalism*, 2018(3): 310 - 329。

题。[①] 这些问题既与新闻从业者的劳动过程、雇佣状况、职业满意度等劳动社会学研究的经典议题高度关联，又与新闻从业者自身的生存与未来的职业发展这两个他们最为关心的现实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

毫无疑问，将自动化新闻引入新闻生产过程中，首先受到冲击的便是新闻记者及其劳动。如前所述，自动化新闻具有一系列新闻记者所不可比拟的优势，不断挤压着传统新闻生产方式的市场空间，对新闻记者在新闻生产中的主体地位造成了巨大的挑战，甚至对其就业前景构成了严重的威胁。[②] 美国叙事科学公司创始人之一，同时也是自动化新闻领域的领导者克里斯蒂安·哈蒙德（Kristian Hammond）曾大胆预测：到2025年，全球90%的新闻将由写稿机器人撰写完成，这也就意味着新闻记者作为一种职业正处于消亡的边缘。[③] 在此情境下，关注和研究自动化新闻对新闻劳动（尤其是新闻记者）的重构作用以及后者的应对之策既必要又紧迫。

马特·卡尔森（Matt Carlson）指出，数字技术和ICTs是重塑新闻劳动的重要力量，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即新闻从业者必须掌握的专业技能、工作场所的组织架构与制度安排，以及新闻生产中的劳资关系。[④] 一方面，随着自动化新闻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快速崛起，其必然导

---

① 白红义：《当新闻业遇上人工智能：一个“劳动—知识—权威”的分析框架》，《中国出版》2018年第19期。

② 除此之外，在斯蒂芬·霍尔（Stefan Hall）看来，自动化新闻的局限性还表现在：应用领域局限，主要集中于财经报道、体育赛事和突发事件等高数据密度、高信息透明度、低语境的新闻报道，且新闻产品主要是标准化程度较高的信息、快讯等新闻体裁；语言比较枯燥、内容上更多的是客观的叙述，缺乏深度的分析；新闻质量高度依赖数据库的大小和数据的质量；等等。参见 Hall, Stefan. Can You Tell If This Was Written by a Robot? 7 Challenges for AI in Journalism. World Economic Forum, January 15, 2018.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8/01/can-you-tell-if-this-article-was-written-by-a-robot-7-challenges-for-ai-in-journalism/.

③ 姚建华、徐偲骕：《新“卢德运动”会出现吗？——人工智能与工作/后工作世界的未来》，《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

④ Carlson, Matt. Automating Judgment? Algorithmic Judgment, News Knowledge, and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New Media & Society*, 2018(5): 1755-1772.

致新闻生产过程中机器(或技术)与新闻记者之间劳动分工的变化,这既改变了新闻记者的工作内容与职业领域,又对他们必要的专业技能提出了新的要求,加速了他们技能变迁的过程;另一方面,新闻记者的技能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包括岗位设计、人才结构、管理方式在内的工作场所中的组织架构与制度安排,进而影响劳资之间的力量对比,成为决定新闻生产中劳资关系的核心变量。因此,对劳动者技能变迁日益丰富与深入的认知成了透析自动化新闻背景下新闻劳动重构过程的关键所在。更为重要的是,在自动化新闻的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并不是被技术操控的对象物,而是不断培养或习得新的专业技能,并与技术进行互动的主体。换言之,新闻劳动具有很强的能动性,这也是对在自动化新闻人机关系的探讨中部分学者所持有的"技术决定论"的批判与反思,后者仅仅关注写稿机器人的"技术逻辑"而忽视了新闻记者的主体性与自主性。①

基于此,本章提出以下研究问题:随着自动化新闻在新闻实践中的广泛应用,新闻记者的专业技能是否发生了改变?以及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具体包括:其一,新闻记者哪些专业技能的重要性在日益下降?这主要涉及新闻劳动的去技能化问题;其二,新闻记者需要培养或习得哪些新的专业技能?这与新闻劳动的再技能化问题高度相关;其三,在未来,新闻记者又需要掌握怎样的专业技能,并将呈现哪些显著的特征?概言之,本章将以劳动分工与劳动过程理论为分析框架,从微观层面切入,考察技能化嵌入新闻记者日常实践的动态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自动化新闻中的人机关系,进而省思在更为广义的层面,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媒介技术与新闻劳动之间的二元张力。

① Ford, Heather and Jonathon Hutchinson. Newsbots that Mediate Journalistic and Audience Relationships. *Digital Journalism*, 2019(8): 1013 - 1031.

二、研究方法与案例介绍

为了更好地探究自动化新闻背景下新闻记者的技能变迁过程，本章采用案例研究与半结构化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上海最具全球影响力的新型数字化财经媒体机构 A 和广州某大型报业传媒集团 B 为案例研究对象。研究者在 2018 年 4 月至 2019 年 5 月，陆续对上述两家媒体机构从事与自动化新闻相关的新闻记者进行了多次半结构化访谈（面对面访谈或微信访谈），包括 4 名 A 机构的新闻记者和 3 名 B 机构的新闻记者。访谈的主要内容包括：新闻记者的日常工作状态，尤其是在工作中与写稿机器人的关系；工作中常用的专业技能；对当前自动化新闻发展现状的评价与展望；对自身职业未来的评估与期待；等等。出于保护受访者个人隐私的目的，研究者对他们进行了匿名化处理。此外，这两家媒体机构的管理者、自动化新闻团队负责人、新闻记者以及技术专家（主要为算法工程师）发表的文章、公开的演讲和接受的访谈也是本研究重要的资料来源。

A 机构成立于 2003 年 7 月，旗下包括电视、日报、周刊、新媒体（含网站、客户端和社交媒体矩阵）等多种媒体，并拥有独立的商业数据中心、研究院和英文互联网媒体。它也是国内创办最早、实力最强、规模最大的财经全媒体集团。随着现代社会信息量的指数级爆发，如何实时监控多样化的信息源并及时捕捉和报道其瞬时变化，如何全面报道与发布批量化的、同质的新闻信息，如何挖掘有价值的信息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对现有的，即靠新闻记者刷屏获取信息并进行内容生产的新闻生产方式构成了巨大的冲击。在新闻编辑室内，新闻记者往往陷入从事大量专业技能低、重复性高和常规化劳动的泥淖，缺乏时间和精力上的保障来进行深度分析报道，同时错失了为读者提供更好决策依据的可能，这些问题或困境也成为制约新闻记者和媒体机构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所在。在

此背景下,2015 年 6 月,国内知名电子商务集团 C 对 A 机构进行战略投资,2016 年 5 月,由双方联合创办的媒体实验室推出了一款财经新闻类写稿机器人。这款写稿机器人能够利用文本解析与信息抽取技术实现信息的实时和自动抽取,在海量、高速、多样、真伪难辨的信息环境下,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帮助财经记者挖掘高价值的信息,第一时间生成阅读性较强的新闻稿件,大幅提升新闻生产的效率,用技术的力量不断推进媒体的变革。①

在 B 机构,自 2017 年 1 月由写稿机器人创作和发布第一篇新闻稿件以来,机器人累计写稿已经超过 10 万篇,涵盖财经、体育、健康、消费、科技等多个领域,是名副其实的"全能写稿王"。2018 年底,该写稿机器人全面升级为"智能信息管家",被接入聊天机器人语料库、语音查询功能、个性化推荐、定制化写作等多种交互渠道之中,打通了信息采集、生产与传播的各个环节,充分发挥出自身的平台优势与内容的"长尾优势"。2020 年 1 月,面向上市公司的自动化新闻写作平台正式上线,它通过自动采集深交所、上交所上市公司的基本资料和公告、银监会公告及股市行情中的动态数据,利用信息抽取、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提取关键信息,融合企业知识图谱,为企业生成了大量与其人事变动、公司违规、财报解读相关的新闻信息。

三、技能变迁:由去技能化向再技能化的转型

在检视自动化新闻与新闻记者技能变迁的动态关系之前,我们必须厘清一个重要的问题:当下新闻记者需要掌握哪些专业技能呢?这是探究自动化新闻背景下新闻劳动去技能化和再技能化的前提与基础。在

① 概括来说,该款写稿机器人在写稿方面具有"多、快、好"的特点。所谓"多",是指它主要针对上市公司公告、财务报表、证券行情等信息源,日阅读字数可达 3000 万;所谓"快",是指它的写稿速度可以达到 28 字/秒,是普通人打字速度的 35 倍;所谓"好",是指它生成的稿件语句流利通顺,完全符合人类自然语言的语法。

与两家媒体机构新闻记者的访谈中，受访者小顾和小吴分别说道：

> 在我看来，选题能力、采访能力和写作能力应该是记者最核心的专业技能……所以具有某一领域的专业知识，而且能够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就很重要，因为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会涉及很多来自西方媒体的财经报道和信息……随着新媒体技术的活力不断被激发，现在的记者还需要掌握大量数字化技能，比如说信息可视化能力、数据统计与分析能力、计算机编程能力，以及对关键数据和信息的核查能力。（小顾，A 机构）
>
> 我觉得对于记者来说，价值判断和与用户的互动能力是最关键的……一方面，我会在写稿子的时候，不断发掘普通人的故事，尽量使自己的报道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读者的需求和兴趣，这变得越来越重要……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不停地思考怎么将新闻信息以一种更为直接和好懂的方式呈现给读者……我们会通过社交媒体与读者互动，因此八面玲珑的人际沟通能力与敏捷灵活的反应能力也成为我们作为记者必备的基本能力。（小吴，B 机构）

经过比对，两位受访者所谈及的新闻记者必备的专业技能，与《2014—2015 年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认证》（*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s Accreditation 2014 - 2015*）报告中提出的获得新闻记者职业认证所必备的专业技能基本相同。[①] 在中国，2004 年 8 月正式实施的《广播电视编辑记者、播音员主持人资格管理暂行规定》对新闻记者

① 该报告由美国教育界最具权威性的认证机构——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认证委员会（The Accrediting Council on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s，ACEJMC）于 2014 年发布。同时，ACEJMC 也是美国新闻传播教育最高水平的权威认证体系的建构者，该体系几乎覆盖了美国所有主流新闻院校。该报告明确提出和规定了新闻记者职业认证所必备的专业技能和核心价值。参见 Accrediting Council on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s.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s Accreditation 2014 - 2015*, Lawrence, KA: ACEJMC/University of Kansas, 2014.

“努力钻研业务、更新知识、不断提高政策理论水平和专业技能”做出了相应的要求。部分学者从新闻采编能力、信息分析和整合能力、价值判断能力、与用户的互动能力等维度出发,对此规定中涉及的新闻记者的专业技能进行了全方位和专业化的解读和阐释。这些专业技能与《2014—2015年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认证》报告中的规定和访谈中的发现大致相仿。①

(一)自动化新闻与新闻劳动的去技能化

在既有研究中,去技能化是分析和阐述技术和劳动之间动态关系的核心概念。所谓去技能化或劳动降格,是指劳动者的专业技能被自动化技术替代,或他们的工作被“降格”为“无需繁复思考或特殊技巧的低技能工作”。② 通过访谈发现:在自动化新闻的生产过程中,大量专业技能低、重复性高和常规化的任务已经转由写稿机器人负责。这些任务主要集中在数据采集和处理、线索识别、信息核查等方面,具体包括:获取有关新闻事件的基本事实和翔实的背景材料、对相关数据和信息进行精细化切割与结构化处理、对关键数据和信息进行快速提取与精准匹配、快速识别新闻线索,以及对新闻中的事实性陈述进行自动化核查,等等。一方面,写稿机器人因其在计算精准度和生产效率方面的绝对优势,成为这些任务快速且高效的执行者;另一方面,新闻记者所掌握的与此相关的技能不断面临着去技能化的威胁。

> 有了写稿机器人,我们就能从专业技能低、重复性高和常规化的任务中解放出来了……现在写稿机器人可以独立完成我们频道每日午盘和收市、股价异动的资讯或快讯。这类资讯或快讯通常不

① 周葆华、查建琨:《网络新闻从业者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新闻与写作》2017年第3期。

② 王星:《技术的政治经济学:基于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的思考》,《社会》2011年第1期,第201页。

首先,持续对传统的专业技能进行迭代,主要包括选题能力和信息核查能力。其一,在选题能力的迭代方面,写稿机器人通过运用大数据发现新闻线索,以满足最大多数用户的兴趣为其选题标准。但这种选题标准容易导致传播过程中的信息窄化,使用户深陷"信息茧房"的困境,甚至引发群体极化现象。尼尔·瑟曼(Neil Thurman)认为,新闻记者不能仅仅通过算法和用户反馈追踪技术所获得的大量用户需求信息来作为其选题的依据,而是应该发挥其敏锐的新闻触角,从庞大的数据和信息中迅速而准确地发现极具新闻价值的选题,从而体现出新闻记者对社会现实深切的关怀和对公众强烈的感召力。① 其二,在信息核查能力的迭代方面,自动化新闻可以从数据来源、内容细节、时间轴等不同方面对新闻事件进行多角度与反复的对比,实现"互相核对、互相补充、互相延伸、互相纠错"的"无影灯效应"——让事实真相越辨越明,让虚假信息无处容身,达到对新闻信息"去伪存真"的目的。② 但当相关的数据和信息与政策、伦理、法律等问题密不可分的时候,新闻记者的信息核查就变得不可或缺,尤其是对关键信息的核查成为新闻信息可靠性的重要保障。

其次,强化与写稿机器人形成错位竞争优势的专业技能,主要包括深度分析能力与情感表达能力。当前写稿机器人在这两方面的能力远不及新闻记者,主要是因为它擅长建构以事件为中心的多维关联网络(强调相关性),而弱于对新闻事件进行因果方面的解读与呈现(注重因果性),因此自动化新闻稿件侧重于客观描述或叙述,鲜有新闻评论、社论、新闻特写,等等。③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新闻记者一般都具备丰富且扎实的专业知识积累、较强的问题解决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较高的新闻敏感度和社会责任感,这些独特的能力和品质是实现自动化新闻从

① Braun, Joshua. Going Over the Top: Online Television Distribution as Sociotechnical System, *Communication, Culture & Critique*, 2013(3): 432 - 458.

② 喻国明:《"机器新闻写作"带动传媒新变局》,《新闻采编》2015 年第 6 期。

③ 韩婷:《试论人工智能视阈下新闻业的未来发展路径》,《东南传播》2019 年第 1 期。

“规范化新闻”到“自由化风格新闻”转型的至关重要的力量。[①] 诚如在访谈中，来自B机构的小张这样说道：

> 与记者相比，自动化新闻在技术方面很有优势，但是它没有办法在新闻的生产过程中像我们一样，进行批判性、创造性和独立性的思考，毕竟记者有着良好的“新闻感”、敏锐的“新闻鼻”和深度阐释力，我觉得，这些才是记者这个职业或说新闻这个行业里最重要和珍贵的品质。（小张，B机构）

因此，不少学者提出，新闻记者的工作重心应该转移到需要挖掘深度、提升高度、拓展广度的内容上，扮演新闻事件深度挖掘者、高度提升者和广度扩展者的角色。[②] 这就要求新闻记者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调查性报道和解释性新闻等“硬核”类新闻信息的生产上，同时他们需要带着个人情感走进新闻现场，挖掘社会的深层问题，展现其深切的人文关怀。[③] 这一观点在对A机构小朱的访谈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 写稿机器人更多扮演的是新闻实践记录者的角色。与它比起来，记者的价值和意义主要表现为对新闻背后原因、趋势和规律的分析，以及对新闻真相和价值的挖掘……在很多情况下，写稿机器人所使用的数据把具体和复杂的社会现实问题给简单化了，自动化新闻往往容易忽视数据背后丰富的社会情境。（小朱，A机构）

最后，兼备硬技能和软技能。专业技能除有高低之外，还可以从硬技能(hard skills)和软技能(soft skills)两个维度来进行划分与区隔。[④] 所谓硬技能，即技术性技能或生产技能，如新闻记者的选题能力、采访能

---

① 彭兰：《人—机文明：充满“不确定性”的新文明》，《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6期。

② 王悦、支庭荣：《机器人写作对未来新闻生产的深远影响——兼评新华社的“快笔小新”》，《新闻与写作》2016年第2期。

③ 马维军：《人工智能时代记者如何突围》，《青年记者》2016年第8期。

④ Weaver, David, Wilhoit, Cleveland and Lori Bergen. *The American Journalist: A Portrait of US News People and Their Work*.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

力、写作和表达能力、基本的计算和统计能力，以及通过分析工具了解和满足用户的需求，实现与他们实时和有效的互动。所谓软技能，即非技术性技能，主要是指随着工作任务变化而可迁移的通用技能或素质技能，这些技能往往对劳动者的职业发展更具决定性的影响，如学习能力、社交能力、吃苦能力、应变能力、自我管理能力，等等。

> 做记者是很辛苦的。从采集信息到核查信息都需要克服非常多的困难，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肯定是不行的……比如说，当我们在做一些社会新闻的时候，需要天天跑城市的大街小巷，明察暗访，很多表面上看不到的事情只有通过锲而不舍的采访和不厌其烦的调查才可能看到。（小徐，B机构）

需要补充的是，在自动化新闻的生产过程中，新闻记者的思维能力，尤其是计算思维能力变得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新闻记者的核心能力。[①] 它与新闻记者需要掌握的数据统计和分析能力、编码能力等密切相关。与此同时，当技术慢慢渗透到人们日常工作和生活的每一处毛细血管时，它已构成了新闻记者的通用技能或素质技能，不但有助于他们拓宽自身的就业前景、丰富其职业选择，而且还有助于他们全面认知和精准把握数字世界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一般规律。

（三）由去技能化向再技能化的技能变迁

自动化新闻已经成为当前新闻生产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不断对新闻劳动进行重构，以去技能化和再技能化两条路径展开：一方面，就专业技能低、重复性高和常规化的任务而言，写稿机器人开始替代新闻记者，这导致新闻记者与数据采集和处理、线索识别、信息核查相关的专业技能处于消亡的边缘，陷入去技能化的困境；另一方面，新闻记者不仅要

① Lindén, Carl-Gustav. Algorithms for Journalism: The Future of News Work. *Journal of Media Innovations*, 2017(1): 60-76.

持续对包括选题能力和信息核查能力在内的传统专业技能进行迭代，而且还亟待强化与写稿机器人形成错位竞争优势的相关专业技能，如深度分析能力和情感表达能力。除这些实用的专业技能或硬技能之外，新闻记者还有必要掌握诸多软技能，尤其是计算思维能力。

更为重要的是，虽然在自动化新闻的生产过程中，新闻记者的技能兼具去技能化和再技能化的特征，但去技能化导致的最为直接的结果就是写稿机器人将新闻记者从纷繁复杂的基础性操作中解放出来，有时间和精力从事具有创新性的工作，并通过再技能化来适应新闻编辑室中日新月异的技术变化。换言之，与自动化新闻导致新闻劳动去技能化和再技能化并存的局面相比，它对新闻劳动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引发了新闻劳动的技能变迁过程，即由去技能化向再技能化的转型。上述技能变迁过程挑战了由布雷弗曼提出的工作场所中“概念”与“执行”不断分离的判断：新闻记者并没有被“降格”为体力劳动者——从事“劳力型”的“执行”阶段工作，不断丧失对劳动过程和自身劳动的控制，而是牢牢掌握“劳心型”的“概念”阶段工作，且这样的工作在新闻记者的日常工作中逐渐占据绝对主导的地位，新闻劳动因此变得不可替代。①

从本质上来说，去技能化反映出的是机器（或技术）和劳动之间的替代性关系，因为它强调通过提高生产的自动化水平来减少生产过程对劳动力的依赖。与之相反，再技能化强调的是技术作为劳动者的一部分而

① “‘概念’与‘执行’分离”是由美国工人活动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哈里·布雷弗曼提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他在对流水线工人劳动过程的研究中发现：劳动者（主要是产业工人）的专业技能和生产知识因在工作场所中引入自动化技术和推行科学管理而持续受到被“降格”的威胁，导致“概念”与“执行”的分离。展开来说，原来需要“劳心型”的“概念”阶段工作从劳动者的工作场所中消失，由办公室中的管理者接手。一方面，管理者形成了对生产知识的垄断，并对劳动者的劳动过程进行管理和控制；另一方面，劳动者只需要从事分工更为精细、管理和控制更为严格的“劳力型”的“执行”阶段工作，沦为纯粹的“体力劳动者”，其不可替代性被逐步消除——无专业技能傍身或生产知识不完备的劳动者渐渐成为劳动者的主体。参见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方生、朱基俊、吴忆萱、陈卫和、张其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04页。

存在,两者是不可分割的。也就是说,机器(或技术)和劳动之间不是简单的主客体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一种互补性的关系,即在自动化新闻的生产过程中,人机关系不是"有你没我"的竞争关系,而是一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共存关系。① 写稿机器人和新闻记者通过劳动分工与协作,在组织和业务上不断深度融合,生成海量高质量的新闻稿件,这既实现了技术与劳动的相互渗透与协同共生,更为新闻生产过程和劳动者技能成长的有效结合提供了丰沃的土壤,有利于真正实现"新闻文化"和"技术文化"的兼容。②

四、新闻劳动:作为趋势的多技能化

早在21世纪初,马克·德乌兹(Mark Deuze)和史蒂夫·保卢森(Steve Paulussen)就敏锐地洞察到,随着数字化技术的迅猛发展,不同类型的媒体融合使新闻记者日益成为"复合型人才"。③ 他们不仅需要专注于在街头巷尾采访和进行新闻报道,而且还必须掌握并熟练使用几种不同的基于数据库内容管理系统的专业技能,而在数字化技术引入新闻编辑室之前,与新闻后期制作相关的任务一般都是由新闻编辑而非新闻记者完成的。

在自动化新闻的生产过程中,新闻劳动的"技多不压身",即多技能化(multi-skilling)已经成为行业的常态。当前对于新闻记者而言,提升自身数据分析(尤其是数据可视化分析)和数据应用能力已然十分紧迫,

---

① 师文、陈昌凤:《驯化、人机传播与算法善用:2019年智能媒体研究》,《新闻界》2020年第1期。

② 在笔者看来,在自动化新闻生产中,厘清和发挥写稿机器人和新闻记者的各自优势,在强化两者不同职能分工的同时,促进主体间的双向理解、建立人机合作的新闻把关机制,是实现自动化新闻与新闻记者之间"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共存关系的基本路径。参见姚建华:《自动化新闻生产中的人机联姻及其实现路径》,《当代传播》2021年第1期。

③ Deuze, Mark and Steve Paulussen. Research Note: Online Journalism in the Low Countries.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2(2): 237 - 245.

这就涉及他们需要培养或习得一定的数理逻辑分析能力、计算机编程能力，同时熟悉算法的原理和运行方式。在日常工作中，与新闻机构内负责开发和运维自动化新闻的算法工程师建立积极的交流与合作机制是获得这些专业能力最为重要且有效的途径。

具体来说，新闻记者与算法工程师之间“交流区”的形成有益于新闻记者不停地完善自己的专业素养和知识结构，将自动化新闻的长处发挥至最大。更为关键的是，作为自动化新闻算法的设计者和训练者，算法工程师往往因为缺乏新闻从业经验，一来无法判断原始新闻素材和语料的质量，二来无法预测相关算法在实际新闻生产中存在的不足，因此他们既需要新闻记者为他们提供和汇总不同分类报道的素材库及语料库，又需要通过与新闻记者的日常交流，优化已有的算法。那么，新闻记者在自动化新闻生产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不仅仅表现为他们不断培养或习得新的专业技能，与技术进行互动，而且还表现为他们为自动化新闻的算法设计者和训练者提供宝贵的专业建议及意见，不断对写稿机器人进行算法优化。因此毫不夸张地说，新闻记者成为人机关系的“引导者”。质言之，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媒介技术对新闻劳动在专业技能上的重构并不是两者关系的全部，更准确地说，两者之间是一种互构关系，即新闻劳动也反过来影响着新闻编辑室中媒介技术的形成与应用，重塑着技术文化与人机关系。

五、小结与展望

统而观之，随着自动化新闻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快速崛起，新闻记者正经历着一系列的技能变迁，即由去技能化向再技能化转型，且多技能化的趋势日渐明朗。这反映出自动化新闻中的人机关系是一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共存关系，而非“有你没我”的竞争关系，它为新闻生产过程和劳动者技能成长的有效结合提供了积极的可能。但有不少进一

步的问题有待后续的深入探讨：比如，新闻记者实现再技能化有哪些途径？如何看待技能变迁过程中来自新闻编辑室内外的阻力？个体再技能化的非同步性会导致新闻记者内部的分化吗？新闻编辑室内是否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权力结构关系？等等。如果我们将技术与劳动的互动过程放置在一个更为宏大的历史背景下，那么就涉及一系列更为复杂的结构性因素，如不同媒体机构间的关系结构、媒体制度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市场环境、文化传统，甚至是价值观念，等等。

还有，当前自动化新闻主要应用于标准化、时效性强以及对数据要求较高（或说“低语境”）的财经、体育、自然灾害、健康、天气预报的报道上。随着人工智能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突破、写稿机器人对语料库的深度学习，以及自动化新闻自身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其应用领域的不断拓展已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自动化新闻可能进入社会新闻、政治新闻等更为复杂和敏感的新闻领域，即涉足“高语境”的新闻报道，而这些报道（或领域）往往是新闻记者所擅长的。[①] 彼时，自动化新闻中的人机关系是否将呈现新的特征？这有待后续研究的持续关注与不断深化。

本章最后借德国哲学家卡尔·洛维特（Karl Löwith）在《从黑格尔到尼采：19 世纪思维中的革命性决裂》（*From Hegel to Nietzsche: The Revolu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Thought*）一书中的精彩论述发问：在未来，自动化新闻能否成为一种更为进步和解放的力量，使新闻劳动不仅成为新闻记者获取生活资料的主要经济来源，更给他们带来莫大的尊严感和自我价值感？进一步来说，自动化新闻能否赋予新闻劳动以独立的、建设性的意义，使它成为“一切尘世技能、德性和愉悦的源泉”？[②] 这一问题既事关新闻从业者美好的职业愿景，也为相关研究者打开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

① 蒋忠波、师雪梅：《国外算法新闻研究的进展与思考》，《新闻界》2019 年第 6 期。

② 卡尔·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19 世纪思维中的革命性决裂》，李秋零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19 年，第 356 页。

第八章　平台经济、数字劳动与情感关系

在中国，随着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信息技术的持续更新以及“互联网＋”行动计划的逐步推进，[①]互联网与工业、零售、交通、物流、能源、金融等各个不同领域的融合日益深入，由此引发了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而“虚拟恋人”服务正是一种依托微信、QQ、淘宝、“喃喃”等互联网平台孕育而生的有偿情感体验类服务。在此，服务提供者（即“虚拟恋人”）以文字、语音或视频方式与消费者进行在线“即时交流”，通过在服务时间内提供清晨叫起床、夜间道晚安、陪打游戏、倾听烦恼、排解压力等个性化服务为消费者创造亲密体验，与他们在网络空间中建构亲密关系，获得相应的物质报酬。该服务最早起源于日本，2014 年传入中国后，就受到大众（尤其是当代青年人）的喜爱与追捧，一时间成为淘宝店铺竞相售卖的“热品”，随即呈现“野蛮”增长的态势。

---

① 马化腾在 2015 年的“两会”上提出：“我们需要持续以‘互联网＋’为驱动，积极引导和建立健全相关监管体系，推动持续深入的互联网跨界融合，从而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升级。”之后，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参见《李克强：要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财新网，2015 年 3 月 5 日，https://topics.caixin.com/2015-03-05/100788412.html。

就在“虚拟恋人”服务“野蛮”生长期间，部分淘宝店铺因涉嫌提供色情服务被曝光和查封，淘宝网屏蔽了“虚拟恋人”“聊天”等搜索关键词，“虚拟恋人”行业的发展也趋于“地下化”和“隐匿化”。然而，2020 年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使人们面对面的交往被切断或被迫转移到线上，孤独和焦虑成为个体普遍的情绪状态。伴随着这些情绪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持续蔓延，“虚拟恋人”服务再次走红网络，成为年轻人关注且追捧的对象：在哔哩哔哩视频网站上，与“虚拟男友”或“虚拟女友”相关的视频超过千条，大部分发布于 2020 年 3 月至今，不少视频的播放量已经超过 1 万人次，最高播放量达到 550 万人次。在淘宝网上搜索“陪聊”“连麦”“早安晚安”或“男神女神”，有 360 多家店铺同时提供“虚拟恋人”服务，销售量最高的一家店铺成交记录已逾 2 万条。

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指出，现代人时常感到孤独和焦虑，但却又害怕被亲密关系束缚，数字化的生存方式恰恰为人们制造了一种“幻觉”：我们有人陪伴，却无须付出友谊。[①] “虚拟恋人”服务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可以“即时享受”，但却无须付出友谊的“陪伴”：任何人只要花上几十元就可以在网络空间中购买到一位随叫随到、称心如意、无条件接受自己的“临时恋人”，获得亲密关系所带来的陪伴体验的同时，不必耗费大量成本（包括精力、体力和财力）进行日常的情感付出与维系。因此，对这部分人来说，“虚拟恋人”服务成为他们驱逐孤独、缓解焦虑和满足内在情感需求的重要选择。那么，“虚拟恋人”在其服务过程中是如何与消费者在网络空间中建构亲密关系的？这种亲密关系具有哪些基本特征？它是否会替代现实社会交往中形成的亲密关系呢？本章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回应，以期为情感劳动与网络空间中的亲密关系研究提供更多的理论视角与经验材料。

① 雪莉·特克尔：《群体性孤独》，周逵、刘菁荆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 年。

一、平台经济、情感劳动与亲密关系

（一）平台经济与平台劳动

在过去的几年中，平台经济在稳定经济增长、促进产业升级、创造就业机会等方面创造了重要的价值，成为中国新经济增长最强有力的引擎，并为其经济转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能。2016 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超过 20 万亿元。2018 年，中国金融网络平台用户总数超过 10 亿，位居全球第一。据估算，2030 年中国整体平台经济规模可达 100.4 万亿元，超过 2018 年全国 90 万亿元的 GDP 总值。① 在全球层面，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平台经济作为发展最迅速、创新最活跃、辐射最广泛的经济形态，成为各国政府制定的数字经济战略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2017 年，全球市值超过 1 亿美元的平台型企业的总价值超过 7 万亿美元，比 2015 年增长了 67%。②

---

①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平台在市场上的绝对主导地位来自其所具有的“网络外部性”，即联结到某一网络或参与使用某一平台的用户数量越多越能提升该网络或平台的吸引力，导致网络或平台具有规模经济的特点。在此，平台的发展与资本的聚合、信息的集中、技术的迭代彼此强化，平台的垄断地位得以形成，而这决定了这些平台可以通过垄断高价获得超过平均利润的垄断利润。平台型企业以自身为中心，将数以万计的服务商和消费者联系在一起，形成平台经济体，它们在自身规模、价值创造、影响力、包容性等方面全面超越传统的跨国公司，推动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参见阿里研究院、德勤（Deloitte）研究：《平台经济协同治理三大议题》，2017 年 10 月 11 日，https://i.aliresearch.com/img/20171025/20171025090031.pdf；乔晓楠、郗艳萍：《数字经济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塑——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当代经济研究》2019 年第 5 期；Economides, Nicholas. The Economics of Network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1996(4): 673-699。

② 与之相应的是，平台型企业在全球互联网搜索、社交媒体、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等诸多市场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例如，Alphabet（谷歌母公司）拥有全球大约 90% 的互联网搜索市场。脸书占据了全球 2/3 的社交媒体市场，得益于在线广告业务，其年净利润超过 80 亿美元。亚马逊在全球在线零售市场中占有近 40% 的份额，其亚马逊网络服务在全球云基础设施服务市场中也占有类似的份额。在中国，微信（腾讯）拥有超过 10 亿的活跃用户，其支付解决方案与支付宝（阿里巴巴）合起来几乎占领了整个中国大陆地区的移动支付市场。阿里巴巴拥有中国电子商务市场近 60% 的份额，是世界上最大的虚拟交易平台和商务交流社区之一，它以低廉的价格和琳琅满目的商品吸引着来自全球的买家。参见牛禄青：《平台经济崛起》，《新经济导刊》2017 年第 11 期。

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催生出规模庞大且形态各异的平台劳动，深刻改变着传统的就业模式和生产方式。[①] 尤其在直播、游戏等信息内容类平台和生活服务、出行等交易类平台中（从所涉及主体的关系来看，它们往往是第三方平台），平台劳动日渐成为劳动者个体自主择业的重要选择。[②] 交通、日常杂务跑腿、家政服务、维修服务、网络直播等众多行业和领域同样吸引了大量平台劳动者，因此在中国，平台劳动者已经成为数量庞大、结构复杂的新型劳动者群体，构成了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 年，中国平台经济体带动就业机会累计超过 6000 万个。[③]

（三）从非物质劳动到情感劳动

拉扎拉托发现，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兴起加

---

① 有学者强调，部分平台劳动者鲜被关注，且大多是无偿或低酬的，但他们却构成了互联网企业资本增殖的源泉。这些劳动包括：其一，进行信息生产与浏览的在线用户；其二，网络游戏开发中负责查找程序漏洞但福利待遇得不到保障的零时工；其三，从事毫无技术含量、只是为他人代为积攒点击量的键盘苦工；等等。参见 Casilli, Antonio. Digital Labor Studies Go Global: Toward a Digital Decolonial Turn. *Internati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7 (11): 21.

② 以外卖行业为例，最近几年，“互联网＋餐饮”的新业态不断驱动服务升级，推动外卖行业快速增长，2017 年其市场规模已经高达 2969 亿元。与此相匹配的是外卖骑手规模的日益壮大。根据美团在 2019 年 1 月发布的《2018 外卖骑手就业报告》，2018 年，有 270 多万外卖骑手从美团外卖获得收入，这一数字比上年增长 22%。在这其中，“80 后”和“90 后”占比高达 82%，他们已经成为这一群体的中坚力量。几乎在同时，作为美团外卖主要竞争对手的饿了么外卖发布了《2018 外卖骑手群体洞察报告》。根据这份报告中的统计数据，在饿了么外卖注册的骑手数量已经超过 300 万人，他们多来自河南、安徽、四川等地的农村地区。阿里研究院预测，“企业＋平台＋个人”的“平台就业”将成为中国未来社会基本的就业景观，到 2036 年，平台劳动者将突破 4 亿人。参见孙萍：《“算法逻辑”下的数字劳动：一项对平台经济下外卖送餐员的研究》，《思想战线》2019 年第 3 期；罗璁：《饿了么的骑手报告说，40%外卖骑手收入在 6000 元以下》，好奇心日报，2018 年 12 月 30 日，https://www.qdaily.com/articles/59826.html；美团点评：《2018 年外卖骑手就业报告》，2019 年 1 月 17 日，https://www.ithome.com/0/406/054.htm。此外，根据第三方数据机构 DCCI 互联网数据中心（Data Center of China Internet）发布的《网络外卖服务市场发展报告（2019Q1）》，美团外卖和饿了么外卖共占据在线外卖服务市场份额的 98.5%，参见 http://www.dcci.com.cn/dynamic/view/cid/2/id/1342.html。

③ 黄再胜：《网约平台劳动的合约特征、实践挑战与治理路径》，《外国经济与管理》2019 年第 7 期。

速了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的转型，越来越多的工作与商品的信息和文化内容的生产相关，这其中就包括一系列通常不被视为“工作”的“活动”。它们涉及文化艺术标准、时尚元素、个人品位，以及更具策略性的公众观点，与知识、信息、交往、关系等高度关联。[①] 哈特和奈格里将这些工作定义为“非物质劳动”，并强调：情感是非物质劳动的内在本质，因此情感劳动是非物质劳动中最重要、最主要的构成部分，包括生产诸如轻松感、幸福感、满足感、兴奋、激情、联结感、归属感等在内的无形的情感产品。[②] 在这类劳动中，情感因素和身体交往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与情感劳动相关的研究中，美国著名情感社会学家阿莉·霍克希尔（Arlie Hochschild）对德尔塔（Delta）航空公司空姐劳动的系统性分析最具代表性。[③] 她在吸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拟剧理论的基础上指出：情感劳动者通过“压抑或伪装情感”（情感管理）和“展现出良好面部表情或身体语言”（情感表达），使顾客获得良好的感受，并以此来满足他们的情感需求。[④] 在此，霍克希尔将情感管理和情感表达界定为空姐情感劳动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强调：当人们的情感被用于商业目的时，它不再是个人真实性情感的流露，而是经过组织化的操纵

① 莫里齐奥·拉扎拉托，高燕译：《非物质劳动（上）》，《国外理论动态》2005 年第 3 期。

② 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年。

③ 阿莉·霍克希尔探讨的“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ur）与哈特和奈格里探讨的“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ur）都强调劳动者的情感被组织控制、利用和商品化的过程。这两个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从提供产品转向提供服务的转型社会中工作的本质与后果，但它们却存在着细微的差异。前者属于情感社会学的范畴，更多的是用来分析劳动者的劳动过程，作为一种劳动形态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对应。因此，其侧重点是“商品化”与“管理”，以及由此延伸开来的“控制”与“规训”；后者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更多的是用来强调情感劳动是一种经济形态，是非物质劳动的一种形式。因此，其侧重点是“生产”，强调情感与资本积累、再生产之间的关系。参见杨馨：《情感劳动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以 L 后援会为个案》，《新闻记者》2020 年第 9 期。

④ 阿莉·霍克希尔：《心灵的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成伯清、淡卫军、王佳鹏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20 年。

规训，即情感整饬（emotional management）之后的商品。霍克希尔进一步阐释道：情感劳动者在其劳动过程中主要采用两种不同的情感管理策略来实现情感整饬，即“浅层表演”（surface acting）和“深层表演”（deep acting）。在这其中，劳动者外在情感表达与其内在真实感受之间、“表演的自我”（acted self）和“真正的自我”（real self）之间的张力不断加剧，随之而来的是真实情感的压抑和丧失、情感异化（emotional alienation）和自我疏离（self estrangement），以及身份认同的危机。①

受霍克希尔的影响，中西方学界从劳动过程理论出发，围绕着服务业中的情感劳动展开了大量理实兼备的研究，全面深刻地揭示出制造业流水线生产时代的劳资关系向服务业时代“劳—资—客”三方关系的变迁过程，并引入阶级、社会性别、城乡关系、区域关系等交叉性分析视角，一方面，关注资本（资）和顾客（客）对劳动者（劳）的控制；另一方面，关注劳动者的主体性和身份认同的建构，及其对情感劳动过程中压迫和异化的抵抗策略，进而反思劳动与现实社会生活中多元权力结构网络之间的勾连关系。② 这些研究大多聚焦人们面对面的劳动情境，即情感的身体直接面向顾客，提供服务性、专业性和关怀性的劳动，其研究对象一般为餐饮、百货、家政、美容美发、休闲养生等传统服务行业中的一线劳动者，如传菜员、售货员、家政人员、美容师、美发师、保健按摩师等。③

---

① 胡鹏辉、余富强：《网络主播与情感劳动：一项探索性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 年第 2 期。

② 何明洁：《劳动与姐妹分化——“和记”生产政体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2009 年第 2 期；苏熠慧、倪安妮：《育婴家政工情感劳动的性别化机制分析——以上海 CX 家政公司为例》，《妇女研究论丛》2016 年第 5 期；李晓菁、刘爱玉：《资本控制与个体自主——对国内空姐情感劳动的实证研究》，《妇女研究论丛》2017 年第 5 期；帅满：《双重控制与多元反应：茶艺师劳动过程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18 年第 11 期；刘育婷、肖索未：《“干活时把雇主当家人，相处时把自己当外人”——住家家政工的雇主关系及情感劳动研究》，《妇女研究论丛》2020 年第 4 期。

③ 佟新：《30 年中国女性/性别社会学研究》，《妇女研究论丛》2008 年第 3 期。

然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移动智能硬件终端的快速普及，线上服务呈现日新月异的蓬勃景象：线上家教、网络主播、陪打游戏服务，以及本章的研究对象——提供陪聊的“虚拟恋人”服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网络空间中的情感劳动已经成为当前人们社会生活中一种十分普遍的劳动形式。[①] 当顾客选择网络服务的主要消费目的在于放松、娱乐或消磨时间时，如观看泛娱乐化直播、与虚拟恋人聊天，服务提供者的情感不再完全是个人真实情感的流露，而成为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且可被直接售卖，不需要依托其他的实体物质或服务。在此，计算机软硬件和网络服务搭建的数字平台不仅成为劳动者的生产资料，更是情感劳动的载体：满足特定期待的情感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媒介信息形式在数字平台上（以及在不同数字平台之间）传播和交换。在这个过程中，网络情感劳动打破了传统情感劳动者和消费者面对面或“身体在场”的劳动情境，两者以“虚拟在场”或“身体缺席”的形式存在，他们之间的互动及其所建构的情感关系成为网络情感劳动的重要标志，[②]这也是虚拟恋人劳动过程的核心所在。

具体来说，越来越多的普罗大众被吸纳进由互联网所建构的数字空间里，成为情感劳动大军中的一员。以网络主播为例，直播技术将现实生活场景以数字图像的形式实时呈现给观众，主播的身体在与观众的互动中实现了虚拟在场。为了获得更多的流量和物质回报，主播有意识地迎合观众的情感想象与陪伴需求，通过塑造“美丽”的符号化身体、打造“多元化”人设等不同方式调动他们的情感，进而获得更多的“打赏”或

① 林颖、吴鼎铭：《网民情感的吸纳与劳动化——论互联网产业中“情感劳动”的形成与剥削》，《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 年第 6 期；石佳玉：《虚拟男友——中国女性的网络情感劳动消费》，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硕士论文，2019 年；姚建华、王洁：《虚拟恋人：网络情感劳动与情感关系的建构》，《青年记者》2020 年第 25 期。

② 梅笑：《情感劳动中的积极体验：深层表演、象征性秩序与劳动自主性》，《社会》2020 年第 2 期。

“礼物”。[①] 随着电商直播时代的来临，作为“带货达人”的网络主播不仅需要通过“感情牌”维系与观众线上和线下的关系，而且还需要掌握一系列互联网营销技巧来吸引观众“下单”，这极大地拓宽了情感劳动的劳动范畴，同时对他们的专业技能提出了新的要求。[②] 此外，朱阳和黄再胜强调，在网络空间中，情感劳动不仅包括网络主播和电商主播的劳动，还包括由观众基于共同的情感需求而产生的情感传播、社区建设与内容制作，以及在参与互联网社交活动过程中，他们自愿提供的包含其使用偏好、情感需求和好友关系等信息数据的行为。[③]

（四）网络空间的亲密关系

与上述研究不同，本章聚焦作为情感劳动者的“虚拟恋人”及其在劳动过程中与消费者所建构的亲密关系，而并非普通的情感关系。所谓亲密关系，是指在人与人之间平等交往的前提下，建立在与他人真实情感交流基础上的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④]具体包括关怀、信任、理解、互动、承诺等要素。[⑤] 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人们之间的情感交流不必局限于现实的社会生活，在网络空间中，人们能够突破时空的限制，不仅与现实生活中的朋友保持联络与互动，而且还可以发展出新的、有意义的亲密关系。尤其对于当代青年人来说，网络已经成为他们建构亲密关系的

① 涂永前、熊赟：《情感制造：泛娱乐直播中女主播的劳动过程研究》，《青年研究》2019 年第 4 期；徐林枫、张恒宇：《“人气游戏”：网络直播行业的薪资制度与劳动控制》，《社会》2019 年第 4 期；姚建华、陈曦：《网络直播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资本和权力的视角》，《现代视听》2019 年第 8 期。

② 王斌：《自我与职业的双重生产：基于网络主播的数字化表演劳动实践》，《中国青年研究》2020 年第 5 期。

③ 朱阳、黄再胜：《劳动的情感参与：数字时代情感的价值和生产》，《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20 年第 2 期。

④ 安东尼·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陈永国、汪民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

⑤ 齐海静、蔡颖：《亲密关系综述》，《社会心理科学》2013 年第 9 期。

三、建构亲密关系："虚拟恋人"的情感劳动过程

"虚拟恋人"情感劳动过程的核心内容是在网络空间中建构与消费者的亲密关系。他们在"进场""在场"和"离场"的不同服务阶段，根据消费者喜欢的恋人类型，主动整饬外显情感来积极调动消费者的情感，努力营造甜蜜的恋爱氛围，给消费者带来即时性的亲密体验，进而满足其对恋爱关系的想象和情感需求，以获得五星好评或续单。

（一）进场：提供多样化的恋人类型

在SS恋人馆中，消费者可以下单"霸道总裁""小奶狗""狼狗""蓝颜""正太"等不同类型的男性恋人，以及"御姐""萝莉"等女性恋人。不同类型"虚拟恋人"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微信头像、朋友圈背景墙、聊天中使用的语气词、表情包等不同方面。也就是说，SS恋人馆在"虚拟恋人"提供服务前，已经为他们建立了包括外在条件（如声音和颜值）、性格特征、特长爱好等基本情况在内的"虚拟身份档案"，旨在为消费者带来更完美，甚至是"天衣无缝"的模拟恋爱效果。该馆还特别提醒"虚拟恋人"在接单前必须做好符合人设的形象呈现："虚拟恋人"在接单时一定要屏蔽朋友圈，根据消费者喜欢的恋人类型修改好自己所有的资料，包括更换头像、背景图、昵称等。卡戎（男，18岁，高中在读，兼职两个月，本研究中受访者的姓名都已做匿名化处理）在访谈中表示：在为顾客创造"亲密体验"时，他会竭力变成"顾客喜欢的类型或想要的模样"，这样才能不断激发顾客强烈的"接近倾向"（closeness），这对于他获得较高的服务满意度至关重要。

设置不同类型"虚拟恋人"的主要目的在于消解"虚拟恋人"和消费者之间的陌生感。一般而言，"虚拟恋人"的类型与自身性格重合度较大，因此他们深谙能够与消费者成功建立起"亲密关系"的话术，服务过

程中即时情感管理和情感表达的难度也相应地降低了，服务效果自然也就更好。例如，十安（女，20岁，大学在读，兼职半个月）觉得自己的特点是“温柔”“可爱”和“话多”，所以她不会主动要求去为喜欢“御姐”类型的消费者提供服务。对于消费者来说，自身的经历以及对不同类型恋人的认知和想象是他们选择“虚拟恋人”类型的重要依据，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会选择与自己聊得来的“虚拟恋人”，轻松和愉悦的聊天氛围无疑更容易使他们沉浸在恋爱的亲密场景中。

（二）在场：努力营造甜蜜的恋爱氛围

无论消费者选择了何种类型的恋人，对于“虚拟恋人”而言，主动整饬外显情感来积极调动消费者的情感，努力为他们营造甜蜜的恋爱氛围，让他们时刻感受到自己被喜欢、被重视、被关心、被呵护和被宠爱十分关键。“虚拟恋人”会在大部分的服务时间内，与消费者“模拟男女朋友的日常或撩人”，倾听他们讲述的故事，使他们“产生极强的代入感”。由于店铺规定“下单五分钟内，顾客如果不满意可以随时换人，这时‘虚拟恋人’无法获得任何工资”，在物质报酬的刺激下，大部分“虚拟恋人”在开始服务后会主动表达对消费者的关心和爱慕，比如使用亲昵称呼或开场白，如“宝贝”“小可爱”“小仙女我来接你回家了”“叮咚，你的女朋友送达了”，等等。此外，“虚拟恋人”大多以倾听、顺从的姿态表达对消费者处境的理解、对其外貌和性格等条件的肯定，或通过温情脉脉的话语叙事让消费者感觉到自己被认可、被重视甚至是被崇拜，从而使他们获得较高的自我价值感，同时迅速将双方代入虚拟场景的恋爱角色设置中，这些都对“虚拟恋人”的即时情感管理和情感表达能力提出了不小的挑战。

使用“土味情话”是“虚拟恋人”在营造甜蜜恋爱氛围方面最为常用的手段。当“虚拟恋人”以土味情话引导话题时，对于熟悉土味情话的消费者而言，这种沟通场景自然而然地提升了他们参与“土味情话”再生产

的积极性；而对于不熟悉土味情话的消费者而言，他们的回应恰恰能与“虚拟恋人”的预设一致，从而被虚拟恋人“套路”：消费者一开始会感到尴尬，但一会儿就能感受到其中的暧昧与幸福。在上述两种情况中，“土味情话”都不是虚伪、轻佻、油腻的造作，而是激发消费者对甜美恋爱想象的催化剂和加速两者关系迅速升温的“助燃剂”。

（三）离场：是再见，还是续单？

对于“虚拟恋人”来说，能否在服务结束后获得消费者的五星好评或续单是对其业务能力的真正考验，尤其是续单，因此增强消费者的黏性是他们实现从“情感”到“金钱”的“关键一跃”。“虚拟恋人”在委婉地表达“服务即将结束”的现实时，往往会巧妙地调动消费者的情感投入，一边增强他们与“虚拟恋人”的黏性，一边有效地激发他们再次消费的欲望。卡戎在访谈中表示：服务即将结束时，他会和消费者说“时间过得好快，该结束了，但真有些舍不得呢！”如果还有话题没有聊完，他会说：“我们到时间了，还要聊的话，你需要续单哦！我在这里等着你呦！不见不散！”对于服务时间比较长且聊得比较投缘的消费者，艾瑞克（女，20岁，大学在读，兼职半年）表示，服务结束时她“多少会有点舍不得”，但无法改变“如果顾客不续单”就只能互删联系方式的结果。

概言之，“虚拟恋人”在“进场”“在场”和“离场”的不同服务阶段，根据消费者喜欢的恋人类型，主动整饬外显情感与他们建构亲密关系，满足他们对恋爱关系想象和情感需求的同时，获得五星好评或续单。“虚拟恋人”采用“浅层表演”和“深层表演”两种不同的情感管理策略来实现情感整饬。具体来说，一方面，“浅层表演”，即“情感表现的整饬”，包括“虚拟恋人”控制外在言辞和使用大量恋爱符号，以及把握表达过程中的语音、语调和语速，以传递给消费者与他们期望相一致的情感。如前文所分析的，“虚拟恋人”经常会使用温情脉脉的话语叙事或“土味情话”来

满足消费者的情感需求。在访谈中，苏晨（男，18岁，大学在读，兼职一年）也反复强调："大部分顾客都是无聊或心情不好的，所以我们更需要一上来就对他们嘘寒问暖，让他们很容易感受到我们的关心与体贴。"另一方面，"深层表演"，即"情感体验的整饬"，包括"虚拟恋人"通过控制自己的心理来调整情感状态，努力唤起某些特定情感，使之能适应情境所要求的外在表情。在访谈中，夕墨（女，17岁，高中在读，兼职一年）表示：在她来SS恋人馆的这段时间里，已经有过50多次的服务经验。有时候她需要连续工作到深夜，即使自己的身心十分疲倦，还是会积极主动地与顾客聊一些轻松愉快的话题，让他们享受舒适感和愉悦感。尤其是对那些话不多，相对比较害羞和内向的顾客，夕墨会选择自己多说一点，成为话题的引导者，尽量不使顾客感到尴尬。在她看来，这样做能够有效地拉近"劳—客"之间的距离，让消费者时时都能感受到被陪伴的温暖，人际吸引的效果自然也就增强了。

四、网络空间中亲密关系的双重"虚拟性"

那么，"虚拟恋人"在其服务中与消费者建构的亲密关系具有怎样的特征呢？一方面，它存在于网络的虚拟空间，而非现实生活中；另一方面，它受市场原则支配，是一种能够即时和短暂满足消费者情感需求的商品，而非建立在两者长久和稳定的情感基础之上，因此具有情感虚拟化的特征，由"虚拟恋人"与消费者建构的亲密关系具有双重"虚拟性"。

一方面，"虚拟恋人"服务中的亲密关系存在于网络的虚拟空间。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人与人之间亲密关系的建构突破了现实社会交往场景的限制，而具有独特性：在虚拟的网络空间，"虚拟恋人"和消费者的身体都是"缺席"的，衣着、姿态、面部表情等非语言符号在传情达意方面无法发挥作用，"虚拟恋人"只能通过视觉或听觉感知到的各种类型的数字化信息为消费者提供"亲密体验"，这些信息

主要包括互联网平台聊天框内的文字、图像、表情包、音频、视频等。也就是说，网络虚拟空间中多样态的数字化信息构成了“虚拟恋人”和消费者之间亲密关系的载体和物化形式。这些数字化信息及其组合在网络空间中的浮现、流动和消失过程与情感驱动、扩散和转移的轨迹是同构的。①

为什么这些数字化信息有助于两者之间亲密关系的建构呢？究其原因，其一，数字化信息在网络空间中自由流动，削弱了时空对个体互动的具体限制，彻底颠覆了传统社会的行为和交往方式，创造出强烈的共时感和共地感。② 约书亚·梅洛维茨(Joshua Meyrowitz)将这一空间定义为“消失的地域”(no sense of place)。在这一地域中，即使“身体缺场”的个体也能进行“在场”般的互动，使他们在网络空间中的情感实践与其在真实交流与沟通场景中的情感实践具有高度相似性，进而有助于他们完成个人情感网络体系的搭建。③ 以表情包为例，“摸摸头”“抱抱”“亲亲”等动态表情包既生动活泼，又高度拟人化，极大地强化了“亲密体验”的真实性。这些表情包不但消解了“虚拟恋人”和消费者之间的地理距离和心理隔阂，而且为消费者提供了一种切实可感的交互体验。其二，网络空间中“虚拟恋人”的“身体缺场”带给消费者充足的想象空间，他们在编码和解码数字化信息的过程中往往会不自觉地将自己对恋爱关系的想象和对“理想恋人”的标准“投射”到“虚拟恋人”身上，④将“虚拟恋

① 自国天然：《情之所向：数字媒介实践的情感维度》，《新闻记者》2020年第5期。

② 约书亚·梅洛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③ 周云水、赵金才：《亲密关系的变革：“基友”的现实表现及其理论蕴含》，《青年研究》2015年第3期。

④ “投射”这个概念最早是由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提出的。他认为，“投射”是一种从别人身上发现自己的情感、想法或愿望的心理保护机制。例如，粉丝对偶像的喜爱往往来自偶像身上的某些特殊的品质，包括温柔、礼貌、努力等。这些品质既是粉丝的情感认同，也是他们的情感“投射”。拥有这些品质的个体就成了这些粉丝理想的伴侣或自己想成为的形象。参见朱丽丽、韩怡辰：《拟态亲密关系：一项关于养成系偶像粉丝社群的新观察——以TF boys个案为例》，《当代传播》2017年第11期。

关系和整个世界变得更具流动性，在此背景下，人们发现“建立有共鸣的关系太花时间了，而且一旦分开又会太痛苦”①。这必然导致传统意义上亲密关系的式微：每个现代人内心处于一种居无定所的漂泊状态——人们渴望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在互动中建构自我认同；但是不确定性使他们对长久和稳定的传统亲密关系愈发充满陌生感，甚至是恐惧感。

因此，无论是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快速发展，还是加速社会的兴起，都是导致个体情感“荒漠化”特征的重要因素，人们有强烈的交往需求，尤其是对亲密关系的渴望，期待尽情倾诉与宣泄。② 如何帮助个体，尤其是当代青年人在日常生活中获得心理上的陪伴感和情感上的慰藉就成为一个重要且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也是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难题。

笔者认为，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为此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解决路径。荷兰哲学家约斯·德·穆尔(Jos de Mul)认为，网络技术为我们构筑了一个超凡的情感世界，各种人物、象征和叙事在此相互交织，而成为人们“精神寄托的自留地”。③ 当前，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将网络空间中的“虚拟恋人”服务视为一种逃离现实生活和实现恋爱自由的有效方式。“虚拟恋人”服务有助于他们“精心缝合因现实生活中亲密关系匮乏所导致的情感生活单一和自我的孤寂”，即时和短暂地获得亲密关系所带来的陪伴和温暖，同时“创造出一种表达爱欲、释放自我等与情感体验紧密相关的生活方式”，赋予日常生活以不凡的意义。④

“虚拟恋人”服务的方兴未艾不仅部分解决了当代青年人情感“荒漠化”的困境，而且还满足了他们对消费体验的需求——他们将消费视为

---

① 哈尔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41页。

② 孙信茹、甘庆超：《“熟悉的陌生人”——网络直播中刷礼物与私密关系研究》，《新闻记者》2020年第5期。

③ 约斯·德·穆尔：《赛博空间的奥德赛：走向虚拟本体论与人类学》，麦永雄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7页。

④ 孙信茹、甘庆超：《“熟悉的陌生人”——网络直播中刷礼物与私密关系研究》，《新闻记者》2020年第5期，第34页。

一种现代生活方式，普遍接受甚至是主动选择用市场化的方式来满足其情感需求。因此，“虚拟恋人”服务在当代青年人情感期待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双重需求下应运而生。但也有不少学者坚持认为，情感性关系和被商品化的关系应该进行严格区分，两者的组织原则是相互对立的，彼此需要保持适当的边界，并对市场原则支配和加速恶化人类真正的情感关系表示深深的忧虑。①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如果当个体在现实生活中感到情感关系的疏远时，他们选择市场化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那么这是否会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他们情感关系的疏离化？在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看来，消费会使人们处在“永恒监督所导致的持续的焦虑和渴望的状态”之中。② 也就是说，一方面，当消费者将网络空间中批量化生产的恋爱符号作为情感慰藉的全部寄托时，他们在体验虚拟的短暂欢愉之后会因再次感受到现实的压力而重陷孤独和焦虑的泥淖；另一方面，当他们深陷过度消费的网络世界时，与现实生活的日益隔绝最终将导致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获得和维系亲密关系的需求与渴望不断被消解，其相应的能力也将随之逐渐丧失。因此，他们极易永远蜷缩在“虚拟恋人”所建构的亲密关系中，陷入“孤独和焦虑——下单‘虚拟恋人’服务得到慰藉——更孤独和焦虑——继续下单‘虚拟恋人’服务”的无限循环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虚拟恋人”服务建构的网络空间中的亲密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个体现实生活中的情感缺失，但终究无法替代人们在现实社会交往中形成的亲密关系。

最后，需要高度注意的是，2014 年前后，由于部分虚拟恋人店铺非法提供色情服务被曝光，不久淘宝网屏蔽了“虚拟恋人”“聊天”等搜索关键词，虚拟恋人行业发展趋于隐秘化。尽管市场上大部分虚拟恋人店铺主打“绿色”聊天，但仍存在“擦边球”现象，甚至有一些未成年恋人馆堂而

① 马冬玲：《情感劳动——研究劳动性别分工的新视角》，《妇女研究论丛》2010 年第 3 期。

② 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140 页。

皇之地进行色情交易。2019 年我国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93.1%,我们有理由担心,虚拟恋人服务的行业乱象对社会公序良俗的影响会随着新媒体产品的普及和使用悄然蔓延,而维护虚拟恋人行业生态的有序和规范既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的作为,也有赖于店铺管理者和虚拟恋人服务提供者社会责任意识的不断提升。

结语　数字劳动研究及其未来

数字技术与 ICTs 正在以不可思议的发展速度将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场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不仅深远地影响着当前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且还孕育出一种新型的劳动形式——数字劳动。这种劳动形式日趋普遍，它囊括了 ICTs 和数字技术产业链上的所有劳动，涉及数字媒体生产、流通与使用所需的各种体力和脑力劳动，如 ICTs 和数字硬件设备的原料采掘、加工组装等体力劳动；软件开发、在线平台设计与维护等脑力劳动；以及互联网平台在线用户的生产性消费行为；等等。

作为数字技术与 ICTs 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加之全社会对互联网行业所带动的新型就业劳动状况恶化的种种担忧，数字劳动研究逐渐成为学者们展开资本主义结构性批判的新焦点，社会各界都在寻找答案与解释。① 在这其中，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及其论著独树一帜。他们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出发，聚焦数字劳动领域中劳动关系、劳动过程、劳动力再生产、劳动者自我认知和团结等方面的最新

① 周延云、闫秀荣：《数字劳动和卡尔·马克思：数字化时代国外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

发展与变化，一方面揭示出资本积累与增殖的实质，并将剥削劳动力的剩余价值视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另一方面透视国家保护、社会福利和工作稳定性不断被瓦解的过程，这两方面对于理解数字经济时代的剥削问题和劳动异化现象极具参考价值，同时很大程度上照亮了行政主义取向的传播学研究的盲点。① 此外，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并不囿于学理上的剖析与阐释，积极投身于社会变革的实践活动，为个人和社会的解放注入了无尽的动能。②

纵观既有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数字劳动研究，虽然在理论、对象、方法和对策等各方面不断创新和丰富，学术队伍也日益壮大，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灯下黑”的问题，学理探索和对数字劳工进行理论化的进程是永无止境的。与此同时，随着 ICTs 和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全球公正传播的新问题和社会不平等问题进一步复杂化，有些被“遮蔽”的劳动议题的重要性日渐凸显，这些盲点和议题既值得未来研究者关注与思考，也是数字劳动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和理论创新之可能的源泉。

一、数字劳动者的主体性研究

2020 年以来，平台算法对外卖骑手的精细化控制、互联网大厂的“厕所难题”、某电商巨头员工的过劳猝死，以及当代青年人被迫下沉展开“逐底竞争”(race to bottom)等劳动问题，甚至是基本生存问题引发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与激烈讨论，在此我们需要追问与思考：数字劳动者只是庞大社会机器上的一颗无言的螺丝钉吗？他们如何摆脱铁笼对他们的制度性和结构性束缚，用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的话来

① 孔令全、黄再胜：《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之数字经济时代拓展——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数字劳动价值创造研究》，《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8 年第 2 期。

② 姚建华、李兆卿：《重返历史的起点：刍议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化——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教授学术访谈》，《新闻记者》2017 年第 12 期。

说，他们怎样才能不再只是“一个快乐的机器人”？[①] 在数字劳动的未来研究中，探索与回应上述问题离不开对数字劳动者主体性问题的深度挖掘与全面反思。

如果我们将数字劳动者的主体性理解为他们所具有的“独立性、个体性、能动性以及占有和改造客体的能力”[②]，那么重新激发数字劳动者的主体性，既包括对他们作为劳动者个体的赋权（如职业技能的培训），又与组织层面的制度性、结构性、系统性改革密切相关，如劳动关系的规范与革新、劳动法律法规的健全与升级等。进一步来说，在未来的数字劳动研究中，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亟须关注以下两个核心问题：其一，数字劳动者如何摆脱拜物性、制度性、文化性的异化与桎梏，发挥其能动性，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其二，数字劳动者在将自我命运与他人命运乃至社会命运紧密关联之时，如何通过个体性、群体性或社会性的行动，迸发出自己的力量？[③]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数字劳动者的主体性问题，和批判与否思资本主义市场逻辑和人的异化逻辑，展开丰富多彩的“反向运动”，进而实现个体解放的问题是同构的。[④] 在王行坤看来，这些“反向运动”包括：夺回时间主权、削减工作时间、建设更民主的工作场所、争取更合理的工作日程和更人道的工作形式，以及获得更公正的劳动分配，等等。[⑤]

在具体的数字劳动者主体性研究方面，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首先，通过借鉴布洛维的理论，未来数字劳工研究可以考虑转向政治—经济—文化联合分析的理论框架，将意识形态问题纳入研究视野，关注

---

①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1 年，第 184—185 页。

② 孙祥飞：《“机器人新闻”与新闻工作者的主体性强化》，《新闻论坛》2016 年第 4 期。

③ 贾文娟：《从数字劳动探索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时代变迁》，《中国图书评论》2020 年第 8 期。

④ 吕新雨等：《生存，还是毁灭——“人工智能时代数字化生存与人类传播的未来”圆桌对话》，《新闻记者》2018 年第 6 期。

⑤ 王行坤：《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时间政治——评瓦克曼〈时间紧迫〉》，《中国图书评论》2018 年第 8 期。

在数字劳工的劳动过程中，劳动者的生产同意是如何形成的，即“数字劳动版本”的“制造甘愿”（manufacturing consent）是如何运作的，[①]不仅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引出发，而且在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前提下展开政治经济分析，聚焦于数字劳工的“劳动”与生产政体（production regime）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一思考路径以及政治—经济—文化联合分析的理论框架尤其适用于创造性地阐释产消合一者与玩工是如何“心甘情愿”地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为新媒体产业贡献劳动成果的。其核心是召唤劳动者的主体性，关注他们的个人体验，以及探讨他们如何参与自我剥削和异化的过程。

其次，未来数字劳工研究，特别是本土的研究还应尝试将考察范围扩大至生产场所之外的领域，将劳动者劳动力再生产的全部过程作为整体来分析，如他们的地缘特征、教育程度、生活方式、社会保障、后代哺育、老人赡养、社会关系，甚至情感生活等各种面向，即从“生产的政治”迈向“生产的政治”与“生活的政治”并重的理念。在工作场景之外，数字劳工并不直接受到资本和国家的控制，学校教育、同乡支持、社区生活都使他们得以突破狭隘的生产政体，意识到自身受到压迫的不合理性，进而“锻炼组织能力、建构团结网络”[②]。

最后，未来数字劳工研究应注意研究对象所具有的主体多样性，也就是说笼统的“劳工”一词很难精准描述实际上十分复杂的劳动者群体，男工/女工、移民/本地人、全职工/临时工/派遣工之间的差异非常巨大。在劳资关系与生产政治中，也并不只有阶级抗争和工人运动这一种抵制模式。保罗·约翰斯顿（Paul Johnston）提出，全球化时代的劳工运动强调劳动者在阶级立场以外的多元化的利益和身份，与公民权运动、性别

① Burawoy, Michael.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② 汪建华：《生活的政治：世界工厂劳资关系转型的新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3页。

平等运动等其他诉求的社会运动汇聚与合流，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改造社会的潜能，同时共同追求社会公共福利与公正的劳动和生活环境。①

二、数字劳动与社会公共性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办网站的不能一味追求点击率”②，这既是对互联网的生产机制和商品化逻辑的批评与反思，也启发我们对非异化的数字劳动展开思考与想象。数字劳动只是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和实现资本积累与增殖的异化劳动吗？在未来，相关学者可以关注互联网的公共服务责任，以及作为公共利益实现者和依托主体的广大数字劳动者。例如在2014年，美国卫星公司数字全球(DigitalGlobe)开放了自家的Tomnod众包平台，希望借助全球网友的力量，找到马航MH370的下落。随后，来自全球2.5万名网络志愿者根据Tomnod众包平台分配到的卫星图片，在线标记出自己肉眼所观察出的可疑线索、漂浮物或是残骸。同样，包括社交化开发平台GitHub、维基百科(Wikipedia)、维基解密(WikiLeaks)等在内的一系列“另类网络实践”为我们探讨数字劳动与公共性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材料和广阔的研究前景。

当然，对数字劳动与公共性问题的研究还涉及对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数据”的想象与展望。部分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主张，为了使大数据不再成为新自由主义继续扩张的新工具，③国家应该拥有公共数据的所有权

---

① Johnston, Paul. The Resurgence of Labor as Citizenship Movement in the New Labor Relations Environment. *Critical Sociology*, 2000(1/2): 139 - 160.

② 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6年4月19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4/25/c_1118731175.htm。

③ Qiu, Jack Linchuan. Reflections on Big Data: Just Because It Is Accessible Does Not Make It Ethical.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015(7): 1089 - 1094.

和监管算法规则的监督权,阻止用户/公民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生产的大数据被资本肆意占用和"圈地"。但是,还有不少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此观点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应只扮演代理性角色,它们掌握数据的唯一合法性来源就是获得用户/公民授权,其使用也必须以可确证的公共利益为出发点,防止任何数据"喂养"的算法反过来侵害、暗算社会成员,特别是广大互联网平台的劳动者。因此,用户/公民依然可以在数据权力体制中努力争取自治,锻造基于数据的技术公民权,保证数据技术的使用是公平和公正的,运用数据为公共利益服务,同时改善自身的生活体验。① 在未来,数字劳动与社会公共性议题有待相关学者持续深耕。

三、数字劳动与交叉性分析方法

自美国著名的民权倡导者金伯利·克伦肖(Kimberlé Crenshaw)采用交叉性分析方法开启种族和社会性别歧视相互交织的研究先河以来,②这一分析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和传播学的大量经验研究中,其重要价值在于,通过"剖析社会结构中复杂的权力蜘蛛网"(犹如撕开层层的洋葱皮)。一方面,透视和洞察微观权力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另一方面,揭示出多重权力结构对群体(尤其是处于社会边缘位置的群体)的宰制性和压迫性力量。③

在数字劳动研究方面,传播政治经济学者长期关注不同群体在不平等权力关系中形成的共同地位或面临的相似困境。他们往往采用阶级、

① 徐偲骕、洪婧茹:《谨慎对待城市"公私合营"与公共数据私人控制——评〈数字化世界的智慧城市〉》,《国际新闻界》2020 年第 10 期。

② Kimberlé, Crenshaw. Demarginalizing the Intersection of Race and Sex: A Black Feminist Critique of Antidiscrimination Doctrine, Feminist Theory and Antiracist Polit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Legal Forum*, 1989(1): 139 - 168.

③ 曹晋:《交叉分析模式与中国新媒体情境中的社会性别研究》,复旦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第二届"新媒体与社会性别研究"工作坊,2021 年 1 月 2 日。

社会性别、城乡关系等交叉性分析方法，将对数字劳动问题的讨论嵌入多元社会关系的整体性分析框架中，包括劳资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企业间关系等，且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①] 如部分学者长期聚焦生产政治的问题，探究阶级与社会性别在重建劳动者的主体性和形塑工厂政体方面的积极作用。他们发现，具有能动性的劳动者与权力结构之间并非简单的对抗或共谋关系，交叉性分析方法极大地丰富了生产政治的逻辑。[②] 在未来，特别是在研究方法层面，如何实现数字劳动研究与交叉性分析方法的深度融合是亟待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深思的问题。此外，除受政治和资本合力作用外，权力结构是否受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作用力的影响？这些力量又是如何与数字劳动相互嵌构的？这些问题兼备启发性和前沿性。

统而观之，伴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兴起，数字劳动应运而生。它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认知，成为时代发展特征孕育出的一种新型劳动形式和理论概念。相关研究从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经济学等多重视角出发，将数字劳动议题置于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叉框架下考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基石，结合后福特主义和意大利自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全方位地透视数字劳动的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价值增殖过程，进而揭示出从资本工业化时代到数字经济时代，从传统的机器大生产时代到智慧型数字化时代劳动形式、内涵和意义的演进与变迁过程。数字劳动研究是对传统劳动价值论批判性的继承与创造性发展，对于理解数字经济时代劳动异化和网络资本剥削问题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更为重要的是，面对中国数字劳动兴起的新现象和新挑战，汲取当

---

① 苏熠慧：《“交叉性”流派的观点、方法及其对中国性别社会学的启发》，《社会学研究》2016 年第 7 期。

② Lee, Ching Kwan. *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 Two Worlds of Factory Wome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代西方数字劳动研究的有益成果，深化对本土数字劳动的理论研究，系统地理解当代中国数字劳动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意涵，科学地揭示国家（政府）、资本、技术与劳动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多元关系，不仅是数字化时代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题中之义，也是立足于中国“互联网＋”实际，契合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目标，构建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的基础和保障，更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数字劳动研究新路径、持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迫切要求。

参考文献

著作部分

阿尔文·罗斯:《共享经济——市场设计及其应用》,傅帅雄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年。

阿莉·霍克希尔:《心灵的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成伯清、淡卫军、王佳鹏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20 年。

安东尼·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陈永国、汪民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

贝弗里·西尔弗:《劳工的力量:1870 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张璐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铦、王宏周、魏章玲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 年。

弗兰克·韦伯斯特:《信息社会理论》,曹晋、梁静、李哲、曹茂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

盖伊·塔奇曼:《做新闻》,麻争旗、刘笑盈、徐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年。

哈尔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董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

哈尔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

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方生、朱基俊、吴忆萱、陈卫和、张其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年。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刚、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年。

卡尔·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19 世纪思维中的革命性决裂》，李秋零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19 年。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年；2004 年。

卡尔·马克思：《马克思资本论节选本》，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

凯瑟琳·麦克切尔、文森特·莫斯可：《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曹晋、罗真、林曦、吴冬妮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年。

凯文·凯利：《网络经济的十种策略》，萧华敬、任平译，广州：广州出版社，2000 年。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1 年。

李连德：《一本书读懂人工智能》，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 年。

路易斯·芒福德：《路易斯·芒福德著作精萃》，宋俊岭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 年。

罗伯特·麦克切斯尼：《传播革命：紧要关头与媒体的未来》，高金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年。

迈克尔·布洛维：《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李荣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年。

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年。

迈克斯·泰格马克：《生命 3.0：人工智能时代人类的进化与重生》，汪婕舒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8 年。

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年。

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

乔纳森·特纳、简·斯黛兹：《情感社会学》，孙俊才、文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

乔治·瑞泽尔：《赋魅于一个祛魅的世界：消费圣殿的传承与变迁》，罗建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

邱林川：《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新工人阶级的网络社会》，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

汪建华：《生活的政治：世界工厂劳资关系转型的新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

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胡春阳、黄红宇、姚建华译，上海：上海译

文出版社，2013 年。

雪莉·特克尔：《群体性孤独》，周逵、刘菁荆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 年。

姚建华：《制造和服务业中的数字劳工》，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年。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郭方、刘新成、张文刚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

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年。

约斯·德·穆尔：《赛博空间的奥德赛：走向虚拟本体论与人类学》，麦永雄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

周延云、闫秀荣：《数字劳动和卡尔·马克思：数字化时代国外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

Adams, Tracy and Sandy Welsh. *The Organization and Experience of Work*. Toronto: Thomson and Nelson, 2008.

Altheide, David and Robert Snow. *Media Logic*.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79.

Auslander, Philip. *Liveness: Performance in a Mediatized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9.

Braverman, Harry.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Brynjolfsson, Erik and Andrew McAfee. *The Second Machines Age: Work, Progress, and Prosperity in a Time of Brilliant Technologie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14.

Burawoy, Michael.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u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Castells, Manuel.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West Sussex, UK: Wiley-Blackwell, 1996.

Cottle, Simon. *Mediatized Conflict: Developments in Media and Conflict Studies*. Berkshire,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6.

Couldry, Nick. *Listening Beyond Echoes: Media, Ethics, Agency in an Uncertain World*. Boulder, CO: Paradigm, 2006.

Dyer-Witheford, Nick. *Cyber-Marx: Cycles and Circuits of Struggle in High-Technology Capitalism*.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9.

Dyer-Witheford, Nick. *Cyber-Proletariat: Global Labour in the Digital Vortex*. London: Pluto Press, 2015.

Edwards, Richard. *Contested Terra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kpla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9.

Ford, Martin. *The Rise of the Robots: Technology and the Threat of a Jobless Future*.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5.

Fuchs, Christian. *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Graham, Mark, Lehdonvirta, Vili, Wood, Alex, Barnard, Helena, Hjorth, Isis and David Simon. *The Risks and Rewards of Online Gig Work at The Global Margins*. Oxford, UK: 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 2017.

Guy Standing. *The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1.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4.

Holman, David, Batt, Rosemary and Ursula Holtgrewe. *The Global Call Center Report: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Management and Employment*. Ithaca, NY: Authors, 2007.

Hong, Yu. *Labor, Class Formation and China's Informationized Polic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1.

Huws, Ursula. *The Making of a Cybertariat: Virtual Work in a Real World*.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3.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 *The Impact of Robots on Productivity, Employment and Jobs*. Frankfurt, Germany: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 Press, 2017.

Johnson, Steven. *How We Got to Now: Six Innovations that Made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2014.

Katz, Elihu and Paul Lazarsfeld. *Personal Influence: The Part Played by People in the Flow of Mass Communications*. New Jersey, N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66.

Lee, Ching Kwan. *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 Two Worlds of Factory Wome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Manovich, Lev. *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1.

Mayer, Vicki. *Below the Line: Producers and Production Studies in the New Television Econom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Mosco, Vincent and Catherine McKercher. *The Laboring of Communication: Will Knowledge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8.

Mosco, Vincent, McKercher, Cathrine and Ursula Huws. *Getting the Message: Communications Workers and Global Value Chains*. London: Analytica Publications, 2010.

Mosco, Vincent. *To the Cloud: Big Data in a Turbulent World*. Boulder, CO: Paradigm, 2014.

Qiu, Jack Linchuan. *Goodbye iSlave: A Manifesto for Digital Abolition*.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7.

Qiu, Jack Linchuan. *Working-Class Network Society: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Information Have-Less in Urban China*.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9.

Read, Jason. *The Micro-Politics of Capital: Marx and the Prehistory of the Present*.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3.

Robins, Kevin and Frank Webster. *Times of the Technoculture: From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to the Virtual Life*.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Ross, Andrew. *Nice Work If You Can Get It: Life and Labor in Precarious Time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9.

Schiller, Dan. *Digital Capitalis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9.

Scholz, Trebor. *Digital Labor: The 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Scholz, Trebor. *Platform Cooperativism: Challenging the Corporate Sharing Economy*. New York: Rosa Luxemburg Stiftung, 2016.

Scholz, Trebor. *Uberworked and Underpaid: How Workers Are Disrupting the Digital Economy*. New York: Polity, 2016.

Smythe, Dallas. *Dependency Road: Communications, Capitalism, Consciousness, and Canada*. Norwood, NJ: Ablex, 1981.

Toffler, Alvin. *The Third Wave*.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0.

Wajcman, Judy. *Pressed for Time: The Acceleration of Life in Digital Capitalism*.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

Weaver, David, Wilhoit, Cleveland and Lori Bergen. *The American Journalist: A Portrait of US News People and Their Work*.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

Yao, Jianhua. *Knowledge Work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 Reform and Resistance in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4.

论文部分

白红义:《当新闻业遇上人工智能:一个“劳动—知识—权威”的分析框架》,《中国出版》2018 年第 19 期。

蔡骐:《社会化网络时代的粉丝经济模式》,《中国青年研究》2015 年第 11 期。

蔡润芳:《“积极受众”的价值生产——论传播政治经济学“受众观”与 Web 2.0 “受众劳动论”之争》,《国际新闻界》2018 年第 3 期。

曹晋、曹茂:《“新闻民工”修辞的政治经济语境分析》,《当代传播》2017 年第 6 期。

曹晋、许秀云:《传播新科技与都市知识劳工的新贫问题研究》,《新闻大学》2014

年第 2 期。

曹晋、张楠华：《新媒体、知识劳工与弹性的兴趣劳动——以字幕工作组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 年第 5 期。

曹晋、赵月枝：《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脉络与人文关怀》，《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5 期。

曹静、周亚林：《人工智能对经济的影响研究进展》，《经济学动态》2018 年第 1 期。

曾维和、贺连辉：《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主体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理论探索》2015 年第 5 期。

曾祥敏、曹楚：《专业媒体新闻内容生产创新实践——用户生产与专业生产深度融合的路径研究》，《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 年第 11 期。

曾新星：《基于用户生成内容模式的传统媒体新闻生产创新研究》，湖南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硕士论文，2013 年。

常凯：《雇佣还是合作，共享经济依赖何种用工关系》，《人力资源》2016 年第 11 期。

陈国权：《气喘吁吁的全媒体记者》，《中国报业》2011 年第 23 期。

陈龙：《身体的劳动与劳动者——以足疗店青年女技师为例》，《青年研究》2016 年第 2 期。

陈世华：《信息政治经济学批判》，《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3 期。

陈甜甜：《新媒体语境下游戏从业者的非物质劳动研究》，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艺术设计学院硕士论文，2018 年。

陈卫星、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观念与命题——关于媒介学的学术对谈》，《南京社会科学》2015 年第 4 期。

陈卫星：《传播与媒介域：另一种历史阐释》，《全球传媒学刊》2015 年第 1 期。

陈卫星：《新媒体的媒介学问题》，《南京社会科学》2016 年第 2 期。

陈自富：《我们对“智能”的认识退步了吗？——与金观涛先生商榷》，《文化纵横》2018 年第 1 期。

成伯清：《当代情感体制的社会学探析》，《中国社会科学》2017 年第 5 期。

成伯清：《情感的社会学意义》，《山东社会科学》2013 年第 3 期。

崔学东、曹樱凡：《“共享经济”还是“零工经济”？——后工业与金融资本主义下的积累与雇佣劳动关系》，《政治经济学评论》2019 年第 1 期。

戴昕：《数据隐私问题的维度扩展与议题转换：法律经济学视角》，《交大法学》2019 年第 1 期。

戴宇辰：《走向媒介中心的社会本体论？——对欧洲“媒介化学派”的一个批判性考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 年第 5 期。

杜鹃、张锋、刘上、裴逸礼：《从有产者游戏到网络劳工——一项关于共享经济与劳动形式变迁的定性研究》，《社会学评论》2018 年第 3 期。

恩达·布罗菲、德·波伊特:《非物质性劳动、不稳定性和重构》,凯瑟琳·麦克切尔、文森特·莫斯可主编:《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曹晋、罗真、林曦、吴冬妮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220—237页。

菲利普·斯塔布、奥利弗·纳赫特韦,鲁云林译:《数字资本主义对市场和劳动的控制》,《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3期。

冯建三:《从〈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看文化与劳动的关系》,《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冯剑红、李国良、冯建华:《众包技术研究综述》,《计算机学报》2015年第9期。

冯象:《我是阿尔法——论人机伦理》,《文化纵横》2017年第6期。

格雷厄姆·默多克,刘宣伯、芮钰雅、曹书乐译:《媒介物质性——机器的道德经济》,《全球传媒学刊》2019年第2期。

格雷厄姆·默多克:《导言》,姚建华主编:《制造和服务业中的数字劳工》,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

韩婷:《试论人工智能视阈下新闻业的未来发展路径》,《东南传播》2019年第1期。

何怀宏:《奇点临近:福音还是噩耗——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最大挑战》,《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1期。

何明洁:《劳动与姐妹分化——"和记"生产政体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2期。

胡鹏辉、余富强:《网络主播与情感劳动:一项探索性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年第2期。

胡绮珍:《中国字幕组与新自由主义的工作伦理》,《新闻学研究》(中国台湾)2009年总第101期。

黄旦:《报纸革命:1903年的〈苏报〉——媒介化政治的视角》,《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6期。

黄欣荣:《人工智能与人类未来》,《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黄欣荣:《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的挑战及其应对》,《理论探索》2018年第5期。

黄炎宁:《中国社交媒体企业营销中的用户劳动和消费主义主体建构:以新浪微博上的杜蕾斯官方帐号为例》,《传播与社会学刊》(中国香港)2016年总第37期。

黄再胜:《网约平台劳动的合约特征、实践挑战与治理路径》,《外国经济与管理》2019年第7期。

惠·卡普尔:《"新"经济/传统劳工:创造力、扁平性及其他新自由主义的迷思》,凯瑟琳·麦克切尔、文森特·莫斯可主编:《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曹晋、罗真、林曦、吴冬妮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204—219页。

纪雯雯、赖德胜:《从创业到就业:新业态对劳动关系的重塑与挑战——以网络预约出租车为例》,《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

贾南:《"网红经济"的繁华与迷思——基于消费主义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的

批判视角》，安徽省第七届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论坛，2015 年。

贾文娟：《从数字劳动探索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时代变迁》，《中国图书评论》2020 年第 8 期。

蒋忠波、师雪梅：《国外算法新闻研究的进展与思考》，《新闻界》2019 年第 6 期。

解雯超：《自媒体时代我国公民新闻的发展》，《视听》2017 年第 3 期。

孔令全、黄再胜：《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之数字经济时代拓展——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数字劳动价值创造研究》，《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8 年第 2 期。

匡文波：《记者会被机器人取代吗》，《新闻与写作》2017 年第 9 期。

蓝江：《数字资本、一般数据与数字异化——数字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引》，《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4 期。

李光锡：《东亚青年与高科技文化——青年难民的劳动地牢摆脱记》，《热风学术网刊》2017 年第 1 期。

李梅：《聚焦中国“劳动”之变——劳动观念的时代跃迁与劳动形态的价值转换》，《探索与争鸣》2015 年第 8 期。

李翔：《互联网背景下监视社会理论的新发展》，《法制与经济》2008 年第 10 期。

李晓华：《人工智能的马克思主义解读》，《人民论坛》2019 年第 S1 期。

李晓菁、刘爱玉：《资本控制与个体自主——对国内空姐情感劳动的实证研究》，《妇女研究论丛》2017 年第 5 期。

梁萌：《技术变迁视角下的劳动过程研究——以互联网虚拟团队为例》，《社会学研究》2016 年第 2 期。

梁萌：《强控制与弱契约：网络技术影响下的家政业用工模式研究》，《妇女研究论丛》2017 年第 5 期。

梁萌：《网络领域中的知识工人》，《学术探索》2014 年第 3 期。

林素芬、林峰：《众包定义、模式研究发展及展望》，《科技管理研究》2015 年第 4 期。

林颖、吴鼎铭：《网民情感的吸纳与劳动化——论互联网产业中“情感劳动”的形成与剥削》，《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 年第 6 期。

刘诚：《劳动观、劳动关系与劳动政策——基于创造性劳动、人本主义和劳资合作的思考》，《探索与争鸣》2015 年第 8 期。

刘丹凌、赵娟娟：《对媒介化社会的批判与反思——基于媒介环境学的视角》，《学术论坛》2014 年第 4 期。

刘芳儒：《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的理论来源及国外研究进展》，《新闻界》2019 年第 12 期。

刘佳：《浅析新闻生产中的众包模式——以新华社“我在现场”为例》，《新闻世界》2018 年第 5 期。

刘居星：《“众包”模式下的参与式新闻》，《传播与版权》2015 年第 6 期。

刘新宇：《大数据时代数据权属分析及其体系构建》，《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6 期。

刘育婷、肖索未:《“干活时把雇主当家人,相处时把自己当外人”——住家家政工的雇主关系及情感劳动研究》,《妇女研究论丛》2020 年第 4 期。

陆胤、李盛楠:《分享经济模式对传统劳动关系的挑战——美国 Uber 案和解的一些借鉴》,《中国劳动》2016 年第 16 期。

吕新雨等:《生存,还是毁灭——“人工智能时代数字化生存与人类传播的未来”圆桌对话》,《新闻记者》2018 年第 6 期。

马骋宇:《在线医疗社区医患互动行为的实证研究——以好大夫在线为例》,《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16 年第 11 期。

马冬玲:《情感劳动——研究劳动性别分工的新视角》,《妇女研究论丛》2010 年第 3 期。

马维军:《人工智能时代记者如何突围》,《青年记者》2016 年第 8 期。

梅笑:《情感劳动中的积极体验:深层表演、象征性秩序与劳动自主性》,《社会》2020 年第 2 期。

蒙冬英:《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文学的媒介化生存》,华侨大学文学院硕士论文,2017 年。

孟晖:《人工智能技术重塑新闻生产的进路与问题》,《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0 年第 7 期。

莫里齐奥·拉扎拉托,高燕译:《非物质劳动(上)》,《国外理论动态》2005 年第 3 期。

牛禄青:《平台经济崛起》,《新经济导刊》2017 年第 11 期。

潘天君、欧阳忠明:《人工智能时代的工作与职业培训:发展趋势与应对思考》,《远程教育杂志》2018 年第 1 期。

裴长洪、倪江飞、李越:《数字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财贸经济》2018 年第 9 期。

彭兰:《人—机文明:充满“不确定性”的新文明》,《探索与争鸣》2020 年第 6 期。

彭增军:《巧夺人工? 人工智能与新闻自动化》,《新闻记者》2020 年第 1 期。

齐海静、蔡颖:《亲密关系综述》,《社会心理科学》2013 年第 9 期。

乔晓楠、郗艳萍:《数字经济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塑——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当代经济研究》2019 年第 5 期。

邱林川:《告别 i 奴:富士康、数字资本主义与网络劳工抵抗》,《社会》2014 年第 4 期。

邱林川:《新型网络社会的劳工问题》,《开放时代》2009 年第 12 期。

邱元阳:《人机关系:从卢德运动到机器换人》,《中国信息技术教育》2019 年第 19 期。

沈浩、元方:《“大数据时代”的自动化新闻写作的历史、实践与未来》,《新闻爱好者》2017 年第 4 期。

沈文玮:《论当代人工智能的技术特点及其对劳动者的影响》,《当代经济研究》2018 年第 4 期。

2019 年第 8 期。

姚建华、李兆卿:《重返历史的起点:刍议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化——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教授学术访谈》,《新闻记者》2017 年第 12 期。

姚建华、王洁:《虚拟恋人:网络情感劳动与情感关系的建构》,《青年记者》2020 年第 25 期。

姚建华、徐偲骕:《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数字劳动研究》,《新闻与写作》2021 年第 2 期。

姚建华、徐偲骕:《全球数字劳工研究与中国语境:批判性的述评》,《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 年第 5 期。

姚建华、徐偲骕:《新"卢德运动"会出现吗?——人工智能与工作/后工作世界的未来》,《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 年第 5 期。

姚建华、徐婧:《数字时代传播政治经济的新现象与新理论》,《全球传媒学刊》2017 年第 3 期。

姚建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18 年第 12 期。

姚建华:《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数字时代的劳动转型(编者按)》,《全球传媒学刊》2018 年第 4 期。

姚建华:《传承与发展:数字时代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新闻与写作》2019 年第 5 期。

姚建华:《零工经济中数字劳工的困境与对策》,《当代传播》2018 年第 3 期。

姚建华:《人工智能中的"人工":众包平台的实践与反思》,《新闻战线》2020 年第 7 期。

姚建华:《自动化新闻生产中的人机联姻及其实现路径》,《当代传播》2021 年第 1 期。

姚建华:《作为数据流的劳动者:智能监控的溯源、现状与反思》,《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 年第 5 期。

尹连根、王海燕:《失守的边界——对我国记者诠释社群话语变迁的分析》,《国际新闻界》2018 年第 8 期。

尤岩:《在互联网下众包新闻模式的探索》,《商》2016 年第 22 期。

喻国明、刘瑞一、武丛伟:《新闻人的价值位移与人机协同的未来趋势——试论机器写作对于新闻生产模式的再造效应》,《新闻知识》2017 年第 2 期。

喻国明:《"机器新闻写作"带动传媒新变局》,《新闻采编》2015 年第 6 期。

袁文全、徐新鹏:《共享经济视阈下隐蔽雇佣关系的法律规制》,《政法论坛》2018 年第 1 期。

詹婧、王艺、孟续铎:《网络平台使灵活就业者产生了分化吗?——传统与新兴灵活就业者的异质性》,《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8 年第 1 期。

张斌:《中国字幕组、数字知识劳(工)动与另类青年文化》,《中国青年研究》2017 年第 3 期。

张刚、孙婉璐:《技术进步、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一个文献综述》,《管理现代化》2020 年第 1 期。

张伟伟:《众包新闻:一个亟待关注与研究的领域》,《今传媒》2014 年第 4 期。

张欣:《国际电视媒体海外中心记者站运行模式初探》,《中国电视》2008 年第 11 期。

张新春、董长瑞:《人工智能条件下"人的全面发展"向何处去——兼论新技术下劳动的一般特征》,《经济学家》2019 年第 1 期。

张学英:《人工智能视阈下基于劳动就业迭代的技能形成问题研究》,《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8 年第 30 期。

张致铭:《"全民红包"与"直升机撒钱"》,《博鳌观察》2016 年第 7 期。

赵腾达、霍艳敏:《零工经济引领就业市场变革》,《上海信息化》2017 年第 4 期。

郑春风:《自动化新闻的实践、影响与困境》,《青年记者》2018 年第 28 期。

钟瑛、李苏、方晨:《新媒体环境中用户生产内容的价值及实现路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1 期。

周葆华、查建琨:《网络新闻从业者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新闻与写作》2017 年第 3 期。

周立君、汪涛:《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科学研究的众包网络平台研究综述》,《科技进步与对策》2014 年第 8 期。

周鹏:《是劳动,还是社交? ——从"东八区"记者微信群看社交媒体对新闻劳动的影响》,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硕士论文,2017 年。

周翔、李镓:《网络社会中的"媒介化"问题:理论、实践与展望》,《国际新闻界》2017 年第 4 期。

周欣姝:《众筹与众包新闻中职业记者角色的转变》,《传播力研究》2018 年第 19 期。

周云水、赵金才:《亲密关系的变革:"基友"的现实表现及其理论蕴含》,《青年研究》2015 年第 3 期。

朱丽丽、韩怡辰:《拟态亲密关系:一项关于养成系偶像粉丝社群的新观察——以 TF boys 个案为例》,《当代传播》2017 年第 11 期。

朱鸣:《"网约工权益保障研讨会"综述》,《工会理论研究》2017 年第 3 期。

朱阳、黄再胜:《劳动的情感参与:数字时代情感的价值和生产》,《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20 年第 2 期。

自国天然:《情之所向:数字媒介实践的情感维度》,《新闻记者》2020 年第 5 期。

Acemoglu, Daron. Technical Change, Inequality, and the Labor Marke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2(1): 7 - 72.

Acevedo, Deepa Das. Regulating Employment Relationships in the Sharing Economy. *Employee Rights and Employment Policy Journal*, 2016(20): 1 - 36.

Aloisi, Antonio. Commoditized Workers, Case Study Research on Labour Law Issues Arising from a Set of "On-Demand/Gig Economy" Platform. *Comparative*

Labour Law and Policy Journal, 2016(3): 653 - 690.

Arrieta Ibarra, Imanol, Goff, Leonard, Jiménez Hernández, Diego, Lanier, Jaron and E. Glen Weyl. Should We Treat Data as Labour? Moving Beyond "Fre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Papers & Proceedings*, 2017(1).

Author, David. The Skill Content of Recent Techological Change: An Empirical Explor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3(4):1279 - 1333.

Bergvall-Kåreborn, Birgitta and Debra Howcroft. Amazon Mechanical Turk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Labour. *New Technology, Work & Employment*, 2014(3): 213 - 223.

Boes, Andreas, Kämpf, Tobias, Lühr, Thomas and Alexander Ziegler. Cloud & Crowd: New Challenges for Labour in the Digital Society. *Triple C*, 2017(1): 132 - 147.

Bosch, Gerhard. Towards a New Standard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in Western Europe.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2004(4): 617 - 636.

Braun, Joshua. Going Over the Top: Online Television Distribution as Sociotechnical System. *Communication, Culture & Critique*, 2013(3): 432 - 458.

Brophy, Enda. Labour Precarity and Collective Organizing at Microsoft.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6(3): 619 - 638.

Brophy, Enda. The Subterranean Stream: Communicative Capitalism and Call Centre Labour. *Ephemera*, 2010(3/4): 470 - 483.

Buhrmester, Michael, Kwang, Tracy and Samuel Gosling. Amazon's Mechanical Turk: A New Souce of Inexpensive, Yet High-Quality, Data.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1(1): 3 - 5.

Cao, Jin and Graham Murdock. Holding Down Half the Sky: Female Knowledge Workers and Flexible Employment in China's Publishing Conglomerates. *Work Organisation, Labour & Globalisation*, 2015(2): 14 - 35.

Carlson, Matt. Automating Judgment? Algorithmic Judgment, News Knowledge, and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New Media & Society*, 2018(5): 1755 - 1772.

Casilli, Antonio. Digital Labor Studies Go Global: Toward a Digital Decolonial Turn. *Internati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7(11): 21.

Chan, Jenny, Pun, Ngai and Mark Selden. The Politics of Global Production: Apple, Foxconn and China's New Working Class. *New Technology, Work & Employment*, 2013(2): 100 - 115.

Cohen, Nicole. Cultural Work as a Site of Struggle: Freelancers and Exploitation. *Triple C*, 2012(2): 141 - 155.

Cohen, Nicole. Negotiating Writers' Rights: Freelance Cultural Labour and the Challenge of Organizing. *Just Labour*, 2014(17/18): 119 - 138.

Comer, Edward. Digital Prosumption and Alienation. *Ephemera*, 2010(3/4): 439 - 454.

Couldry, Nick. Mediatization or Mediation? Alternative Understandings of the Emergent Space of Digital Storytelling. *New Media & Society*, 2008(3): 373 - 391.

Deuze, Mark and Steve Paulussen. Research Note: Online Journalism in the Low Countries.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2(2): 237 - 245.

Economides, Nicholas. The Economics of Network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1996(4): 673 - 699.

Fast, Karin, Örnebring, Henrik and Michael Karlsoon. Metaphors of Free Labor: A Typology of Unpaid Work in the Media Sector.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016(7): 963 - 978.

Felstiner, Alek. Working the Crowd: Employment and Labour Law in the Crowdsourcing Industry. *Berkeley Journal of Employment and Labour Law*, 2011 (32): 143 - 203.

Ferus-Comelo, Anbiel. Free Bird: The New Precariat in India's Mobile Manufacturing. I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Labor and Media*, edited by Richard Maxwell, 2015, London: Routledge, pp. 119 - 129.

Ferus-Comelo, Anibel. Paving the Path Toward the Unionization of High-Tech Sweatshops. In *Trade Union Responses to Globalization : A Review by the Global Union Research Network*, edited by Verena Schmidt, 2007,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pp. 51 - 62.

Fisher, Eran. "You Media": Audiencing as Marketing in Social Media.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015(1): 50 - 67.

Flanagan, Frances. Theorising the Gig Economy and Home-Based Service Work.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2019(1): 57 - 78.

Ford, Heather and Jonathon Hutchinson. Newsbots that Mediate Journalistic and Audience Relationships. *Digital Journalism*, 2019(8): 1013 - 1031.

Fort, Karen, Adda, Gilles and Bretonnel Cohen. Amazon Mechanical Turk: Gold Mine or Coal Mine.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2011(2): 413 - 420.

Frey, Carl Benedikt and Michael Osborne. The Future of Employment: How Susceptible Are Jobs to Computerisation?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17(114): 254 - 280.

Fuchs, Christian. Dallas Smythe Today—The Audience Commodity, the Digital Labour Debate, Marxist Political and Critical Theory. *Triple C*, 2012 (2): 692 - 740.

Fuchs, Christia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Society: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Internet.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9(1): 69 - 87.

Fuchs, Christian. Web 2. 0, Prosumption, and Surveillance. *Surveillance & Society*, 2011(3): 288 - 309.

Fuchs, Christian. With or Without Marx? With or Without Capitalism? A Rejoinder to Adam Arvidsson and Eleanor Colleoni. *Triple C*, 2012(2): 633 - 645.

Gallant, Linda and Gloria Boone. Communicative Informatics: An Active and Creative Audience Framework of Social Media. *Triple C*, 2011(2): 231 - 246.

Gamson, William and Gadi Wolfsfeld. Movements and Media as Interacting System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993(1): 114 - 125.

García Avilés, José Alberto, León, Bienvenido, Sanders, Karen and Jackie Harrison. Journalists at Digital Television Newsrooms in Britain and Spain: Workflow and Multi-Skilling in a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Journalism Studies*, 2004(1): 87 - 100.

Gereffi, Gary. The Organization of Buyer-Driven Global Commodity Chains. In *Commodity Chains and Global Capitalism*, edited by Gary Gereffi and Miguel Korzeniewics, 1994, Westport, CO: Greenwood Press, 95 - 122.

Ghuman, Ramandeep and Ripmi Kumari. Narrative Science: A Re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2013(9): 205 - 207.

Hammon, Larissa and Hajo Hippner. Crowdsourcing. *Business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Engineering*, 2012(3): 163 - 166.

Hjarvard, Stig. From Bricks to Bytes: The Mediatization of a Global Toy Industry. In *European Culture and the Media*, edited by Ib Bondebjerg and Peter Golding, 2004, Bristol, UK: Intellect Books, pp. 43 - 63.

Howe, Jeff. The Rise of Crowdsourcing. *Wired*, 2006(6): 1 - 5.

Huws, Ursula. The Underpinnings of Class in the Digital Age: Living, Labour and Value. *Socialist Register*, 2014(50): 80 - 107.

Ibarra, Imanol Arrieta, Goff, Leonard, Hernández, Diego Jiménez, Lanier, Jaron and Glen Weyl. Should We Treat Data as Labor? Moving Beyond "Fre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Papers and Proceedings*, 2018(108): 38 - 42.

Ipeirotis, Panos. Analyzing the Mechanical Turk Marketplace. *XRDS*, 2010 (2): 16 - 21.

Irani, Lilly. Difference and Dependence among Digital Workers: The Case of Amazon Mechanical Turk.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2015(1): 225 - 234.

Irani, Lilly. The Cultural Work of Microwork. *New Media & Society*, 2013 (5): 720 - 739.

Jia, Lianrui and Dwayne Winseck.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Internet Companies: Financialization, Concentration, and Capitalizati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2018(1): 30 - 59.

Communication : Minding the Gap, edited by Katharine Sarikakis and Leslie Shade, 2008,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p. 241 - 257.

Silberman, M. Six and Lilly Irani. Operating an Employer Reputation System: Lessons from Turkopticon, 2008 - 2015. *Comparative Labour Law and Policy Journal*, 2016(3): 505 - 542.

Smythe, Dallas. 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1977(1): 1 - 27.

Staab, Philipp and Oliver Nachtwey. Market and Labour Control in Digital Capitalism. *Triple C*, 2016(2): 457 - 474.

Standing, Guy. The Precariat: From Denizens to Citizens? *Polity*, 2009(4): 588 - 608.

Steeves, Leslie and Janet Wasko. Feminist Theory and Political Economy: Toward a Friendly Alliance. In *Sex and Money : Feminism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Media*, edited by Eileen Meehan and Ellen Riordan, 2002,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p. 16 - 29.

Stevens, Andrew and Vincent Mosco. Prospects for Trade Unions and Labour Organizations in India's IT and ITES Industries. *Work Organisation, Labour & Globalisation*, 2010(2): 39 - 59.

Stewart, Andrew and Jim Stanford. Regulating Work in the Gig Economy: What Are the Options? *The Economic and Labour Relations Review*, 2017(3): 420 - 437.

Sussman, Gerald and Carey Higgins-Dobney. The Planned Obsolescence of TV Journalism. I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Labor and Media*, edited by Richard Maxwell, 2015, New York: Routledge, pp. 230 - 241.

Taylor, Nicholas, Bergstrom, Kelly, Jenson, Jennifer and Suzanne de Castell. Alienated Playbour: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in EVE Online. *Games & Culture*, 2015(4): 365 - 388.

Terranova, Tiziana. Free Labour: Producing Culture for the Digital Economy. *Social Text*, 2000(2): 33 - 58.

van Dalen, Arjen. The Algorithms Behind the Headlines: How Machine-Written News Redefines the Core Skills of Human Journalism. *Journalism Practice*, 2012(5 - 6): 648 - 658.

Weber, Matthew and Allie Kosterich. Coding the News: The Role of Computer Code in Filtering and Distributing News. *Digital Journalism*, 2018(3): 310 - 329.

Wilson, James and Paul Daugherty. Collaborative Intelligence: Humans and AI Are Joining Force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18(4): 114 - 123.

Zhao, Yuezhi and Rob Duffy. Shorted-Circuited? The Communication of Labor Struggles in China. In *Knowledge Worker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edited by

Marge, Matthew, Banerjee, Satanjeev and Alexander I. Rudnicky. Using the Amazon Mechanical Turk for Transcription of Spoken Language.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coustics Speech and Signal Processing, March 14 - 19, 2010, Dallas, TX.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Jobs Lost, Jobs Gained: Workforce Transitions in a Time of Automation. McKinsey & Company Report, 2017.

Morikawa, Masayuki. Who Are Afraid of Losing Their Jobs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Robots? Evidence from a Survey.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2017.

Morozov, Evgeny. Data Populists Must Seize Our Information for the Benefit of Us All. *The Guardian*, December 4, 2016.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6/dec/04/data-populists-must-seize-information-for-benefit-of-all-evgeny-morozov.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 Participative Web: User-Created Content, Working Party on the Information Economy, April 12, 2007. https://www.oecd.org/sti/38393115.pdf.

Örnebring, Henrik, Karlsson, Michael and Karin Fast. The Labor of Journalism: Challenges of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Restructuring. Digital Disruptions to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Conference, Missouri University Brussels Office, Brussels, Belgium, October 2 - 3, 2014.

Ross, Joel, Irani, Lilly, Silberman, M. Six, Zaldivar, Andrew and Bill Tomlinson. Who Are the Crowdworkers? Shifting Demographics in Mechanical Turk. Proceedings of the 28th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Extended Abstracts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 April 10 - 15, 2010, New York.

Schmidt, Florian. Digital Labour Markets in the Platform Economy: Mapping the Political Challenges of Crowd Work and Gig Work. Friedrich-Ebert-Stiftung Project, 2017. http://library.fes.de/pdf-files/wiso/13164.pdf.

Schwab, Klaus.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What It Means and How to Respond. *Foreign Affairs*, December 12, 2015.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6/01/the-fourth-industrial-revolution-what-it-means-and-how-to-respond/.

Schwartz, Oscar. Untold History of AI: How Amazon's Mechanical Turkers Got Squeezed Inside the Machine. *IEEE Spectrum*, April 22, 2019, https://spectrum.ieee.org/tech-talk/tech-history/dawn-of-electronics/untold-history-of-ai-mechanical-turk-revisited-tktkt.

Silberman, M. Six and Lilly Irani. Operating an Employer Reputation System: Lessons from Turkopticon, 2008 - 2015. *Comparative Labour Law and Policy Journal*, 2016(3): 505 - 542.

Smith, Rebecca and Sarah Leberstein. Rights on Demand: Ensuring Workplace

Standards and Worker Security in the On-Demand Economy. National Employment Law Project, New York, 2015, https://www.nelp.org/wp-content/uploads/Rights-On-Demand-Report.pdf.

Srnicek, Nick. We Need to Nationalise Google, Facebook and Amazon. Here's Why. *The Guardian*, August 30, 2017.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7/aug/30/nationalise-google-facebook-amazon-data-monopoly-platform-public-interest.

Thornhill, John. Social Media Users of the World Unite!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5, 2018. https://www.ft.com/content/ea6c3a0c-0843-11e8-9650-9c0ad2d7c5b5.

Tingley, Kim. Learning to Love Our Robot Co-Workers.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3,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02/23/magazine/learning-to-love-our-robot-coworkers.html.

Trajtenberg, Manuel. AI as the Next GPT: A Political-Economy Perspectiv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18.

后记　我与劳动研究的故事

作为一名行政管理专业出身的青年学人，我对劳动研究的兴趣始于本科阶段。在《公共行政学》和《西方行政学说史》两门课程上，竺乾威教授和顾丽梅教授如数家珍地向我们介绍和讲解了包括泰罗制科学管理原理、梅奥的霍桑实验和人际交往理论、麦格雷戈的 XY 理论、赫茨伯格的双因素激励理论在内的一系列西方行政学理论，这些理论都涉及对人性基本假设的探讨，主张通过对劳动者进行有效的科学化管理，实现组织的经济与效率目标。在学习和掌握这些理论的过程中，我逐渐对一个问题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企业是如何将生产要素（尤其是人力资源要素）合理地组织起来的？是如何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能动性进而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在这种求知欲的驱动下，我在课余时间阅读了《科学管理原理》（*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人类动机理论》（*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再论如何激励职工》（*One More Time: How Do You Motivate Employees?*）等大量西方经典的行政学和管理学文献，这些著作不但深化了我对上述问题的理解与思考，而且帮助我夯实了相关的理论基础，丰富了相应的知识储备。

如果没有起初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曹晋教授的推荐，没有之后亲炙莫

斯可教授的经历，那么我的学术旨趣可能会沿着行政管理的路径走下去，即聚焦政府或者现代企业组织及其人力资源管理，和新闻传播与媒介产业也许永远将是平行线的关系了。在导师莫斯可教授的推荐下，我在博士一年级时仔细研读了他和凯瑟琳·麦克切尔教授合著的《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Knowledge Worker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和《传播的劳动：全世界知识劳工会联合吗?》(*The Laboring of Communication : Will Knowledge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两本彼时在传播劳动领域极富系统性、权威性和前瞻性的“鸿篇巨制”。同时，在导师学术旨趣的直接影响下，我的博士论文最终聚焦中国出版产业中的编辑群体，试图解释中国社会的加速市场化和全球化进程对编辑人员日常工作及生活的全方位影响，尤其是探讨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改革背景下，编辑人员所面临的诸多机遇和挑战，进而剖析作为“新知识无产者”的他们与中国社会变迁之间的勾连关系。可以说，这项研究旨在通过极富冲击力的第一手经验材料，向读者呈现这样一番时代图景：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以编辑人员为代表的广大中国知识劳动者作为劳动力商品，受到了资本、技术和权力的多重宰制，他们不但失去了作为知识分子在改革前所享有的崇高的社会地位与声望，而且在经济上也被无情地甩出先前由政府统包统揽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陷入“朝不保暮”的不稳定状态。博士论文所采纳的这一鲜明的批判主义立场一直持续至今，成为我学术研究的重要支点。

2016年初，我正式入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彼时正是中国互联网高速发展和数字信息技术不断革新的黄金时期，数字经济时代的脚步也越来越近。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社会情境下，数字技术的支持部门和新兴经济部门对新型劳动力的需求日趋高涨，数字劳工群体应运而生。一部分来自传播政治经济学和劳动社会学领域的学者开始关注数字经济背后的劳动议题，特别是劳动者和劳工组织的变迁，并围绕劳动力商品化、劳资关系、资本的积累与增殖、劳动剥削与异化等议题，发表了不少

开拓性的经验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既回应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又紧密联系着本土最新实践。正是因为清晰地体认到上述时代背景的深刻变迁，我自己的研究兴趣在2016年后也更多地聚焦数字劳动。

四卷本的“媒介和数字劳工研究：西方的视角”丛书是我在数字劳动领域的第一项学术成果，由商务印书馆于2017年至2020年陆续出版。这套丛书从阶级、社会性别、权力等一系列社会学的核心范畴出发，以制造业、服务业、媒介产业等诸多产业中的数字劳动者为“经”，以信息时代的价值与积累、数字劳动方式与特征、信息产业的劳动关系等重大议题为“纬”——在两者的相互交织中，数字劳动研究被赋予了强大的理论阐释力。需要指出的是，伴随互联网驱动下的移动设备普及，大量在休闲时间内创造价值的用户产生了，而由这些新型数字劳工——“产消合一者”生产的内容已经成为数字资本主义新的剩余价值的增长点，这套丛书也是国内较早关注此问题的著作。彼时，我编著这套丛书的“初心”，是想把对数字劳动的考察放置在更为宏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脉络之中，在分析和阐释数字时代劳动形式多样化、劳动关系复杂化、劳动控制过程严密化的基础上，探究数字劳工生活和工作的结构性变迁，以及背后庞杂的权力关系网络。诚然，这套丛书既是我数字劳动研究的起点，也为我日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完整的知识体系。

读者现在看到的这本小书，是这份“初心”的赓续。它是我的第一本中文学术专著，凝结了我对劳动问题（尤其是数字劳动问题）几乎所有的整体性和原创性思考。它尝试从理论前沿和在地经验两个维度出发，一方面为读者细致梳理和全景展现数字劳动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帮助读者打开一扇通往繁茂学术“森林”的理论大门；另一方面关注数字劳动的实践逻辑，坚持从日常生活经验出发，将自身在鲜活场景中的微观体察与社会的宏观结构分析紧密地扣连起来，在广阔的社会情境中审视数字劳动与全球外包、灵活积累、技能变迁、情感服务之间的多元张力，在运用理论回应现实问题的同时，进一步推进本土化的理论生产。

数年以来，我的数字劳动研究经历了从研学经典理论到将经典理论与经验现实紧密结合，再到省思经典理论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如前所言，我将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和劳动社会学中经典理论的研学作为个人数字劳动研究的起点（如受众商品理论、产消合一理论、劳动过程理论、劳动分工理论等），并在此基础上，撰写和发表了若干篇与此相关的研究综述，系统地阐述了其内涵与外延，这些内容也成为本书**上篇（数字劳动与理论前沿）**的主体部分。其中，劳动过程理论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劳动控制问题、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问题、劳动者的异化问题以及劳动者的主体性问题（主要表现为劳动者对剥削和异化的结构性抗争）都是数字劳动研究中十分重要的议题。我以亚马逊在线众包平台上的零工劳动者、新媒体平台的新闻专员为研究对象，尝试从微观的、切实可感的分析视角切入，将经典理论与经验现实有机结合起来。其一，透析平台的运作机制和劳动控制过程（*劳动控制*）；其二，揭示出平台资本跨越时空限制、动员和整合全球范围内的劳动力，从而实现资本弹性化积累的实质（*劳动剥削*）；其三，探究劳动者有效的反控制、反剥削的集体实践（*劳动抗争*）。相关研究构成了本书**第五章（全球外包、数字劳动与劳动控制）**和**第六章（众包新闻、数字劳动与灵活积累）**的主要内容。不过，我很快就意识到，仅仅运用上述“劳动控制—劳动剥削—劳动抗争”这一经典分析框架来进行数字劳动研究，似乎很容易把自己囚困在一个固定的套路或者熟悉的逻辑中，从而导致研究日渐窄化和僵化，对于一位年轻学者来说，这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因此，我开始尝试反省自己的既有研究，并对经典理论进行省思，探索将技术、技能、情感等要素嵌入资本和劳动的二元关系中。本书的**第四章（下一代互联网、数字劳动与工作/后工作世界的未来）**、**第七章（自动化新闻、数字劳动与技能变迁）**和**第八章（平台经济、数字劳动与情感关系）**即是上述反省和探索的阶段性成果。它们尝试回应下列三组具体问题：其一，由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构成的下一代互联网技术是否会导致工作岗位的消失，进而导致劳动的消

的出版给予了全额的经费支持。

感谢传播政治经济学、劳动社会学和文化研究学术共同体中的每一份子。这些年，十分幸运能有机会和其中的许多优秀学者共同探讨学术问题，展开密切的学术合作，在学术上相互激发、不断精进。在此，特别感谢本书序言的作者之一——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的罗小茗副教授。同时，她也是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骨干。该中心及其刊物《热风学术》不仅对数字劳动议题青眼有加，而且凝聚了大量文化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青年学者。他们在此发声，用思想温暖学术、用学术关怀现实。感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优秀毕业生，现同样任职于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的徐偲骕博士。他是曹晋教授的高足，与我有着长年紧密的合作，本书的许多观点都可以追溯到我和徐偲骕博士激烈的观点交锋和思想碰撞。他在百忙之中，对本书的清样进行了通读和修改，使全书的整体表达更为准确、流畅和凝练。同样感谢中国传媒大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姬德强教授、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陈世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沙垚副研究员、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吴鼎铭副教授、上海大学社会学院贾文娟副教授。身处这样一个知识社群，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学术大家庭的温暖和团结，更激励我在学术道路上不断前行。

当然，特别的感谢也要送给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传播学院赵月枝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吕新雨教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郭镇之教授、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冯建三教授和刘昌德教授、英国拉夫堡大学传媒研究中心默多克教授、美国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传播与多媒体学院彭达库教授。本书的不少观点得益于这些学者兼备学理深度和人文情怀的著述，同时他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对我的学术成长给予鼎力支持。

当然，一如既往地感谢我的导师莫斯可教授。虽然最近两三年，我们之间的联系不像之前那样频繁，但导师总是在第一时间无条件地支持

我的每一个学术项目，为我提供宝贵的学术资源，这份恩情没齿难忘。

感谢我的父母这么多年来对我工作的理解和对我不求回报的付出。这份坚如磐石的亲情使我能在近不惑之年，仍然葆有一个理想主义者的信念与情怀。我始终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丰富数字劳动研究的理论光谱，有助于激发后续研究者的学术想象，不断推进数字劳动研究的广度、深度与厚度；我更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永远葆有凝视结构的勇气，直击底层社会的焦灼与阵痛、内隐与期待，然后用文字和思想的力量来温热悲寒的生命。我希望自己不只是一名敏锐的社会观察者和冷静的理论阐释者，同时也是满怀热忱和社会责任感的实践者与行动者，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劳动者发出一点声音，为社会进步贡献微薄的力量。

最后，本书的出版多亏了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胡翼青教授和助理研究员吴志远博士，没有两位老师的牵线搭桥，就没有这本小书与江苏人民出版社这样高端学术平台的因缘际会。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王保顶社长对本书在出版全过程中的每一份关怀与支持，史雪莲副编审亲自操刀这本小书的审校工作，书稿的付梓离不开她强大的智力支持和无私的情感劳动，她对小书所默默倾注的心血令我无比感动。由于个人水平有限，本书中难免会有疏漏，我理应承担全部责任，同时也敬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2021 年 8 月 31 日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